

FLC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季刊

| 第7卷 第3期 | (总第25期) | 2023年9月 |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第7卷 第3期 | (总第25期) | 2023年9月 |

主 编：蒋洪新 Editor-in-Chief: Hongxin Jiang
副 主 编：邓颖玲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Yingling Deng
执 行 主 编：曾艳钰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Yanyu Zeng
编辑部主任：任海燕 Managing Editor: Haiyan Ren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众议 湖南师范大学
黄国文 华南农业大学
黄友义 中国翻译协会
黄忠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德凤 澳门大学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
聂珍钊 浙江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束定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 宁 上海交通大学
王守仁 南京大学
许 钧 浙江大学
杨金才 南京大学
张隆溪 香港城市大学

Editorial Board

Zhongyi Che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Guowen Hua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ouyi Huang,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Zhonglian Hua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Li Ji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Defeng Li, University of Macau
Jiande L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zhao Nie, Zhejiang University
Dan Shen, Peking University
Dingfang Shu,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ongzhi Wa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efei Wa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Ning W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ouren Wang, Nanjing University
Jun Xu, Zhejiang University
Jincai Yang, Nanjing University
Zhang Longx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主 管：湖南省教育厅 出版发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海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主 办：湖南师范大学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2096-4366 海外发行代号：QR9393
编 辑：《外国语言与文化》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3-1536/H 国内发行：湖南省邮政报刊发行局
邮 箱：jflc@hunnu.edu.cn 印 刷：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代号：42-380
地 址：湖南长沙岳麓区麓山路 36 号 出版日期：2023 年 9 月 28 日 整体设计：周基东
电 话：0731-88873041 定 价：28.00 元 排版制作：书亦有道

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CNKI）收录，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期刊基本参数：CN43-1536/H*2023*q*16*160*zh*P*¥28.00*1500*14*2023-09

目次

文学中的性别与政治书写

- 001 《美国悲剧》中水域自然的隐喻意蕴 舒奇志 梁佳苇
012 乌托邦建构的悖论：从《上来透口气》看乔治·奥威尔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 孙怡冰
025 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卖妻”及其性政治研究 吾文泉
035 “后9·11”男性神话的颠覆——《国家乱象》中的美国男性气质反叙事解读 吴荣兰

文学文化研究

- 044 德意志民族诗学重塑与诗人功能——歌德叙事谣曲研究 段懿玲
057 加纳戏剧《阿诺瓦》中的文化记忆 黄坚 余湘玲
066 敬虔与自治——罗斯金人文精神的诗性图景 蔡成珍
078 日本儿童文学杂志《赤鸟》的教养指导与教育实践 林子愉
087 从城市到乡村：本·琼生城市喜剧和乡村庄园诗中的共同体想象 吴美群 方耀

比较文学研究

- 096 对位比较 大卫·达姆罗什 文逸闻/译
111 比较“西方”和“其他地区”：超越欧洲中心主义？ 西奥·德汉 肖美玲/译

翻译研究

- 122 巴恩斯通毛泽东诗词英译原则探微 侯奇焜

语言学研究

- 131 英语新闻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等级及其认知阐释 齐新刚 邓云华
144 文化话语研究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传播——基于《中国日报》网站和“网络新闻语料库”的对比分析

王彦 任欢

Contents

- 001 **Qizhi Shu, Jiawei Liang** Metaphorical Meanings of Aquatic Nature in *An American Tragedy*
- 012 **Yibing Sun** The Paradox of Utopia: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m in George Orwell's *Coming Up for Air*
- 025 **Wenquan Wu** "Wife Sale" in 19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and Its Sexual Politics
- 035 **Ronglan Wu** Demolishing Post-9/11 Male Myth: On the Counter-narrative of Masculinity in *A Disorder Peculiar to the Country*
- 044 **Yiling Duan** Reconstruction of German Folk Poetry and the Function of Poet: A Study of Goethe's Ballads
- 057 **Jian Huang, Xiangling Yu** A Study on Cultural Memory in *Anowa: A Ghanaian Drama*
- 066 **Chengzhen Cai** Veneration and Dominion: On John Ruskin's Humanistic Poetical Vision
- 078 **Ziyu Lin** The Self-cultivation Guidance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the Japanese Children's Magazine *Akaitori*
- 087 **Meiqun Wu, Yao Fang** From the City to the Country: Community Imagination in Ben Jonson's City Comedies and Country House Poems
- 096 **David Damrosch** Contrapuntal Comparison
- 111 **Theo D'haen** Comparing "West" and "Rest": Beyond Eurocentrism?
- 122 **Qikun Hou** A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ao Zedong's Poems by Willis Barnstone
- 131 **Xingang Qi, Yunhua Deng** A Cognitive Study on the Subjectivity Hierarchy of Hedging in English News Discourse
- 144 **Yan Wang, Huan Ren** A Corpus-based Comparative Cultural Discourse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etween *China Daily* and News on the Web Corpus

FLC

文学中的性别与政治书写

《美国悲剧》中水域自然的隐喻意蕴

◎ 舒奇志 梁佳菁

内容提要: 西奥多·德莱塞的《美国悲剧》以 20 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的一起湖上情杀案为素材, 没有将作为故事背景的湖区即水域自然视为固定的物理空间, 而是将之作为城市空间的一种延展、文本意义的发生场和叙事维度, 并结合地理物象和地理事象赋之以多重隐喻意义。这一水域自然既承载了主人公实现阶级跃升的欲望, 也是其美国梦的幻灭之地, 彰显了 20 世纪初期美国环境政治话语的权力运作方式, 表达了德莱塞对美国社会转型时期阶级区隔、权力欲求和环境政治问题的独特思考。

关键词: 西奥多·德莱塞 《美国悲剧》 水域自然 文学地理学 符号隐喻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3-0001-11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规划一般课题“19—20 世纪之交美国文学中的男性气质与城市空间想象研究”(18YBA396)

作者单位: 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3.001

Title: Metaphorical Meanings of Aquatic Nature in *An American Tragedy*

Abstract: Based on source materials of a real-life lake murder occur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odore Dreiser's *An American Tragedy* does not consider its background, the lake area—the aquatic nature, as a fixed physical space, but as an extension of the urban space, as a productive site for textual ideas and as narrative dimension, which is endowed with metaphorical meanings via geographical images and geographical activities. The aquatic nature in the work does not only bear the protagonist's desire for social climbing which turns out to be a space of disillusionment for his desire of the American dream, but also displays the power operations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us, it highlights Dreiser's unique thinking on the issues concerning class division, power pursuit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Keywords: Theodore Dreiser, *An American Tragedy*, aquatic nature, literary geography, symbolic metaphor

Authors: Qizhi Shu,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China; Jiawei L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China.

美国自然主义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 (Theodore Dreiser) 在其代表作《美国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 中讲述了男主角克莱德杀害已孕女友罗伯塔的故事。小说中风光绮丽的湖区是这场爱情悲剧故事无言的见证者。学者们关注到作品中风景各异、大大小小的河流和湖泊, 主要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考察其中的生态景观和社会问题的关联, 进而阐发德莱塞小说中自然和城市对人类精神的不同价值导向和影响。厄德海姆 (Cara Elana Erdheim) 认为作品中不同级别的湖泊展现出的是水域因其使用者地位的不同所发挥出的不同作用 (3), 反映了环境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协调 (18)。麦尔斯 (Robert M. Myers) 则将历史批评和心理分析融入生态批评, 考察了作品以美国阿迪朗达克地区 (Adirondacks) 为故事背景的意义, 指出主人公对该地区荒野景观的理解折射出“其内心深处的需求和 20 世纪之交美国社会的思想状况” (390)。刘海奋则认为作品中的气象、动物等自然意象具有审美意蕴, 隐射出人物命运、渲染小说的悲剧氛围 (74)。这些研究阐释了作品中自然生态景观的社会意义, 但对于“水域自然” (aquatic nature) 在文本空间中的叙事价值和多重符号意义的生产还有待深化和挖掘。

有别于西方学术界突出的“空间转向”哲学、社会理论研究范式, 中国学者建构的文学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 其研究对象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曾大兴, 《概论》7)。这一研究主张地理环境为作家创作提供了题材。具体而言, 地理环境包括地理物象 (地表上的实物) 和地理事象 (地表上发生的实事)。文学地理学就是考察地理物象和地理事象对作家生命意识的触发作用, 考察作家的生命意识在地理环境和文学之间的中介作用, 考察文学作品“应物斯感”与“缘事而发”的运行机制 (曾大兴, 《贡献》111)。在文学地理学看来, 文学有三个空间: 第一空间是客观存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 第二空间是作家在作品中以第一空间为基础想象构建的文本空间; 第三空间则是读者感受和创造的文学审美空间。这三个空间都与地理环境密切相连。文学地理学的空间批评与西方空间批评只分析文本的空间结构不同, 前者还要针对具体的空间, 联系文本内外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的特点来探讨文本的意义 (曾大兴, 《研究方法》292), 究询文本空间中发生的事件、对话、描述背后的含蓄意指。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聚焦《美国悲剧》中的地理环境, 可以帮助我们从地理物象和地理事象的动态关联中考探到文本中水域自然的隐意, 挖掘出作家所表达的生命意识。

《美国悲剧》的创作素材源于一件真实的湖上情杀案件。文本虚构的大比特湖就是现位于美国东部阿迪朗达克地区的大驼鹿湖 (Big Moose Lake)。作品将大比特湖这一地理环境作为城市空间的延展, 以主人公克莱德的城市生活和湖上活动为地理事象, 再现了 20 世纪初期美国阿迪朗达克湖区的旅游开发风尚及其自然保护区建立背后的一些颇具争议的社会性问题。在当时, 美国城市化迅速发展, 自为自然与人化自然之间出现了互相对立、互相渗透的现象。小说中的大比特湖区作为自然景观不再是纯粹单一的物理空间, 而是渗透了

阶级、权力和环境政治的意象，变为了文本意义的发生场。这一水域自然既是主人公实现阶级跃升的“欲望之湖”，也是其梦想幻灭的“死亡之湖”，还是资本主义实施环境统治的“权力之湖”，凸显了德莱塞对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阶级区隔、权力欲求和环境政治问题的独特思考。

一、欲望之湖：阶级区隔的隐喻

阿迪朗达克地区的荒野旅游始于19世纪30年代，自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初进入全盛时期。旅游者会记录下自己在该地区与当地原住民的营地生活和荒野冒险经历，给大众展示一个美丽又具挑战的湖区面貌。有医生甚至撰文宣传湖区“新鲜的空气和山景让他摆脱了‘白色瘟疫’”结核病（Harris and Jarvis 147）。这些荒野冒险故事诱惑着城市精英阶级前往湖区度假探险，“荒野疗法”则吸引了大批在身体或心理上不健康的都市人来到湖边的“治疗小屋”，以“恢复他们的健康，并重新确立他们的男子气概”（Otis, “Disentangling” 559）。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国家旅游政策的支持下，纽约州与该地区政府联合修建了道路，道路两旁迅速建起了豪华度假酒店、高尔夫球场、露营地等，纽约开始购买更多的土地来鼓励旅游业。于是在阿迪朗达克旅游消费的受众不再仅限于热衷真实冒险的游客和疗养病人，而是更广泛地包揽了各种来自城市精英阶级的团体游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阿迪朗达克荒野美学与湖区娱乐的价值，“荒野美学吸引了当时在城市占据主导政治地位的精英阶级”，成为他们不失品位又彰显情趣的娱乐活动（Terrie, *Forever Wild* 125）。在旅游消费文化的裹挟下，湖区不再是一种独特、纯粹的自然地理面貌，它承载着20世纪初美国大众文化的审美情趣，成为阶级区隔的象征。

作品主人公克莱德在湖区独步时就幻想过上这种“有湖滨浴场、更衣室，还出租游泳衣和游船”^[1]的上层阶级度假生活（德莱塞 291），希望自己能像上层阶级一样占据自然，沉浸在其田园般的欢乐中（Erdheim 8）。这种生活与他的城市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克莱德在工厂和城市不断受到监视，他一直试图内化格里菲思家族严苛的准则，但遭到表兄的打压和排斥。与去男性化、性压抑的工厂生活相比，水光潋滟的荒野湖区蕴含着年轻勃发、生生不息的力量。在这样的城市环境里，身处底层阶级的克莱德“心中描绘出另一幅图景”（德莱塞 292），幻想着上层阶级的湖上休闲生活。在他的幻想中，湖区成为寻欢作乐、释放“他天性中那一份被压制而反抗着的性之力的骚动”的最佳场所（292）。作品以湖区为地理环境呈现了克莱德与两任女友——打工妹罗伯塔和富家女桑德拉湖上约会的不同地理事象，再现了主人公的阶级跃升欲求和幻想。

与罗伯塔在湖区的偶然邂逅让克莱德感受到幻想实现的假象：“他抬头对她一望，就像

意想不到地实现了梦想的人一样，脸上放出光彩。她呢，觉得他仿佛是一个突然显现的欢乐精灵，一个从烟雾飘渺之中，或是悸动的生命之中凝成了的诗情。”（德莱塞 294）在相互凝视中，克莱德与罗伯塔的主体认知都发生了变化，湖面氤氲的水汽填补了人物之间的距离。作为凝视的背景，湖区延伸为一个温暖湿润的欲望容器，暗示两人陷入爱河，但其中也暗藏着讽刺的旋涡和两人的爱情悲剧。原因在于克莱德误认为罗伯塔是自己爱情对象的幻想形式，但罗伯塔作为被爱者对克莱德来说只不过是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言的“理想自我的自恋式投射”（《快感大转移》137）。在这种凝视中，罗伯塔与湖区环境这两种符号形式被抽去了作为真实实体的特点，被克莱德以“镜子”的形式赋予一种“非人性”的抽象理想和“理想特质”。女性和湖区分别对应他欲望凝视中的前景与背景，让他似乎体验到上层阶级精英带着情人来湖区度假的生活方式。然而，湖区的商品化发展加重了湖区这一背景的阶级划分色彩，在走出幻觉后，克莱德欲望凝视中的前景人物罗伯塔被逐渐虚化，变得不稳定、不可靠。

代表精英阶级的桑德拉很快就替代了罗伯塔，成为克莱德新的理想客体。通过桑德拉，克莱德了解到更多上层交际圈中富人在湖区的消费方式与社交活动，也参加了他们在湖区奢靡享乐的社交活动。他对湖区的想象逐渐加入了一种社会身份的等级关系，还见识到了湖区的商品化、富人的购买力和审美力，以及媒体的宣传力之间的关联。上层阶级在自然景区中的各种活动与“社会视听”息息相关，所以桑德拉催促父母搬至环境更优雅的私人湖区，因为不同的湖区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区隔。曾在克莱德幻想中出现的斯克隆湖、拉凯特湖和张伯伦湖等都是上层阶级的私有领地，而他与罗伯塔能进入的不过是免费开放的湖区。克莱德认识到湖区的富人社交生活仅能让他短暂地进入精英圈层，为他在格里菲斯家族中作为侄子的边缘地位争取一些虚假的社会意义。要成为上层阶级的一员，桑德拉无疑是一块很好的跳板，所以克莱德紧接着爱上了桑德拉，并将二人的约会计划置于私人湖区这个更加凸显阶级身份的容器之中。约会的整个下午虽然是在独木舟上钓鱼，穿着“五光十色的游泳衣和海滨的绸衣服”嬉戏（德莱塞 639），但主要的活动是唱歌、谈情说爱。克莱德与桑德拉约会的地点仍然以水域为背景，但他作为主体，对理想客体的凝视转移到了一些有顺序、有主次的行动，即体现掌控力和理想男性气质的行动上，以期得到欲望客体桑德拉的认可，达成自己阶级攀登的最终诉求。曾与罗伯塔约会的湖区是一面静态“镜子”，与桑德拉约会的湖区则变成了动态流动的画面，这些画面形成的符号集合构塑了精英阶级的理想自我。相较于与第一个理想客体罗伯塔的被动邂逅，第二个理想客体桑德拉被克莱德添加了阶级欲求的理想特质。所以在之后的行动地点设置中，克莱德更为主动、熟稔地去利用水域自然所携带的审美知识来追求理想客体，以此获得精英圈层的入场券。这一过程反映了主流知识权力对克莱德的主体形构。当他认识到罗伯塔是他进入更高等级湖区/精英阶级的阻碍时便决定摆脱她，并将犯罪现场选在了收费的湖区——大比特湖，

因为这是“几乎没有人烟的地方”(530),在完成凶杀之后他就能从南面的小路“通往科伦斯顿的别墅”(535),继续实施与桑德拉的约会计划,去参与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达成自我阶级跃升的梦想。但是德莱塞并没有将水域自然符号局限于指向阶级区隔中的个人进取,而是通过在同时作为治理场域的城市与自然的双重否定下,赋予湖区更为极端的意义——死亡。

二、死亡之湖：“美国梦”幻灭的隐喻

阿迪朗达克地区拥有3000多个湖泊,面积辽阔。其壮阔的山脉、美丽的湖泊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许多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审美意象。爱默生(Ralph Emerson)的诗歌《阿迪朗达克》(“The Adirondacks”)和现实主义画家斯蒂尔曼(William Stillman)的画作《阿迪朗达克的哲学营地》(“The Philosopher’s Camp in the Adirondacks”)等经过浪漫化处理的书写和想象都出现在当地旅游手册之中。这些关于阿迪朗达克的叙事和意象都强调自然的治愈性力量,并且认为在人和自然的相处之中可以重建自我的主体,形成一种拓荒式精神的心理隐喻——荒野是实现个体自立自强“美国梦”的最好实践地点。1922年,德莱塞和情人海伦也慕名参观了这片湖区,但他在《美国悲剧》中虚构了一个与当地旅游宣传手册不一样的景区,让叙事空间与真实地点产生了距离。

坎贝尔(Charles L. Campbell)比较了德莱塞和梭罗作品中的湖泊意象,指出“克莱德像梭罗一样试图实现自己的梦想,不幸的是他遵循了‘湖的路’”(252)。与《瓦尔登湖》中实现梦想的光明之湖相比,德莱塞笔下的湖是种深刻的死亡意象。在描写克莱德准备在湖区溺死罗伯塔的细节中,德莱塞非常细致地将地理环境和地理事象结合起来,直接以“死!杀人!”(510)等字样突显出克莱德的心理活动。湖泊如同镜子反射出克莱德作为主体的目光,但凝视的对象却是他自己非理性的自我。湖区的地理环境通过诸多比喻表达出来,如“湖水仿佛像一颗硕大的黑珠子”(566),“这池塘好像又千变万化,变成了一只大水晶球”(567)等。当克莱德凝视着湖水思考是否取消计划时,德莱塞使用了他惯用的长句与长比喻让克莱德只看到了令他自己陌生的死亡。在他对湖泊的视觉和心理感知中,他的四周不断被黑暗的湖泊吸纳,其理性的主体也被吸入进去,释放出非理性的自我,甚至感知到未来的死亡。同时,湖区的地理景观——“泥泞的山路”“惨淡有毒的野藤”“倒下来的原木”“积水不干、日久塌陷的绿色黏土”“趴在青苔上、葛藤上、长了苔藓的断梗残肢上、腐烂的原木上”的青蛙,成群的蚊子,“钻进比比皆是的垃圾堆里、有毒的野草里和水草里”的蛇(530)——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在克莱德的游客凝视中,以具身性(embodiment)刺激着他的主体感知,也唤起了读者阅读文本时的

具身感知。特别是关于潜鸟叫声的听觉书写，以大段的拟声词“吉特、吉特”反复打断叙事者的话语和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让克莱德在实施犯罪时不断地出神、迟疑，也让读者看到这一行动过程的艰难。湖区如同一面镜子，预示主体掌握自然的梦想必然走向毁灭。有关死亡的修辞在文本空间中通过视觉、声音书写加强了地理导向性，拓展了客观地理空间的文本符号意义。“死亡之湖”的隐喻意义先入为主地通过作者的叙事策略与地理导向驱动读者融入到流动的故事空间。

《瓦尔登湖》再现了自强不息的典型美国梦，而克莱德通过水域、爱情获得阶级跃升的美国梦被证明是失败的。德莱塞的湖区表现出一种与自我进取式美好愿景不同的意象——自我屈从。“地理意象是对地理客体的主观感知”（张伟然 13），这种感知看似源于主体在知识、道德层面的自由感知，实则是作家在解构社会对主体不自由的形构。当时普遍流行的美国梦意识形态本质上具有被单个的特殊内容作为“典型”来渲染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它通过特殊文本意义赋予了大比特湖区这一自然地理空间虚幻的能指意义，并在大量的浪漫化叙事与集体想象中融入了当时精英审美与旅游消费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个体实现美国梦和阶级跃升的地理象征，试图在与自然的共谋中去逐渐消融社会中潜在的对抗，因为普遍化的隐喻可以利用偶像幻象有效欺瞒主体对社会不公和阶级壁垒的感知。德莱塞利用地理互文性“曲解”荒野中的传统浪漫式书写，讽刺了美国梦的普遍性意义，在作品再现上让克莱德陷入空洞的先验图示（transcendental schematism），然后对他的追求进行不断否定，从而揭示美国梦意识形态在自然共谋的机制下对克莱德产生的影响。

当年少的克莱德当上酒店服务生时，他第一次瞥见了富人的生活，那是他“从来不敢窥探的豪华世界”（德莱塞 33）。成年后的克莱德充满希望地追至伯父的城市，但在社会中他仍然是一名“被排除者”，不断遭到堂兄妹以及其他人的嘲笑和冷落。在城市阶级空间的否定下，主体强烈的被剥夺感隐含着提升的可能性。所以克莱德利用荒野知识，在与城市空间对立的水域自然里试图逃脱否定，寻求爱情的猎物，参与富人社交活动，短暂地进入上流社会，这似乎能让他逐步触摸到美国梦的光芒。湖区这只可以帮助克莱德的“有力大手”的突然消失，暗示着水域自然作为美国梦能指的断裂。由此，德莱塞揭示出政治意识形态的空洞能指也吸纳了自然空间，因为在富人世界里，自然是可以占据、享乐的场所，使得荒野自然成为每个人皆可实现的美国梦神话发生地。同时，美国梦却由于其空洞与虚幻让个体在自然空间中产生了自我的分裂，因为在克莱德的世界里，自然只是不断愚弄他的命运。克莱德把自己的特殊“错误”提升为“普遍错误”，而作为个体，表达这种普遍性的唯一方式就是“暴力的完全非理性过度爆发”（齐泽克，《敏感的主体》232）。克莱德彻底感受到了自己的惨败，并痛恨阻挠他动手的生命力量，即曾给予他爱情幻想与自我进取力量的水域自然。他意识到这股力量是欺骗式的支持，并将罗伯塔视为其自我进取——追寻美国梦的阻碍。在怪异寂静的湖面与刺耳聒噪的鸟叫声形成的强烈对比之下，自然能指的两

极化不断拉扯克莱德紧绷又脆弱的精神之弦，以感官认知形式强化了他意识指标模式中的“象征病态”，仿佛美丽的湖泊对他的回应也如同他在城市中所遭受的歧视一样，“好像是在嘲笑他”（德莱塞 566）。尽管一些地理感知刺激并警告他会得到惩罚，但在城市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双重否定之下，他还是选择了屈从于非理性主体——魔鬼的错误指引。他崩溃地推开了罗伯塔，小船的剧烈抖动使得他与罗伯塔一同掉入了湖中，最终克莱德不顾罗伯塔的呼救，仓皇逃离。作品有意模糊了克莱德的谋杀与罗伯塔死亡之间的真相，凸显出克莱德以自我屈从的形式终止内心无尽的挣扎、最终导致美国梦幻灭的结局，以此讽刺了嘲弄他的整个社会。

三、权力之湖：环境政治的隐喻

在人类早期的政治思想中，自然环境就被视为影响当地政治的重要要素。环境政治逐渐演变为生态环境与现代政治的逻辑起点（李娟 80），与个人价值观、地方公共事务、地方和国家政策等息息相关（Hays 1）。从 19 世纪末期开始，阿迪朗达克地区出现的大量私人公园就与环境政治纠缠在一起。当时一些人以保护商业的名义提出必须限制山区的伐木和炼钢产业，又以“保护自然”的名义购买大片土地并将之保留为“森林保护区”，以确保下游水路畅通，因为“这对于货物运输至关重要”（Harris and Jarvis 145）。阿迪朗达克公园的所有权几乎在国家、个人、公司、私人保护区之间平分，这一现象在当时引起了社会不满。20 世纪早期社会对阿迪朗达克的描述与争论大多集中在土地的所有权及其用途上，而关于环境政治中的人口——阿迪朗达克荒野中原住民的叙事却消失不见。

长期以来，一直有证据表明这一地区的本地人，包括印第安人和被称为白人“土著”的欧洲拓荒移民后代，都被视为该地区的“原住民”，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进行文化交流，形成了当地的人文景观。这种人文景观却被都市人误解为原始、野蛮、滑稽的刻板形象，并以此来“编织出他们在阿迪朗达克荒野度假的故事”（Otis, “Disentangling” 570）。这些故事一方面反映了都市人对土著历史的承认，另一方面也是对土著历史的歪曲。这个地区也因此逐渐成为美国荒野幻想的一种象征，一个“空旷、可以自由开发和利用”的地方（Otis, “Location” 8）。作品对克莱德与桑德拉湖上约会的描写就充满了这种原住民想象。桑德拉划桨上点缀的黄色水仙花“象征与莫霍克河有关的印第安人的神话”，她将自己“打扮成印第安人的样子，黑黑的头发上插了一只黄色羽毛”（德莱塞 270）。在克莱德对湖区生活的想象中也充满了对原住民的幻想：湖边露营地“就像一个印第安村落”，每个人都睡在帐篷里，但有“厨子和佣人”为他们服务（637）。桑德拉和克莱德作为都市人对原住民的想象覆盖并湮没了真实的故事，以此契合美国人对边疆地区财富的欲求。这种想象认知机制

通过范·莱文 (Theo Van Leeuwen) 所说的“意识形态便利效应” (ideologically convenient effects; 102), 展现出经过都市人奢侈化改造与重建的印第安风情文化和人文景观, 同现实中阿迪朗达克的土地改造、保护区公园扩张和旅游宣传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真实的阿迪朗达克历史里, 随着大量游乐园、公路、度假酒店等旅游设施的修建, 被认为是“野蛮”的本土原住民的人文地理景观, 比如原住民的季节性营地, 都被改造或被破坏。纽约州颁布的自然保护法限制了原住民狩猎、捕鱼、收集柴火等“原始”生计, 于是“阿迪朗达克人为了迎合中产阶级游客的需求, 要么改换旧业, 要么开创新业务” (Otis, *At Home* 253)。由于在保护区内, 外来人员必须征得许可才能进入, 许多在此居住的印第安人被迫永久搬出家园。代表“文明”的权力机构在驱赶、规训、改造代表“原始”“野蛮”荒野符号的意义, 这其实揭露了环境政治中政策制定和制度实施的威力。德莱塞在描绘水域景区时也暗示了这种威力。

与现实社会中对无人荒野的想象和上层阶级土地私人化收购行为相似, 克莱德在心理层面也将湖区的居民因素驱除。环绕叙事中心大比特湖的是周边的森林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湖泊。它们与城市距离较远, 彰显出私人空间的隐蔽与广阔, 被克莱德视为保护自我的私人领域, 因此谋杀地点也被他选在人迹罕至的湖边景区。这一点成为作品体现“荒野”生产的关键节点 (Myers 388)。当克莱德陷入选择罗伯塔或桑德拉、选择继续含辛茹苦地生活或是跻身上层社会的伦理困境时, 荒野中出现了一个“保护者”角色——拥有无穷且毫无约束的自然力量, 能够完全掌控荒野和个体思想的“魔王”。每次克莱德担心有可能被其他人看到时, 魔王就通过强调湖区地形的荒凉特征向他保证他是安全的。魔王在呢喃低语中为克莱德搭建的水域空间, 其实是个小说中人物及其理想读者所共同“想象、相信、希望的可能次世界” (Eco 246), 借此作者铺陈出克莱德对水域空间的私人化认知意向。阿迪朗达克在克莱德的可能次世界中指向的是主体私有的“领土”, 但在文本叙事冲突中却不断扩展出它的另一层意义: 一个充满规训的公共权力空间, 一个充满环境统治术的政治场域。

首先, 尽管在“法外之地”的荒野, 社会审查制度仍然通过自然景观折射在个体心理上。当克莱德进入湖湾, 就迅速进行了一系列不同的自然感知, 反映出他在准备犯罪时不断变化的心理状态。一开始湖区风景拟人化为“一双看似强壮, 却又友好同情的手” (德莱塞 560), 让他有了被保护的感觉, 以为湖区为他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但当这种自然提供的安慰感离去后, 湖中“迷人而又危险的深渊”使他心里感到很寒冷 (561)。在此, 湖泊是一种矛盾的存在, 既指向心理保护区, 又代表着社会审查机构。突然传来的潜鸟叫声代表着道德法律的警钟, 四周高耸骇人的冷杉树象征着裁决他的“剑戟”。

此外, 德莱塞肯定了荒野中有代替社会监视的实体性权力机制的存在。在小说最后, 作为克莱德“私人领域”而存在的湖区被证明是一个假象, 魔鬼叙事者所搭建的次世界被

作者所断言的可能世界所替代。阿迪朗达克地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无人荒野，旅游消费的发展把这里转变成了一个新的管制空间，受到似乎不可见的、隐性“文明社会”的权威操控。控方通过犯罪当天的 127 名证人——包括列车员、酒店员工、导游、船员等旅游业相关人士——锁定犯罪嫌疑人并开始抓捕行动。最直接的证人是一名在大比特湖上露营的游客。在整个控方的诉讼中，克莱德被“由来自不同的、没有联系的、意想不到的地方的证人建立起来的”“牢不可破的证据链”所困惑（德莱塞 756）。在整个审判过程以及审判后，克莱德又受到法庭和社会上每个人的“持续凝视”。甚至在被定罪后，每个人都想“看看他是如何受罚的”（748）。

因此，在作品中，“荒野”“水域”不再是个体获取主导权力的私人领域，而是一座开放的“规训之城”，因为规训原本就是在一个将要“完成的、空的、人造的空间”中运作，消除风险与不便因素，以此保证无人空间中的安全（福柯 227）。在阿迪朗达克这样的荒野地区，主权者以保证安全为由，对自然保护区中的“原始野蛮”“法外之地”等符号意义进行相对的削减和驱逐，以往作为社会心理审查机制的道德法律和新出现的权力控制实体，比如消防塔、旅游业、森林警察等新型管辖机制等开始建立，可以与“法外之地”的威胁对抗，也可以根据“等级、权力关系的严格交流以及分配的特有功效”来对自然进行多样化的规训式建构（224）。这表明在社会个体的凝视中，荒野自然象征着与现代文明相对立的符号意义，是可以利用并掌控的。同时，在文明社会的监管中，“文明”的代理者既会通过环境政治技术不断辐射权力、削除自然空间中“安全隐患”的符号意义，也会以一种无所不包的治理术，将被视为“异己”的原住民的真实历史通过“文明”的策略忽略甚至删除。从这一层面看，小说中的大比特湖成为“权力之湖”，隐含着 20 世纪初美国社会的环境政治治理策略的话语力量，既重现出现代文明和自然原住民之间的关系变化，也再现出克莱德作为个体所经历的环境政治监管。

《美国悲剧》塑造了一个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紧密联系的水域自然世界。如历史学家特里（Phillip Terrie）所言，人们讲述关于阿迪朗达克这片土地的故事，反映了他们的需求（*Contested Terrain* xx）。在德莱塞笔下，阿迪朗达克湖区是一个与阶级区隔、权力欲求、统治术息息相关的自然空间，是城市空间的延展。作品虚构的水域自然表明其所携带的关于美国梦和消费主义的主流审美知识为主人公塑造了错误的欲求之梦，因为自然与城市同样具有阶级区隔的作用。渺小的个体依靠自然之力攀登社会阶层被证明是失败的，湖区成为克莱德梦想幻灭的死亡之地。同时，大量隐藏的景区工作人员出庭做证，暗示着自然休闲中心与城市劳动中心已悄然结合，真实的原住民人文景观在都市神话与环境政治中遭到破坏性重建。作者通过叙事策略再现关于水域自然的地理想象，在文本空间内外的互动中展现出丰富的阐释层次。一方面，荒野美学成为 20 世纪美国精英阶级的重要审美趣味和美国

梦的精神象征；另一方面，无论在国家政治实体还是在意识形态层面，荒野不再荒芜空旷，而成了充满人类意识与统治术的新型“人化自然”。通过地理物象和地理事象的交融，《美国悲剧》中的水域自然不但体现了德莱塞建构文本叙事结构的意义，也隐含着他对美国社会转型时期所产生的现实问题的独特思考，“应物斯感”和“缘事而发”地抒发了他作为作家针砭社会时弊的生命意识。

注释 [Note]

[1] 本文引用的作品译文主要参考许汝祉的翻译，个别处笔者参考作品原文做出了修改。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Campbell, Charles L. "An American Tragedy; or, Death in the Woods." *Modern Fiction Studies*, vol. 15, no. 2, 1969, pp. 251-59.
- Dreiser, Theodore. *An American Tragedy*. Translated by Ruzhi Xu, SDX Joint Publishing Press, 2014. [德莱塞:《美国悲剧》, 许汝祉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 Eco, Umberto. *The Role of the Reader: Exploration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 Indiana UP, 1984.
- Erdheim, Cara Elana. "Is There a Place for Ecology in *An American Tragedy*? Wealth, Water, and the Dreiserian Struggle for Survival." *Studies in American Naturalism*, vol. 3, no. 1, 2008, pp. 3-21.
- Foucault, Michel. *Selected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Book II: What Is Criticism?* Edited by Min'an Wang, Peking UP, 2015. [福柯:《福柯文选 II: 什么是批判?》, 汪民安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Harris, Glenn R., and Michael G. Jarvis. "A History of Planning in the Adirondack Park: The Enduring Conflict." *Big Places, Big Plans*. 1st edition, edited by Mark Lapping and Owen Furuseh, Routledge, 2017, pp. 139-77.
- Hays, Samuel P.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Since 1945*. UP of Pittsburg, 2000.
- Li, Juan. "Historical Evolutions of Modern Wester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Its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Liaoning Administration College*, no. 5, 2020, pp. 80-85. [李娟:《现代西方环境政治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 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第80-85页。]
- Liu, Haifen. "Aesthetic Implications of the Natural Images in *An American Tragedy*." *Journal of Ya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5, 2015, pp. 74-76. [刘海奋:《论〈美国悲剧〉中自然意象映射的审美意蕴》, 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第74-76页。]
- Myers, Robert M. "'A Purely Ideational Lake': The Representation of Wilderness in Dreiser's *An American Tragedy*."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vol. 20, no. 2, 2013, pp. 377-95.
- Otis, Melissa. *At Home in the Adirondacks: A Regional History of Indigenous and Euroamerican Interactions, 1776-1920*. Diss.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3.
- . "'Location of Exchange': Algonquian and Iroquoian Occupation in the Adirondacks before and after Contact." *Environment, Space, Place*, vol. 5, no. 2, 2013, pp. 7-34.
- . "Disentangling the 'Native' Guide: Indigenous and Euroamerican Guides of the Adirondacks, 1840-1920."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vol. 11, no. 4, 2014, pp. 555-74.

- Terrie, Phillip. *Forever Wild: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nd the Adirondack Forest Preserve*. Temple UP, 1985.
- . *Contested Terrain: A New History of Nature and People in the Adirondacks*. Syracuse UP, 2008.
- Van Leeuwen, Theo. *Handbook of Visual Analysis*. Sage Publications, 2001.
- Zeng, Daxing.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Geography*.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 “Six Research Methods for Literary Geography.” *Forum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 1, 2017, pp. 282-302.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的六个研究方法》,载《中文论坛》2017年第1期,第282-302页。]
- . “The Contribution of Literary Geography to Geography.”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Review*, no. 2, 2021, pp. 105-12.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对地理学的贡献》,载《美学与艺术评论》2021年第2期,第105-12页。]
- Zhang, Weiran. *Geographical Images in Medieval Literature*.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4. [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北京:中华书局,2014。]
- Žižek, Slavoj. *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 Six Essays on Women and Causality*. Translated by Daping Hu, et al.,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2015. [齐泽克:《快感大转移——妇女和因果性六论》,胡大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 . *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Translated by Qi Ying, et al.,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2006. [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夏开伟

乌托邦建构的悖论：从《上来透口气》看乔治·奥威尔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

◎ 孙怡冰

内容提要：《上来透口气》是乔治·奥威尔在“二战”前夕发表的小说，旨在构建一个以家庭生活和乡村文化为核心的乌托邦，以重塑民族身份的统一性，但这一构想并未成功。本文从奥威尔对社会阶级和民族文化的理解两个方面入手，探讨其乌托邦建构失败的原因。首先，以主人公保灵为代表的下层中产阶级很难形成独立的身份政治。其次，奥威尔的思想中存在小英格兰主义的倾向，与他主张的社会变革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促使奥威尔走向反乌托邦写作的原因，除了外在的政治因素外，还有作者本人在社会阶级和民族文化认知上的保守主义倾向。

关键词：乔治·奥威尔 乌托邦 《上来透口气》 小英格兰主义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3-0012-13

作者单位：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3.002

Title: The Paradox of Utopia: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m in George Orwell's *Coming Up for Air*

Abstract: *Coming Up for Air* is a novel written by George Orwell just before World War II. The novel aimed to create a utopia centered around family life and rural culture in order to rebuild national identity. However, this ambitious vision ultimately fail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factors contributed to Orwell's unsuccessful endeavor, examining two aspects: class and national culture. Firstly, it is challenging for the lower-middle class, represented by the protagonist George Bowling, to establish an autonomous identity. Secondly, Orwell's thoughts exhibit a tendency towards little Englandism, which inherently contradicts his advocacy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Orwell's conservative leanings regarding social class and national culture propel him towards anti-utopianism in his later works.

Keywords: George Orwell, utopia, *Coming Up for Air*, little Englandism

Author: Yibing Sun, Lecturer,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上来透口气》(*Coming Up for Air*)发表于“二战”前夕,被视为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最具英国特色的作品”(Kerr 22)。小说以主人公保灵的回忆为线索,表达了对乡村所代表的过去世界的怀念。但小说发表后获得的评价并不高。在迈耶斯(Jeffrey Meyers)汇编的评论集中,豪(Irving Howe)表示,“很多当代小说家都能做得更好”(160);富勒(Edmund Fuller)则认为,小说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属于奥威尔文学遗产的一部分,而非“小说的内在品质”(162)。研究者们大多认为小说展现了奥威尔对乡村有机体的怀念,作者希望以此反思并批判英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如博布里齐(Christine Berberich)所说:“小说传递了奥威尔对老英格兰的怀念。”(40)福勒(Roger Fowler)则认为小说展现了典型的奥威尔式主题:“怀旧、与现在的疏离以及对未来的恐惧。”(148)也有批评家注意到小说中的悲观论调,认为其中的一些元素与奥威尔的后期作品之间具有相似性(Carr 57; Rai 85; Van Dellen 59)。本文认为,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之后并未立即确定反乌托邦的写作主题,而是在《上来透口气》中尝试建构了以家庭和乡村为核心的乌托邦,但这种未成功的尝试促使他在后期转向反乌托邦写作。造成奥威尔失败的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首先,以主人公保灵为代表的下层中产阶级很难形成独立的身份政治,他所表达的田园理想带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其次,奥威尔的思想中存在“小英格兰主义”的倾向,与他主张的社会变革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因此,奥威尔在阶级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他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倾向,都促使他逐渐走向了反乌托邦写作。

一、缔造乌托邦：以家庭与乡村为核心

《上来透口气》有两条写作主线——战争危机的迫近和对乡村的怀念。读者可以在报告文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的结尾处,清晰地看到上述两条主线:“高大的骏马在厚厚的草甸间慢悠悠地吃草,两岸满是垂柳的小溪缓缓流动[……]英国的一切都陷入沉睡[……]除非被炸弹的巨响唤醒。”(232)可以看出,奥威尔从西班牙返回英国时,认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毫无危机意识。他希望借助一部新的小说提醒读者,英国本土极可能卷入战争。因此在《上来透口气》中,保灵的叙述时刻伴随着轰炸机的声音,以唤起读者对潜在危机的警觉。与此并行的是保灵对乡村的怀念。他不断强调童年的美好并尝试返回记忆中的乡村。尽管保灵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他最终确认了返乡的意义:“得到了些许平静与安宁。”(251)奥威尔希望唤醒读者对乡村所代表的英国文化和英国精神的共同记忆,并形成以乡村为纽带的情感共同体。

《上来透口气》创作于1938年夏天,奥威尔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表示:“我们正冲向悬崖[……]在枪声响起前我们大约有两年时间。”(*The Collected Essays* 1: 362)^[1]他此时已明

显感受到战争的不可避免，但并不主张英国立即卷入其中。这与他在1936年西班牙内战期间所持的立场截然不同。虽然奥威尔曾反对英国政府对西班牙采取的“不干涉政策”，并作为志愿者前往当地支持民选共和国，但这段经历也让他的左翼理想幻灭。在1938年至1939年的一段时间里，他十分反对战争，认为应该尽可能维护和平（Rodden 43）。奥威尔创作这部小说时，明显受到反战立场的影响，选择回归英国文学中的田园主义传统。小说中对乡村生活的描写、意识流的倒叙手法及怀旧主题，都反映了30年代英国社会对“乡村的广泛迷恋”（Bluemel 160）。小说在写作主题和写作风格上，与同时代的《南瑞丁》（*South Riding*）、《妇女之家》（*A House of Women*）、《青山翠谷》（*How Green Was My Valley*）等作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奥威尔在此时转向田园主题与他反对英国卷入战争、希望维持和平状态的立场息息相关。他试图借助田园主义传统下的文化资源，复活属于英国人的宝贵特质，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因此，奥威尔尝试构建以家庭与乡村为核心的乌托邦。主人公保灵首先从孩童的视角展开回忆，描述了布尔战争前温馨舒适的小镇家庭生活：“周日的下午——当然，总是在夏天，空气中飘浮着烤猪肉和蔬菜的味道，母亲坐在壁炉的一边，开始阅读最近发生的谋杀案，慢慢张着嘴睡着了。父亲坐在另一边，穿着拖鞋，戴着眼镜，费劲地看着几行脏兮兮的印刷字[……]我则把桌布当帐篷，坐在桌子底下看《男孩自己的读物》。”（*Coming Up* 50）

奥威尔希望唤起读者对传统家庭生活的怀念，并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一种稳定性和连续性。家庭意象曾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是奥威尔前往英国北部工业区调查之后完成的报告文学，书中有一段与前文近乎一致的描写：“父亲坐在壁炉一边的摇椅上读赛马结果，母亲则在壁炉的另一边做针线活。”（116）奥威尔在此将自己的家庭理想投射到了工人阶级的生活中，而在《上来透口气》中则投射到了乡村小店主的家庭生活里。奥威尔赋予家庭生活一种时间上的永恒性，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都无法摧毁其所代表的稳固性。他还将英国比作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家庭，尽管其中存在诸多弊病，但人们总会在敌人迫近时“团结在一起”（*The Collected Essays* 2: 68）。奥威尔十分看重家庭提供的情感纽带，认为它能在动荡时期将英国人维系在一起，因为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对家庭的归属和依赖是个体情感的自然流露，并不存在外来的压力和限制。这与他一贯强调的个体自由毫不冲突。家庭也由此顺理成章地成为奥威尔为英国社会提供的精神方案中的核心元素。

在英国同一时期的官方宣传中，存在许多类似的表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王乔治五世（George V）对家庭意象的运用。1932年的圣诞节，乔治五世首次通过广播向臣民发表演讲，这一传统延续至今。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朗（Cosmo Lang）曾先后担任国王讲话撰稿人。他们在演讲中采用了一种新的情感语言，以塑造国王和民众间更为亲密、更为私人的关系。在新的修辞之下，国王常常化身为英国的大家长，

民众则团结在以国王为核心的传统家庭之中，共同应对社会危机。这种修辞手法具有明显的优势：对英国本土来说，家庭的比喻呼唤其背后所代表的亲密、忠诚、奉献、牺牲等精神，号召民众团结在国王的统一领导之下；对海外殖民地而言，家庭的比喻减弱了帝国的强权色彩，为帝国统治披上一层温情的面纱，使人们“不再将注意力集中在殖民地与英国当局间持续不断的暴力斗争上”（Owens 123）。奥威尔的小说和乔治五世的演讲都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普遍渴望稳定的情绪，家庭成为一种强调传统和延续性的有力修辞，同时提供了重新整合社会情感的可能性。

奥威尔还在小说中设置了乡村与战争、乡村与城市的双重对立，以凸显乡村的重要性。在乡村与战争的对立中，乡村总是与“战前”相连。“战前”作为时间状语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指向两个不同的时间点。保灵回忆幼年生活时告知读者，战前的美好时光是布尔战争爆发前（*Coming Up* 37）；当他追忆“一战”前的少年生活时，又表示“1911, 1912, 1913[……]是好时光”（115）。奥威尔赋予“战前”双重时间身份，使战前的乡村演化为一种想象中的存在，说明人们将自己在当下所渴望获得的精神或者特质都投射到了乡村意象上。这也是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in the Modern Novel*）中所探讨的内容，即乡村作为文化符号表达了对稳定秩序的向往，用来掩盖或批判当下的矛盾（63-64）。乡村与城市的对立则主要聚焦于真实与虚假的对比上。每当保灵回忆乡村，他都会联想到自然界中可触可感的真实事物，现代世界则成为虚假的代名词。保灵从法兰克福香肠中吃到了鱼肉的味，他认为这反映了现代世界的本质：“每样东西都是别的东西做的。”（*Coming Up* 26）通过乡村与战争、乡村与城市这双重二元结构，奥威尔强调了乡村及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在当下的重要性。如果说乡村意象在特定时期发挥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那么奥威尔的乡村书写旨在唤起人们对英国文化中某种悠久历史传统的认同和对某些独特英国精神的共同记忆，以避免当前的身份断裂或缺失。

乡村作为英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经常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官方话语中。英国一向以其渐进式的改革而非暴力革命而自豪，强调稳定、连续的思想在动荡时期尤为凸显。相对于欧洲大陆的剧变，英国人最引以为傲的是政权在“麦克唐纳 [Ramsay MacDonald]、鲍德温 [Stanley Baldwin] 和张伯伦 [Neville Chamberlain] 之间相对平稳的过渡”（Miles and Smith 14）。两个在表面上对立的政党都默契地选择了更为温和而非激进的叙事策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鲍德温，他曾三次出任英国首相并经常以乡绅形象示人。鲍德温对英国与乡村之间关系的界定——“英国 [England] 就是乡村 [country]，乡村就是英国”（101）^[2]——至今仍被传颂。鲍德温将乡村与英国民族身份紧密相连，但这一表述包含内在的矛盾。一方面，以乡村为核心的话语策略所凝聚的向心力远大于党派、团体和阶级斗争所产生的离心力，能够尽可能将英国社会整合起来；另一方面，用英格兰指代英国的做法隐藏了英格兰在其中的核心地位，实际上是用一个核心族群的身份替换了多个民族的复杂身份。这也验证了史密斯

(Anthony Smith) 的观点, 即核心族群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需要寻找一些普适性的元素来维护民族统一, 借助文化材料为共同体创造一套神话体系和象征符号 (53-54)。家庭和乡村这两种文化符号都具有普适性, 它们不仅帮助缔造了英国民族神话, 而且掩盖了核心族群在其中享有的文化霸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 家庭和乡村已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是民族身份的有机构成。持不同立场的个体或群体都可以借助其中的文化资源, 以表达自身的政治、美学或者社会诉求。那么, 奥威尔借助家庭和乡村缔造的乌托邦, 是否也反映了某一特定群体的诉求? 是否也存在用英格兰身份替换多民族身份的问题? 下文从阶级和民族文化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讨论奥威尔的思想中潜藏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

二、如何理解英国的民族独特性: 奥威尔的阶级困境

奥威尔写作这部小说的直接动力源于当时国内外的危急局势。他希望借助家庭和乡村来强调英国的民族独特性, 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并实现面对危机时的团结。在此需要结合奥威尔的一篇重要文章《论英国人》(“The English People”), 来分析他如何理解英国的民族性格。奥威尔在文中并未给出明确定义, 而是罗列了一些英国人的特点, 如对艺术较为迟钝、喜欢足球、同情弱小等, 然后通过描述的方式告知读者, 英国的确拥有一种人们共有的、独特的传统, 正是这种传统界定了英国的民族独特性:

寻找自 16 世纪以来贯穿英国人生活的主线并非易事, 但那些为此烦恼的人能感受到它切实存在[……]例如, 人们认为劳伦斯[D. H. Lawrence]和布莱克[William Blake]都具有“英国范儿”。同样, 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和切斯特顿 [G. K. Chesterton] 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同一类人 [……] 现代英国人和莎士比亚的相似度, 远远高于和现代法国人、德国人的相似度 [……] 人们相信传说中的事极有可能成真, 因为它们设定了一种特定类型的人或“人格”, 普通人则努力与之相匹配。(*The Collected Essays* 3: 6)

奥威尔希望说明在英国人当中存在某些共性, 这些共性超越了阶级差异,^[3] 将人与人紧密相连。奥威尔强调阶级差异可以被弥合, 人们能够统一在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在他看来, 面对当时的社会局势, 阶级情感常常让位于爱国主义 (3: 6)。但奥威尔所列举的例子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他认为文学史上的这些重要作家代表了某种共同的精神, 并反映了民族性格的共同点, 但劳伦斯和布莱克、约翰逊和切斯特顿之间的共性, 或许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才能理解。这种用文学来隐喻文化的方式似乎难以代表普通民众, 是一种

明显带有精英色彩的文化解释方法。“普通人则努力与之相匹配”表达了作家本人的良好愿望，即文化作为一种规训方法能够帮助塑造理想个体。但其表述也说明，上述作家所参与构建的英国文化实际上属于某个特定群体，无法像奥威尔所期望的那样尽可能地囊括普通民众，并帮助形成统一的文化精神。确切地说，普通民众是被收编其中而非参与其中。但从主观意识看，奥威尔并非有意将民族性格的特点归属于某个特定群体。他在著作中多次强调普通民众的力量，尤其是工人阶级的作用。只是作家自身所处的阶级、接受的教育和文化背景，都使他更倾向于从自己熟悉的领域挖掘资源，因此存在一定局限性。奥威尔此时主张以民族文化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案也更偏向精神层面。随着社会形势急剧变化，尤其是英法对德宣战后，奥威尔愈发感到仅靠文化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于是逐渐放弃了此前持有的和平主义立场（Rodden 43）。他开始强调赢得战争与社会革命密不可分，并加入英国的国民卫队（Home Guard），深度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

相关研究常将奥威尔最直接的反乌托邦动因界定在西班牙内战这一历史事件上（Davidson 79; Newsinger 50; Rodden 70），因为作家本人曾明确表示自己在西班牙内战后“明确了立足点”（*The Collected Essays* 1: 5）。本文需要补充的是，奥威尔从西班牙失望而归后并未马上转向反乌托邦写作，创作于1938年的《上来透口气》反映了作家建构乌托邦的努力，只是这种努力最后以失败告终，作家由此逐渐转向反乌托邦写作。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奥威尔思想中所包含的文化保守主义因素——集中体现在他对阶级的有限理解和希望退守英格兰文化这两方面。例如，保灵在小说中自相矛盾的表述体现了奥威尔的矛盾思想。一方面，他明确表示无法回到过去：“我们熟悉的旧生活已被连根锯断。”（*Coming Up* 181）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返乡之旅终归有一些意义，他“得到了些许平静与安宁”（251）。小说中存在着希望回归过去与预见悲剧性未来之间的张力，这种内在的矛盾贯穿了奥威尔的后期写作。

乌托邦构建失败的原因，首先在于保灵所表达的田园理想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奥威尔喜欢用阶级分析问题。在评论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威尔斯（H. G. Wells）、吉辛（George Gissing）等作家时，他常将作品中的思想局限性与作家的阶级背景联系起来。在《论英国人》中，他讨论了社会阶级分层，并强调不能简单根据经济状况将人们划分为上层、中产和工人或无产阶级，而更应关注中产内部的文化差异。他提出可以依照中产阶级在文化上与贵族的相似程度将其划分为两个阶层：前者包括政府官员、部队军官、大学教师、神职人员等，后者包括乡村手工业者、小店主和城市中的经纪人、推销员等（*The Collected Essays* 3: 19-21）。奥威尔常将中产内部的两个阶层称为上层中产（upper-middle class; 3: 214）和下层中产（lower-middle class; 1: 433），以此说明上层中产在文化上与上层阶级无异，这些人最有可能做的是维护既有体制和统治秩序。真正具有变革潜力的是下层中产和工人或无产阶级。例如，他指出英国一直有厌恶战争和军国主义的传统，这种情感在“下层中

产和工人身上最为强烈”(2: 60)。这样的划分与奥威尔的家庭出身有一定关联。他生于印度殖民地的下层官员家庭,自称“偏下的上层中产”(The Road 153)。他一直努力摆脱家庭背景的影响,一是通过自身实践主动靠近社会下层,并发掘其宝贵特质,《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和《通往威根码头之路》都体现了这种努力;二是塑造具有反思意识的主人公,如《让叶兰继续飞扬》(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中的戈登和《上来透口气》中的保灵。

保灵是小说中唯一具有反思意识的个体。他来自乡村小店主之家,从事保险推销员的工作,属于奥威尔所定义的下层中产。保灵对社会现象有敏锐的观察,并经常以警示或预言的方式强调战争即将到来。与保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妻子希尔达和波提欧斯先生,两人都属于奥威尔所定义的上层中产,并反映了作家身上的两种文化因素:希尔达代表了殖民地家庭出身,波提欧斯则代表了公学教育。希尔达来自一个“有着英印背景的”(Kerr 53)^[4]殖民地官员家庭。这类人在当地是享有特权的统治者,返回本土后却只能依靠微薄的薪资生活,甚至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在经济上接近社会底层,但在认知上却自视为上层,这种收入与认知的脱节导致其难以融入英国本土。在保灵看来,希尔达是个“精神萎靡、了无生气的中年妇女”(Coming Up 154),终日为学费、煤气账单和黄油价格发愁,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波提欧斯先生曾担任公学教师,在牛津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最初似乎扮演了保灵的精神导师。1938年的社会局势令保灵十分忧虑,他希望波提欧斯能够为其疏解疑惑,后者却表示“太阳底下无新事”(181)。波提欧斯认为当下的一切都不值得深究,因为类似的情况早已在古希腊罗马世界里发生过。希尔达与波提欧斯共同代表了奥威尔希望摒弃的上层文化^[5]。通过对两个人物的讽刺性描写,奥威尔宣告这种文化业已失效:“所有体面人都已瘫痪,要么是已死之人,要么是活的猩猩。”(184)

因此,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文化资源来应对现实问题的奥威尔将目光转向了下层中产。克里克(Bernard Crick)指出,奥威尔在1936年后的政治写作和实践“都是为了获得下层中产的关注”,他们将他们视为“人民群众的天然领导者”(189)。范德伦(Robert J. Van Dellen; 57-68)、费德里科(Annette Federico; 50-63)的研究都将保灵定义为普通人的代表,认为保灵的平庸能从读者这里收获更多的认同,从而使保灵所传递的价值观更具普遍性意义。这也符合奥威尔的写作初衷,他希望淡化保灵的阶级属性,因此保灵在小说中不断地强调“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人”(Coming Up 173)。但保灵能否代表普通人,或者如奥威尔期望的那样代表利益一致的下层中产和底层民众?保灵清楚地意识到“店主之子与帮工之子间有清晰的社会界限”(62),他的理想是恢复小店主的家庭生活和自给自足的商业经营模式,并未顾及远在他之下的人群。他虽然看到了社会问题,但只是哀叹过去,在寻找无果后陷入精神上的走投无路。可以说,下层中产无法创造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也无法提供解决困境的方法。菲尔斯基(Rita Felski)曾指出,下层中产在文化上容易将来自权威的

束缚内化，无法提供“积极的身份认同”（39），也难以形成“进步的身份政治话语”（41）。在保灵的逻辑中，应对社会危机的唯一方式是回归过去，回归既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样一来，下层中产阶级俨然成为旧制度的维护者。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更像是矛盾的缓冲器，而非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当保灵意识到无法回到过去后，做出的结论是“一切都会往下掉”（*Coming Up* 261）。保灵的这种悲观态度在奥威尔写于1940年的《鲸鱼腹中》（“*Inside the Whale*”）有更为清晰的阐述：“将自己交给世界进程，停止与它斗争 [……] 简单地接受它，忍受它，并记录它。”（*The Collected Essays* 3: 526）

奥威尔选择描写来自下层中产阶级的主人公，也揭示了他对工人阶级的理解十分有限。他常将自己对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的认识误用于工人身上，或者将二者混为一谈。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奥威尔居住在巴黎的贫民窟，接触了当地的乞丐、酒鬼、妓女和外籍流民，并干过一段时间的洗碗工；回到英国后，他又加入流浪汉队伍，辗转于各个救济站，依靠救济金度日。奥威尔对这个群体有着较为浪漫化的认识，他对米勒（Henry Miller）的欣赏或许也因为后者曾在巴黎过着类似的生活（1: 498）。但这一群体与有组织的产业工人截然不同，他们是马克思所称的流氓无产阶级，是“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马克思、恩格斯 719）。奥威尔并未将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区分开来。在他的理解中，流氓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没有差异，都属于受压迫的人，是值得同情的对象。此外，他还经常混用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例如，在他的阶级划分中，工人与无产阶级类似于同义词（*The Collected Essays* 3: 18）。他将《共产党宣言》中的原文“工人没有祖国”（马克思、恩格斯 419）替换为“无产阶级没有祖国”（*The Collected Essays* 3: 6）。这样便囊括了他更为熟悉的流氓无产阶级。尽管奥威尔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深入英格兰北部考察了失业工人的状况，但他主要描述了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未能完全融入其中并准确捕捉到工人阶级的文化。读者能够察觉到作为观察者的作者与作为观察对象的工人之间存在距离，尤其在文化和心理方面存在明显差异（Clarke 41-42）。这种写作风格虽然是奥威尔对自身进行审视的一种方式，但如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所指出的，他仍未完全放弃“在爱德华时代音乐厅的舒适氛围中看待工人阶级的习惯”（17）。奥威尔从不具备文化独立性的下层中产阶级中寻找变革动力，还有对工人阶级文化理解的有限性，都导致他无法解决现实困境。

三、如何解决帝国衰落的问题：走向“小英格兰主义”

作为“一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奥威尔对布尔战争的了解更多源于书本；通观其作品集，也未找到关于布尔战争的详细论述。但他在小说中特意将保灵的出生年份设置在1893年，以便通过保灵的视角见证英国社会从维多利亚晚期到“二战”前的变化，并专门

论述了布尔战争对英国的影响。在小说中，布尔战争被视为英国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开端，从而引起 20 世纪上半叶有关国家走向和民族身份的讨论。战争引发了保灵的父亲和伯父伊齐其尔关于“大小英格兰”的争论。保灵的父亲认为，英国在南非的战争乃道义之举，是在履行“白人的责任”（*Coming Up* 48）。这一观点来自吉卜林于 1899 年发表的同名诗歌“*The White Man's Burden*”，也是战争之初的主流观点，认为英国人的使命是将文明和进步带给更“低等”“落后”的种族。因此布尔战争爆发之初，大多数英国人倾向于支持战争。父亲错将布尔人称作“野猪”（*Boars*; 48）。这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充分暴露了帝国的殖民逻辑，将被殖民者等同于动物并剥夺其基本的生存权力。伯父伊齐其尔则是传统的自由党人，强调专注于英国的内部事务，自称“小英格兰人”（48）。战争中英军所暴露出的残忍，尤其是将妇女和儿童关押在集中营内的做法，让帝国扩张失去其道德合法性。对作为白人后裔的布尔人的屠戮，也让原本建基于先进与落后的种族殖民逻辑不攻自破。布尔战争“粉碎了民族的自满情绪”（*Searle* 302），也让英国人的帝国狂热逐渐减退。从战争后期开始，“小英格兰主义”（*little Englandism*）^[6]的思潮逐渐占据上风。正如小说中所写，保灵的家乡是传统的自由党选区，而保守党在战争期间有一次获胜。再到 1906 年选举时，小镇重新成为自由党选区（37）。这段描述反映了布尔战争推动了“小英格兰主义”的复兴。尽管“小英格兰主义”在 19 世纪末遭受猛烈抨击并走向衰落，但借助布尔战争的影响，它重新获得了大量支持者。1906 年大选时，在反对战争的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的领导下，当时更倾向于“小英格兰”路线的自由党于衰微之时重登执政舞台。这说明战争带来了一种内转倾向，英国社会开始强调聚焦于本土，反对在海外的无限扩张。

“小英格兰主义”反映了英国作为岛国的固有心理特征。自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James VI*）在 17 世纪初成为苏格兰、英格兰的共同君主后，双方不再陷于频仍的边境战争。1707 年的《联合法案》（*Acts of Union*）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边境纷争，漫长的海岸线成为国家的天然屏障。英国在自然屏障的保护下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因为“上帝已规定好英国的自然身份、在地图上的恰当形状和位置”（*科利* 43）。这种与众不同的意识也让英国人获得了一种身份的独特性，尤其是在危急时刻，对英国独特性的强调都会频频出现。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布尔战争也推动了“小英格兰主义”思潮的兴起。马斯特曼（*C. F. G. Masterman*）指出，19 世纪末出现了一股新的文学潮流，它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主张世界主义。这种新的文学形式更接近于民族主义，布尔战争推动了这股文学潮流的发展（转引自 *Wiener* 60）。1904 年，马斯特曼与切斯特顿等人组织了一次研讨会，提出一种用自由、民主的爱国主义替代帝国主义的理念。与会者的观点与战前出现的创作潮流共同定义了小英格兰精神，即强调“古老的、家庭的和乡村的英格兰”（60）。可以说，“小英格兰主义”更接近于一种思想倾向，它的具体内涵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但每逢危机时刻都能看到它的兴盛。因为当帝国处于扩张期时，为了更好地将不同地域统摄于统治网络之中，关

于帝国的宣传更侧重其普适性。在本土文化空间内，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等地的异己概念被削弱，英格兰也仅作为不列颠的一个分支存在。随着帝国衰落，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强调英国作为岛国的特殊性，强调英格兰作为帝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重要性。这也解释了为何以英格兰乡村为主题的作品，始终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乡村文化是英格兰乃至整个英国的经典化身，为民众提供了连续且稳定的身份认同。同时，它看似脱离了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民族和种族纷争，在意识形态层面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符号。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历史背景下，帝国已不再是世界中心，社会的断裂、动荡和空虚感更加强烈。作家们更倾向于相信岛国文化而非多民族的文化能够成为粘合剂（Esty 10）。奥威尔创作《上来透口气》时，正在思考国家如何解决经济衰退、阶级矛盾和外敌入侵等问题。他此时并不希望英国卷入不同的政治阵营或者军事斗争之中，认为需要重新强调英国的民族独特性并呼唤爱国主义。奥威尔选择以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乡村和家庭生活为蓝本来构建理想社会，希望重拾民族身份的完整性。小说中对家庭、乡村浓墨重彩的描写，都与前文提到的“小英格兰”精神相契合。奥威尔一方面强调岛国的身份特殊性，希望唤起人们对英国独特传统和文化的记忆；另一方面试图呼唤爱国主义，希望人们能够摒弃差异并团结一致。因此，不应简单地将小说视为一部乡村怀旧之作，它更多地体现了奥威尔的一种文学建构策略，即将过去视为一种“政治和文化资源，并从中汲取价值”（Brooker 295）。在奥威尔的作品中，能找到许多他对岛国身份特殊性的论述。例如，他表示与陆军相比英国人更偏爱海军，因为英国是个岛国，“没有强大的陆军，这里的民主制度也一样发展”（*The Collected Essays* 3: 4）。1941 年，德国正对英国发动大规模空战，奥威尔认为英国人应坚定获胜的信心，同时坚信英国不会受到法西斯主义的蛊惑，皆因“英国文明有自己独特的味道”（2: 57）。

但奥威尔在强调英国独特性，唤起民众爱国意识的同时，以隐含的方式用英格兰替换了英国。许多评论家都曾指出奥威尔身上典型的英格兰特征。伯布里克表示，奥威尔不仅是“爱国主义者”，更是一个“英格兰爱国主义者；不是苏格兰、威尔士的，甚至不是英国的”（34）。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则认为：“在街上遇见库斯勒 [Arthur Koestler]，你觉得他是中欧人；遇见奥威尔的话，当然是英格兰人，而且是传统的英格兰人。”（转引自 Clarke 84）。在奥威尔自己的论述中，也能看到对英格兰的强调。如在 1941 年完成的《狮子与独角兽》（“The Lion and the Unicorn”）中，他用与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等相区分的方式，来界定英国人的独特性，并告诉读者英格兰足以代表整个英国。他写道：“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读者或许会不舒服，因为我用‘英格兰’比‘不列颠’更频繁 [……] 但当欧洲人遇到不列颠人时，这种差异便微乎其微。”（*The Collected Essays* 2: 64）奥威尔用英格兰来指代英国，其中暗含的逻辑与帝国向内收缩时更强调以英格兰为核心的逻辑十分相似。但奥威尔强调传统、强调英格兰的倾向与他所宣称的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的

变革理想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这也是奥威尔的写作中始终存在的悖论，如哈蒙德（J. R. Hammond）所言，是“主张社会变革和渴望返回过去”（149）之间的矛盾。

通过前文的分析会发现，造成奥威尔在后期转向反乌托邦写作的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外，或许也与他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倾向有关。奥威尔以爱德华时代的家庭和乡村文化为支点，塑造英国民众的情感和意识，希望以此度过社会危机。但他最终发现无法完全复制过去的文化，也无法借助旧传统解决当下的问题。保灵因此慨叹道：“我们无法返回下宾菲尔德，就像无法将约拿放回鲸鱼腹中。”（*Coming UP* 259）这种悲观主义的观点在他的后期作品中有更为明显的体现，先是转化成了亨利·米勒式的静默，表现为政治上的被动和回避，作家的能动性仅在于接受并记录一切；继而体现在《动物农场》（*Animal Farm*）中的驴子本雅明身上，他深刻意识到社会体制的缺陷和不可避免的压迫，但仅以冷眼旁观者的身份对所有事情表示怀疑；最后转化为一种绝对的悲观主义，并在《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中达到顶峰。

注释 [Notes]

- [1] 文中来自四卷本 *The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的引文，均以卷号加页码的形式标注。
- [2] 原文使用的 *England* 一词既可以指代英国，也可以指代更为狭义的英格兰。鲍德温开篇指出，*Britain* 和 *England* 存在差异，人们在谈论英国时，更习惯使用 *England* 和 *Englishmen*，因此本文在此译为“英国”。鉴于 *England* 与 *Country* 的双关性，这句话还有一层潜在含义：以英格兰为核心的文化具有普适性，足以代表整个英国，即“英格兰就是国家，国家就是英格兰”。虽然鲍德温的讲话主旨是强调英国的乡村文化，但第二种解读也体现了讲话本身的内在张力。
- [3] 此处仅提及阶级差异，主要因为奥威尔在文章中并未过多关注种族、党派等问题，他将论述重点放在了阶级问题上，尤其是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所呈现的差异性和共同点。
- [4] 缅甸最初被纳入英属印度的统治范畴，相当于印度诸省之一，直到1937年才从英属印度独立，成为单独的殖民地。奥威尔出生于印度殖民地的下层官员家庭，他本人曾在缅甸担任警察（1922—1927）。鉴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奥威尔在提到缅甸时，有时会直接用印度来指代。像奥威尔这类具有印度或缅甸殖民地背景的人，常被称为“英印人”。
- [5] 在奥威尔的定义里，上层阶级与上层中产阶级同享一种文化。
- [6]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小英格兰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存在已久，但真正作为专有名词出现，是在国会议员沃特金爵士（E. W. Watkin）的著作《加拿大与美国：回忆录，1851—1886》（*Canada and the States: Recollections, 1851 to 1886*）中。他写道：“任何读过下面内容的人都会知道，我是个帝国主义者，厌恶小英格兰主义。”这一概念在诞生之初含有贬义色彩，用来讽刺以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为首的自由党及其路线。布尔战争期间，“小英格兰主义”主要用作一个反帝国主义的术语，强调英国应专注于本土，而不是纠缠于海外纷争。需要强调的是，“小英格兰主义”并不反对帝国殖民，而是反对以战争这种简单粗暴的形式进行殖民，更倾向于以文化、政治的形式维护海外统治。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ldwin, Stanley. "England is the Country, and the Country is England." *Writing Englishness 1900-1950: An Introductory Sourcebook on National Identity*, edited by Judy Giles and Tim Middleton, Routledge, 1995, pp. 97-102.
- Berberich, Christine. "A Revolutionary in Love with the 1900s: Orwell in Defense of 'Old England'." *The Road from George Orwell: His Achievement and Legacy*, edited by Alberto Lázaro, Peter Lang, 2001, pp. 33-52.
- Blumel, Cristin. "The Regional and the Rural."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ritish Literature of the 1930s*, edited by James Smith, Cambridge UP, 2019, pp. 160-74.
- Brooker, Joseph. "Forbidden to Dream Again: Orwell and Nostalgia." *English: Journal of the English Association*, vol. 55, no. 213, 2006, pp. 281-97.
- Carr, Craig L. *Orwell, Politics and Power*. Continuum, 2010.
- Clarke, Ben. *Orwell in Context: Communities, Myths and Values*.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Colley, Linda.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Translated by Yupeng Zhou and Yaohui Liu,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科利:《英国人: 国家的形成, 1707—1837年》, 周玉鹏、刘耀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Crick, Bernard. *George Orwell: A Life*. Secker and Warburg, 1980.
- Davidson, Peter. *George Orwell: A Literary Life*. Palgrave Macmillan, 1996.
- Etsy, Jed. *A Shrinking Island: Modernism and National Culture in England*. Princeton UP, 2004.
- Federico, Annette. "Making Do: George Orwell's *Coming Up for Air*." *Studies in the Novel*, vol. 37, no. 1, 2005, pp. 50-63.
- Felski, Rita. "Nothing to Declare: Identity, Shame, and the Lower Middle Class." *PMLA*, vol. 115, no. 1, 2000, pp. 33-45.
- Fowler, Roger. *The Language of George Orwell*. Palgrave Macmillan, 1995.
- Hammond, J. R. *A George Orwell Companion: A Guide to the Novels, Documentaries, and Essays*. Palgrave Macmillan, 1982.
- Hoggart, Richard.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 Chatto and Windus, 1957.
- Kerr, Douglas. *Orwell and Empire*. Oxford UP, 2022.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1. Translated by Bureau of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Marxist Work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Meyers, Jeffrey, editor. *George Orwell: The Critical Heritage*. Routledge, 1997.
- Miles, Peter, and Malcolm Smith. *Cinema, Literature and Society: Elite and Mass Culture in Interwar Britain*. Routledge, 2014.
- Newsinger, John. *Hope Lies in the Proles: George Orwell and the Left*. Pluto Press, 2018.
- Orwell, George. *The Road to Wigan Pier*. Harcourt, 1958.
- . *The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Edited by Sonia Orwell and Ian Angus, Harcourt, 1968. 4 vols.
- . *Homage to Catalonia*. Harcourt, 1980.

——. *Coming Up for Air*. Penguin, 2001.

Owens, Edward. *The Family Firm: Monarchy, Mass Media and the British Public, 1932-53*. U of London P, 2019.

Rai, Alok. *Orwell and the Politics of Despair: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Writing of George Orwell*. Cambridge UP, 1988.

Rodden, John. *Becoming George Orwell: Life and Letters, Legend and Legacy*. Princeton UP, 2020.

Searle, G.R. *A New England? Peace and War 1886-1918*. Oxford UP, 2004.

Smith, Anthony D. *National Identity*. Translated by Juan Wang, Yilin Press, 2011. [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Van Dellen, Robert J. "George Orwell's *Coming Up for Air*: The Politics of Powerlessness." *Modern Fiction Studies*, vol. 21, no. 1, 1975, pp. 57-68.

Wiener, Martin J.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1850-1980*. Cambridge UP, 2004.

Williams, Raymond.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in the Modern Novel*. Translated by Ziman Han, et al.,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责任编辑:吴晋先

19 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卖妻”及其性政治研究

◎ 吾文泉

内容提要: 19 世纪英国正值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的高潮, 大机器生产取代工场手工业, 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 农民沦为无业游民, 手工业者破产, 工人失业, 财富分配不均造成贫富两极分化, 卖妻陋习在民间死灰复燃。本文通过对简·奥斯丁、托马斯·哈代等作家的小说, 以及宽页民歌中卖妻现象的研究, 认为 19 世纪卖妻书写是对英国经济强盛时期女性商品化的批评, 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真实写照, 是女性被妖魔化和市场化的仪式操演, 是女性长期处于受歧视和从属地位的性政治控诉, 更是人伦道德体系坍塌的绝佳例证。

关键词: 19 世纪英国文学 卖妻 性政治 简·奥斯丁 托马斯·哈代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3-0025-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维多利亚时代文学济贫书写研究”(19AWW006)

作者单位: 江苏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镇江 212100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3.003

Title: “Wife Sale” in 19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and Its Sexual Politics

Abstract: The Enclosure Movement really was coming to its end by the 1830s but leave as is if the article itself is also inaccurate, when machines replaced cottage industries workshop crafts and commodity economy replaced natural economy, farmers became vagrants, craftsmen went bankrupt, workers lost their jobs, and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wealth caused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rough the study of Jane Austen and Thomas Hardy’s novels, as well as the phenomenon of wife-selling in broadside ballad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writing of wife-selling in the 19th century is a criticism of the commodification of women during the economic boom of England, a true depiction of the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society, a ritual manipulation of the demon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of women, a sexual political complaint of women’s long-term discriminated and subordinate status, and a perfect example of the collapse of the moral system.

Keywords: 19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wife sale, sexual politics, Jane Austen, Thomas Hardy

Author: Wenquan Wu,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jiang, Jiangsu, China.

卖妻在英国至少存在了 300 多年。虽然梅尼非 (Samuel Pyeatt Menefee) 认为英国的卖妻现象可追溯到 1073 年(2),但最早有据可查的记录出现于 1553 年 11 月 24 日,“尼古拉·科尔达贝用推车推着妻子来到伦敦,把妻子卖给了一个屠夫”(Nichols 48)。19 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实施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工商业制度,导致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两极分化严重,加上政府济贫不力,从而让大量民众长期处于贫困和苦难之中。卖妻现象在农村和城市广泛存在,且大都集中发生在农村集市、伦敦东区贫民窟的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和数量众多的济贫院(劳动力弱的女性通常是济贫院的累赘和负担)。英国民间的卖妻行为有一整套程序和风俗:以市场或集市为场所,被卖者脖子套上绳索,购买者竞价,出价高者买走女人。不难看出,拍卖妻子实质上如同买卖牲口或奴隶一般。

英国的卖妻研究,大多数将卖妻归咎于夫妻不和、女方有外遇和离婚成本过高等,如梅尼非的《卖妻:英国大众离婚的人类学研究》(*Wives for Sale,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British Popular Divorce*)、汤普森(E. P. Thompson)的《共有的习惯》(*Customs in Common: Studies in Traditional Popular Culture*)、德罗孟德(Barb Drummond)的《嬉笑的女人和麻烦的妻子:英国的卖妻行为》(*Frolicsome Women and Troublesome Wives: Wife Selling in England*)等,这些专著从文化和习俗等方面探讨英国卖妻现象。但女性主义理论家米利特(Kate Millet)认为卖妻是将女性商品化和非人化的歧视行为,是“性政治正确”的牺牲品,是男性用以维护父权制、支配女性的策略;底层贫困的女性毫无抗争能力,只得靠出卖肉体或被拍卖而苟活,女性蜕变为“第二性”或“被边缘化的他者”。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 19 世纪文学中的卖妻现象研究集中于解读哈代(Thomas Hardy)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Mayor of Casterbridge*)。温菲尔德(Christine Winfield)、坦普尔曼(William Templeman)、塔夫特(Michael Taft)、苏克(Julie Suk)和唐纳利(Brian Donnelly)等学者探究了小说中卖妻事件的来源,但缺乏对人性、道德和女性主义等的深入分析。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的《走向女性主义诗学》(“Toward a Feminist Poetics”)一文是为数不多运用女性主义理论批评小说中卖妻行为的研究之一。国内两位学者对此也有一定见解,如魏军梅从法律视角对小说中卖妻事件展开的分析(34-43),以及胡怡君结合卖妻、巫术、斯基明顿等民俗学元素对小说中共同体的研究(182-99),但总体上这些成果缺乏女性主义研究视角。本文拟通过分析 19 世纪初奥斯丁小说、19 世纪中叶民歌和 19 世纪晚期哈代小说中的卖妻现象,剖析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女性的商品属性和从属地位,揭示卖妻现象人伦道德体系坍塌的本质。

一、奥斯丁小说中的女性商品化批评

卖妻采用民间集市商品买卖的形式:在公共场所公开拍卖,投标人竞价,有时售价低

到令人发指；丈夫将缰绳交给购买者，完成婚姻的交易，签订书面协议。交易完成后妻子如货物般被转交给购买者。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万物商品化，更是加剧了这一现象的流行。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对此习以为常，甚至为拥有高身价而窃喜：“一群人用于支配另一群人的权力结构关系和组合，在其性活动中，男性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力，而女性则被随意控制，对自己被降低到动物水平仍充满欣喜。”（米利特 32）19 世纪初经济市场化时代，女性主动兜售自己以换取更好的生存条件，富人花钱购妻使得婚姻商品化，女性身份地位降低到如米利特所言的“动物水平”。市场化经济是女性商品化的温床，也将传统卖妻行为转化为外表“体面”的合法化买妻。简·奥斯丁的小说是对女性商品化和婚姻道德伦理进行讽刺和批评的先例。

对一生都居住在农村的奥斯丁而言，卖妻事件不仅可以耳闻，报刊上也时常出现这些把女性当作商品的新闻。“到了 18 世纪 90 年代，卖妻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它成为了编辑评论的主题”（Gillis 212）。据阿什顿（John Ashton）的调查，卖妻双方竟然有中产阶级的绅士淑女：1815 年 7 月 14 日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完成了一桩卖妻生意，买卖双方都是有产者，被拍卖的妻子年轻漂亮，衣着靓丽，坐着马车前来，脖子上套着丝绸绳子，最终价格定格在 55 基尼（1 基尼等于 21 先令）的高价；离开时她仍然是乘着马车，买方是马匹商人，而卖方为牧场主（217）。身处社会转型期的奥斯丁将婚姻市场化和女性商品化穿插入动人的爱情故事之中，以浪漫故事中的特定情节批评该现象和女性地位低下的性政治，如长子继承权和买卖婚姻等。

女性婚后的嫁妆及所生子女都是丈夫的财产，遗产实行长子继承，妻女均无继承权。女性本身属于丈夫，姓氏必须改成夫家姓，缺乏应有的身份地位。《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 1811）中达什伍德置有偌大良田和庄园，膝下育有一儿三女，在其临死前，根据英国法律和惯例，所有遗产留给了儿子，给妻子和三个女儿只留了一小笔钱。母女四人必须搬出自己家，寻找容身之处。有时让旁支亲戚（如侄子或外甥）继承遗产也不给女儿，如小说中的威勒比就准备继承姨妈的财产。继承了遗产的有钱未婚女子是男人们追逐的对象，因为婚后女子所有的财产归丈夫，如《爱玛》（*Emma*）的女主人公爱玛拥有一笔不菲的钱财，使得嫌贫爱富的邻居埃尔顿律师对其死缠烂打。在商品社会，反之亦然，男人有钱也是适龄女性追逐的目标，《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中两个富裕的绅士宾利和达西购置地产定居在贝内特家附近，立刻成为贝内特家女儿们的猎物，由此应验了小说开篇著名的警句：“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奥斯丁 3）。小说叙事结构始终沿着有钱男人与贝内特家女儿们以经济为基础的爱情和婚姻展开，似乎暗示了奥斯丁对商品化婚姻的揶揄之意。通过伊丽莎白与达西的情感纠葛，奥斯丁真正的用意是财富维持只是社会基础，而两人的真情结合才是幸福婚姻的全部。

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导致奥斯丁在小说中对已婚女性商品化进行批评——东印度

公司在印度的婚姻市场。东印度公司依靠殖民扩张和海外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发了财的公司职员在印度急需娶妻生子，因而许多英国女性远赴印度寻找丈夫和财富，并在婚配后定居，由此在印度逐渐形成了一个火爆的婚姻市场。这些女性被形象地称为“捕鱼船队”(De Courcy 1)。在这里，女性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其目的是谋求财富，而男性又需求迫切，因而婚姻就是激情加财富的游戏。这个婚姻市场充斥着欲望与金钱的交易、阴谋与背叛的道德堕落和失范行为，“印度的这个婚姻市场与牲畜市场毫无二致，每件物品总要标到最高价位为止”(Blakiston 49)。著名宪章派诗人胡德(Thomas Hood)在其诗歌中假借一个年轻贫民女儿之口，表达了对去印度寻找财富的急迫心情，诗中这样写道：“爸爸妈妈每天都告诉我/现在是我出嫁的时候了/因为我虽然我尚未成熟/我已处于青春期/他们说，趁我们有阳光/我们应该晒成干柴——/而印度的太阳如烈火/我要去孟买！”(486)

1752年，奥斯丁的姑妈费勒(Philla)怀揣发财梦想，也加入“捕鱼船队”，远渡重洋去印度寻找有钱的东印度公司职员。不久，公司一名医生出钱购买了费勒，成为其丈夫。他比费勒大20岁，除了行医之外，还和公司高管、后来成为东印度公司首任印度总督的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合作做走私贸易，积累了不少财富。仅靠金钱维持而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根基不牢，加之年龄差距巨大，婚后两人感情不和，聚少离多。年轻貌美、风情万种的费勒经常一人留在加尔各答公司总部，几年后生下女儿伊莉莎。费勒出轨的传闻流传很广，据说黑斯廷斯是其生父。伊莉莎4岁时随父母回到英国，定居伦敦郊区。姑妈在东印度公司的传奇经历深深影响了年轻的奥斯丁，这种女性商品化的市场婚姻对其爱情观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反作用，并塑造了奥斯丁的婚姻观(也是她终身未婚的原因之一)：以财富为目的而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注定失败，出轨的恋情常常遭到道德谴责。

奥斯丁以姑妈费勒为原型创作了不少小说，如《爱情与友谊》(*Love and Friendship*)、《凯瑟琳，或凉亭》(*Catharine, or the Bower*)、《苏珊夫人》(*Lady Susan*)和《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等。《爱情与友谊》以书信体叙述了两对以财富为目的而闪婚的夫妻最终招致不幸的故事。劳拉见到英俊而富有的爱德华便春心萌动，两周内就嫁给了爱德华，而有钱的好友费丽帕也与一个试图通过婚姻攫取钱财之徒“闪婚”。金钱换来的婚姻遭到家人的反对，最后酿成悲剧。《凯瑟琳，或凉亭》则根据费勒远嫁印度的经历写成，小说中女主人公塞西莉亚搭乘“捕鱼船队”赶往印度，如费勒一样，被出钱最多的商人获得，嫁给了一个她并不喜欢、大她20多岁的富裕男人，婚后感情不和，痛苦万分。缺乏感情基础的买卖婚姻注定招致伤痛，这也是工业化时代女性商品化的悲哀。《苏珊夫人》是奥斯丁1794创作但生前未出版的小说，主人公苏珊是个风情万种又工于心计的寡妇，周旋于梅因沃灵和寇西两个男人之间，为获得更多财产和地位而把两个家庭搅得不得安宁，最终因计谋被识破而失败。苏珊主动出卖自己以换取最佳的生存条件，将自己商品化到如米利特所言的“动物水平”。《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把托马斯一家弄得鸡犬不宁的玛丽和亨利·克罗福德兄妹

也是这类人物。玛丽不仅长相迷人，而且天资聪颖、擅长表演，是个十足的交际花。她以女性特有的魅力勾引爱德华只为享有庄园的继承权，将自己的后半生建立在换取庄园财产的唯一目的之上。只因为最终被爱德华看穿，加之爱德华决意从事她鄙视的牧师职业，两人分歧严重，无果而终。由此可见，这些人物群像均有作者姑妈费勒以身换钱的影子，她们眼中的恋爱和婚姻是商品化的金钱生意，最终因情感和道德的缺失而失败。奥斯丁对这类婚恋观采取批评态度，从而有了有钱男人总缺少个妻子的讽喻名言。

在英国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市场经济浪潮中，追名逐利、自私自利的观念已然大行其道，以钱买妻，或者女性自降人格出售自己，都是平常之事，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婚姻成为时代风尚。换言之，奥斯丁笔下虽然没有买妻卖妻的交易仪式（通常被认为是粗俗的），但上述人物（往往是中产阶级）言谈婚姻必以钱财为目标，而市场婚姻的这些乱象如病毒一样，是费勒和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媒介输入的舶来品，在英国乡下都有其滋生的温床。女性就像漂荡在商品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只能任凭风吹雨打，随波逐流，也说明了商品化、追逐财富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和道德观已深深陷入商品大潮之中。

二、民歌中性政治的仪式化

卖妻事件不仅见诸报端（1760—1880年有218则报道；汤普森447），还在民歌中广为流传。英国民歌是一种描述性或叙事性的诗歌或歌曲，通常采用简洁的歌谣形式和朗朗上口的音韵节奏，以社会时事为主题，在公共场所演唱或朗诵。有时民歌被印在宽边的纸张上（一面是诗歌，另一面是曲调，配以刻版插图），在街上兜售（有时小贩还教唱这些民歌），世称“宽页民歌”（broadside ballads）。很多民歌由此进入口传文学，如《罗宾汉》、《绿袖子》和《斯卡布罗市场》等。“卖妻”民歌最为流行的时代正是印刷业和报刊业发达的19世纪。

民歌对卖妻的描述方式是直陈和白描，其仪式感和交易性更加直观。缰绳是售妻仪式的中心部分。妻子在脖子上套着缰绳，被带到市场上。缰绳往往是普通的绳索，也有丝绸绳和缎带等。这令人联想起牲口市场和奴隶竞卖现场。被卖的妻子被降格为动物，失去了人格和话语权，如同待宰的羔羊任人摆布；而男子手执缰绳，牵引妻子，吆五喝六。交易双方是男权主义的代表，统治并支配着女性的身体和话语权。女性在这场性政治的支配权交易中被赋以商品属性，按米利特所言：“男权制授予父亲对妻子和孩子的绝对拥有权，包括肉体摧残的权力，甚至还常常包括杀害和出卖的权力。”（42）

在大多数19世纪民歌中，妻子被卖时都被安上了各类罪名：酗酒、通奸、粗暴脾气或其他坏习惯，给男权主义者盖上一块遮羞布。如1828年的一首民谣《卖妻歌》（“Sale of a Wife”）便描述了一位苏格兰妻子：“玛丽·麦金托什大约六点钟被丈夫带到草料市场，准备被卖掉。她的罪行是酗酒和通奸，腰间系着一根草绳，胸前写着‘待售’的字眼。数千

名观众聚集在一起见证了这一新奇事件。”(web) 由于卖妻过程侮辱性太强, 而且几个竞标者争相嘲笑被卖女子, 激起民愤, 旁观的几百名妇女用石头做武器奋起反抗, 她们攻击拍卖者, 把丈夫打倒在地, 造成一场空前的打斗和骚乱, 但仍然没能阻止妻子被卖。

牛津大学图书馆线上英国宽页民歌数据库(Broadside Ballads Online)收集了近20首以卖妻为主题的19世纪民歌, 足以说明当时民间卖妻风俗之流行。民歌《造船木匠的妻子》(“The Ship Carpenter’s Wife”)中的卖妻过程就是一出完整的喜剧。首行吆喝爱嬉笑的观众, 称卖妻故事为嬉笑的喜剧, 其中一个竞价者一边出价, 一边嬉笑。竞拍者手拿铮亮的锤子, 女人站在手推车上。最终水手购得妻子, 用手摸其脸蛋, 驮回去, 上了吊床(水手生活在船上), 并请乐手吹奏《情郎罗松》的曲子, 大家一起歌舞到天亮(web)。这首民歌是水手生活的独特写照, 表现了底层民众把买卖妻子当作普通婚礼来庆贺的习俗。曲调虽粗俗, 但独具仪式感和游戏性。水手的行为仿佛是购物者获得心爱的商品, 用手抚摩, 匆匆回去享用, 且不用改善居住环境, 毫无新婚礼仪之感。卖妻过程对于男性而言有时是轻松的游戏和幽默的操演, 妻子易主只在敲锤付钱的一瞬间。在公众游戏和注视的仪式中, 女性应有的权利和身份丧失殆尽, 男性的权威展现无遗。

民歌《约翰·霍布斯》(“John Hobbs”)婉转起伏又风趣幽默, 通过幽默曲折的叙事, 表现了夫妻双方对话语权的争夺。妻子虽然漂亮但凶悍, “快活的”霍布斯将妻子拽到市场, 准备跳出火坑。但没人出价要这个悍妇, 而且来市场的男人都是卖妻的, 自然不会买。霍布斯无奈, 准备用绳子结束自己的生命, 救他的却是那个自己讨厌的妻子, 两人交流了一阵便和解了, 高高兴兴把家还(web)。这首民歌每两行就有惊人的转折, 其独特之处正是通过三起三落的不断变化, 出色捕捉到了夫妻之间的情感动态, 话语权的得与失就在顷刻之间, 操演性极强。整个卖妻过程就是一个玩笑, 最终没卖成, 但过程基本都走完, 只是因为男人们没胆量买回去征服她。可见女性(虽有妖魔化之感)牢牢抓住了话语权, 但诗歌仍然以丈夫霍布斯为主体, 将他描述为遭受婚姻不幸的受害者和可怜人, 以后也摆脱不了那个“恶魔”。

另一首名为《卖妻》(“The Sale of a Wife”)的民歌讲述一个贫民窟的纺织工在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出售妻子的过程。观看者人山人海, 女人被缰绳牵出, 拍卖者大喊开价, 其间嬉笑声不断, 最后由出价最高者买走了女人。卖妻的男子拿到13先令1便士, 在手里抛来抛去, 手舞足蹈, 欢呼雀跃, 高唱卖妻歌, 走向赌场(web)。这两首卖妻歌充分说明卖妻仪式的游戏性和娱乐性, 演绎了一幕滑稽可笑的荒诞剧。其荒诞性体现为二: 一是观众的热闹和起哄, 兴奋的场面是对被卖妻子的贬低和歧视, 也是女性在公开场合被众人当作性想象和性游戏的对象; 二是原丈夫终于摆脱了麻烦和累赘, 获得自由后兴高采烈, 尽情享乐。女性在性别政治中成为被嘲笑和被歧视的玩物, 而且来卖妻市场看热闹的大多是拥有性别优越感的男人。这是个一边倒的游戏仪式, 是对女性的严重侵害。女性没有话语权

和身份感，若女人来参与这种市场，就一定会搅局，阻止这种有辱女性的野蛮游戏，因为她们痛恨它、讨厌它，可以打破这种性政治不平衡的状态。

民歌中的卖妻仪式是民间习俗的游戏化和戏剧化，它具有社区仪式的所有特性：简便实用、表演性、市场性、民间狂欢化。它又包含了牲口或奴隶拍卖市场的买卖特征：缰绳牵引、市场拍卖、评头论足和公众见证等。卖妻事件在本质上是社会、经济、法律、性别、道德和心理等方面的各种复杂、深刻和隐秘的渊藪，尤其是女性在性别政治关系中的非人性和非法性。对于男性而言，卖妻仪式增强了游戏性；女性则是仪式中被观看和被戏谑的受辱对象。男性占统治地位，可以随意处置手里的物品，而女性只能被动服从，不能反抗，只能成为游戏中的玩物。

三、哈代小说中性政治的伦理叙事

哈代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1886)讲述的故事堪称19世纪最著名的卖妻事件，主人公亨查德拍卖了妻子苏珊和他们的孩子。哈代的卖妻叙事颇具戏剧性。虽然亨查德在醉酒时一时冲动卖掉了妻女，但整个场面具备了卖妻仪式的所有元素和程序。哈代的卖妻素材源自《多塞特纪事》(*Dorset County Chronicle*)等报道：布赖顿的一名男子领着一位外表整洁、脖子上挂着缰绳的年轻女子到市场上准备将她出售。讨价还价在人群的哄笑声中进行，一位买家很快出现并以30先令将其买下。哈代看中的是民歌中人群的哄笑声，并据此对这则报道进行大胆的文学性改造，减少粗俗性和偶然性，增加时代性和伦理性。

亨查德酒后的卖妻闹剧开启了一篇伦理叙事。亨查德是个打草工，与妻女一家人“可怜又寒酸”(哈代3)，走在两边种满树篱的路上(树篱是圈地运动时所种的小树，用作圈围土地的篱笆，现已长高长大)。这是后圈地时代的英国农村，由于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大农场的发展壮大，挤压了农民的生存空间，自由农蜕变成农场工人或称季节性雇工，受到农场主的压榨，生活贫困。亨查德便是这样的季节性雇工，到处寻找工作机会。小说开始，筋疲力尽的他两手空空，饥肠辘辘。他与人喝酒，在醉意正浓时落入他人起哄的圈套，将妻子苏珊和他们的孩子以5基尼卖给了一个水手，一场玩笑变成事实。亨查德醒来后悔不已，到处寻找妻女未果，发誓绝不沾酒，不断奋斗，成为受人尊敬的卡斯特桥市长和大商人，但最终却因为卖妻丑闻传扬出去而身败名裂，众叛亲离。

亨查德的卖妻行为一开始就是娱乐性和游戏性的，虽也有仪式感，但是违背男女主人的意愿，属于非法行为，也不符合人伦道德。亨查德在醉酒时所开的玩笑，只能当作现场一同酗酒的几人的娱乐而已，拍卖仪式也只是一场模仿秀，并非真正的市场拍卖(没有拍卖者、大量公众观看，女人脖子上也没有套绳)，因而即使在农村，这样的仪式也不符合民

间习俗或习惯法。此外，亨查德卖妻也是无奈之举。由于长时间处于失业状态，无力养活自己，更不用说一家人，生活的窘迫（在他卖妻时身上只有15先令）迫使其卖妻。亨查德正好借游戏为由出售妻子，扔掉生活包袱。既娱乐又无奈的卖妻是亨查德悲剧的根源，一如胡怡君所言，是其性格缺陷导致了一场道德危机和人生悲剧。卖妻“是亨察尔[亨查德]悲剧产生的根源，是人物性格缺陷的放大镜”（187），卖妻事件在亨查德心头投射了永远的道德谴责与法律责任的阴影，对其商业活动和政治生涯都产生了严重影响。就法律冲突而言，魏军梅认为“当时国家正式法、宗教法、民间习惯法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这实际上反映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多元婚姻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和博弈”（36）。哈代将卖妻描述为一种非法的、不道德的行为，是冲动型的或道德上有缺陷的人所犯之错。然而，“这个有道德缺陷的人物并不是反派，而是一个悲剧主角，因为卖妻的复杂道德和意想不到的后果，还是由于交易中各种可能的法律含义而造成的”（Suk 27）。民间习惯法认可卖妻行为（有人做证、有人主持仪式），亨查德的妻子始终觉得卖妻是“合法的”，而亨查德本人却在道德和法律等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最终与其显赫的地位和富足的财产形成矛盾冲突。这才是亨查德悲剧的根源。

然而，就妻女被拍卖而言，女性长期在男性霸权统治之下，渐渐屈服，麻木到逆来顺受、任其摆布的地步，加之女儿一起被卖，似乎女性无论长幼，都是父权的牺牲品和受害者。肖沃尔特认为：“亨查德选择了生活在男性群体中，用父子关系、金钱和法律契约的男性准则来定义他的人际关系；[……]（女性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压抑的男性自我的理想化和忧郁的投影。”（130）哈代想用卖妻的游戏性和仪式性来构建一个卖妻戏仿的假象，却更加突显了卖妻事件从娱乐到现实的不可逆性，以及亨查德卖妻的社会属性和时代特征。像亨查德这样从底层打拼到一定地位和身份的成功人士必定在男权社会和现代文明转型期走向悲剧。哈代在小说最后也预言了一个女性翻身的想象级景象，即其女儿伊丽莎白·简的逆袭成功将经济结构女性化，而亨查德自己则成为一个过时的商人。“他所经历的经济女性化过程与他作为一个过时的商人，这都与他作为一个不正当的和情感驱动的经济学的实践者而受到的惩罚密切相关”（Kreisel 149）。

上述文学作品中的卖妻现象只是19世纪英国文学长河中的部分代表，除了民歌直陈民间卖妻的现实以揭示底层贫困人民生活真相外，奥斯丁根据英国农村中产阶级婚恋状况的物化转向而对女性商品化及其道德败坏的倾向进行讽刺和批判，而哈代则把主人公的卖妻行为作为导致其人生悲剧的伦理选择，以揭示英国社会伦理悲剧的实质。文学中的卖妻现象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和贫富两极分化的产物，是对英国经济强盛时期女性商品化的批评，是女性被商品化、妖魔化甚至娱乐化的展演，是女性长期处于受歧视和从属地位的性政治控诉，更是人伦道德体系坍塌的绝佳例证。进入21世纪以后，卖妻风俗在英国已然消退，

然而文学界对此仍津津乐道，如法莫（Virginia Farmer）的《六便士新娘》（*Sixpence Bride*）和《斯宾斯沃思新娘》（*Spenceworth Bride*），赫恩（Candice Hern）的《新娘出售》（*The Bride Sale*），希雷（S. Shirai）与德维（C. Devine）的《出售婚姻》（*Marriage for Sale*），以及卡罗尔（Lois Carroll）的《盗窃出售新娘》（*Stolen Bride for Sale*）等，不一而足。这类小说娱乐性强，但其中蕴含的卖妻信息证明了文化传承中业已形成的强烈集体无意识，是英国民族意识中挥之不去的记忆印迹。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shton, John. *Social England under the Regenc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888.
- Austen, Jane. *Pride and Prejudice*. Translated by Zhili Sun, Yilin Press, 1990. [奥斯丁:《傲慢与偏见》, 孙致礼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0。]
- Blakiston, John. *Twelve Years Military Adventure in Three Quarters of the Globe*. London: Henry Colburn, 1829.
- “Sale of a Wife.” *The World on the Street,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digital.nls.uk/broadsides/view/?id=15971&transcript=1.
- De Courcy, Anne. *The Fishing Fleet: Husband-hunting in the Raj*. Phoenix, 2013.
- Donnelly, Brian. “Thomas Hardy’s ‘The Mock Wife,’ ‘Maumbury,’ and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no. 1, 2016, pp. 97-110.
- Drummond, Barb. *Frolicsome Women and Troublesome Wives: Wife Selling in England*. Barb Drummond, 2018.
- Gillis, John. *For Better, or Worse: British Marriages, 1600 to the Present*. Oxford UP, 1985.
- Hardy, Thomas.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Translated by Guoliang Guo, et al.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2016. [哈代:《卡斯特桥市长》, 郭国良等译。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6。]
- Hood, Thomas. *The Choice Works of Thomas Hood*.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876.
- Hu, Yijun. “Wife Sale, Witchcraft, Skimmington and the Prudent Businessman: A Study of the Paradigms of Community in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2, 2019, pp. 182-99. [胡怡君:《卖妻、巫术、斯基明顿与理性的商人:〈卡斯特桥市长〉里的共同体范式研究》, 载《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第182-99页。]
- “John Hobbs.” *Broadside Ballads Online*, ballads.bodleian.ox.ac.uk/static/images/sheets/10000/09765.gif.
- Kreisel, Deanna K. *Economic Woman: Demand, Gender, and Narrative Closure in Eliot and Hardy*. U of Toronto P, 2012.
- Menefee, Samuel Preatt. *Wives for Sale,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British Popular Divorce*. St. Martin’s Press, 1984.
- Millett, Kate. *Sexual Politics*. Translated by Wenwei So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2000. [米利特:《性政治》, 宋文伟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 Nichols, John Gough, editor. *The Diary of Henry Machyn, Citizen and Merchant-Taylor of London, 1550-1563*. London: J. B. Nichols and Son, 1848.
- Showalter, Elaine. “Towards a Feminist Poetics.”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edited by Elaine Showalter, Pantheon Books, 1985, pp. 125-43.
- Suk, Julie. “The Moral and Legal Consequences of Wife Selling in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Subversion and Sympathy: Gender, Law, and the British Novel*, edited by Martha C. Nussbaum and Alison L. LaCroix, Oxford UP,

2013, pp. 6-47.

Taft, Michael. "Hardy's Manipulation of Folklore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The Case of the Wife-Sale in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Studies in the Novel*, No. 4, 1981, pp. 399-407.

Templeman, William. "Hardy's Wife-Selling Incident and a Letter by Warren Hastings."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no. 2, 1955, pp. 183-187.

Thompson, E. P. *Customs in Common: Studies in Traditional Popular Culture*. Translated by Han Shen and Jiafeng Wang,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2002. [汤普森:《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家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The Sale of a Wife" *Broadside Ballads Online*, ballads.bodleian.ox.ac.uk/static/images/sheets/10000/07162.gif.

"The Ship Carpenter's Wife" *Broadside Ballads Online*, ballads.bodleian.ox.ac.uk/static/images/sheets/15000/13105.gif.

Wei, Junmei. "Conflict and Game in the Pluralistic Matrimonial Legal Norm of Victorian England: Based on the Wife-sale Scene in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Journal of Jiang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0, No. 5, pp. 34-43, 125. [魏军梅:《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多元婚姻法律规范的冲突和博弈——以《卡斯特桥市长》中卖妻事件为视角》,载《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34-43,125页。]

Winfield, Christine. "Factual Sources of Two Episodes in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no. 2, 1970, pp. 224-31.

◇责任编辑:夏开伟

“后9·11”男性神话的颠覆 ——《国家乱象》中的美国男性气质反叙事解读

◎ 吴荣兰

内容提要: 肯·卡尔弗斯的《国家乱象》是一部讽刺性“后9·11”小说,将个人私事与国家大事并置以揭露“后9·11”美国问题。本文基于男性气质视角进行文本解读,探究小说如何在描述一场私人离婚拉锯战的同时讽喻美国社会,打破“9·11”之后美国政府利用主流媒体所构建的男性神话,即英雄叙事,以及衬托男性气概的女性受害者刻画,取而代之以一幅美国男性气质乱象,包括萎靡和失控的“自造男人”男性气质、抑郁的联邦调查局“超男性气概”和颠覆的“脆弱少女”保护迷思。小说成功地实现了男性书写的反叙事,表达了作者对美国关于反恐的国家安全策略的质疑,以及对反恐战争的批判。

关键词: 肯·卡尔弗斯 《国家乱象》 男性气质 “后9·11” 反叙事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2023)03-0035-09

基金项目: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美国‘后9·11’小说男性气质研究”(Z20JC068)

作者单位: 浙江树人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3.004

Title: Demolishing Post-9/11 Male Myth: On the Counter-narrative of Masculinity in *A Disorder Peculiar to the Country*

Abstract: Ken Kalfus's *A Disorder Peculiar to the Country*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first satirical Post-9/11 novels, and it juxtaposes personal affairs with national events to expose Post-9/11 American problems.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sculinity, and explores how the novel, through narrating a torturing divorce, satirizes American society, demolishes the male myth constructed by the mainstream media after September 11 which is featured with hero narrative and portray female victims to replaces the demonstration of masculine disorder. This process is represented by the “self-made man” out of control, the depressed hypermasculinity of FBI agent, and bankrupt protection of “vulnerable maidens”.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novel successfully realizes a counter-narrative of male writing, and presents the author's views against American government's security strategy and war of counter-terrorism.

Keywords: Ken Kalfus, *A Disorder Peculiar to the Country*, masculinity, Post-9/11, counter-narrative

Author: Ronglan Wu, Associate Professor,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男性气质与美国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不了解男性气质就无法彻底地了解美国历史”(Kimmel 2)。纵观美国历史,美国男人一直很在意自己的硬汉形象,更确切地说是在意自己在别人眼中的男子汉形象。“美国男人一直害怕别人会认为[他们]不够具备男子汉气概,软弱、胆怯、害怕”(6-7)。“9·11”之后,美国男人的这种焦虑与恐惧加剧,因为双子塔的倒塌被直接解读为“美国男性神话的象征性破坏,民族自豪感的骤然阉割”(Ramazani 118)。在他们看来,这不仅证实了福山(Francis Fukuyama)关于“西方文化女性化”的担忧(27),似乎还印证了本·拉登、萨达姆对美国男人鄙夷式的论断。本·拉登于1998年12月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曾嘲笑“美国士兵懦弱”“男性气概丧失”“穆斯林妇女拒绝被这些美国犹太男妓保护”(转引自Tickner 333)。因此,在男性气概受质疑的危急时刻,政府急于治愈民族创伤,利用主流媒体建构了美国霸权必胜的男性神话景观,表现出一种“英雄叙事”的怀旧心理。其本质被蒂克纳(Ann Tickner)归纳为美国常见的性别政治策略,即“在战争或不确定时期就会致力于‘重构一个男性化社会’”(336)。出于政治目的所打造的男性气质迷思(masculinity myth)受到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和以班纳特(Eve Bennett)、法鲁迪(Susan Faludi)为代表的学者的关注。在他们看来,官方叙事中的男性气质表征可概括为二:其一为与爱国主义相关的美国霸权、英雄式男性气概和日常英雄的回归;其二,让女性在媒体中消失,或将之塑造为受害者形象,以彰显美国男性气概。在《新时代来临》(“The Coming of Age”)演讲中,小布什总统号召“抛弃女性所代表的软弱、被动和受害者形象,转向营造男性的力量、积极的行动和军事的胜利氛围”(转引自Drew 74)。

“后9·11”时代出现的男性神话景观引起了卡尔弗斯(Ken Kalfus)的关注。他独树一帜,在2006年出版了第一部讽刺性的“后9·11”小说《国家乱象》(*A Disorder Peculiar to the Country*)。小说用一种巧妙的新风尚喜剧形式,在炭疽恐惧、自杀式炸弹和反恐战争背景下,讲述马歇尔和乔伊斯两位主人公在曼哈顿痛苦、荒唐的离婚经历,借以讽喻社会。小说塑造了马歇尔、罗宾斯两位颓废的男性形象和以尼克为代表的堕落且邪恶的美国暴徒画像,这显然与官方的“男性狂欢叙事”背道而驰,给“后9·11”时代出现的“寻找英雄”狂热泼了冷水。因此,本文将从男性气质视角出发,探究《国家乱象》中的男性叙事如何对媒体所鼓吹的男性气质迷思进行反拨,颠覆“后9·11”时代的男性神话,形成男性书写的“反叙事”,进而考察美国社会的真实风貌,表达作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对美国国内外政策的反思与批判。

一、失控的“自造男人”: 家庭修辞的失败

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政府发表演讲,号召传统家庭的复兴,希望家庭成为爱国团结和休养希望的强有力隐喻,利用民族主义和家庭力量来加强国土安全(转引自Biesecker

147-69)。主流媒体将美国男人打造为“日常英雄”，力图抵消美国“普遍存在的无助感和潜在的怀疑，即国家及人民已经变得软弱，袭击带来的恐惧已深入人心”（Carroll 55）。然而，《国家乱象》开篇以两位主人公误认为配偶已命丧“9·11”的狂喜反应，表明作者对“自造男人”（self-made man）“日常英雄”身份及其家庭愿景的质疑。

在美国文化中，“自造男人”男性气质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看重“市场上的成功、个人的成就、流动性、财富”，强调以自我控制来获得身为男人的安全感（Kimmel 23）。马歇尔先前的身份基本符合流俗“自造男人”标准：已婚且育有子女，工作体面，跻身于白人中产阶级。然而，自从离婚程序启动以来，马歇尔的生活已完全失控：在家庭、性、职业及暴力这几个传统领域，他都遭受了男性身份危机，迷失了自我，根本无力修复和经营家庭。

马歇尔一直活在婚姻失败导致的自卑与绝望之中，尽管他的名字暗示着男人的权威。妻子乔伊斯多年前就不再与他有夫妻生活，二人水火不容，甚至在家时互不说话、互不干扰，沟通只能通过律师进行，“相互之间的憎恨已上升到部落和种族间历史性仇恨的强度”（Kalfus 7）。磨人的离婚官司让马歇尔频频陷入绝望的情绪状态，“无价值的、不妥协的、失败的和死亡的情绪”（11）。他试图找回男性的自信，因而笨拙地与幼儿园老师娜奥米调情，却发现自己只是一厢情愿；他以为可以独自照顾好两个孩子，享受单亲家庭生活，却手忙脚乱，发现自己只是盲目乐观。

家庭失败的马歇尔试图借用英雄气概的标识来重获控制感。从世贸中心逃离时，他曾回去去帮助受伤的陌生人劳埃德。这一度让他感受到久违的自信，“在这个需要果断当担、采取行动的危險时刻，某种东西正在显现，他看到了希望，在这一瞬间，他可以瞥见自己成为男子汉的希望”（15）。油然而生的英雄气概让他主动担当起劳埃德逃生导师责任。马歇尔居高临下地看着自己的“俘虏”，询问他的名字，打听他家人的情况，鼓励并搀扶着他往前走。然而，这种欢欣鼓舞的感觉只持续了片刻，劳埃德就被坠落的残骸砸中，一半脑袋被横截削掉，坠地而亡。马歇尔感到曾经拥抱过他的希望消失了，“留给他的并不陌生的绝望”（18）。更可怕的是，他一直无法摆脱内疚的感觉，不停质疑正是自己的拯救才导致了劳埃德的死亡，如果劳埃德晚一刻被拉出废墟，或在其他时刻自行出来，也许就不会正巧被掉下来的残骸砸中。他猜测乔伊斯也会这么说，所以他在想象中不停与她争辩：“我一直表现得很英勇。你看不见吗？该死的，难道你不明白吗？”（38）正如这句脏话所暗示的一样，马歇尔根本无法让自己相信他是成为英雄的材料。“9·11”之后，媒体不停播放死里逃生的幸运者的报道，给他们贴上勇敢的平民英雄标签。殊不知这些“幸运者”已然成为德里罗（Don DeLillo）小说中的“坠落的人”（Falling Man），萎靡地沦陷于创伤抑郁的旋涡里不能自拔。

未能找到英雄气概的马歇尔只能诉诸暴力，因为“男子气概既被理解为生殖的、性欲

的和社会的能力，也被理解为斗争或施暴的才能”（布尔迪厄 69）。暴力可以对自信与勇气的缺失进行表面的修复或补偿。马歇尔开始在酒吧打架，沉浸在人群的短暂关注中，尤其是当两个女孩走到他身边时，他表现得更为勇猛。当她们得知他是一名“9·11”幸存者后，表现出了更多的兴趣，这让他有了一种被追捧成英雄的错觉。但是，马歇尔冷静的姿态下潜伏着不安、怀疑和绝望：“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自己会进一步坦白他有多么可怜、多么羞愧、多么孤独。她们会同情他吗？她们会拥抱他吗？他应该告诉她们他的‘9·11’故事吗？”（206）马歇尔欲言又止，因为“自造男人”的父权标准认为“自造男人需要自我控制，而自我控制需要情感控制”（Kimmel 128）。他生怕按照父权标准，向他人敞开心扉会使他显得脆弱、女性化。在此，卡尔弗斯揭示了“9·11”后充斥于美国文化中的霸权性男性气质不过是一场表演，“是一个用来掩盖创伤国家的恐惧和不安的盾牌”（Bjerre 246）。

压垮马歇尔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的失业。失业是对男性的一种阉割，“男人一旦丧失经济能力，作为一家之主的地位就大打折扣，男性气概受到威胁”（Kimmel 201）。妻子开始明目张胆地出去约会，还将获得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和公寓。男性需要在与女性的关联中定位自己的男性气概（7），妻子的漠视加剧了马歇尔的价值焦虑，她的决绝彻底摧毁了马歇尔作为男人的底气与信心。为了最后证明和维护男性气概，马歇尔决定孤注一掷，炸死全家。他模仿圣战分子，在胸前绑了一个自制炸弹，对乔伊斯大声宣布上帝是伟大的，然后试图引爆。结果失败了，因为他读不懂阿拉伯文说明书，未能正确地连接电线。四次尝试均失败了，每一次失败都进一步羞辱了马歇尔。讽刺的是，这是乔伊斯唯一一次对马歇尔的所作所为感兴趣。她开始帮助急得快精神错乱的丈夫；两个孩子也随之加入，儿子靠在父亲身上，一只小手放在一顶炸药帽上。现场变成了一个怪诞、扭曲的幸福家庭景象：当家庭成员齐心协力时，久违的欢乐闪现，但是一旦成功，他们就会毁灭。看着家人为他的自杀——谋杀阴谋而齐心协力，马歇尔不禁想起他们也曾充满爱意、亲密无间，由此突然感到疲劳，放弃了引爆，结果又被妻子指责他没能力完成任何事情。之后，这对夫妇又恢复了敌对状态。

“家庭”的隐喻一直充斥于西方现代政治想象与实践，特别是在发生重大历史事件时，政客所发表的关于家庭的言论，即“家庭修辞”，具有一个普遍特征，即将家庭情感推扩到国家情感，以家喻国。一向鼓吹个人主义的美国也不例外。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与安全感遭受重创，民众生活在恐怖主义的阴霾之下。“家庭隐喻”随即成了美国国家政治话语的一部分，政府发表“家庭修辞”，鼓励传统家庭回归，其内涵包括贬斥女性主义与女权政治，倡导男性作为“一家之主”的核心力量，将家庭单位视为休养希望与爱国团结的强有力隐喻。在家庭修辞中，官方试图传播一种更为广泛的男性价值观，即把“日常英雄”视为“一种无可指摘的男性行为，消除人们对‘9·11’内涵的任何模糊认识”（Carroll 54-55）。然而，卡尔弗斯笔下的马歇尔不但事业失败，失去人生目标，甚至差点毁灭整个家庭。这种萎靡且失控的“自造男人”形象嘲讽了美国的男性神话，构成了

对美国文化引以为傲的“自造男人”男性气质的反叙事，揭露了政府所宣扬的家庭修辞的失败。

二、抑郁的联邦调查局“超男性气概”：国家安全论的质疑

除了对“日常英雄”进行嘲讽，为了进一步揭露“9·11”之后官方为宣扬国家安全论而刻意标榜的“超男性气概”（hypermasculinity）的伪装，卡尔弗斯刻画了一个英雄标签更为突出的男人——联邦调查局特工罗宾斯，使小说在男性气质书写上的反叙事特征更加明显，“成为对抗危机时期充斥于美国的尖锐、简单化的英雄故事中的必要堡垒”（Bjerre 245）。

“9·11”之后，媒体把超级英雄重新打造为主流文化元素，为男性，尤其是白人男性打造超级英勇、果敢、智勇双全的“超男性气概”形象：电视台循环播放着白人消防队员拯救受害者时视死如归的画面，报道着美军“在伊杀敌”时英勇无畏的事迹；原本民心不稳的小布什总统也摇身一变，和他的男性官员化身为“机动玩具、超级英雄”（Faludi 47），公众支持率飙升，超过90%。在媒体叙事中，小布什总统迈着自信的步伐，目光坚定，铿锵有力地面向全国发表了题为《新时代来临》的演讲，言行举止透露着总统英武的权威、强大的男性力量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雄心。“9·11”事件已被彻底征用，“变得政治化、商业化、军事化，而且性别化了”（Bjerre 244）。官方叙事这一套路并不陌生，因为在男权文化话语体系中，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是公认的男子汉，“通过依附在‘男性气概’上，他们成为人们眼中优秀的战士”（Goldstein 252）。小说开篇形象地描述道：

纽约的警察和消防员要比其他城市的更有魅力，[……]他们表现出古典英雄的风度，目光清晰，胸脯横阔，有男性气概，心地善良。当他们大步走过大街，走进熟食店时，大家都鼓掌欢迎他们。[……]在这座城市的任何时刻，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一名消防员，而当他从人群中经过时，市民们都会退后一步。（Kalfus 21）

乔伊斯也沉浸在对英雄的意淫中。第一次看到罗宾斯时，尽管他又矮又胖，乔伊斯仍因为他“英勇的权威”而莫名地感动、痴迷，理由只有一个：他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她把最平凡的事美化为充满情欲的时刻。当回想起他在例行的炭疽检查中用棉签擦拭她的鼻子时，她就幻想他们之间有一种浪漫的联系；她洗完澡后站在镜子前，想象着罗宾斯带着“时而孤独，时而沉思，时而慷慨，时而贪婪”的眼光看着她赤裸的身体（51）。显然，乔伊斯把一系列传统男性特征强行投射到罗宾斯身上，并让自己暴露在男性掠夺者的目光下，幻

想着他胳膊强壮，双手柔软，看到她的迷失和恐惧，来拯救她。性一直被视为“美国男性气质的一个核心要素”（Kimmel 68-69），在流俗女性眼中，披着英雄外衣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消防员自然而然成为超男性气概的代表。乔伊斯的女同事们趋之若鹜，迫不及待地 and 消防队员约会，追求一种“恐怖性爱”（terror sex; Kalfus 22），希冀从中找回安全感，消除恐惧。

然而，当乔伊斯慢慢接近罗宾斯并最终与他约会时，她构建的男性神话破灭了。罗宾斯并非媒体塑造的英雄救世主；相反，他是一个抑郁症患者，需要医生的拯救，正在接受心理治疗。当他们在地铁上偶遇时，小说透过孩子纯真的眼光，让读者看穿乔伊斯有色眼镜中“英雄”的真面目。他眼皮耷拉着，两眼无神，反应迟钝，垂头丧气地和她讲述联邦调查局工作的挫败感：他们曾接收到“9·11”袭击预警，却无法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阻挡它；炭疽调查混乱又让人崩溃，他们只是穿梭在不同机构间，收集着不计其数的数据却无法进行关联，只能例行公事地把报告发送给上级，“让它杂乱地堆放在某人的桌子上，让他决定如何利用自己的智慧，而事实是政府中没人能够完整地看待并理解这个事件”（138）。在正式约会时，罗宾斯毫无兴致，只顾喋喋不休地描述联邦调查局审讯系统的怪异：他们逮捕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嫌疑犯”，使出浑身解数折磨“犯人”，随便套出点话去交差，但是没日没夜的审讯工作反而把他们自己变成被洗脑的囚犯，什么都记不住。他的坦露心扉让乔伊斯沾沾自喜，误以为这是他俩关系亲密的力证。事实是罗宾斯逢人就说，对象包括住在隔壁的老妇人、干洗店的清洁工、华裔送货员，因为他必须找人倾诉，从而找到活着的感觉。“他必须证明在工作之外，在联邦调查局之外，还有一个世界”（200）。一直被父权话语洗脑的乔伊斯认为“情感控制保持男性的完整性”（Schwenger 44），失去情感控制的罗宾斯在她眼里自然就丧失了男性神话光环，其价值也得不到男性社会的肯定。罗宾斯最终神秘地从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失踪了，乔伊斯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从他同事嘴里也打探不出任何消息。

“9·11”之后的美国宛如惊弓之鸟，官方叙事中强行回归的美国传统男性气概似乎为之注入了强心剂，刻意表现的“超男性气概”曾让美国人知晓“国内与国外的‘美国新战争’”，让他们“觉得更安全了，因为‘我们’的男人正在保护我们和我们的生活方式”（Tickner 335）。然而，卡尔弗斯让乔伊斯见证的“超男性气概”是无能而抑郁的，完全无法胜任保护国家安全的职责。乔伊斯沮丧地总结道：“又一个失败者，又一个破碎的人格，又一个中年疯子，这证实了她所听到的，她现在遇到的男人都有毛病。”（Kalfus 197）罗宾斯所代表的“超男性气概”类似于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一般性偏执狂的“伪男性气概”，其实质是一种掩盖性别不安的徒劳，是官方主流媒体叙事所打造的男性神话论的反叙事。卡尔弗斯揭穿了这种伪装，让读者重新回到不断质疑国家安全的状态。就如乔伊斯，她憎恨自己竟然误信在美国的生活是安全的，事实是“有人像配偶一样无耻地欺骗了她们[……]她和孩子的未来笼罩在一个致命的、不可磨灭的阴影之下”（Kalfus 32-33）。

三、颠覆的“脆弱少女”保护迷思：军事行动正当性的瓦解

不管是“日常英雄”，抑或是“超男性气概”，官方打造的“后9·11”父权胜利叙事都是围绕“美国神话”构建的，“在那里女性需要男性的保护，而男性成功地提供了保护”（Faludi 118）。它是一种渊源颇深的文化传统，无意识回顾了曾经平息美国文化创伤的一种迷思。早在17和18世纪，印第安部落捕获了数以百计的新英格兰移民。妇女和儿童的囚禁暴露了白人男性保护的失败，给男性带来巨大的羞耻感和创伤，“白人少女被黝黑的‘野蛮人’强行带走的过去成了[这个国家]反复出现的比喻。[……]少女的获救，无论是幻想的还是现实的，都成了主导的救赎故事”（212）。每当美国遭遇社会、政治或民族危机，它就会重现。根据法鲁迪（Susan Faludi）的观察，在媒体报道中，“9·11”受害者主要被描述为“脆弱少女”，尽管“9·11”遇难者比例为三男一女。邦廷（Madeleine Bunting）在《卫报》中指出，“9·11”后第九天，一般女性几乎从报纸和电视屏幕上消失了，“目前媒体上唯一的女性面孔是受害者”（3）。异国风情的“脆弱少女”救赎论也大行其道。美国政府频繁提及伊拉克的强奸室，“围绕着野蛮男性敌人压迫女性的论述，把反恐战争定义为从棕色男性手中拯救棕色女性的战争”（Holland 249），为美国入侵伊拉克增加了情感筹码，试图为美国的军事行动赋予正当性。

利用女性构建男性神话是惯用手法，因为“女人常常是男人用来提高自己在其他男人心目中地位的一种手段”（Kimmel 7）。《国家乱象》里的男性却颠覆了美国传统沿袭下来的“脆弱少女”保护迷思。正如前文所阐述的，不管是萎靡的“自造男人”马歇尔，还是抑郁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罗宾斯，都丧失了英雄的光环，自身难保，根本无法保护“脆弱少女”。然而在作者看来，具有美国式霸权性/支配性男性气质外露特点的男性更危险，更有毁灭力，因为他们不仅不会拯救女性，甚至可能通过诱导或逼迫的手段，颠覆“脆弱少女”原先的女性气质，让她们做出越轨行为。

在小说结尾前高潮部分，作者就刻画了这样的男性。彷徨的马歇尔跟随幼儿园的娜奥米老师驱车前往她男友尼克组织的私人聚会。尼克戴着墨镜，双颊凹陷，一脸狞笑，显露着原始的欲望，野蛮粗暴的举止充满了对女性、外国移民和黑人的蔑视，“把他们看作彰显其男性气概的他者”（32）。他不仅给众人准备了大麻、摇头丸，还因为聚会气氛过于节制而谩骂不已，随即请来两个非裔妓女，跳起脱衣舞，聚众淫乱。他甚至逼迫一位十四五岁、戴着兜帽的黑人男孩剥光衣服，当众搓揉生殖器，还嘲弄地评论着男孩耷拉着的阴茎。看到胆怯的男孩手淫未能成功，尼克给他的头套上塑料袋，先是引诱，而后拉下脸命令女友娜奥米对男孩进行口交。尽管不乐意的女友吓得不停发抖，马歇尔也鼓起勇气劝阻，尼克仍不为所动，只说了一句：“反正你又不是没做过。”无可奈何的娜奥米只好在众人的起哄声和尼克的拍照声中完成任务。

这个令马歇尔羞愧得几乎作呕的插曲就像一面明镜，映照出美国霸权性男性气质极大的堕落和侵略性，更让读者联想到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的虐囚丑闻。在被曝光的照片中，被拘留者也是戴着头巾，光着身体，头上戴着塑料袋，在围观的美国军人的坏笑中，被迫做出不雅行为。这些图片让全世界为之震怒，给美国政府和军方都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和身份危机。为了推卸责任，美国政府发表了一系列公开声明，将这些虐待行为描述为少数人犯下的孤立事件；媒体也将矛头转移到女兵英格兰（Lynndie England）身上，将“美国士兵怎么会犯下如此恶行”的质问转化为“一个女人为何会做下这样的暴行”的批判，企图误导公众将阿布格莱布危机解读为女性的性别认同危机，甚至把矛头指向所谓“有损美国男性气概”的女权政治。即便政府一时转移了舆论焦点，仍无法摆脱国际社会对美国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剥夺人权，以及美国整体军事行为的鞭笞。小布什总统曾在“我们”与“他们”，“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基础上赋以反恐战争正当性，“不仅重新阐明了美国英雄和伊斯兰恶徒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冲突，而且支持美国通过使用高度性别化的叙事进行军事干预”（Holland 248）。但是军方的虐囚事件和小说中这起民间模仿的聚会插曲，都让读者看到这样的现实：不管是美国士兵，还是美国男性尼克，都让女性复制男性的暴行并彻底屈服于野蛮的力量。这不仅证明了美国男人教化女性的失败，还将美国英雄刻画为暴力犯罪者。在美式霸权性男性气质淫威下展现的女性虐待者形象，不管是平民女性娜奥米，还是女兵英格兰，她们都不再是西方的“脆弱少女”，她们“不仅破坏了与女性，尤其是白人女性相关的文化和性别期望，并且挑战了反恐战争的正当性和神圣性”（249）。显然，在这场军事行动中，男性已经从“西方英雄”“拯救者”的道德制高点跌落下来，西方“脆弱少女”的保护迷思被颠覆，男性书写呈现出与官方叙事大相径庭的反叙事特征，军事行动的正当性也随之瓦解。

在官方意识形态掌控下，“媒体、娱乐和广告的三驾文化马车”促成了“后9·11时代”的到来，这是一个“新家庭核心成员‘团聚’、女性气质归化、冷酷勇士男子气概被重新塑造的年代”（Faludi 3-4）。《国家乱象》逆流而上，嘲讽了这个时代，构建了家庭瓦解、男性气质萎靡、女性气质颠覆的“后9·11”社会乱象图景。正如法鲁迪注意到的：“即使在[‘9·11’事件后]旨在恢复我们男性自信的电影中，对英雄无能为力的恐惧[……]也经常会表现出来。”（10）卡尔弗斯的男性塑造揭穿了“后9·11”男性神话的虚伪性和表演性。小说的结局是本·拉登火速被捕，反恐战争快速取胜。它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构成了讽刺，揭露了美国霸权式国家安全策略和军事行动的无效性，以及简单地把反恐战争、暴力甚至杀戮作为恢复和证明美国男性气概的手段的荒谬性、破坏性和反人道性。《国家乱象》男性书写的“反叙事”范式响应了德里罗在《未来的废墟中：“9·11”之后对恐怖和丧失的思考》（“In the Ruins of the Future: Reflections on Terror and Loss in the Shadow of September”）一文中对“反

叙事”的倡导(35),在危机时刻捍卫了文学想象的重要性。这部小说既是对美国霸权式男性气质的反叙事,也构建了一种对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单向思维叙事的反叙事。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iesecker, Barbara. "No Time for Mourning: The Rhetorical Production of the Melancholic Citizen-Subject in the War on Terror."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no. 1, 2007, pp. 147-69.
- Bjerre, Thomas. "Post-9/11 Literary Masculinities in Kalfus, DeLillo, and Hamid." *Orbis Litterarum*, vol. 67, no. 3, 2012, pp. 241-66.
- Bourdieu, Pierre.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Translated by Hui Liu. Haitian Publishing, 2002. [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
- Bunting, Madeleine. "Women and War." *The Guardian*, 20 Sept. 2001.
- Carroll, Hamilton. *Affirmative Reaction: New Formations of White Masculinity*. Duke UP, 2011.
- DeLillo, Don. "In the Ruins of the Future: Reflections on Terror and Loss in the Shadow of September." *Harper's*, December, 2001, pp. 33-40.
- Drew, J. "Identity Crisis: Gender, Public Discourse, and 9/11." *Women and Language*, vol. 29, no. 2, 2004, pp. 71-77.
- Faludi, Susan. *The Terror Dream: What 9/11 Revealed about America*. Atlantic Book, 2008.
- Fukuyama, Francis. "Women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ld 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vol. 5, no. 77, 1998, pp. 24-40.
- Goldstein, Joshua. *War and Gender*. Cambridge UP, 2001.
- Holland, Shannon. "The Enigmatic Lynndie England: Gendered Explanations for the Crisis at Abu Ghraib." *Communications and Critical / Cultural Studies*, vol. 6, no. 3, pp. 246-64.
- Kalfus, Ken. *A Disorder Peculiar to the Country*. Harper Perennial, 2006.
- Kimmel, Micheal. *Manhood in America: A Cultural History*. Oxford UP, 2006.
- Ramazani, Vaheed. "September 11: Masculinity,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Empathy."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 21, no. 1, 2001, pp. 118-24.
- Schwenger, Peter. *Phallic Critiques: Masculinity and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 Tickner, Ann.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9/11."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3, no. 4, 2002, pp. 333-50.

◇责任编辑:夏开伟

FLC

文学文化研究

德意志民族诗学重塑与诗人功能

——歌德叙事谣曲研究

◎ 段懿玲

内容提要: 18世纪后半叶,德意志文学界掀起一阵回溯古代日耳曼传统的浪潮,以期焕发德意志文学的新生。歌德在该时期的叙事谣曲创作多次采用德意志本土民间传说作为文学素材,回溯古代日耳曼民族的神话形象,以凝聚德意志民族身份认同,传达新时代民族精神。歌德一方面赋予逐渐没落的日耳曼神话形象新的生命,以诗的形式展现个人宗教观念;另一方面强调诗人作为沟通传说与童话、人性与神性,以及市民与道德的连接媒介功能。

关键词: 歌德 叙事谣曲 德意志民族诗学 诗人功能

中图分类号: I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2023)03-0044-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歌德及其作品汉译研究”(14ZDB091)子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3.005

Title: Reconstruction of German Folk Poetry and the Function of Poet: A Study of Goethe's Ballads

Abstrac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there was a wave of retracing ancient Germanic traditions in German literature, intending to revitalize German literature.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Goethe used native German folktales as the literary material for his ballads and rediscovered the mythological images of the ancient Germanic folktales, so as to nourish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nvey the national spirit of the new age. On the one hand, Goethe gave new life to the declining Germanic mythological images and presented his religious views in poetic form; on the other hand, he emphasized the poet's function as a connection medium linking legend and fairy tale, humanity and divinity, citizenship and morality.

Keywords: Goethe, ballad, German folk poetry, the function of poet

Author: Yiling Duan,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歌德时代的德意志小邦林立、诸侯割据，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英国和法国。在此背景下，为发展本国文化，德意志最初选择模仿法国或英国文学，但此举一定程度上限制和阻碍了德意志本土文学发展。德意志文学界为了摆脱困境，逐渐掀起一阵回溯古代德意志传统的浪潮，以期使德意志文学焕发生机。只有植根于德意志民族的土地，才能自然孕育出属于德意志民族的民族精神，构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凝聚统一的民族意识。从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到以格林兄弟（Brüder Grimm）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们试图从自古流传的德意志民族文学、民间传说中汲取新力量，认为德意志文学不能一味地依赖对他国文学的模仿，而是要植根于本民族，通过诗人的创新为德意志文学注入新的灵魂，这对于在18世纪常陷于模仿方向之争的德意志文学界来说正是一场文学转变。

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多次采用德意志本土民间传说作为文学素材，在歌德1799年至1813年的叙事谣曲创作中，就有四首以德意志民间传说为基底进行诗学重塑的诗歌。歌德在这一时期对德意志民间素材的创造性采用，一方面归功于青年时期在赫尔德影响下养成的收集民歌与民间素材的习惯，另一方面则是受到世纪之交德意志文学界对新神话探讨的影响。

歌德的收集范围非常广泛，除德意志本土外，还涉及北欧、古希腊、印度等其他国家和地区民间素材。1771年，歌德与赫尔德在斯特拉斯堡相识，那时赫尔德已经开始致力于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他在斯特拉斯堡逗留期间与歌德的交谈，点燃了后者对民歌的热情。1771年夏，歌德在阿尔萨斯地区就收集了12首民歌（Strobach 69）。此外，1773年赫尔德发表题为《论德意志风格与艺术》（*Von deutscher Art und Weise*）的散文集，呼吁搜集整理散落民间的德意志民歌，旨在为德意志新文学指明发展方向。同时，赫尔德邀请歌德将自己的论文《论德意志建筑艺术》（*Von deutscher Baukunst*）添加到作品集中以呼应全书主旨“德意志风格”。青年时期与赫尔德的交流，为歌德中后期以德意志民间传说为素材的叙事谣曲创作埋下种子。而引发歌德创作的直接原因，可以认为是受到以赫尔德、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等人为代表的“新神话”探讨的影响。德意志的分裂凋敝使当时的文学家提出重新回到人类自然之原点的想法，即利用对古代神话的挖掘重新进行诗学创作，开创新的文学辉煌。早在1767年，赫尔德就在《论神话的新使用》（“*Vom neuern Gebrauch der Mythologie*”）一文中主张“用一只新的富于成果而技艺精湛的创造之手”变换神话的形式，由此让它成为当代的一部分，同时赫尔德反对在文学作品中机械化地重复神话故事，而是应当使神话体系在最新的社会和生活世界发展形势下得到重新解释（弗兰克 145-49）。在赫尔德之后，浪漫派在世纪末也愈发聚焦于有关新神话的讨论。施莱格尔在《关于神话的谈话》（“*Rede über die Mythologie*”）中认为诗人应当将诗与神话相结合，以新的、更美的、更伟大的方式将与自然更接近的古代神话作为诗的题材，并在诗中体现出人类心中神性的回光，

以此作为诗的灵魂，否则的话就是徒有躯壳的空洞的诗（253-56）。但是古代神话是在当时的社会基础上自然产生的，而在德意志近代文学艺术中所推崇的新神话显然是人为的。事实上，近现代也缺乏产生“新神话”的社会基础，因此大多数文学家只能主张通过革新的方式利用旧神话，为其注入新的时代精神。

在新神话思想的影响下，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加入神话元素。与浪漫派的新神话观点不同的是，歌德并没有在自己的叙事谣曲中指向具体的、某一宗教中的神，比如浪漫派所推崇的狄俄尼索斯或基督，而是依然在泛神论的创作框架中，通过神话创作开启属于德意志本民族的异教复兴，人为复兴中断的日耳曼文明，借着神话的外衣传达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内核。歌德对于日耳曼神话和德意志传说的回溯挖掘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其作品中来源于世界各地的诗学素材恰恰是这一点最好的证明。在魏玛版收录的歌德叙事谣曲作品中，《第一次瓦尔普吉斯之夜》（*Die erste Walpurgisnacht*）、《婚礼歌》（*Hochzeitlied*）、《捕鼠人》（*Der Rattenfänger*）和《忠实的埃卡特》（*Der getreue Eckart*）是以德意志民族民间传说为素材进行诗学重塑的四首叙事谣曲，在歌德整体叙事谣曲创作中处于中后期，除《忠实的埃卡特》外，均为歌德于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前后所作。四首叙事谣曲彼此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在个体中渗透着整体思想。

一、宗教之争：来自异教的反击

歌德作为启蒙运动后的诗人经历了宗教世俗化。这一过程在文学上最显著的表现是文学不再仅仅为神学服务，在从神学分离出来并且独立的过程中原有的宗教元素进入了世俗文学创作。魏塞（Benno von Wiese）指出，启蒙运动以后所有的西方作家、诗人都是异端。他们背离基督教传统信仰，试图通过文学特有的审美形式展示真理，文学从为神学服务转向宗教批判（转引自谷裕 10-11）。日耳曼地区的原始宗教文化作为非基督教存在，被称为“异教”。歌德在《第一次瓦尔普吉斯之夜》以德意志本土传说为素材，以诗的形式展现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对立，为世纪之交的叙事谣曲创作定下新的基调。歌德叙事谣曲中有关基督教与异教对立的内容在 1797 年“叙事谣曲年”的《科林斯的新娘》（*Die Braut von Korinth*）中就曾出现过，而新时期的叙事谣曲与前者都表达了对基督教一神论的负面态度；不同之处在于，在《科林斯的新娘》中歌德选取古希腊异教作为基督教的对立面，而 1799 年则转向古代日耳曼传统中的异教。“叙事谣曲年”的诗学创作重新激发歌德写作《浮士德》（*Faust*）的灵感，因此该阶段的叙事谣曲常常被认为是《浮士德》的预备练习。《第一次瓦尔普吉斯之夜》中的人物塑造、对话、情节设置具有戏剧性，呈现出如《浮士德》一样的诗剧特征，也为后续《浮士德》中的《瓦尔普吉斯之夜》与《古典的瓦尔普吉斯之夜》提

供了创作基础。

这首叙事谣曲通过极具冲突性的张力展现基督教与日耳曼异教的对立之态，表现在格律、空间、时间和群体身份上。《第一次瓦尔普吉斯之夜》采用特殊的格律形式以凸显诗歌张力，与歌德大多数叙事谣曲中规整的格律有所不同。该诗由十二诗节组成，除第九和第十二诗节外，均可认为是两两一组，每组的第二节是对第一节的强调，通过合唱形式为诗歌提供充分的音乐效果。全诗以抑扬格开场，第二诗节后替换为扬抑格，直至第八诗节两节一组交替格律形式，第九和第十二诗节为抑扬格，而夹在中间的第十、十一诗节为扬抑格。采用扬抑格的人物主要为德鲁伊祭司和相关合唱诗节中的人物（其他祭司、异教守卫）。采用扬抑格的人物按照出场顺序为持反对意见的异教群众、进行战略部署的异教守卫及基督教守卫。截然相对的两组格律形式，从诗歌结构上增加了对立冲突感。

歌德并没有在诗歌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两大对立群体的身份，而是在情节叙述的过程中，逐渐使其身份显现出来。德鲁伊出现在全诗之首，指涉两大阵营之一的群体身份。德鲁伊原指凯尔特信仰中的祭司，丁策尔（Heinrich Düntzer）和鲍姆加特（Hermann Baumgart）均曾指出该名称是在18世纪广泛流传的对日耳曼异教祭司的错误称呼，认为这是歌德的误用，他原本想要借此表达的是古代日耳曼异教祭司（Düntzer 475; Baumgart 67）。不过这种特别的祭司称呼使诗歌具有特殊的情感色彩倾向，与可适用于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代的泛称“祭司”（Priester）一词相区别（Baumgart 67）。第一诗节“遵守古代神圣的遗风，/前去把天父颂扬”^[1]（V.10-11）中首次出现“天父”（Allvater），指作为众神与人类的父亲及万物的创造者的最高之神，在德语中常常和“沃坦”（Wodan）连用（Dudenredaktion 128）。丁策尔认为此处的“天父”是传统日耳曼异教中的最高神沃坦（475），歌德通过该词再次暗示该群体作为日耳曼异教徒的身份。第三诗节首次点明异教徒身份，“对付异教徒，对付罪人”（V.23），直至第七诗节，通过异教徒守卫的一句话才解释该异教群体的“敌人”（V.74）是“基督教教士”（V.50），与上一句（V.23）相联系。“异教徒”与“罪人”形成同位语，表明如果不信仰基督教，就成为基督教的罪人，体现基督教一神论思想下的排他性，此时两个群体的身份才完全明确。第十二诗节作为“德鲁伊祭司的合唱”，原本应当与第九诗节“德鲁伊祭司之一”按照顺序依次出现，形成与前文一致的两两一组的合唱形式，但是歌德将这两个诗节拆分开来，与基督教群体相关的第十诗节“基督教看守者之一”和第十一诗节“基督教看守者合唱”被包围其中，形成框形结构。虽然全诗没有写明结局，但通过诗节形式的布局巧思，基督教徒被两面夹击，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其无路可逃的结局不言而喻。第十二诗节作为结尾对第九诗节德鲁伊祭司后半部分进行重复，以强调异教徒对自身古老宗教信仰的坚定信念，与四处逃散的基督教守卫所隐喻的对自身信仰的背弃形成对比。

异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尖锐且无可调和的激烈矛盾由第三、四诗节展现。这两诗节

由异教群众的质疑声音组成，看似言辞激烈地反对作为异教领袖的德鲁伊祭司的牺牲提议，实际上通过反对声侧面反映基督教对于异教的残酷打击与无情杀戮：“送死”（V.19）、“残酷的征服者”（V.20）、“在壁垒上屠戮”（V.24）等。不同于基督教徒的残忍行径，异教徒在进行反击时以“智取”（V.51）为手段，“我们利用他们自己/虚构的魔鬼恐吓他们”（V.52-53）。从这一句中，一方面可以从基督教徒和异教徒对待异己的处理方法中看出，歌德在塑造人物时倾向于异教徒的情感态度；另一方面“魔鬼”一词反映基督教的排他性，圣经中摩西十诫的第一诫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Ex. 20, 3）。基督教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将异教的神丑化为魔鬼，在宗教话语上对其他宗教进行打压。有关异教徒反击手法的描述体现了古代宗教秘仪的特征，异教徒出于对自身信仰的虔诚，无畏地举行牺牲仪式：“弥漫的烟气火焰熊熊”（V.12, V.14）；“趁浓烟炼出火焰熊熊：请纯洁我们的信仰！”（V.75-76, V.96-97）。“火”作为四大自然元素之一在秘仪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拥有毁灭与创造的力量。在人类获取火种之前，只有诸神才能支配火，因此火被赋予与神相关的强烈宗教色彩。火作为一个重要元素出现在歌德多首诗歌中，如在《天福的渴望》（*Selige Sehnsucht*）中烛火象征“抒情之我”在宗教、艺术上对于“变”（*Verwandlung*）的追求，渴望如凤凰涅槃一般在灰烬中的重生（Butzer and Jacob 119）。在叙事谣曲《神与舞女》（*Der Gott und die Bajadere*）中，舞女在结局中跳入火场，完成对神的献身牺牲，最终与摩诃天一同重生，得到拯救升入天国，这同样是对火所象征的“死与变”的强调。在这首叙事谣曲中，异教徒在熊熊火焰间愈演愈烈的反击，正是“死与变”中自我牺牲的决心与对重生的向往。

除此之外，这首叙事谣曲通过营造山脚与山顶之间的空间张力，隐喻异教与基督教的现实宗教地位差异。全诗开篇德鲁伊祭司所发出的号召“我们要赶往山上”（V.9）及众祭司的呼应“登吧！直登到山！”（V.17）中所体现的异教徒向山顶攀缘的行为，暗示基督教处于山顶高位，凌驾在位于山脚的异教徒之上，隐喻其对宗教话语权的把控，而异教向上攀爬的举动则意味着夺回宗教地位的过程。除此之外，歌德借用白昼与黑夜隐喻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地位差异。圣经开篇“神说，要有光”（Gen. 1, 3），基督教对光的崇尚使其在传播过程中对“光”进行独占，在基督教的侵略与驱逐下，异教失去了拥有“光”的权利，藏身于黑夜。第九诗节德鲁伊祭司发出感叹“我们竟落得/趁夜色昏黑/秘密地歌颂神明”（V.66-68），表明异教曾经拥有光并且存在于白昼。在以重新拥有“光”为目标的战争中，异教徒不得不采取昼伏夜出的战争策略，第五诗节德鲁伊祭司在进行战略部署时说道：“可是在白昼/在林区里面/还要悄悄掩护。”（V.39-41）第七诗节异教徒守卫呼吁：“来吧！拿起尖刺和叉子……在夜间发出叫嚷之声。”（V.54-57）在全诗结尾，歌德通过合唱词“即使被剥夺古代遗风/有谁能夺去你的光？”（V.77-78）呼应主旨，表明即使古代异教的外在形式已经不复存在，但异教的内在精神因其对光的追寻而永存。

歌德创作完这首叙事谣曲后，立即将其寄给策尔特（Carl Friedrich Zelter），希望他能够为这首康塔塔式的叙事谣曲谱曲。而策尔特始终对自己的编曲不甚满意，直到歌德去世前一年，才由策尔特的学生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将其实现。1831年，歌德在给门德尔松的信中对其根据该诗改编的音乐作品表示满意，他写道：“世界史上必然一再重复的是，一个古老的、已确立的、经过考验的稳定之物被出现的新兴之物挤压、推搡，即使没有被消灭，也被挤至最狭窄的空间。”（Goethe, *Goethes Briefe* 67）即使日耳曼异教在历史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被基督教粗暴排挤打压，逐渐没落并失去原有的地位，但是它仍旧在对真理的追寻中，化身于异教之火永不熄灭，这就是歌德在这首叙事谣曲中想要传达的理念。在歌德以德意志民间传说作为素材创作的四首叙事谣曲中，《第一次瓦尔普吉斯之夜》非常明确地以基督教与异教的对立作为主题，而其他三首看似与宗教没有明显关联的诗歌，实际上也隐含着歌德对基督教与异教两者之间的矛盾的态度倾向。

二、歌德新神话形象构建：民族神话与传说中的多元存在

启蒙运动引发的人本主义思潮使传统的宗教信仰体系有所松动，科学理性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与宗教信仰发生博弈，但当科学理性对事物的认知与探索受到阻碍并且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时，一部分群体选择回归宗教信仰。在此过程中，歌德依然选择强调高于人的存在，承认人类在面对自然与神时的弱势地位，但与一些德意志浪漫派不同的是，歌德并没有回归基督教信仰，而是以泛神论观念认识和理解世界。在歌德的新神话构建中，他回溯古代日耳曼民族的神话形象，与德意志传说相结合，在叙事谣曲中出现多种超越人类感官之外的存在：矮人（Zwerg）、霍尔达（Holda）、守护灵（Schutzgeist）、精怪（Dämon）等形象。相较于魏玛时期叙事谣曲中出现的魔魅自然形象、1797年有形且具象的神的形象，这一时期的歌德不再仅强调处于至高位置的自然与神性，而是转向介于神与人之间的其他存在。这些形象并非建立于基督教语境，而是主要以古代日耳曼异教传统以及流传在德意志民间的传说形象为蓝本，强调神之外、人之上的存在，以诗人技艺为其赋予新的艺术效果。

《婚礼歌》中出现的矮人形象是歌德基于德意志传说进行改编的产物，与后来格林（Jacob Grimm）在《德意志神话》（*Deutsche Mythologie*）中对矮人的描述基本吻合。矮人作为既非人也非神的群体具有“与神相近的超人特征”，“拥有能够伤害或帮助人类的力量”（363）。除此之外，“矮人[……]是异教的[……]他们内心厌恶教堂的修建，因为钟声扰乱他们从前隐秘的生活”（380）。教堂代表着基督教传教过程中所构筑的宗教空间，随着传教范围扩大，“钟声”逐渐影响到作为异教形象代表的矮人的正常生活，隐

喻了基督教对异教空间的挤压与剥夺。歌德对该传说形象的选用与重塑隐含着歌德对不同宗教的观点。

《婚礼歌》表面上是一首描绘矮人盛大婚礼的欢快社交歌曲，然而在第一诗节，歌德就十分隐晦地为全诗的诠释角度留下提示：“那祖父曾参加圣战。”(V.5)“圣战”指十字军东征，即十二、十三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一系列军事扩张行动，目标是要将“圣地”从伊斯兰教统治者手中夺回(罗伯茨 206)。老伯爵在“神圣的”十字军东征战争中“英勇获胜赢得名声”(V.6)，然而看似获得荣誉与名声的老伯爵回到家中的真实处境却是“家仆四散财物流失”(V.9)，为基督教奉献自我而征战牺牲的老伯爵并没有真正获得来自上帝的祝福。这时矮人出现在疲惫的伯爵身边，希望能够得到伯爵的允许，将伯爵家中的大厅借给他们举办婚礼。《德意志神话》中写道：“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矮人)也需要人类的建议和帮助。特别是三种情况下：[……]第三，他们为举办婚礼借一个大厅；但他们总是以珍贵之物作为报答，给房子的主人及其后代带来幸福。”(378)在这首诗中，矮人作为日耳曼神话中的非神形象替代了基督教中的神成为赐福行为的施与者，伯爵作为人类成为赐福行为的接受者。1802年2月，歌德仅完成了《婚礼歌》的第三到第七诗节，直到当年12月17日，才将全诗补充完整(Düntzer 348)，最终补充的第一、二、八诗节更加完整地体现出矮人赐福行为所具有的长久性。最初的版本仅仅展现了矮人盛大的婚礼场景，歌德在后续的修改过程中以第一人称复数口吻在第一诗节补充了当下正在进行的伯爵孙子的婚礼场景，同时借婚礼现场献唱的歌手之口为后文引出当年伯爵所经历的矮人的婚礼。在以第三人称视角叙述的矮人婚礼场景之后，最后一个诗节再次切换为第一人称复数口吻，使视角回到当下孙子的婚礼现场，并且补充描绘了在矮人的祝福下伯爵举办的盛大婚礼场景。也就是说，在最终版本中呈现出三重婚礼，即孙子的婚礼作为首尾框架，将矮人的婚礼与伯爵的婚礼包含其中，全诗最后一句“今昔盛况两者相当”(V.72)指出孙子婚礼同样隆重，表明矮人的祝福不仅带给了伯爵本人，也给予了他的子孙后代，以体现其赐福的长久性。

歌德在《忠实的埃卡特》中赋予了日耳曼神话形象霍尔达的幽灵大军和德意志传说形象埃卡特新的文学生命。霍尔达在日耳曼神话中是崇高威严的女神，司掌天气，可以控制凡间降雪，在职责上相当于希腊神话中掌管雨雪的宙斯(Grimm 222)。诸如霍拉(Holla)、霍勒(Holle)、胡尔达(Hulda)等其他名称均为霍尔达的别称。由于霍尔达(Holda)在德语中与“友善的”(hold)词形相近，因此最初霍尔达女神被认为是慈爱的女神。随着基督教在德意志地区的传播，作为异教女神的霍尔达形象逐渐演变为生活在井中或地下的会魔法的中年女性形象。《德意志神话》中记录霍尔达会在空中飞翔进行一年一度的迁徙，迁徙的过程为冬季的土地带来新年的丰收，后来又逐渐与在空中飞翔的狂躁的幽灵大军或女巫联系在一起(223)。基督教的传播一定程度上逐渐使古老的霍尔达大军变成纯粹的邪恶者

(Unholden; 转引自 Düntzer 398)。歌德在重塑文本中采用的正是伴随霍尔达出现的幽灵大军形象：“她们来了，夜之骇物已来/她们是邪恶的姊妹”（V.2-3），“霍尔达幽灵们，她们出猎解渴”（V.10）。在歌德的重塑中，霍尔达幽灵大军对酒有着难以抑制的渴望，她们“尽情啜吸和狂饮/啤酒喝干酒壶喝空/狂暴大军呼啸飞过/翻山越岭前往别处”（V.16-19），而这样的改编令人不禁联想到希腊神话中围聚在狄俄尼索斯身边的狂热的酒神女信徒，18世纪末的浪漫派恰恰对酒神狄俄尼索斯有所推崇，因此，在《忠实的埃卡特》中歌德对霍尔达幽灵大军的改编或许是以传统的日耳曼神话人物形象代替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信徒形象所做出的尝试。

诗中出现的另一个人物形象埃卡特是德意志地区从日耳曼女神霍尔达衍生出的相关传说形象。在德意志传说中，埃卡特老人作为好心的警告者停留在霍尔达所在的维纳斯山前，劝阻人们前往山中。歌德在重塑过程中为其赋予了超越人类理性的特征，使其具有拯救人类的力量，因此歌德诗中的埃卡特形象被认为是“守护灵”的化身（Kommerell 356）。诗中与埃卡特有关的描述暗示其区别于人类的神性与崇高性：“虔诚的”（V.21），“神圣的”（V.24），“行奇迹者”（V.29），“奇迹”（V.38）。除此以外，埃卡特在与孩子们对话时，往往采用对第二人称复数“你们”的命令式，与神对凡人启示时的语气相近，神圣坚定且不容置疑。第二诗节中，埃卡特老人在帮助受到惊吓的孩童躲避幽灵大军袭击时说道：“酒让她们高兴，让她们喝酒”（V.11），其话语给出让狂暴的幽灵大军恢复平静的关键方法。在诗中霍尔达幽灵大军具有双重状态：“友善的”（V.12）与“邪恶的”（V.3），但是人类的孩子仅能认识到她们是“邪恶的姊妹”，却无法认识邪恶的背面“友善”，埃卡特能够指出拯救人类的方法，这既暗示着埃卡特区别于人类的身份，也说明人类对高于自身存在的认识具有局限性。

最后一首以德意志传说为素材的诗歌《捕鼠人》篇幅较短，全诗主要由捕鼠人自信诙谐的独白构成。与其他几首叙事谣曲相比，该诗在戏剧性与叙事性上的特征相对较弱。科默尔恩（Max Kommerell）认为《捕鼠人》中的主人公“吹笛人是一个具有魔性的人”（der dämonische Mann; 372）。首先需要更正的是，在德意志传说中，捕鼠人形象确实往往和吹笛人形象合二为一，他通过吹笛声引诱老鼠或孩童。但是在歌德这首叙事谣曲中，捕鼠人通过弹奏弦乐或歌声进行引诱行为，并非使用默认的笛子，所以此处科默尔恩的“吹笛人”表述不准确。捕鼠人作为一个区别于一般市民的存在，没有人知道他从何而来，去往何处。他拥有“魔力”，因此被认为是“具有魔性的”。该词作为形容词派生于德语词“精怪”（Dämon），最早来源于古希腊语中的 δαίμων，一方面可指“神、女神、神灵”“命运”“守护神”等，另一方面也指“恶魔、魔鬼”（罗念生、水建馥 177）。在古希腊，精怪被看作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 [……] 既能助人，亦能害人”（贺骥 15）。在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传统信仰被斥为异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在与古希腊罗马宗教的斗争中，将异教

的众神贬为“魔鬼”(15)。而原本在异教中亦正亦邪的“精怪”，也逐渐在基督教语境中被赋予邪恶的“魔鬼”含义。1828年3月11日，歌德在与爱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的谈话中提道：“精怪或护神，能任意操纵人，使人不自觉地听它指挥，而同时却自以为在凭自己的动机行事。”(爱克曼 168)歌德对捕鼠人形象的重塑符合其对于精怪的解释，诗中捕鼠人既拥有吸引老鼠的能力，也能够引诱孩童和少女，使人类无法抗拒来自捕鼠人、来自超越人类存在的力量。但是歌德在重塑时并没有将精怪塑造为一个绝对的反面角色，诗中与捕鼠人相关的形容词如“赫赫有名的”(V.1)、“心情快活的”(V.9)、“多才多艺的”(V.17)均为褒义倾向的词汇，歌德以捕鼠人传说形象塑造的精怪并非基督教语境下邪恶的代表，而是更加接近于古希腊传统中对于精怪的解释。

在以上三首叙事谣曲中，人类与其他形象作为自然中的不同群体共同存在，不过人类始终处于被动状态：被赐福、被保护、被引诱。在歌德的作品中，人类作为自然中的群体，从未拥有过绝对的力量，人类的力量渺小而脆弱。与启蒙时期将人类理性置于至高地位的推崇之举截然相反，歌德想要强调的始终是高于人类且人类理性无法推及的存在。与歌德早期一些通过以人类死亡作为结局强调自然或神性地位的叙事谣曲相比，本阶段的叙事谣曲创作一方面风格趋于沉静和谐，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神性之间的张力有所缓和，在歌德的观念中有了可调和的空间；另一方面，歌德在叙事谣曲中也不再仅仅聚焦人与自然或神性的关系，而是引入其他存在的角色，人与其他存在的关系并非单纯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整体而言，以上两点变化体现出歌德中后期的思想转变，即逐渐克服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观点，转向整体辩证的自然观。

三、诗人功能：作为连接媒介的诗人

在对德意志本土民间素材进行改编处理时，歌德作为诗人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叙事谣曲创作中，诗人既是文学的创作者，也是作品中被探讨的对象。无论是作为诗人的歌德本人，还是诗中的诗人艺术家形象，都具有作为连接媒介的功能：诗人既是传说与童话的连接者，将真实与虚构在诗歌中交织融合；又是神性话语的传达者，使人性与神性通过诗人身份产生沟通与联系；还是市民道德教育的承担者，以诗学作品引领市民达到更高层次的道德伦理水平。

歌德作为诗人首先在叙事谣曲中将传说与童话相互连接与融合，以呼应叙事谣曲的整合性。歌德所处的时代，快速发展的近代自然科学要求人类对世间万物做细化分类与碎片化切割。然而，在歌德看来，严格的科学划分体系并不一定适合文学领域。他在叙事谣曲中避免近现代自然科学中非此即彼的分类法，而是强调叙事谣曲作为叙事、抒情与戏剧三

大文学基本类型之融合的原初性和不可分割的整全性。因此，在叙事谣曲中，歌德凭借诗学塑造将传说与童话彼此连接与融合。传说与童话作为不同类别的文体具有相对的特征：真实与虚构。传说最重要的特征是真实性，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但受制于历史的时间性和地理位置的空间性，最初由人民口头传播，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被赋予超感官想象，其中一些传说在后续流传过程中以书面文字形式被记录下来。与传说相反，童话具有虚构性。德语 Märchen 与其中文翻译“童话”所表达的“儿童文学”的含义并不完全一致。Märchen 派生于“谣言”（Mär），是该词的缩小化形式，指非真实发生的事情（Dudenredaktion 1165）。中文翻译“童话”无意间中断了德语 Märchen 中包含的超越自然的力量或形象介入人类生命体验的含义传达。

本文四首叙事谣曲的原传说素材来自德意志萨克森州、下萨克森州、图林根州等邻近地区，歌德在对其重塑时，运用诗艺赋予传说新的艺术效果，使其在历史真实性基础上具有童话虚构风格，在连接传说与童话的同时扮演着沟通真实与虚构的媒介角色，使二者之间的纠缠贯穿于叙事谣曲。比如在《婚礼歌》中，老伯爵结束多年征战终于离开战场，夜里回到家中，看到家门冷落破败的场景。家园的破碎促使伯爵内心情感波动，不免感慨叹息，但长夜漫漫，终有黎明，“早晨会把一切变得更好”（V.16），在伯爵以豁达的心胸准备入睡迎接明天的到来时，歌德开始运用诗艺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当他躺着适意浅寐 / 床下有什么在动 / 窸窣的老鼠，随它去动！ / 但愿它能找出点儿面包渣！ / 可你看！那站着个极小的人 / 小巧的矮人，提着盏挂灯 / 摆出演说者的举止，发言人的架势 / 站在疲乏的伯爵脚边 / 他没睡，但很困倦。”（V.19-27）伯爵被床下窸窣的声音打扰，看到矮人出现在脚边，却让人无法区分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是虚构的幻觉。德国学者对于伯爵究竟是否已经睡着存在不同的讨论，丁策尔认为歌德省略了一部分内容，事实上伯爵已经睡着，并且被床下的动静吵醒（354）。持有另一种观点“梦境说”的科尔夫（Hermann August Korff）认为，这一切也有可能是老伯爵回到残败旧居第一个夜晚所做的一场异梦（82）。丁策尔与科尔夫至少在“已经入睡”上看法一致，至于是醒来回到现实中，还是仍在梦中，对此尚未有定论，但归根结底以上讨论的本质正是对真实与虚构的分辨。虚构与真实在歌德的笔下失去界限，老伯爵后来见到的矮人的盛大婚礼究竟是虚是实，成为歌德留下的谜题。歌德并非想要塑造清晰明确且无可争论的情节，而是有意使之模糊化，以打破科学分类所追求的严格界限，以诗人身份作为传说与童话、真实与虚构的连接媒介，从而追求文学的整全性。

在魏玛版叙事谣曲章节首页的序言中，歌德就曾强调诗人作为神性话语的传达者以连接人性与神性的媒介功能。该序言由一句扬抑格形式的诗行“童话多神奇，诗艺使其真”（Goethe, *Gedichte* 1 159）作为提纲挈领的总起，凝结歌德叙事谣曲的整体核心。“神奇”（Wunder）作为一个与“神迹、神祇”相关的词汇，蕴含着让人类无从捉摸、无法认识的隐意，“童话”与“神奇”在上半句同时出现，相互呼应，暗示歌德叙事谣曲中的超感官存在，

而后半句“诗艺使其真”强调诗人作为凡间俗世中超感官存在的倾听者、传达者和转述者，运用诗学技艺使真理显照，成为人与超感官存在的连接媒介。这一有关“诗人与艺术家身份功能”的观点曾出现于歌德 1783 年创作的叙事谣曲《歌手》(Der Sanger) 中，主人公作为中世纪流浪歌手通过歌唱传达神的话语。该母题在叙事谣曲《捕鼠人》中再次出现：该诗每一诗节的首句都出现“歌手”一词 (V.1, V.9, V.17)，一共重复三次，也就是说，不管是在主人公自身看来，还是歌德作为创作者想要强调的，都是捕鼠人的首要身份是一个“歌手”、一个艺术创作者，其次才是“捕鼠人”“捕童人”和“捕女人”。不同于收录在格林兄弟《德意志传说》(Deutsche Sagen) 中通过吹笛进行诱捕的方法，在这首诗中捕鼠人通过弹琴与唱歌蛊惑他人：“当他歌唱金色童话”(V.12)，“当我拨动琴弦弹奏”(V.15)，“当听到魔弦和歌唱”(V.24)。“弦”象征着“诗艺”(Dichtkunst; Butzer and Jacob 359)，捕鼠人拨动琴弦奏乐的举动，象征着诗人或艺术家运用诗艺将更高层的话语进行重塑的行为，从而成为话语转述者与传达者。捕鼠人在引诱儿童时，所唱的是“金色童话”，金色作为与神性相关的表达 (Butzer and Jacob 58)，暗示捕鼠人所传达之物的神性与真理性。歌德借捕鼠人的流浪艺人形象表达有关艺术家或诗人的观点，即诗人或艺术家作为媒介，用自己的诗歌或艺术作品连接人类与超越人类理性认识的存在，如赫尔墨斯一般，将高于人类存在的真理传达。

除此之外，诗人连接着市民与道德，承担着对于人的道德教育功能。一方面，在启蒙运动之前主要由宗教承担道德教育功能，但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宗教逐渐失去原有的地位，原本由其承担的一部分教育功能在世俗化过程中渐渐转移到诗人身上。另一方面，18 至 19 世纪，市民阶层阅读量大幅增加，增长的阅读需求量使阅读和生活这两个领域越走越近 (萨弗兰斯基 58)，这样的现实变化逐渐要求诗人在追求文学创作的艺术性时，兼顾到文学与生活的相关性，在作品中渗透一些关于生活态度、道德伦理的价值观，因此，歌德该时期的一部分叙事谣曲呈现出面向市民的教育性。在《捕鼠人》中，老鼠象征着令人厌恶之物，危险之物 (Butzer and Jacob 336-37)，对于捕鼠人清除鼠患的举动，科默尔恩认为捕鼠人清除的也是市民灵魂之恶，这是在暗示诗人或者艺术家在市民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 (372)，即诗人通过创作洗涤市民灵魂，引导民众的精神前往更高层次的教化功能。而儿童寓言风格倾向的《忠实的埃卡特》在最后一个诗节明确且近乎直接地传达“教训”：“孩子们，当父亲师长和尊长 / 面色诚恳地与你们交谈 / 你们要认真准确地听从！ / 还要噤口，痛苦守秘 / 多言有害，沉默为好。”(V.44-48) 在诗中，孩子们奉父母之命从酒馆取了啤酒准备回家，路遇霍尔达的幽灵大军，把他们酒壶中的酒一饮而尽，孩子们既害怕又不知所措，担心如果只能拿空酒壶回家一定会受到父母的责骂。埃卡特及时出现帮助他们，并要求他们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否则酒壶中的啤酒就不再永不干涸。回到家后的孩子们最初保守了秘密，但最后还是鲁莽地将之泄露给父母，于是来自超感官存在的馈赠就此消失。歌德重

塑原素材时为其添加保母题，目的正在于教导孩子诚实守信，以诗学作品面向市民传达道德行为准则与教育意义。

歌德的创作灵感取之于民，经过诗学重塑，再用之于民，使德意志民族诗学焕发新的生机。无论是歌德等人在古典时期对古代的向往、对作为人类童年时代的古希腊的探索，还是浪漫派对中世纪的崇尚、对于人类原始自然的神话溯源，都是在政治分裂与文化凋敝的状况下对共同出路的寻求。德意志文学家试图重新回到人类自然的原点，对古代神话进行挖掘与重塑，为德意志文学的新辉煌做出一种尝试、一种文学上的革新。歌德以及诸多同时代的德意志作家都曾长期致力于古典风格的文学创作，试图在文学上复现古希腊的黄金时代。歌德时代的人或许可以在文学与艺术中复制古希腊的表象，但是永远也不会召唤回真正的黄金时代，因为黄金时代只能以自然的方式渐进形成，人们无法连同黄金时代的前提也一并复制。但歌德这样的“天才”人物，逐渐脱离了古希腊带给德意志的“桎梏”，专研于德意志本土民间素材的收集和重塑，不经意间迎来属于德意志在文学与艺术上的黄金时代。或许传说与神话早已失去原本的真实，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流传的精神，正是歌德等德意志作家通过诗艺创作，使传说和神话如狄俄尼索斯一样再生。

注释 [Note]

- [1] 本文所涉及的诗歌译文主要参考自歌德：《歌德文集·第09卷：叙事诗》，钱春绮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其中《婚礼歌》、《忠实的埃卡特》及《捕鼠人》的中译文在钱译基础上有所调整。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umgart, Hermann. *Goethes lyrische Dichtung in ihrer Entwicklung und Bedeutung*. Carl Winters Universitätsbuchhandlung, 1933.
- Butzer, Günter, and Joachim Jacob, editors. *Metzler Lexikon literarischer Symbole*. J. B. Metzler, 2008.
- Dudenredaktion, editor. *Duden: Deutsches Universalwörterbuch*. Dudenverlag, 2015.
- Düntzer, Heinrich. *Lieder. Gesellige Lieder. Aus Wilhelm Meister. Balladen. Goethes lyrische Gedichte*. Bd.2. Leipzig: Ed. Wartig, 1876.
- Eckermann, Johann Peter. *Gespräche mit Goethe*. Translated by Guangqian Zhu.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1978. [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Frank, Manfred. *Der kommende Gott: Vorlesungen über die Neue Mythologie*. Translated by Shuangzhi Li, East China Normal UP, 2011. [弗兰克：《浪漫派的将来之神——新神话学讲稿》，李双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Gedichte 1: Goethes Werke, Abt I*, Bd. 1. Weimar: H. Böhlau, 1887.
- . *Goethes Briefe Juli 1831-März 1832. Goethes Werke, Abt IV*, Bd. 49. H. Böhlau, 1909.

- . *Gedichte 1800-1832.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Abt. I, Bd. 2. Deutscher Klassiker, 1988.
- Grimm, Jacob. *Deutsche Mythologie*. Bd.1.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5.
- Gu, Yu. *Verborgene Theologie: Deutsche Literatur vor und nach der Aufklärung*. East China Normal UP, 2008. [谷裕:《隐匿的神学——启蒙前后的德语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He, Ji. "Goethe's Idea of the Demonic." *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ction)*, vol. 20, no. 4, 2009, pp. 14-19. [贺骥:《歌德的魔性说》,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0卷第4期,第14-19页。]
- Kommerell, Max. *Gedanken über Gedichte*. Vittorio Klostermann, 1956.
- Korff, Hermann August. *Goethe im Bildwandel seiner Lyrik*. Bd. 2. Koehler and Amelang, 1958.
- Luo, Niansheng, and Jianfu Shui, editors. *Ancient Greek Chinese Dictionary*.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 [罗念生、水建馥编:《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Roberts, John Morris. *The Penguin History of Europe*. Translated by Teng Li, et al.,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2013. [罗伯茨:《欧洲史》,李腾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3。]
- Safranski, Rüdiger. *Romantik: Eine deutsche Affäre*. Translated by Maoping We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2014. [萨弗兰斯基:《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卫茂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Schlegel, Friedrich. "Rede über die Mythologie." Translated by Bojie Li. *Reading German Poetics from 1780-1990*, edited by Xiaofeng Liu, East China Normal UP, 2006, pp. 252-64. [施莱格尔:《关于神话的谈话》,李伯杰译,载刘小枫编《德语诗学文选(上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252-64页。]
- Strobach, Hermann. editor. *Volkslieder gesammelt von Johann Wolfgang Goethe*. H. Böhlaus, 1982.

◇责任编辑:邹文新

加纳戏剧《阿诺瓦》中的文化记忆

◎ 黄坚 余湘玲

内容提要: 加纳戏剧家阿玛·阿塔·艾杜的创作始终围绕非洲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强烈冲突展开,其代表作《阿诺瓦》以主人公离开家乡后的命运变化为脉络,将加纳传统文化的变形和遗忘展现在戏剧受众面前。针对身份认同的记忆危机,剧作家依托地点、象征符号和身体等媒介对文化记忆进行了重构,从而唤醒民众的抵抗意识,最终实现了文化身份认同。

关键词:《阿诺瓦》 阿玛·阿塔·艾杜 文化记忆 重构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 I1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2023)03-0057-09

基金项目: 2022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尼日利亚本土文化视域下费米·奥索菲桑的戏剧创作研究”(22WLH00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3.006

Title: A Study on Cultural Memory in *Anowa*: A Ghanaian Drama

Abstract: The creation of Ghanaian playwright Ama Ata Aidoo has focused on the fierce conflicts between African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Aidoo's masterpiece *Anowa* shows audience the distortion and oblivion of Ghana's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Anowa* protagonist after her farewell to her hometown. In response to the memory crisis endangering identity, Aidoo reconstructed the cultural memory based on the media such as place, symbols and body, so as to awaken people's sense of resistance, help them complete the cultural self-rescue,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cultural identity.

Keywords: *Anowa*, Ama Ata Aidoo, cultural memory, reconstruction, identity

Authors: Jian Huang,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China; Xiangling Yu,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China.

作为第一位出版戏剧作品的非洲女性剧作家，阿玛·阿塔·艾杜（Ama Ata Aidoo）始终致力于反映西方殖民和非洲本土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关注非洲女性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其作品大都以非洲女性的生活为创作背景：她们一方面受到非洲传统的困扰，另一方面又深陷后殖民时代非洲的混乱。她的第二部剧作《阿诺瓦》（*Anowa*）的同名女主人公便是典型。该剧改编自一个民间故事，以19世纪中期大西洋奴隶贸易和英国殖民主义扩张下的黄金海岸（今加纳）为背景，讲述了阿诺瓦与丈夫阿科背井离乡谋求生计，却在异质文化观念影响下渐行渐远，结果压抑的矛盾和冲突爆发，二人最终双双殒命的悲剧。较之《幽灵的困境》（*The Dilemma of a Ghost*），《阿诺瓦》“更为成熟，入选了‘20世纪非洲百佳图书’”（鲍秀文、汪琳 51）。鉴于艾杜在加纳乃至非洲戏剧界的影响力及非洲戏剧研究对促进非洲文学研究和中非人文领域深入交流所具有的独特价值，本文尝试以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文化记忆理论为切入点，深入剖析《阿诺瓦》这部经典作品。

一、文化记忆的残缺：传统的断裂

15世纪下半叶，葡萄牙开始在加纳（彼时被称为黄金海岸）沿海地区掠夺黄金和象牙，修筑碉堡和要塞，拉开了殖民扩张和资源掠夺的序幕。随后荷兰、法国和英国陆续参与其中，经过两百多年的激烈角逐，最终由英国将加纳全境纳入自己的殖民版图。

四百多年的殖民史使加纳长期遭受西方殖民主义思想的侵蚀和荼毒，其中文化记忆遭受的冲击尤甚。首先，加纳的文化联系被人为割裂。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欧洲殖民者很早就开始涉足奴隶贸易。17世纪美洲种植园经济的迅速发展，让奴隶贸易成为一本万利的买卖。一方面，“劫掠奴隶最古老、最广泛的一种方式是一部族间的战争”（阿勃拉莫娃 95）。殖民者乐此不疲地激化当地各部落间矛盾，从中攫取利益。在非洲内陆动乱不息时，殖民者又强行划分殖民地的分界线，导致有着相同历史文化背景的族群被迫分离，埃维人便因此散落在加纳、多哥和贝宁三地。另一方面，奴隶成为非洲可供输出的“单一作物”，被贩卖给美洲的种植园主。对于处在本地流散和海外流散状态下的黑人而言，他们与非洲文化的渐行渐远，家园意识的日渐淡薄，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其次，与非洲其他地方一样，加纳的传统生活模式正逐步被取代，土地不再是财富的象征，“蓄奴成为私人投资及体现私人财富的最好形式”（徐济明 54）。英国为实现持久而有效的控制而在加纳实行间接统治，“利用封建酋长作为当地支领薪金的官吏，充当殖民政权的下级机构”（黄克衡 4）。为了更便利地操控殖民地，英国刻意加强并巩固酋长的地位，“先后拟定了三项法律：1878年的‘土著权限条例’，1927年的‘土著行政条例’和1944年的‘土著职权条例’”（54）。酋长和奴隶主为了谋求利益而与白人交易，用自己的同胞换取非洲没

有的商品或者武器。

最后，殖民统治为种族主义思想的大行其道提供了温床。“野蛮、暴力和未开化”成为包括加纳黑人在内的所有非洲黑人身上的标签，即便是那些“被赋予权力”的黑人代理也被归于同一范畴。然而可悲的是，他们被物质欲望诱惑着，心甘情愿地替主子卖命，间接地强化了种族主义的影响。

1957年，加纳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早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国家。尽管表面上看，加纳长达四百多年的殖民史宣告结束，但殖民文化入侵造成的沉痾宿疾却是加纳民众必须面对的现实。作为非洲民族主义者，艾杜对奴隶贸易、种族和性别的压迫，以及加纳社会政治独立后传统文化的意义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并在其作品中反复探索和实践。记忆的当下性决定了记忆总是以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为框架，受当下具体的思想潮流的影响。“一旦原有的社会框架发生了变化，起初属于文化记忆范畴的内容丧失了其奠基性和规范性的作用，它就注定逐渐被遗忘”（金寿福 38）。殖民瓦解了非洲传统的生活结构和价值观，并将新的文化记忆植入非洲人民内心深处；大西洋黑奴贸易切断了沦为奴隶的黑人与家园之间的直接联系，造成文化记忆的断层，使其集体患上了“失忆症”。艾杜敏锐地意识到殖民压迫下加纳人民文化记忆的扭曲和变形，并恰如其分地在《阿诺瓦》中展现出来。剧中与现实高度吻合的时间线和地点支撑并激发了人们的集体与历史意识；阿诺瓦与母亲和阿科的冲突，以及阿科从打渔人到海岸角酋长身份的转变，展现了不同个体之间文化记忆的碰撞与交融；对奴隶制和殖民压迫的回忆描写并探寻了过往的真实面目。记忆是身份认知的核心，但记忆并非一成不变。艾杜创作《阿诺瓦》的主要目的就是展示并重构文化记忆，激发加纳民众的身份认同感，促使他们直面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并作出正确的选择。

二、文化记忆的变形：主体意识的异化

艾杜首先借剧中老人之口勾勒出记忆中美好的家园：“太阳每天都会到来，但不会晒伤我们的庄稼，雨水充沛”“溪流环绕”“没有洪涝”“人们在海滩上就能收到海洋的馈赠”（Plastow and Banham 142）。话音一转，老人道出了“一个秘密”，即1844年签订的《邦德协议》（*The Bond of 1844*）。随着当地实际管辖权的易手，加纳陷入了被殖民的泥淖。在殖民文化的侵蚀下，当地黑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被异化，文化记忆也发生了扭曲和变形。在艾杜看来，“作为作家，我们的一部分责任或承诺就是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区揭露存在的、错误的问题”（Needham and Aidoo 130）。事实上，她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将文化记忆的变形过程逐步呈现给戏剧受众。

文化记忆的变形首先在女主人公阿诺瓦身上得到呈现。她因天资聪颖，自幼时起就被赋予了传承古老文化的期望，被大家一致认可为最佳女祭司人选。“文化记忆由专门的人员从事。这些记忆载体以一众名字而闻名，例如萨满、吟游诗人、格里奥人，以及祭司 [……]” (Jan Assmann, “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 20)。显然，祭司履行着守护和传递文化记忆的职责。剧中的老妇人称阿诺瓦为“天生的女祭司”，族人和阿诺瓦的父亲奥赛姆也期望她顺应文化习俗和社会要求，接受这一神圣的使命。此外，奥赛姆多次要求阿诺瓦的母亲班杜督促阿诺瓦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过，非洲西部母系氏族社会的传统并未赋予男性过多的话语权，加纳也不例外。这就是部落女性普遍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且祭司也由女性来担任的原因。正如奥赛姆所言：“我不是那个能决定阿诺瓦婚姻的人。” (Plastow and Banham 152) 既然父亲在婚姻大事上没有决定权，那么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女祭司与否，也不由他说了算，必须要通过班杜的协助方能达成。在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的集体记忆理论中，家庭集体记忆之构建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呈现出强大的坚韧性。但他也坦言，“即使是当家庭成员都彼此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也都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回忆家庭共同的过去” (95)，表达自己的个人经验。论对待祭司的态度，班杜与奥赛姆截然不同。提起女祭司、女巫，她便被吓得战战兢兢，不寒而栗，认为“她们吞咽狗的眼睛、跳火圈、喝山羊的血 [……] 她们没有羞耻心” (Plastow and Banham 148)。从班杜对待祭司的态度可以看出，古老的传统文化正逐渐从一部分人的心中消逝。阿诺瓦在父母的疼爱下长大，崇尚婚姻自由，信奉男女平等，坚决不接受传统的包办婚姻。她始终认为自己的婚姻与母亲无关，因而一意孤行选择了母亲和大家眼中愚蠢、一无是处的“木薯男”阿科，最后远走他乡。同时，她在争吵中称自己的母亲为“女巫”。“女巫”这一称呼在加纳文化中被视为禁忌，是不祥的。显然，该冲突恰如其分地折射出文化记忆在阿诺瓦这一个体上发生的变形，使之无法辩证多元地审视并对待传统文化。“她没有像期待的那样早早地步入婚姻，而当她最后决定结婚时，也没有迎合女性不外出工作的文化期望” (Nyamekye 219)。阿诺瓦对自我的追求将其与周边人区分开来，印证了主体意识的异化。

阿诺瓦和丈夫离开家乡后一直未能生育，于是“不孕”成了她身上的标签。在加纳社会的传统观念中，生育是头等大事。阿诺瓦的“不孕”让父母大为惊讶，族人则认为她是为了追求财富而放弃生养，丈夫也以此要求她放弃工作。然而，相较于求助村里有威望的老人，阿诺瓦更相信西方的药剂。她否认自己与家乡之间存在任何关系，认为“村子和城镇里有更加恐怖的东西” (Plastow and Banham 166)。阿诺瓦主动与家乡和传统文化脱离，这让她在积累家庭财富的过程中逐步沦为阿科的附属。后者弱化了她的职业属性，最终将她变成深居宅门的家庭主妇。可以说，文化记忆的变形彻底颠覆了阿诺瓦的人生。一方面，她拒绝成为承载传统文化责任的祭司，摒弃传统身份，离开家乡，使自己沦为家园中的他者；另一方面，作为拥有理想的现代女性，她却遭受阿科的空间禁锢和夫权压迫，因无法继续

工作而陷入迷茫。阿诺瓦成为她自己口中的“旅人”，既失去了话语权，也无处可去。在她决定嫁给阿科并离开故乡时，班杜的话就预示了阿诺瓦不可避免的结局：“当我老得动不了的时候，我仍将坐在墙旁，等着你带着你的破烂衣裳回来。”（Plastow and Banham 154）

剧中文化记忆变形的代表不仅有阿诺瓦，也有阿科。在他的记忆中，被瞧不起是一种常态。每当阿科回想起人们评价阿诺瓦给他带来的众多帮助时，他便在心底暗暗发誓：“阿诺瓦，我会成为新的丈夫，而你将会是新妻子。”（165）阿科心目中的“新”便是其寻求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在西方思潮影响下的主体意识重建，这也为阿科对阿诺瓦实行夫权压迫，不让后者继续在高速公路上工作埋下了伏笔。可以说，从那一刻开始，阿科心中已然萌发了关于社会等级的意识。在阿诺瓦的帮助下，阿科的事业蒸蒸日上，他开始与阿诺瓦商量“雇佣一两个男人来帮忙”（167）。他口中的帮手正是黑人奴隶。阿诺瓦对此则持相反观点，甚至为此与他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不过作为一名非洲女性，阿诺瓦逃避不了夫权的压迫，也无力与之抗衡。事实上，两人的情况本不需要购买劳动力，仅是阿科的虚荣心作祟，这正是阿科自我身份“异化”的转折点。“交流记忆指的是一个集体的成员通过日常接触和交流建立起来的记忆，交流记忆的承载者是个体”（金寿福 37），存在于个体回忆过去事物的实践之中。对于雇佣黑奴这一行为，阿科狡辩道，“他们是来帮助我们工作的”，“大家都这么做[……]不是吗”（Plastow and Banham 168）。阿科试图用这种说法让奴隶贸易“合法化”。然而事实上他只是在掩盖真相、混淆是非。必须承认的是，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意识形态会影响主体的一系列记忆选择。在西方殖民思想的映射下，阿科认为雇佣奴隶无可厚非。相反，阿诺瓦反对雇佣奴隶的言语却成了奇谈怪论，因为跟阿科一样，包括阿诺瓦父母在内的族人们将雇佣奴隶的数量与财富权力的象征画上了等号。奴隶与生俱来的自由和自然基本权利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忽视，反映了当地普遍扭曲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当下观照彼时，将凸显记忆的选择性有多么重要。

随着剧情的展开，阿科雇佣了越来越多的奴隶，故事也逐渐走向高潮。该剧的高潮发生在一个核心物理空间：阿科居住的欧式豪宅。从本质上说，这个场所不只是由物质构成的建筑，也不只是阿科的住所，更是其个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载体，关涉阿科的价值取向和身份认同。文化记忆“总是通过文字或非文字性的、已被固定下来的客观外化物发挥作用”（扬·阿斯曼，《文化记忆》46）。豪宅这个特殊的空间凝聚了殖民时期代理人群体的殖民文化记忆。“家具不是有意设计成外国风格的，就是很豪华的”，“巨大的餐具柜”上面摆着“装满烈酒或空着的玻璃瓶”和“大的装饰盘”，“大厅中央的壁炉上挂着严肃的维多利亚女王照片”（Plastow and Banham 183）。除了阿科的大房子，阿科的穿着打扮也体现了对西方文化的亦步亦趋——从一开始穿着打渔的工作服，到休闲服，再到穿金戴银。由于个人交流记忆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只有通过外化之物即文本、图像、礼仪或纪念碑等，才能持久固定下来。文化符号有利于保持稳定性，阿科将自己的个人交流记忆和身份认同注入了豪宅

这一物理空间，从而使记忆化作符号保存了下来。

最后，作为殖民压迫和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主要受害者，黑人奴隶被剥夺的土地和丧失的身份，也是文化遗忘和文化变形的重要外化。当阿诺瓦询问仅仅8岁的奴隶双胞胎兄弟的来历时，留在两兄弟记忆里的只有上一个奴隶主，却并不知自己从何处来。黑人奴隶女孩在和男孩的交谈中毫不掩饰对上流社会生活的艳羡。女孩希望自己是阿科和阿诺瓦的孩子。她幻想着，眼睛放光，“如果我是她，头发、手指、膝盖戴上珠宝，手腕戴上手镯，凉鞋要镶上钻石”（Plastow and Banham 191）。其他大房子里的奴隶更是称阿诺瓦为“女巫”，认为其吞食小孩。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一书中指出：“交往的中断及其参照框架的消失或改变会导致遗忘。”（29）黑人奴隶群体流离失所，辗转各地，已然无法重拾过往的记忆，文化遗忘是必然的结果。举办仪式时的表现更是如此。庆典仪式是文化记忆重现和传承的重要媒介之一，具有强化民族凝聚力和身份认同的功能。在阿科成为酋长的仪式中，合唱的黑人群体不再用心吟唱古老的歌谣，只是在毫无感情地背诵，游行的队伍行列也没有遵照传统规定而行，只想给人留下富裕和拥挤的印象。剧中人们对仪式的敷衍和内容的漠视足以表明，传统仪式已不被人们重视，已然沦为毫无意义的例行公事，自然失去了其传承文化、强化身份认同的功能。

三、文化记忆的重构：身份意识的觉醒

文化记忆最重要的功能是建构身份认同。依托《阿诺瓦》，剧作家将大量文化记忆碎片汇总到一起，通过剧情的演绎来引导戏剧受众，让他们在入戏的状态下将这些碎片拼接在一起，编织出一幅真实与虚构交织的记忆图景，以此强化他们的身份认同。

“地点本身并不包含内在的记忆，作为记忆的媒介，地点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回忆空间构建中的不可或缺性”（李昕 173）。阿科的身份在第三幕转变为海岸角的酋长。借助海岸角这一回忆空间，阿诺瓦脑海中的记忆被激活了。海岸角城堡是殖民时期殖民者贩卖奴隶的据点之一。通过阿诺瓦回忆与祖母聊天的场景，艾杜向观众展现了奴隶城堡的建立。“高楼耸入云天，它的地基比我见过的最大的公路还大，它有比我见过的所有房子加起来还多的房间”（Plastow and Banham 184），一砖一瓦无不昭示了殖民扩张和黑奴贸易的邪恶与污秽。恰如老人所言：“这些伫立在海岸边的堡垒将时刻提醒着我们的孩子，大海会作证。”（142）毫无疑问，一座座奴隶城堡如同纪念碑一样承载着当地人不堪回首的文化记忆。通过海岸角、奴隶城堡与大西洋黑奴贸易的关联，剧作家得以唤回这个空间承载的文化记忆。

传统加纳文化虽然受主流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压制，但仍然可以映射在一些可附着的象

征物上。这些象征物是文化记忆最好的载体，让文化记忆得以重构。在阿科的大房子中，虽然充斥着殖民文化元素，但其中仍然混杂着非洲本土的象征物。“混杂性”是巴巴(Homi K. Bhabha)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异质文化相互交织，“从殖民话语的内部对其实行压迫，使之带有杂质进而变得不纯，最后其防御机制彻底崩溃，对殖民主义霸权的批判和颠覆也就得以实现”(王宁 50)。例如，摆放在维多利亚女王照片右侧的乌鸦照片，实际上是氏族的图腾，其文化内涵不言自明。阿诺瓦的服饰同样值得关注。相比于阿科愈发华丽的着装，阿诺瓦自始至终披着离开家乡时的破布，这从侧面揭示了传统加纳文化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摆放在大厅正中央的金椅子。这把金椅子是阿科极为重视的物件，甚至还专门安排了黑奴为其扇风，以确保他坐上去的时候会有凉意，代表着坐拥者重要的社会地位及无上的权威。同时，在传统加纳文化中，金椅子也是族群团结的象征，是加纳人民的精神寄托和灵魂倚仗。阿科雇佣自己同胞跪于金椅子前降温的行为极具讽刺意味。

除开空间、象征物之外，身体记忆也是文化记忆的一种形式，“是通过长时间的习惯、无意识的积淀以及暴力的压力产生的。它们同时具备牢固性和不可支配性。”(阿莱达·阿斯曼 275)阿科成为海岸角酋长的仪式打开了阿诺瓦的记忆闸门。从她回忆里的祖母口中可知，大家都不再谈论这个奴隶问题了，“所有人都选择了遗忘，他们已经忘了”(Plastow and Banham 186)。不过，祖母试图压抑的痛苦在阿诺瓦的潜意识中爆发了。“我梦见自己是个高大的女人，我的体内出现巨大的洞，男人、女人和孩子喷涌而出”(186)。在这场噩梦中，阿诺瓦的身体成了非洲大陆的象征，在压迫和剥削中遭受残忍的对待：

海水滚烫，冒着热气。[……]它抛出许多的大龙虾，煮熟的龙虾，每一只落下的时候都变成了一个男人或女人，但保留了龙虾头和爪子。他们冲到我坐着的地方，把我面前涌出的男男女女拽住，撕裂他们，摔在地上，用脚踏踏。[……]把我们族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关在石头山里。但是从来没有一声喊叫或低语。(186)

“记号阻碍着遗忘，身体本身承载着回忆的痕迹，身体就是记忆”(阿莱达·阿斯曼 279)。阿诺瓦渴望向同胞倾诉自己的噩梦，然而她们哭喊着让她不要再提及此事。文化记忆变形的黑人奴隶群体拒绝接受和追忆这段创伤历史，这份记忆成为阿诺瓦独自承受的梦魇。阿诺瓦的梦境将被压抑的记忆释放出来，身体叙事与历史意识交叠，警醒同胞铭记殖民者犯下的滔天罪行，激发他们试图遗忘的族群记忆。

阿诺瓦随着空间位置的移动，一步步迷失自我，遭受空间禁锢，成为一座情感的孤岛。在阿科被欢呼雀跃包围时，阿诺瓦“穿着她的旧衣，看起来颓废又孤独”(Plastow and Banham 184)。散落的记忆碎片环环相扣，拼凑出被主流文化遮掩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记

忆符号成为诱因，在激发观众想象力的同时，也让阿诺瓦逐步走出“鬼魂”的状态，开始反抗。当阿诺瓦再一次目睹双胞胎兄弟跪在金椅子前扇风时，她变得愤怒，态度强硬地反驳阿科雇佣奴隶帮忙的虚伪行为：“就好像其他人是牲畜吗？瞧瞧我们现在，从早到晚无所事事。”（195）在阿科毫无理由地提出离婚时，阿诺瓦一口回绝并坚持向他讨要说法，为自己争取平等的权利。最后阿诺瓦当着一众奴隶毫不留情揭穿了阿科阳痿的事实，迫使后者因自尊心极度受挫而选择了自绝于人世。阿科的结局显然宣告了阿诺瓦话语权的回归和她抗争夫权的最终胜利。阿诺瓦自离开家乡后就一直在传统文化与主流西方文化的罅隙中艰难生存，满腔激情最终化为怨愤，最后选择以溺水结束自己的生命。曾发誓永不回家乡的她，终究裹尸还乡，没能逃出传统文化的“围墙”。

艾杜笔下的女主人公总是敢于跨越夫权的界限，她们违反了传统的婚姻和母性崇拜的话语，却又戏剧化地展示自己的脆弱和对非洲传统的服从。通过对阿诺瓦的刻画，艾杜表现出年青一代，尤其是其中的女性在文化身份认同困境中的迷茫和挣扎。在后殖民语境下，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交织。当文化碰撞时，传统文化总是被忽略，甚至被否认。借助戏剧中阿诺瓦和阿科两人双双殒命的悲剧，艾杜表达了自己对一味背离传统文化现象的看法。

《阿诺瓦》向戏剧受众展现了非洲黑人主体意识逐渐异化的客观事实，并借助传统悠久的民族文化表征来消解西方中心主义，重构边缘化的文化身份。艾杜在剧中试图通过地点、象征符号和身体等媒介来重新组织过去，将加纳人民逐渐遗忘的记忆带回中心地带。地点空间将想象的记忆投射于客观现实，象征符号唤醒了戏剧受众内心逐渐消亡的民族记忆，身体记忆将他们的记忆细流汇聚成充斥着伤痛和反思的历史海洋。《阿诺瓦》中承载的文化记忆让该戏剧具有浓厚艺术张力的同时，也使得戏剧本身成为加纳乃至非洲文化记忆的一部分。文化记忆在指向过去的同时，更注重的是当下与未来。异质文化的冲突与较量最终导致了阿诺瓦的悲剧，这一结局给予戏剧受众的启示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碰撞和冲突之后，非洲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必然要相互妥协，以杂糅的形式融为一体，最终达至新的平衡并开拓出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Assmann, Aleida. *Erinnerungsräume: Formen und Wandlungen des kulturellen Gedächtnisses*. Translated by Lu Pan, Peking UP, 2016.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Assmann, Jan. "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 *Cultural Memories: The Geographical Point of View*,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1, pp. 15-27.

———.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Translated by

- Shoufu Jin and Xiaochen Huang, Peking UP, 2015.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Абрамова, С. Ю. *Africa: Four Hundred Years of the Slave Trade*. Translated by Shilin Chen and Huiping Ma,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4. [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陈士林、马惠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Bao, Xiuwen, and Lin Wang,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20th Century African Masterpieces*.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2016. [鲍秀文、汪琳编:《20世纪非洲名家名著导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 Halbwachs, Maurice. *On Collective Memory*. Translated by Ran Bi and Jinhua Guo,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2002.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Huang, Keheng. *Ghana: Gold Coast*. World Affairs Press, 1957. [黄克衡:《加纳:黄金海岸》。上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 Jin, Shoufu. "Jan Asman's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vol. 33, no. 2, 2017, pp. 36-40. [金寿福:《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载《外国语文》2017年第33卷第2期,第36-40页。]
- Li, Xin. "From Cultural Memory to Human Memory Community: Moral Persistence in the Meaning Production." *Academic Research*, no. 10, 2019, pp. 170-76, 178. [李昕:《从文化记忆到人类记忆共同体——论意义生产中的道德固守》,载《学术研究》2019年第10期,第170-76,178页。]
- Needham, Anuradha Dingwaney, and Ama Ata Aidoo. "An Interview with Ama Ata Aidoo."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vol. 36, no. 1, 1995, pp. 123-33.
- Nyamekye, Patricia, et al.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Practices and Beliefs in Ama Ata Aidoo's *Anowa* and Efuah Sutherland's *Edufa*." *Significance*, vol. 5, no. 8, 2015, pp. 217-24.
- Plastow, Jane, and Martin Banham. *Contemporary African Plays*. Methuen, 1999.
- Wang, Ning. "Narrative,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Identity: Homi K. Bhabha's Theory of Postcolonial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no. 6, 2002, pp. 48-55. [王宁:《叙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载《外国文学》2002年第6期,第48-55页。]
- Xu, Jiming.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nd Slavery in West Africa." *West Asia and Africa*, no. 4, 1994, pp. 53-62, 42. [徐济明:《大西洋奴隶贸易与西非奴隶制》,载《西亚非洲》1994年第4期,第53-62,42页。]

◇责任编辑:夏开伟

敬虔与自治

——罗斯金人文精神的诗性图景

◎ 蔡成珍

内容摘要: 约翰·罗斯金的图像符号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互涉性,这极大增加了罗氏散文文本的不可译性。尽管如此,透过女性崇高视角再审视罗氏散文文本极具诗性张力的人文精神,仍有较大的空间。本文结合罗斯金的传记史料,从敬虔与自治的双重维度入手,对其三部代表性散文《建筑的诗意》、《建筑的七盏明灯》与《威尼斯之石》展开文本细读,挖掘其表层建筑书写遮蔽下图像文本符号系统中的诗性精神的互动生成。概言之,罗斯金异质的建筑图像书写可视作为一种书写策略与斗争工具,它挑战了二元对立的合法性,并借此重塑多元文化的流动性与开放性。

关键词: 约翰·罗斯金 建筑书写 人文精神 诗性图景 敬虔 自治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2023)03-0066-12

基金项目: 2022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提升能力项目“约翰·罗斯金的‘共同体’思想研究”(2022KY175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广西外国语学院欧美语言文化学院,广西 南宁 600222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3.007

Title: Veneration and Dominion: On John Ruskin's Humanistic Poetical Vision

Abstract: The inextricable intertextuality of John Ruskin's pictorial writings and symbol systems led to the enhancement of the untranslatability of Ruskinian prose texts. Nevertheless, penetrating through feminine sublimity, there still exists abundant spaces for the re-examination of humanistic heritages of Ruskin's prose texts featuring with powerful poetic tension. This paper, initiating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veneration and dominion, purports to conduct a close textual reading of his three representative architectural prose works, *The Poetry of Architecture*, *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 and *The Stones of Venic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nteractive generation of the textual symbolic systems of his architectural writings. Thus, Ruskin's heterogeneous architectural vision can be regarded as a writing strategy and a tool of struggle to challenge the legitimacy of binary oppositions, thereby reconstructing a kind of fluidity and openness of diverse cultures.

Keywords: John Ruskin, architectural writings, humanism, poetical vision, veneration, dominion

Author: Chengzhen Cai, Lecturer, Colleg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Guangxi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Nanning, Guangxi, China.

“维多利亚时期的圣人”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散文书写直面人性整体,创造性地融入对人性与社会的想象,对公民实行人文教化的使命富有洞见。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人文化成”出自《周易·彖传·贲卦》,“人文”指涉诗书、礼乐、法度等精神文化,而“化”则指教化之功效。在西方文化中,“人文”兼具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之意义。前者主要体现为对人的幸福与尊严的追求,泛指人道主义精神;后者则指涉对真理的追求,主要体现为一种广义的科学精神。

罗氏诚挚呼唤的人文精神乃超越任何宗教桎梏的超越性精神,这种追求扎根于个体心灵深处。人文精神首要考虑的是道德与审美的境界,这一境界内含在民族灵魂的幽深处。《建筑的诗意》(*The Poetry of Architecture*)、《建筑的七盏明灯》(*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 (简称《建筑七灯》)与《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是罗氏早期三部建筑书写系列的代表性散文作品。它们借用建筑的表层景观符号,透过建筑与地方环境、气候之互动图景,探讨了建筑与民族国家在气质上的关联。在《建筑的诗意》开篇,作者便提出:

让民族精神在品格 [Character] 上得到升华,它的概念就会变得纯粹;让其欲望简单,它理念会变得很美;让它情感谦卑,它便不会无礼于石头。对于建筑师和雇主而言,只有一条规则:在一切事情上皆要遵循自然,如同寻找人形之美般,去寻找物质创造的美;勿在多变的人造装饰中寻找,而是在能使它远离死丘、纯洁而充满活力的精神中寻找。(Cook and Wedderburn 1: 168)

若如他所言,建筑书写旨在“寻找人形之美般,去寻找物质创造的美”,那么,他的建筑书写似在主张以全新的视角看待物质世界,即将个体之同情推人及“物”。由此而言,他所指涉的物质绝非人造装饰,而是表层物书写遮蔽下对于个人、社会、国家人文精神品格塑造的希冀。

一、诗性书写:符号的重构

罗斯金的文本在跨文明译介与传播过程中,似乎产生了诗性魔力。在曾花费六年时光翻译罗斯金美学著作的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看来,罗氏的诗画书写融合了对人类永恒世界的关切和忧虑,激发读者对时间本质乃至生命意义的重读。他曾把自身的写作比喻为“修建大教堂的过程”,试图“以变换、想象和象征的诗性方式呼唤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联系”(刘海清 144-51)。

罗斯金擅长运用互涉性极强的诗性语言，与光怪陆离的世界展开公正而真实的对话，其阐释性隐喻精练而明晰。“诗性”一词源自维科（Giambattista Vico）的《新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他借此犀利地对西方文明的危机作出诊断，并构建了一种基于创造性感性实践的“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朱立元、黎明 91）。在古希腊语中，诗即创造，而诗性智慧兼有创造性的智慧之意义。解构主义大师米勒（J. Hillis Miller）曾撰文评价罗斯金的文本特征，认为对话式的文本主要通过图像与文本的并置呈现，两个不同符号系统的互涉使对话式关联得以产生，图像与语句意义皆变得不可译，图像与语句皆指涉自身，两者无可交汇，仿佛是媒介战争，使阅读任务变得艰巨。他犀利地指出：

罗斯金所用的意象表明，一切叙事都是关于一个迷宫般转折与回返的故事，关于道德人生中“谬误与复原的途径、畸异与端正、乖张与激进的交织”。由谬误与真理、无知与智识交互生成的叙事的迷宫，也就构成了每个爱欲或战争的故事。性别上的区分在任何故事中都是预先设定的。正是这些区分才能开启人类漫长的情感与冲突的故事。（米勒、钱文逸 74）

然而，尽管米勒的解读肯定了罗氏的“阴性生命”创造性书写，却忽视了罗氏作品超越性的诗性张力，且未能结合具体文本，进一步挖掘罗氏独特的诗性思维对人文精神重建的独特意义。在米勒看来，与《圣经》和古希腊神话的叙事一样，罗氏笔下的“缝纫、针线、中世纪手抄本和建筑中的装饰性阿拉伯纹饰、现代铜板画——它们都在其形式与对道德生命之繁复的再现上与迷宫相近”。它们“代表了一切阴性生命的耐心与纯洁”（73）。米勒进一步指出，罗斯金认识到“迷宫般的装饰设计始终‘与书写相连’[……]每一个字母都具备某种图画性，而每一张图像也都具备某种书写性”（73）。结合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图像意义生成之三个维度——“前图像学”的自然意义，程式性常规意义和图像文化哲学的意义再生产（48）——则不难认识到，阅读罗氏的建筑书写需运用综合直觉，洞察人类心灵基本倾向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征象。书写符号的任意性由图象书写衍生而出，这些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灵魂感性符号，恰恰反映了人类道德与命运的症结。

以他最为畅销的《建筑七灯》为例。尽管近几年《建筑七灯》在国内几经重译，但囿于其表层建筑图像书写的遮蔽性，其诗性文本之流动性仍较少被发掘。作为“如画的语言”大师，罗斯金受英国水彩建筑画家普劳特（Samuel Prout）启发，积极运用比喻或“化身/具象”（incarnation）修辞的力量，使其“文字建筑进一步变成了如画的意象建筑”，因而具有了互动生成的阐释空间。在该作第一版序言中，“品格”（character）、“论文”（essay）及“建筑”（architecture）均采用了大写形式（*The Seven Lamps* 7-8）。《建筑七灯》于1849年正式出版，1855年第二版问世后，近25年的时间内近乎绝版；在第三版（1880）序言开篇，罗氏向

读者致歉道：

我从未预期再版此书，它无疑是我撰写得最为徒劳的创作 [……] 但是我发现公众仍然喜欢此书——仍会读它，但他们不会去看对其真正有用与有益的内容；我从那时起写作的源头都在此书——无论这些文字如何过于藻饰，且过分轻率地喷薄出过多议论——此处我依然以旧式的语言表达；有许多偏激和完全错误的新教主义，已经从此版正文和附录中去除了。(Cook and Wedderburn 3: 15)

如果说罗氏“如画的语言”容易为其散文书写附上一层“隐性”(covert)的叙事，那么未言之物同样彰显“隐晦的特质”(dark qualities)，更由此赋予了文本一层“神秘的”(mysterious)意义。这层笼罩在文本上的神秘面纱，不断地抵制诗意的确定性。此处，我们不妨先揣测罗氏将其视为“最为徒劳的创作”的缘由。在作品出版期间，不少批评家诟病其作品中强烈的伦理倾向，直至“一战”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文人仍对“吹毛求疵的散文”(over-wrought prose)及说教的口吻嗤之以鼻。然而，罗氏口中“真正有用与有益的内容”究竟为何？是彼时出版商们看重的罗氏手绘插图的商业价值？抑或是其尝试克制地传达的精神价值？罗氏在《建筑七灯》收篇处，阐明自身写作方式：“在我写作本书期间，不止一两次搁笔踌躇、思虑再三，也经常迫使我自己要有所节制、当停则停，以免使作品变成对读者喋喋不休的劝诫。”(3: 265)

“劝诫”与“节制”的结合被采用为一种表达方式，使得文本在叙述与未叙述之间生成一种持续的张力。举例而言，在《建筑七灯》第三次再版(1880)之后，它成为罗氏流布最广的艺术书籍。在其序言中，罗氏刻意增加了33条格言，并为读者附上了一条中肯的阅读建议：

建议——我发现，由于怪诞的不幸，新版序言忽视了我把书中某些段落用大号字体印刷并将其编为“格言”的原因：“如果读者愿意留心这些，他便会验证自己偏好的正确性，即发现格言的可用性和可靠性。如果它们先被读者充分领悟，此书的其余内容也会变得清晰而具有说服力——否则它可能被误认作‘仅仅是一团华美的词藻’，而阅读实则徒劳无获罢了。”

——1880年5月26日，科尼斯顿，布兰特伍德(3:17)

就建筑书写的阅读建议而言，罗氏所呼唤的实乃读者应兼具“敬虔”与“自治”的人文精神。如凌继尧注意到的，尽管罗斯金是第一位将艺术、劳动与道德的所有要素结合起来的艺术家，但在他的艺术体系里，失去美似乎也意味着失去了道德准则(208-300)。我

们不妨先依据他上文的建议，重访他坦承的别具深意的“大写文字”，探究其序言中大写的“Character”及“Architecture”等，是否确实别有“重构”之深意。其刻意附加并予以强调的33条格言洋溢着清教的基本理念，如“真实”（格言7、8、10、12）、“勤劳”（格言6、25、26）、“节制”（格言3、5、11、19、22、28、29、32、33）等。从《建筑七灯》第三章“力量之灯”中给出的定义来看，优美与崇高之物的区别在于，前者顺应自然，后者改造自然；抑或可如格言17将其概述为“建筑有两种思想力量：敬虔与自治”（Cook and Wedderburn 3: 101）。在第七章“美之灯”中，他再次重申了此观点：“美主要源自对有机自然的外在显现。”（3: 138）“我极度热爱这些黑白图案，因为它们在我所能找到的所有作品上，展现出绝妙的生命精神”（3: 186）。静谧的“石头建筑”传递着无法言说的共情。绝美的光芒、野性而无常的爱隐隐地镌刻在那象征着悲惨、痛苦的人性巨石之上。由此观之，与其说其思想充斥着严苛的清教伦理教条，毋宁说是彰显了世间宗教共有的人文品格，以及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人类思想与实践互动生成的有机生命智慧。

或许基于此种和谐的审美理想，在罗氏的建筑书写中，建筑图景的插图如谜语般充满不确定性，亦赋予作品新一层的文本张力。罗氏坦言在写作过程中，表现出对自身强烈感情的极度克制。以数字的选用为例，罗氏在《劳工书简》（*Fors Clavigera*）的第五封信中说道：“我一直对[七]这个数字有很大的顾虑；因为当我创作《建筑七灯》之时，我竭力运用所有的奇思妙想，避免它从我手中变成八盏，甚至九盏。”（Cook and Wedderburn 3: 138）或如一位学者所留意到的：“‘七’这个数字所予人的完整感、神秘感必定在其考量之内[……]这个数字的决定乃随着Ruskin本人的想法而变。”（陈德如9）插图灰白的色彩，寓言般地为其隐性的范本教育提供多元文本支撑。罗氏依托深厚的词语谱系学学养，巧妙地通过类比等修辞彰显多重寓意，无形中赋予了文本开放的阐释空间，引导读者填满、阐发抑或丰富文本的意蕴，通过表层的视觉图景引导读者的心灵重建：

由建筑师承载的自然形象，也只能由我们通过直接的智性活动来感知，并且，它总是需要我们以一种不固定出现的、某种相似的智慧来理解与感受它。它是所觅之物的书面或固化印象，亦是探究与思维具象表达的成果。（Cook and Wedderburn 3: 155）

诚如亨德森（Heather Henderson）在1898年所注意到的，“《罗斯金自传》中包含两种叙事：外在的艺术家/内在的先知——两者结合起来为罗斯金的作品创造了一种‘无法消解的张力’”（92）。内在的先知精神亟需“敬虔”之力，而外在的艺术家则需要“自治”之柔，“敬虔”与“自治”两者因相互颀颀而熠熠生辉。

二、个体激情：建筑与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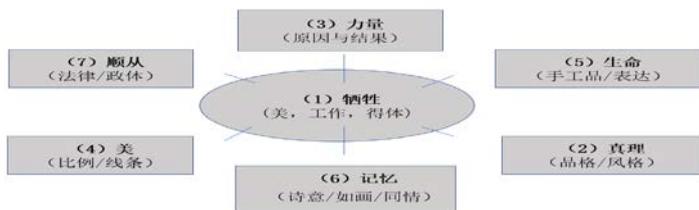
罗氏在其母亲的影响下，从小熟稔《圣经》，他的婚姻观深受宗教的影响，显得理性而严苛。在其妻子 12 岁时，罗氏便已经为她创作了颇具伦理精神的《金河王》(*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1844 年起，罗氏对威尼斯、佛罗伦萨、卢卡、热那亚和锡耶纳等处的古建筑遗址进行考察，在安杰利科 (Fra Angelico)、提香 (Titian) 及丁托列托 (Tintoretto) 等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们的影响下，开始着手进行《建筑七灯》的写作。

在《建筑七灯》的表层建筑符号下，澎湃着罗氏的人文精神。1848 年 7 月，在《建筑七灯》创作之余，他给未婚妻格雷 (Euphemia Chalmers Gray) 去信，信件中溢满了炽热的爱的告白：“比想念莎士比亚更挂念 ECG。”与此同时，在其同时期来往的信件中，他直言“一种巨大的黑暗恐惧”震慑着他，使他感到某种“阴郁的预兆” (Bradley 17)。这种惊怖之感，恍似伯克 (Edmund Burke) 曾在《崇高与优美的观念之起源的哲学研究》(*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中描述的那伟大而纯朴的强力。1848 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罗氏痴迷于《建筑七灯》创作，其间，他频繁地翻阅《圣经》及但丁、阿里斯托芬、卢梭与卡莱尔的作品。其妻子却多次感觉到“严重不适” (21-22)。仅从此段时间罗氏的阅读，我们不难窥见其知识体系的丰富性，即其思想受到古希腊自然理性学说、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自然法学及文艺复兴以来极具人文主义色彩的启蒙思想的影响。

从其传记依稀可见，罗氏在《建筑七灯》的创作过程中，脑海中难免浸润着新婚时对女性之美好特质的憧憬。待至 1849 年 5 月 10 日，《建筑七灯》付梓。6 月 14 日，罗氏为格雷撰写了一封致爱信 (23)。或许，他曾效仿诗人但丁，将恋人想象为追求信仰的化身，追求伯克式痛苦与快乐并存的生命激情：

他又回到了《建筑七灯》中提出的原则，这本书在 1848 年出版时深受阿比维尔的影响。当时，在他的新婚新娘的陪伴下，罗斯金用一种从未在他已婚妻子身上表现出来的热情来研究建筑。“索姆河流域华丽的建筑”也饱含情感，或许反映了罗斯金对婚姻的渴望，在某种程度上，罗斯金声称，一位真正的建筑师必须是一位充满激情的人。(Hilton 149)

《建筑七灯》创作于其新婚伊始，它暗涌着强烈的情感及婚后再未有过的激情，抑或性情古怪多变的特质 (Bradley 19)。或许如西方建筑学者凯彭 (D. S. Capon) 在分析《建筑七灯》之理论思想时所留意到的，罗氏选择将颇具希伯来“敬虔”精神的“牺牲之灯”/“美之灯”置于中心，并推崇为最基本的核心准则 (见图 1)：



▲图1 凯彭对“七灯”的解读（转引自陈德如 13）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凯彭已然将“牺牲”与“美”“劳作”“节制”等清教伦理精神并置,其原则亦不失为希伯来世俗化、道德化的神人伦理精神之体现。首先,人文化成图景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宇宙论诗学象征形式。在罗氏笔下,个体的生命和灵魂与自然法传统有着紧密的关联,主要体现为对理性的尊崇。由于目睹过1848年法国革命的残酷,他既不满暴力革命,也对本国温和的专制统治抱怨颇多。但正如在《建筑七灯》最后一章“遵从之灯”中所言:“多亏有它[遵从],体制才得以安定,生活才又有了乐趣,信仰才获得推行;而我们所创活动的一切成果,也是借由着它,彼此之间才有了联结与延续。这项原理,我称之为‘遵从’。”(Cook and Wedderburn 3: 248)罗氏所倡导的此种“遵从”,赋予其建筑书写强烈的人文理性色彩:一方面,其以理性与自由的价值为根基;另一方面,它认可了人类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因而,此处的“遵从”兼具了人道主义者的责任和容忍之诉求。基于此,罗氏的建筑图景表现出类型美之统一、无限、静穆、对称、纯粹,以及适度等风格。

其次,敬虔之心赋予主体内在生命力,丰富的想象力为个体提供无限性。如在“生命之灯”中,罗氏指出:“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人类的想象力以尊崇[神]为乐,片刻也不会因模仿无生命的僵死之物,而对其真正的本质视而不见;但更因其宏大的生命力而喜悦,把姿态化成云彩,把欢乐化成波浪,把声音化作岩石。”(3: 191)而“所有的崇高[sublimity],如同优美一样,单纯就词源意义而言,它们皆是‘如画的’,即适合成为画面的主题”(3: 236)。它们皆是罗氏透过圣经象征学似的类比,对维多利亚时期愈发严苛的理性主义展开批判的媒介:

人类之美德与其所处之昼夜交替的世界,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一样从根本上与自身的对立面存在着分别[……]而就这块陌生混沌的美德之黎明、态势不明的灰色地带里,热诚渐趋成为不耐,合度慢慢转为严苛,正义变身为残酷,信仰沦落为迷信,到了最后,那些美好的德性最终无一例外地消失于阴暗之中。(3: 54)

或许在罗氏看来，此种颇具严苛精神的崇高，浸润着男权的凝视，而建筑纹饰中颇具阴柔气质的女性书写彰显着异质的崇高。实际上，“自启蒙运动以降，尽管叙利亚品格的宗教仍不失为西方生命形态的核心，部分西方文化由原初浸润‘希伯来品性’转为更加彰显‘希罗色彩’”（阮炜 224）。诚然，彰显西方人文精神起源的“希罗色彩”赋予罗氏建筑书写不容忽视的张力。在男权凝视下，纯粹彰显超验理性的崇高对于社会改造不仅具有局限性，更有甚者，可能存在将人类文明推向武力毁灭的风险；而由个体内在生发的“自治”则对现代共同体的塑造至关重要。

三、社群想象：自治与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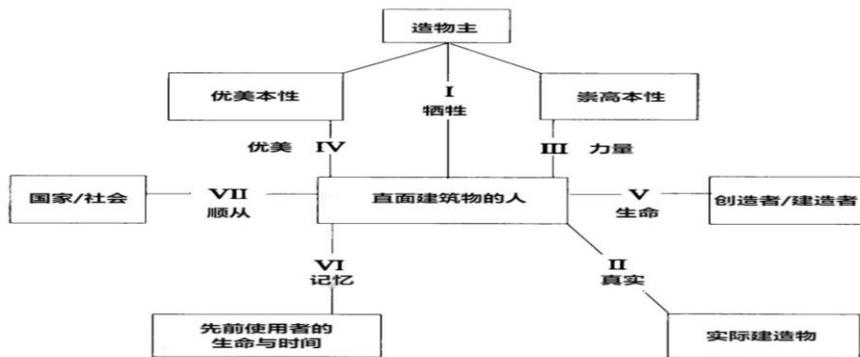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罗氏的建筑书写悄然融合了西方古典法式的崇高与理性，但罗氏也呼唤女性需兼具一种“雌雄同体”式的理性、勇气、尊严、判断力及正义感，借助想象力及个人实践，超越个人之有限性，为了家庭及社会共同体的和谐，义无反顾地牺牲。现实生活中，罗氏早期一段短暂而饱受争议的婚姻让他备受批判。实际上，他积极呼唤女性“统治”的力量，希冀两性之间和谐、平等地共存。与康德性别观中存有的对女性力量的偏见不同，罗氏积极倡导提升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教育，借此重塑女性的自我认知及角色力量。他鼓励女性接受平等而全面的教育，并多次公开称赞女性的艺术创作天赋（Hanley and Maidment 61）。由罗氏早年所接受的基督教福音派家庭教育来看，富有男性气质的神学教育为其文学创作提供耐性、精确性、想象力等文艺批评创作必备的品质；笛福、班扬等学者所著的一系列人文经典，则构筑了其性格及作品中“女性气质”的一面（65-67）。他平等地看待女性作为公民个体所富有的潜能，并身体力行地教导女性。1864年，他发表著名的演讲《王后花园里的百合》（“Of Queens’ Gardens”），极力推崇女性的智慧和力量。与传统加诸女性身上的“娇美”“精致”“柔弱”“感性”等角色认知不同，这种家庭化的崇高鼓励女性在自然的启发下，积极与他人缔结纽带，强化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责任。

罗氏所呼唤的人文主义者需具有较强的非功利性，由此紧握自身的立足点，呈现出理性的、通天之际之独立王国的自治性与自洽性。罗氏拒绝将人性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极力引导底层人民追求并培养更高层次的美德。罗氏在文中进一步谈道：“有一些事情我们不仅需要，而且不可或缺；世上所有的努力和纷争，不，更有甚者，所有英格兰真正的人才和解决办法，将永远不会使我们缺乏这些品质：服从、团结、合作和秩序。”（《建筑七灯》2）为了实现此种诉求，我们不难理解，罗氏将物“人化”，借此呼吁人们对世界丰富性的感受力及同理心。他在《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中描述的“情感误置”（*pathetic fallacy*）将情感之维赋予自然界万物，其功能类似于移情说。不过，罗氏提出情感误置的目的在于

对其展开探讨，借此呼吁公众或忠实于外在的自然界，或尊重内心真诚的情感。

以罗氏激励推崇的哥特建筑为例，建筑书写如视觉艺术具有文本般的记录功能和诗歌般的象征意义。异质的哥特书写宛若不拘于形、千姿百态而错综复杂的象征符号，彰显个体抵制庸俗、抵制权威与寻求自由的生命精神。罗氏笔下的哥特建筑是生命个体心智力量的象征，是复杂人性的逼真刻画。哥特式建筑的道德元素指涉六点：野性、多变、自然、怪诞、刚性与冗余（*The Lamp of Beauty* 232）。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世纪，哥特作为一个文化概念，与古典主义的秩序和理性相对，泛指一切混乱不堪、野蛮愚昧，乃至魑魅魍魉的事物。

随着 19 世纪科技理性的发展，彰显情感空间的哥特书写试图对理性崇高提出挑战。以西方建筑批评家巴尔乔恩（Cornelis J. Baljon）对《建筑七灯》的梳理为例，“建筑七灯”（牺牲、真实、力量、美感、生命、记忆、遵从之灯）依次被巴氏具像化为造物主、建筑实体、崇高性、美感、建造者、人类、国家/社会的象征物。与凯彭不同，他将“直面建筑物的人”置于中心位置，这个“大写的人”跃然纸上：



▲图2 巴尔乔恩为《建筑七灯》作的结构分析图（402）

与西方朗吉努斯—伯克—康德一脉所推崇的理性崇高不同，罗氏仿佛在建筑书写中解构多重的二元对立。在巴氏的论述中，个体在积极践行社会义务，维护个人与国家道德的同时，需要注意两种同时与造物主发生关联的基础：其一是优美，其二是力量。这与康德在《论优美感与崇高感》（*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önen und Erhabenen*）一书中所折射出的人性观一脉相承。然而，罗氏所尝试构建的颇似福柯由“‘认识你自己’到‘看护自己’所生成的道德主体”，后者通过“改变、净化、转换和提升自我”（杨慧林 14-23），重塑人类栖居的社群家园。具体而言，在公共领域的个体实践中，罗氏早期对社会的批判趋于保守，以他 1845 年给父亲的家书为例：“我回复了一两封信，想解释一下我所说的，我自身越来越倾向共和党了。您懂的，我不是指自由人的增多——在那些可怜的、恶毒的、

愚蠢的人能承受的所有的诅咒中，最大的祸源或许是自由；但如果能让人来管理其自身，这样做所需要的努力能造就出一个美好的人。”（Cook and Wedderburn 3: 262）待至 1848 年，英国宪章运动在欧洲大陆革命风暴的推动下达到了高潮，近两百万工人在请愿书中主张自己的劳工权利。这不仅是大众民主诉求在人类社会全面展开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社会政治议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与正面犀利抨击法国大革命的伯克不同，罗氏倾向于在建筑线条书写的遮蔽下传达其社会批评：

我对这些劳工的不幸并非视而不见，我也没有否认近期明显活跃的社会运动的理由：暴乱头目的鲁莽恶行，上层社会公共道德准则，以及政府首脑勇气及诚实的缺失。但是这些原因自身可以追溯到一个更深刻、更简单的缘由：鲁莽的煽动家，不道德的中产阶级，以及软弱奸诈的贵族，在所有这些国家的家家户户中，最常见、最显著的致难原因都可以归咎于——懒散。（3: 261）

对比观之，罗氏人文化成的诗性正义似乎继承了休谟与亚当·斯密式的旁观者的正义，兼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化遗产。究其原因，一方面，在摒弃共情与伦理纽带的情况下，在法国大革命的感应下，他那试图建立超验秩序的崇高书写似乎携带着暴力基因，推广单向度的征服模式；另一方面，罗氏对社会弊病有细腻的观察，他撰写的散文也有极强的人文伦理意识，呼唤“家家户户”在不同文化层面的改造。尽管颇具社会主义的利他意识，但他拒绝笼统地从阶级视角出发，而是具体地从“家家户户”面临的复杂人性入手，呼唤个体积极地“看护自己”。一方面，自由可帮助公民实现最好的自己，获得政府善治下的安全感；另一方面，无节制的自由并不可取，人格之尊严在于其理性的立法者资格，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人之自由，恰恰也基于此：

如果你所说的自由是对激情的惩戒，对智慧的掌控，对愿望的屈服；如果你的意思是对施暴的惧怕，犯错的羞耻；如果你的意思是对所有掌权者的尊重，对所有依赖者的照顾；对善的尊重，对恶的怜悯，对弱者的同情；如果你的意思是对所有思想的观察，对所有快乐的节制，对所有辛劳的坚持不懈 [……] 因此尽管一定程度的放纵，对于展示个人对事物的热情是有必要的，它们的美好、愉快和完美却都包含在它们的克制中。（《建筑七灯》247-48）

概言之，罗氏意象化的文字透过诗性与复义性，彰显出个体对人类社会丰富性的探索与呈现。如他在《建筑七灯》文末对“索多玛”典故的援引，隐含着其对想象的共同体社会构建的诉求。这种诉求体现在个体的热情、牺牲与共情中——“对装饰堆砌的砥砺热爱：

一种矢志不渝的巨大热情，一种毫无私利的牺牲 [……] 最后，一种对完满性以及物质宇宙之宝藏的共情，皆肇始自我们竭尽全力所为其行为界定的‘自然主义’”（*The Lamp of Beauty* 242）。

罗氏最终尝试接受热情与牺牲、愉悦与痛苦的混杂，通过共情之力量的重塑，认可自我之流动性，从而以更开放的态度面对生命现实，与想象中的他者休戚与共。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共生性与流动性，体现在彼此的越界与包容中。由此，在异质人群间，一种共情的、兼具主体交互的有机共同体得以不断地重塑。如他儿时在一首有趣的短诗中写道：

“唉！幽暗与已故的同类 / 是我疏远之人 / 我躺在童年屋顶的 / 红色废墟 / 及荒木
灭火者之下 / 当清晨降临于我及我那 / 用鲜血洗礼、守护的婴孩上 / 人类的悲伤乃其
食粮 / 人的生命乃其果酒 / 缘何？——那些把我留在那里的人 / 激励我幼小的四肢去
承受 / 所堆积于我高颅之物， / 我可可忍耐——却不惧怕。”

一只陌生人的手 / 一位陌生人的爱 / 拯救了我的生命 / 减轻了我的苦楚 / 教导我
挥舞长矛、拉动弓弦 / 证明青春之力量。（Cook and Wedderburn 3: 57-58）

罗氏父亲在 1838 年 6 月 12 日的信中对该诗赞扬道：“仔细阅读后，我认为这是约翰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它有一种健康的、男子气概的基调；一种精神、力量和独创性，赋予诗歌以值得一读的希望——如果他的健康和生命被赋予；说到恐怖，我要把你从荷马史诗里引出来，里面有蒲柏的优美诗句，是它的十倍。”作者本人在后来的几年里对这部作品就不那么宽容了：“一部模仿‘Giaour’的打油诗。”（57-58）

诚然，罗氏不仅主张以全新的视角看待物质世界，还将人类之同情推人及“物”，由此提升个人同情与感受事物的能力，增加个体对世界丰富性的理解，规避爱与同情之道德能力的缺失。或许诚如希克雷（David Hickray）所言：“他 [罗斯金] 留给我们颇具魅力的遗产就是他那丰富且变化着的思想。”（47）如上文短诗所言，“人类的悲伤乃其食粮”，而“陌生人的手”与“陌生人的爱”这种阴柔的力量构成其救赎的源泉。罗父所称赞的“精神、力量与独创性”何尝没有贯穿于其创作始终呢？然而，尽管此种饱含人文力量的诉求大多被罗氏克制的书写方式所遮蔽，但时人仍可凭借此种忧思，管窥其作品深刻的人文精神内核。

直面时代激进的洪流，罗斯金积极运用自己深厚的学养功底，扎根本土历史文化传统，谨慎地引导公民借助想象力与同情之力，走出民族转型期面临的混沌与无序，重构秩序与正义。值得注意的是，罗氏推崇的自治需以两性平等为基石，兼具女性主导的人文力量。由此观之，罗氏的建筑图景书写可被视为一种书写策略与斗争工具，它挑战二元对立的合法性，流溢出一种跨越神秘与崇高的流动性，并彰显着自由与克制、有限与无限等多元言说方式的开放性。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ljon, Cornelis J. "Interpreting Ruskin: The Argument of 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 and *The Stones of Venice*."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 55, no. 4, 1997, pp. 401-14.
- Bradley, John Lewis. *A Ruskin Chronology*. St. Martin's Press, 1997.
- Chen, Deru.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 On Ruskin's Architectural Thinking*. Taiwan Business Press, 2016. [陈德如:《建筑的七盏明灯: 浅谈罗斯金的建筑思维》。台北: 台湾商务出版社, 2016。]
- Cook, E. T., and Alexander Wedderburn, editors. *The Complete Works of John Ruskin (Vol.I-XXXIX)*. Library Editi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3-1912.
- Hanley, Keith, and Brain Maidment, editors. *Persistent Ruskin: Studies in Influence, Assimilation, and Effect*. Ashgate Publishing, 2013.
- Henderson, Heather. *The Victorian Self: Autobiography and Biblical Narrative*. Cornell UP, 1989.
- Hickray, David. "Reading Ruskin." Translated by Lin'ai Li and Yingfeng Zheng, *History and Exposition*, no. 2, 2001, pp. 45-48. [希克瑞:《拜读罗斯金》, 李临艾、郑英锋译, 载《史与论》2001年第2期, 第45-48页。]
- Hilton, Tim. *John Ruskin: The Later Years*. Yale UP, 2000.
- Ling, Jiyao. *Fifteen Lectures on Aesthetics*. Peking UP, 2004. [凌继尧:《美学十五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Liu, Haiqing. "On the Fusion of Proust's Novel Aesthetics and Visual Arts." *Journal of t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no. 3, 2019, pp. 143-51. [刘海清:《论普鲁斯特小说美学与视觉艺术的融合》, 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第143-51页。]
- Miller, J. Hillis, and Wenyi Qian. "On Ruskin, or 'The Art of Scraping.'" *New Art*, vol. 36, no. 2, 2015, pp. 72-80. [米勒、钱文逸:《论罗斯金, 或“刮的艺术”》, 载《新美术》2015年第36卷第2期, 第72-80页。]
- Panofsky, O. *The Meaning of Visual Art*. Translated by Zhiqiang Fu, 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1987. [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 傅志强译。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Ruan, Wei. *The Development of Rationality: An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Various "Philosophies" or Spiritual Forms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2017. [阮炜:《理性的开显——古典时期诸“哲学”或精神形态的考察报告》。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7。]
- Ruskin, John. *The Lamp of Beauty*. Edited by Joan Evans, Phaidon Press, 1959.
- . *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 The Electric Book, 1998.
- . *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 Translated by Li Xiang,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0. [罗斯金:《建筑七灯》, 离香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 Yang, Huilin. "Re-reading the 'Knowing' and 'Doing' between Epictetus, Matteo Ricci and Wang Yangming from Foucault." *Studies of World Religions*, no. 5, 2022, pp. 11-23. [杨慧林:《从福柯重读爱比克泰德、利玛窦、王阳明之间的“知”与“行”》, 载《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5期, 第11-23页。]
- Zhu, Liyuan, and Ming Li. "Reappraisal of the Aesthetic Thoughts of Giambattista Vico."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no. 4, pp. 86-93. [朱立元、黎明:《重估维柯思想的美学内涵》, 载《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 第86-93页。]

日本儿童文学杂志《赤鸟》的教养指导与教育实践

◎ 林子愉

内容提要: 日本儿童文学杂志《赤鸟》创刊于日本近代童话诞生期, 见证和促成了日本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历史转折点。《赤鸟》反对日本文部省的僵化教育模式, 从艺术、审美的视角创作童谣与童话, 为儿童认识世界和提升教养水平提供了机遇。杂志在帮助儿童获取丰富的知识、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养成良好读书习惯、增强国语表达能力、掌握作文写作方法等教育实践方面做出了实质贡献。杂志后期向“综合杂志”转型, 彰显了其想要提升国民整体教养水平的办刊理念。通过考察《赤鸟》与日本作文教育, 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近代日本作文教育模式, 为我国当代作文教育提供参考。

关键词: 《赤鸟》 铃木三重吉 作文教育 教养指导 教育实践 日本儿童文学

中图分类号: I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3-0078-09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4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3.008

Title: The Self-cultivation Guidance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the Japanese Children's Magazine *Akaitori*

Abstract: The children's literature magazine *Akaitori*, founded during the birth of modern Japanese *dowa*, marked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Japa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Akaitori* opposed the rigid education model of Japa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reated *dowa* and *doyo* from an artistic perspective. It provid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children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and improve their self-cultivation. *Akaitori* aimed to help readers acquire knowledge, establish correct values, develop good reading habits, enhance their Japanese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master composition writing methods. In the later period, the magazine transformed into a "comprehensive magazine", and this publication process also demonstrated its objective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national self-cultivation. Analyzing *Akaitori* and investigating composition education can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modern Japanese composition education model and inspire contemporary composition education.

Keywords: *Akaitori*, Suzuki Miekichi, composition education, self-cultivation guidance, educational practice, Japa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Author: Ziyu Lin,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自日本儿童文学杂志《赤鸟》创刊(『赤い鳥』,1918年7月1日)以来,日本学界对《赤鸟》的研究已经遍及语言学、文学、美术、音乐、教育、媒体研究等各个领域。其中,《赤鸟》杂志上的作文往往被当作日本生活作文教育运动的重要先导来进行讨论。国内学界对《赤鸟》杂志亦有所关注,主要成果有莽永彬《铃木三重吉与日本现代儿童文学》中对《赤鸟》概况的介绍,浅野法子《中日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平行比较研究——以中国〈儿童世界〉与日本〈赤鸟〉为核心》对郑振铎所编《儿童世界》与铃木三重吉所编《赤鸟》的平行考察,秦岚《与鸟飞翔——回望铃木三重吉与日本儿童文学杂志〈赤鸟〉》对《赤鸟》创刊史的系统研究,林子愉《日本儿童文学杂志〈赤鸟〉中的地藏形象变迁》对《赤鸟》童话中宗教形象的考察,王瑜《近代日本儿童文学杂志〈赤鸟〉中殖民话语的隐性书写》对杂志背后的殖民问题的关注等。^[1]由此可见,已有研究在介绍铃木三重吉文学与《赤鸟》的基础上,将视点聚焦在儿童文学、比较文学、宗教研究、殖民话语等具体问题上,但对《赤鸟》作文评选及《赤鸟》教育实际影响力的研究仍不充分,值得进一步探索。本文以《赤鸟》杂志及其投稿作文为研究对象,探讨杂志的教养指导理念,并通过考察“读者—杂志—学校”的多方互动,还原其教育实践的原貌,以期对我国作文教育有所启示。

一、教育与时局：儿童读物的批判性反思

铃木三重吉被称为日本儿童文化与文学运动之父,在其领导下发行于1918年至1936年的儿童文学杂志《赤鸟》旨在“为了孩子,去做漂亮的读物”,在日本掀起了被称为“赤鸟运动”^[2]的儿童文化运动。在那个鼓吹商业模式的年代,大众童话出版盛行。三重吉心怀对儿童的关切,主动承担起保护儿童童真的责任,希望能顺应儿童的天性,将艺术献给儿童。他对当时日本儿童读物的现状并不满意:“和西洋人不同,我们日本人悲哀的是我们还不曾有过一位为了孩童创作纯丽读物的艺术家。”^[3](宣传语,1918年)因此他想创办一份具有真正艺术价值的日本儿童读物。

《赤鸟》主要刊登童话与童谣,此外还设置了俗语、儿童剧、绘画、科学知识、作文选评、古事记物语、曲谱、读者通信等栏目,旨在为读者提供多方位的阅读体验。三重吉网罗了当时文坛的一流作家为《赤鸟》写稿,森鸥外、泉镜花、高浜虚子、德田秋声、岛崎藤村、北原白秋、小川未明、小宫丰隆、野上弥生子、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等人均有作品刊登在《赤鸟》上。芥川龙之介的《蜘蛛之丝》(「蜘蛛の糸」)、有岛武郎的《一串葡萄》(「一房の葡萄」)、菊池宽的《纳豆大战》(「納豆合戦」)、宇野浩二的《落下的神灵》(「落の下の神様」)、新美南吉的《小狐狸阿权》(「ごん狐」)、西条八十的《金丝雀》(「かなりあ」)等诸多原载于《赤鸟》的作品更是成为儿童文学的经典。《赤鸟》还征集并刊登儿童作文,通过作文评选活动

指导儿童写作。他主张让儿童写“原原本本”（直接看到、听到、思考到、感受到）的作文，培养其个性和创造性，提升儿童的写作表达能力。日本在“二战”后的1948年设立了“三重吉奖”，用来表彰优秀的儿童作文和诗歌，以此纪念三重吉通过《赤鸟》为儿童作文教育作出的贡献。

日本明治时期的儿童读物基本上是民间故事的改写或外国童话的翻译与改编。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原创儿童文学始于明治二十四年（1891）岩谷小波发表的《黄金丸》（「こがね丸」）。岩谷小波创办的《少年世界》（『少年世界』）也是明治时期具代表性的儿童文学杂志。此时的儿童文学被称为“御伽噺”（指讲给孩子们听的传统神话、民间故事等），也就是说，童话这一概念还没有正式确立下来。“御伽噺”的内容多为冒险故事、复仇故事，充斥着劝善惩恶的思想，是天皇制国家主导下的道德教化、娱乐与儒教思想混合的产物。进入大正时期，以铃木三重吉为首，关注儿童问题与儿童读物的作家不满足于儿童文学的状况，于是新时代的童话诞生了。此时，人们开始不再把儿童看作还未成熟的小大人，而是视其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赤鸟》以书写艺术性的童话与童谣为目标，“排除世俗的、卑下的儿童读物”（宣传语，1918年），倡导童心主义的价值观；创作内容追求平等、友爱、宽容、和平，并响应言文一致运动与写生文运动的理念，探索文章表达手法。这使日本儿童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外国童话改编和翻译之外，真正的原创童话不断增加。

日本近代“儿童的发现”这一历史进程将“儿童”从“大人”的概念中分离出来，由此催生了近代童话。柄谷行人认为，“儿童的发现”本质上是具有支配权的近代政府向国民灌输的一个强制性概念，是为推进其近代社会结构，甚至推行义务教育而人为创造的具有支配性的概念，而“儿童”这一概念的产生正是以儿童文学的出现为前提的（136-64）。在国民贫富差距悬殊与自由教育运动背景下的大正时代，《赤鸟》的出现具有反抗国家教育体制的自由主义目的。义务教育形成初期，日本政府严格控制学校思想道德教育，贫乏的教育读物中充斥着教化性，束缚了儿童的天性，限制了学校中的知识传播和学习。明治时期的教育基本上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注入式教育或以教科书为中心的教育为主。与之相对，大正自由教育运动中的教育家们以儿童为中心，摸索新的教育模式，开发儿童读物，为儿童认识世界和提升教养提供了崭新的机会。以《赤鸟》编辑者和童话作家为主的这群“为孩子着想的艺术师”，从艺术、审美的视角创作童谣、童话，为童心发声。《赤鸟》杂志逐渐进入家长和教师们的视野。王瑜指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经济优越的都市新中间层^[4]首先成为《赤鸟》的忠实读者，他们期待在提升自身教养的同时对孩子抱有厚望，因而《赤鸟》的儿童阅读背后投射出成人读者的教育意识（『赤い鳥』に関する研究」50-51）。“儿童—家长—学校”在此基础上产生联动，促进《赤鸟》教育功能的发挥。

二、作文与育人：重视生活与教养的《赤鸟》作文教育

铃木三重吉在《赤鸟》创刊前夕撰写了一篇题为《创作童话及童谣的最初的文学运动》（「童話と童謡を創作する 最初の文学運動」）的宣传广告，其中提道：“不用拘泥于文章的长短，不要写空想的内容，只需要如实地写下所见、所闻、所想，请一定要不断地寄给我们这样的文章。”三重吉认为当时市面上的儿童读物内容庸俗，行文机械，无法为儿童提供阅读参考和写作范本。“如实地写下所见、所闻、所想”已经透露出他主编《赤鸟》时追求事实和真情实感的文章观。1918年7月，《赤鸟》创刊号在卷首刊登了杂志创刊的6条标语，其内容与发刊前的宣传广告相互呼应，讨论了作文征集的标准问题：

○令《赤鸟》杂志自豪的不仅仅是内容、材料的纯净，就整本杂志的文章而言，都可以作为儿童作文的范本来使用。

○看看如今的儿童作文吧！至少也看看选拔儿童作文的标准吧！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被当今报纸、杂志、报导上的文章表达毒害甚深。《赤鸟》杂志上由铃木三重吉选出的“征集作文”，面向所有儿童和致力于儿童教养的人们，以及其他所有的国民，是真正提供作文鲜活例子的栏目。（宣传语，1918年）

由此可见，如何办好杂志与如何写好文章是两个密不可分的重要问题。杂志内容质量直接影响到儿童写作能力的提升，乃至教养的养成——此种养成并非局限于儿童自身，而是面向所有国民。《赤鸟》上刊登的所有文章都是以成为儿童作文的范文为目标的，因此作文写作的方法与技巧便成为《赤鸟》重点关注的问题。

来稿作文被刊登在每期最后的“征集作文”栏目上（选登小学至中学一年级的优秀作文），作文评选成为《赤鸟》的重要特色之一。据统计，《赤鸟》共刊登过1223篇儿童投稿作文（木下纪美子61）。杂志初期，每期会选登6~8页、约10篇以上的作文；复刊后每期会选登10~16页的作文。全盛时期，杂志一个月可以收到2000多篇投稿。大正时期，作文在学校教学中的分量很大，而《赤鸟》读者群中教师和家长占了很大比重。关注作文教育的教育者们推荐孩子阅读《赤鸟》上的范文并投稿，以此锻炼其写作能力。

有关《赤鸟》中涉及儿童作文的相关表述，除极少数出现的“作文栏”“募集作文”等表述以外，更多出现的是“缀方”一词，例如“募集綴り方”（征集作文）、“模範綴方”（模范作文）、“綴方研究”（作文研究）等。“缀方”这一表述体现的正是三重吉对作文教育的态度。明治三十三年（1900），文部省更订“小学校令”后，日本出现了“作文”与“缀方”二词混合使用的情况，虽然两者均有“儿童作文”的意思，但使用场景有所不同。“缀方”一词普遍被应用于学校教育的环境中，与日语国语教学的科目紧密相关，是随着读、写、听、

说的分科而出现的。而三重吉在编辑《赤鸟》时频繁使用的正是与国语教学相关的“缀方”一词，可见他所关心的也是作文教育问题。这种教育是脱离了国语教育学科制度以外的作文教育，所涉及的是作为儿童文化一环的作文素养养成问题。

对被评选上的优秀儿童作文，三重吉会给出自己的评审意见。在第1期第1号的最后，他这样说道：“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大家在写文章的时候都应该把所经历的事情和所感受到的东西用平常的语言如实地描写出来，至少这类文章是最应该受到表扬的。”（75）他所推崇的是不加虚饰的、纯朴的、如实的描写。明治时期的儿童作文多为对成人所写文章的模仿，大多是语句优美的美文，其中汉文、汉诗文、拟古文不在少数，整体上缺少真实性，没有生机。大正以后儿童作文的样貌与明治时期大为不同，写实变得尤为重要。三重吉这里提到的如实描写正是强调写实的重要性。此外，在创刊号最后的通讯栏里，三重吉对当选童话和落选童话做了一个整体评价。他认为好的童话、好的文章所表达的情感应该是纯朴、自由且抒发个性的；用平常的语言来表达感情，不加修饰，这些才是被选上的童话所具有的特质（77）。而落选的童话，词汇语言的选择往往很粗糙，缺少品位，感情夸张，带有说教性，故作修饰且表面华丽。三重吉还表示，不光是童话，所有的文章只要过度装饰就不是好文章。

三重吉对孩子们的作文有着自己的一套选拔标准，即推崇写生性质的生活作文，用写生文的理论来指导儿童写作，让儿童写生活中直接看到、听到、想到、感受到的东西，反对儿童模仿成人的笔触，也反对将理科和修身课上学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搬到作文里。三重吉的作文指导是对当时政府的作文教材《小学读本》（『小学読本』）中作文教学法的批判，他强调的是对自然、人物、生活等对象的直接描写。他认为，实事求是地描写是写好作文的重要条件，如何对描写对象进行真实的描写、正确地把握自己的心理活动至关重要，同时强调儿童写作过程也正是培养人格的过程。他把写作能力与儿童教养结合起来，认为如实地记录生活也是一种能力，写作训练可以让儿童更加细致地观察生活、感受生活。比起受到社会束缚的千篇一律的无个性文章，能够真实地传达自己生活与情感的文章才是三重吉所推崇的：

所谓作文，换句话说，是我们的后人基于感情表达及其想法表达的基本的表现方法，包含了其中全部的教养。自不必说，作文指导手法是否合适，直接对他们的实际生活与他们自身的文化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96）

三重吉因此还强调，作文不仅仅只是儿童写的文章，其背后还与儿童人格与文化涵养的培养有所关联。练习作文、写好作文与认真观察生活密不可分，需要写作者通过观察生活来描写真实的生活场景与生动的人际关系。儿童对待生活的态度会影响作文的品质，因此对

作文的指导也是对生活的指导。

此外,三重吉还指出,作文并不是“文艺主义”,而是“人的教育主义”,作品的价值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文艺价值,但其育人作用也不容忽视。作文反映的不仅仅是文章写作方法等技术层面的问题,同时也是儿童的价值观念通过语言表达呈现出来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儿童的内在教养。

三重吉于1935年出版了单行本《作文读本》(『綴方読本』),系统地总结了她的作文指导方法。这本书直到今天仍是日本作文指导的基础性书籍。

三、杂志与读者:教养指导与教育实践的双重影响

随着《赤鸟》对童话、童谣与儿童画的广泛征集,作家和读者们纷纷响应号召,投入文学创作,由此迎来了被称为“教养实践”的童话、作文、童谣、儿童画的创作热潮(赤い鳥事典編集委員会 20-21)。读者在阅读与欣赏杂志作品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杂志所带来的艺术性熏陶,继而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创作文学和艺术作品。《赤鸟》形成了一个从阅读到写作的循环,通过让读者练习写作的方式实现了作品内容的“内面化”,在教养指导与教育实践上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当我们关注《赤鸟》的读者栏时可以发现,《赤鸟》在唤起儿童的阅读热情、帮助其养成阅读与写作习惯上做出了努力。如杂志第2卷第6号上刊登了一位来自福岛的小学生的来信:“我从第一期开始就是《赤鸟》的忠实读者。因为在东京的哥哥告诉我这是一本好书,而且每个月都会寄来给我看。”(72)同期还刊登了一封家长的来信:“我很早就想要一本能作为范本的童话文学杂志。我有三个妹妹。至今为止她们读的都是庸俗的少女杂志,或是埋头于冒险故事和低劣的催人泪下的少女小说。但自从《赤鸟》出现后,三个人都会反复读《赤鸟》。”(76-77)家长订阅《赤鸟》,他们将杂志上的文章读给孩子听或推荐给孩子阅读。《赤鸟》为儿童带来了自主阅读的快乐,在修养身心、提升阅读水平等方面也有所助益。

其次,很多学校或是教师也是《赤鸟》的长期订阅者。如杂志第9卷第3号的通信栏刊登了一位山形县教师的来信,文中提到地方上的教师自己购买杂志,在教室里设置读书区,通过轮流读杂志的方式解决了班上贫困孩子的读书问题(105)。这不仅减轻了孩子家里的经济负担,也帮助他们养成了日常读书的习惯。可见《赤鸟》受到了教育工作者的欢迎和支持。

家长与教师一方面将《赤鸟》作为文学读物推荐给孩子阅读,另一方面也将《赤鸟》作为作文写作的范本推荐给孩子参考。第3卷第1号读者栏刊登了一封爱知县读者的来信,文中提道:“我弟弟今年三年级了。在学校里只写过一两次作文,他强烈要求说‘我要写作

文’。虽然现在写得还不行,但我想这期间应该会有所长进,所以决定让他往《赤鸟》投稿试试。”(76)第3卷第3号上刊登了一位来自长野县的教师的来信:“去年一整年,听取铃木先生的意见后对一年级学生的作文进行了指导。五十位同学几乎每天都写作文,我每天也会看他们写的文章。在我们学校,五年级以上的女学生都会传阅《赤鸟》。”(78)《赤鸟》的作文指导与学校教师的现场指导二者完美结合,杂志编辑和教师都希望孩子能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通过使用优秀读物提升孩子的教养。

投稿作文经过三重吉的修改,题目和内容质量都有了一定的提升。三重吉认为作文题目应该直观地体现文章内容,因此他在改稿时会给作文建议更恰当的标题。如第2卷第2号刊登了一篇名为《小时候》的作文(72)。这篇作文如实且生动地描绘了作者的亲身经历,没有多余的修饰,因而被选为优秀作文。但从作文题目来看,读者无法从中提取文章信息,因此三重吉将其修改为《脸上的伤疤》,以突出主题。在描写层面,三重吉反对过多的修辞,如第3卷第4号的作文评语中,他举例说明投稿作文在描写露珠时使用了“水晶般的露珠”“像黄金般闪烁的露珠”的修辞手法,认为是不可取的,通过更加细致的观察,如实记录下露珠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模样即可,不必过度修饰(74)。

通过读者栏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大多数来信都出自成人读者,读者栏因此成为杂志与家长、教师对话的渠道。《赤鸟》希望听取他们关于孩子的建议与想法,希望他们能来稿谈谈自己与孩子对杂志的评价和要求,甚至孩子成长过程中值得纪念的事情也是征稿所欢迎的内容。从这种对话方式可以看出,在接受意见这个方面,比起与孩子直接对话,《赤鸟》更重视作为监护人的成人的意见,更希望从成人的视角获得孩子的成长信息和对杂志的评价。后期的《赤鸟》还走上了家庭杂志的道路。从第21卷第6期(1928年12月)开始,封面上新增了“家庭杂志”一词,向“面向家庭的儿童艺术科学杂志”即“综合杂志”转型。而“家庭杂志”这一标签为了在稳固儿童读者群体的同时,努力争取更多的成人读者。

随着《赤鸟》忠实读者的不断增加,读者不再局限于书面交流,而是进一步通过各类线下活动交流阅读感想。这种线下交流让孩子、家长和教师共同构成读者团体。第3卷第1号的读者栏刊登了一位埼玉县教师的来信,文中提到该教师经常与当地儿童一起参加教会举办的童话会,这些孩子都是《赤鸟》的忠实读者(73)。奈良市县立师范学校的一名教师来稿称,自己在当地以《赤鸟》童话为资料举办了有关童话的演讲会(78)。杂志第17卷第2号上刊登了一名杂志会员的来信,其中提到十几人在家中举办歌唱会的情景(148)。根据以上投稿可以看出,忠实读者自发组建了研究会、童话会、歌唱会等线下活动,这意味着《赤鸟》读者已经开始超越杂志投稿栏的限制,通过线下交流获得了全新的读者体验。

最后,《赤鸟》还帮助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教师。能在《赤鸟》上刊登作品,不仅是孩子和家人的荣誉,也是对教师的鼓励。中谷泉提出,《赤鸟》的投稿栏成为教师展现文学热情的场所(40)。《赤鸟》投稿中不难见到教师们不懈努力的身影。如杂志第3卷第5号上登

载了一位长野县老师的投稿：“我去年指导的学生五味重郎，他的作文两次入选了《赤鸟》，与其说是高兴不如说令我感到惶恐 [……] 要不加修饰地书写，我常把这句杂志的标语放在嘴边。”（78）自己指导的学生作文入选并被刊登在杂志上，不仅是对孩子写作能力的认可，也是对教师指导能力的嘉奖。教师们还将《赤鸟》当作儿童教育甚至外语教育的教材使用。杂志刊出的芥川龙之介的《蜘蛛之丝》、菊池宽的《纳豆大战》等经典作品还被收录进《小学文艺读本》（『小学文艺読本』）等课外读物当中。为放学后的儿童提供了丰富可靠的阅读资料。为了孩子们的教育，每位教师都必须自觉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和教养水平。

《赤鸟》也为年轻作家的创作实践提供了新的平台。新人作家通过阅读《赤鸟》获得写作热情，经过反复的创作、修改、投稿等写作实践，为成为未来的知名作家、诗人开辟了道路。坪田让治、新美南吉、与田准一、巽圣歌等人都是因向《赤鸟》投稿而成名。

《赤鸟》的出现是大正民主运动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全面阐释。杂志顺应了大正民主运动的风潮，基于当时的儿童教育和社会文化现状办刊，最终成就于日本儿童文学的诞生期。明治以前的儿童教育仍是以教师和教科书为中心的机械式教育，儿童读物的内容以道德教化为主，作文多是对范文的模仿。《赤鸟》正是在反抗明治教育的过程中践行其教养理念和开展教育实践的。然而《赤鸟》并非是对新时代读者的简单迎合，而是努力发挥杂志的引领作用，让读者去欣赏新杂志、接触新理念、接受新教育。儿童教养的提升是《赤鸟》的办刊追求之一。杂志创办者希望儿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养成读书习惯，增强表达能力，掌握写作方法，获取丰富知识。因此，这些都成为《赤鸟》的教育内容。

以“读者投稿—编辑修改—作品评选”为模式的《赤鸟》投稿栏刊登了大量儿童原创作品，走上了作文写作指导的教育实践道路，并以此形成了“儿童—家长—学校”的联络网，在杂志与读者之间形成较为理想的关系。《赤鸟》对儿童的阅读培养与写作指导并不局限于教育内部，而是涉及日常生活中的儿童教养与文化涵养问题，与学校教育形成良好联动。《赤鸟》扩大了教育人士的视野，培养了新时代的儿童，使日本国民对艺术杂志与自由教育有了崭新的认识。此外，《赤鸟》作为儿童读物，也让成人读者从孩子身上收获了对自我教养提升的期待。可以说，《赤鸟》既以儿童读者为对象，又充分利用了其背后的成人读者。在与《赤鸟》互动的过程中，家长接受新的教育理念，教师走上了作文教育实践的道路，其中一些人甚至成为儿童教育家和知名作家。走上家庭杂志道路后的《赤鸟》所做的不仅仅是对家庭教育的反思，还希望提升国民教育的自觉性与责任感，期待能培养大正民主氛围下讴歌自由、有教养的新市民。难能可贵的是，《赤鸟》中所收录的优秀作文也被当作写作范文来使用，杂志所编童话还被收入当代日本的小学教材和课外参考读物中。这不仅仅是一个只属于大正时代儿童的文艺世界，同时也深深吸引并影响着后世的读者们。

本文所展现的《赤鸟》杂志中的作文教育理念及其实践，不单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日

本作文教育模式，亦对当代中国的作文教育有所启示。借鉴《赤鸟》有关作文指导的办刊模式，可以推动“儿童—杂志—教师”的多重互动，课外教育与学校教育形成互补，让我们对儿童写作能力的提升、优秀儿童杂志的刊出、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都抱有更多的期待。

注释 [Notes]

- [1] 参见莽永彬:《铃木三重吉与日本现代儿童文学》,载《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第36-40页;浅野法子:《中日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平行比较研究——以中国〈儿童世界〉与日本〈赤鸟〉为核心》。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8;秦岚:《与鸟飞翔——回望铃木三重吉与日本儿童文学杂志〈赤鸟〉》,载《十月》2018年8月,第128-39页;林子愉:《日本儿童文学杂志〈赤鸟〉中的地藏形象变迁》。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8;王瑜:《近代日本儿童文学杂志〈赤鸟〉中殖民话语的隐性书写》,载《广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第174-82页。
- [2] “赤鸟运动”是由铃木三重吉发起的儿童文化与文学运动,该运动以《赤鸟》杂志为阵地,以童心主义价值观为指导,旨在提高儿童文学的质量。《赤鸟》杂志以儿童为中心,发表了大量具有艺术性的童话与童谣,对儿童个性的解放与儿童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这一运动对学校教育中的作文教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生活作文教育运动的先导。
- [3] 本文有关《赤鸟》杂志的引用均出自『赤い鳥』CD-ROM,東京:大空社,2008年。译文为笔者译。后文直接注明页码,不再另做说明。
- [4] 日本新中间层是大正时代出现的新中产阶级,他们普遍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包括公务员、教师、警察、记者、公司职员等人群。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Karatani, Kojin. *The Origin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Jinghua Zhao, Central Compilation Press, 2007.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 Kinoshita, Kimiko. “Study on Early Composition of *AkaiTori* (‘Special Edition’ New Image of Japanese Language Teachers).”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1972, pp. 61-68. [木下紀美子:『赤い鳥』初期綴り方作品研究(〈特集〉新しい国語教師像)],『国語科教育』,1972年,第61-68页。]
- Nakatani, Izumi. “From *AkaiTori* to *Composition Classroom*: Intermediary Term of Teacher.” *Nihon Bungaku*, 2004, pp. 36-46. [中谷いづみ:『赤い鳥』から『綴方教室』へ:教師という媒介項,『日本文学』2004年,第36-46页。]
- The Akaitori Dictionary Editorial Board. *Akaitori Dictionary*, 2018, pp. 20-21. [赤い鳥事典編集委員会編:『赤い鳥事典』。東京:柏書房,2018年,第20-21页。]
- Wang, Yu. “A Study on *AkaiTori*: An Aspect of Japanese Original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Taisho Era.” *Doshisha Kokubungaku*, no. 69, 2008, pp. 43-57. [王瑜:『赤い鳥』に関する研究—大正期日本創作児童文学の一側面として—,『同志社国文学』2008年,第43-57页。]

◇责任编辑:吴晋先

从城市到乡村: 本·琼生城市喜剧和乡村庄园诗中的共同体想象

◎ 吴美群 方耀

内容提要: 英国文学有着历史悠久的共同体书写传统。不同文学家书写共同体的形式各不相同, 这在社会观念转型时期尤为明显。文艺复兴时代, 英国正处于从中世纪农业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转型的重要阶段, 剧作家本·琼生从城市与乡村两个维度围绕转型中的英国展开了共同体想象。他在城市喜剧中虚构了一个反讽的城市共同体, 批评了彼时现实共同体分崩离析的状况, 随后在乡村庄园诗中延续了对城市共同体的批评, 并虚构了以庄园主美德为基础的乡村庄园共同体, 缓解了转型时期的阶级冲突和市民身份焦虑, 为早期现代英国国家转型提供了古典神话式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乡村庄园诗 城市喜剧 共同体 本·琼生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3-0087-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本·琼生作品中的共同体思想研究”(19YJC752035); 安徽省高等学校科研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瓦尔登湖》中的新物质主义自然书写研究”(2022AH050864)

作者单位: 长沙学院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22; 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6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3.009

Title: From the City to the Country: Community Imagination in Ben Jonson's City Comedies and Country House Poems

Abstract: There is a long-standing tradition of community writ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 Writers are particularly active in imagining diversified communities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During the Renaissanc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medieval rural to modern urban civilization, the playwright Ben Jonson, feigns communities different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ity and country. In his city comedies, Ben Jonson imagines realistically an ironic city community, criticizing the split of real community. In his country house poetry, Ben Jonson continues to criticize the split city community and fictionalizes a friendly community of country house by eulogizing the host's hospitality, easing the class conflicts and identity anxieties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 and providing a classical mythological solution for the early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England.

Keywords: country house poems, city comedies, community, Ben Jonson

Authors: Meiqun Wu,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Yao Fang,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China.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剧作家本·琼生 (Ben Jonson) 曾在其散文中提出:“诗人如同政治家一样, 可以创造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feign a commonwealth]。”(*Discoveries* lines 729-45)^[1] 表达了明显的共同体意识。他在城市喜剧和乡村庄园诗中展开了不同形式的共同体想象, 从乡村与城市两个维度实现了对 17 世纪初“英国形象” (*Every Man in His Humour* Pro 23) 的想象性建构。本·琼生在城市喜剧中建构了一个以基督教牧领治理为基础的城市共同体, 在乡村庄园诗中虚构了一个以古典美德为基础的乡村庄园共同体。两种维度的共同体想象是本·琼生诗学思想与政治理想自觉结合的体现, 表达了诗人在英国性的想象性建构中对古典—希腊传统和希伯来—基督教传统的继承与融合, 并试图借助“两希”传统解决转型时期的英国早期现代危机, 以履行诗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西方的共同体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The Republic* [Πολιτεία])。英语中的“共同体”一词首次出现于 1395 年, 意指“人们的普遍性; 人们作为一个群体”。然而, 共同体是一个不断被重新定义的概念, 是“一种不断协商的关系”(Muhleisen xii-xiii)。米勒 (J. Hillis Miller) 认为, 共同体是“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一群人, 他们彼此都认识, 并共享关于文化的设想” (176)。滕尼斯 (Ferdinand Tönnies) 提出血缘 (blood)、地缘 (place) 和心缘 (mind) 为共同体的三大支柱 (42)。德兰蒂 (Gerard Delanty) 则提出“逝去的共同体”“可复归的共同体”和“尚未实现的共同体” (19-20) 三种共同体形态。共同体“与既定秩序的关系可能是肯定的或颠覆性的; 它们可能是传统的、现代的, 甚至是后现代的” (2)。

共同体书写在社会转型时期非常活跃, 维多利亚时期如此, 文艺复兴时期也不例外。文艺复兴时期既是英国从中世纪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时期, 也是社会观念流变的重要时期。人们深受传统农业文明向资本主义商业文明转型所引发的“现代性焦虑”之苦。正如德兰蒂所言, 现代性的兴起导致了传统共同体的危机, 激发文学家们进行不同形式的共同体想象。莫尔 (Thomas More) 在《乌托邦》(*Utopia*) 中虚构了一个没有冲突的乌托邦共同体; 斯宾塞 (Edmund Spenser) 的《仙后》(*The Faerie Queene*) 和西德尼 (Philip Sidney) 的《阿卡迪亚》(*Arcadia*) 则虚构了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共同体。由此,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中逐渐形成了一股具有浪漫特征的乡村共同体想象潮流, 有如滕尼斯的回溯式或怀旧式共同体,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现代性”和“国家的批评” (Delanty 2)。本·琼生也在其乡村庄园诗中通过赞美恩主 (patron) / 庄园主虚构了一个以古典美德为基础的“同一共同体” (community of the same; Ramsay 118), 与文艺复兴晚期英国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文明形成对照。

本·琼生乡村庄园诗中的共同体想象与城市喜剧中的共同体密切相关。他在《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 中虚构了一个以基督教牧领治理为基础的城市共同体, 披露了 17 世纪初英国现实共同体分崩离析的现状。在这之后, 本·琼生在乡村庄园诗《致潘舍斯特》(“To Penshurst”) 和《致罗伯特·罗斯爵士》(“To Sir Robert Wroth”) 中延续了对城市共同体的

批评，同时虚构了一个古典式的友谊共同体，以歌颂贵族/庄园主的美德为基础，表达了对古典农神时代的怀念，塑造了向内聚合的共同体，展开了与城市共同体的对话并为其危机提供了神话诗学般的解决方案，从而激发了英国人的共同体热情。从城市喜剧中的基督教牧领共同体到庄园诗中的古典友谊共同体，本·琼生在其创作中既展现了早期现代英国文明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型及其曲折，也表现了转型过程中城市与乡村的对话。

一、城市喜剧中的基督教牧领共同体想象

根据福柯的理论，“现代[西方]国家是建立在两种政治模式的基础之上的：希腊的城邦—公民制度和基督教的羊群—牧领制度”（转引自周慧 92）。牧领（le pastorat）概念来自希伯来传统。希伯来神如同牧羊人一样带领着人们，因此基督教牧领治理的关键是对人类精神和行为的指导。福柯的观点道出了基督教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在欧洲并存的局面。实际上在整个西欧，二者的冲突与融合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未曾中断，并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高潮。本·琼生热衷于钻研古典传统，但又深受本土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因而在其创作中自觉将二者进行了融合。《炼金术士》虽沿用了希腊城邦共同体范式，但主要以基督教牧领治理为基础，对转型中的早期现代资本主义英国进行了讽刺性虚构。

《炼金术士》是一部关于城市边缘者利用瘟疫和自由区的便利条件，通过炼金术骗取伦敦市民财产的讽刺喜剧。洛夫威特为了躲避瘟疫而逃离位于黑衣修士区的房产，留下仆人杰里米看守房子。杰里米伙同江湖骗子萨托尔和妓女多尔在洛夫威特屋内组建了一个临时的“三人集团”。他们打着炼金术的幌子，将迷信炼金术的伦敦市民引诱至屋内以骗取他们的财物。在此过程中，伦敦市民的愚蠢贪婪和唯利是图被揭露得一览无余。几番戏弄之后，屋主洛夫威特归来，“三人集团”瓦解，炼金炉灰飞烟灭，一切复归原位。

“三人集团”从多方面体现出共同体的特征。首先，集团成员多尔的名字 Dol Common 有明显的共和国/共同体隐喻意义。见萨托尔和费斯争吵，她批评两人道：“你们想挑起内战毁了我们吗？”（*Alch.* 1.1.83）“内战”为“三人集团”打上了古典城邦共和国的烙印，萨托尔是“执政官”（Sovereign），费斯是“长官”（Captain），而多尔则成了共和国的象征。当两人争吵升级，多尔气急败坏地说：“我们毁了！你们不再关心自己的名誉了吗？你们的判断力哪里去了？安静！再关心一下我可以吗？你们的共和国。”（1.1.108-10）乍一看，“三人集团”似乎是一个建立在名誉和道德基础上的古典城邦共同体，但它们的争吵和多尔对于“内战”的担忧预示了临时共同体的裂缝和它最终坍塌的结局。

临时共同体形式多变，在进一步争吵中转变成了资本主义商业共同体。多尔的劝解让读者逐渐明白两人争吵的原因是利益不均。多尔责备两人：“我们不应该按照平等原则吗？我们这个三人集团/共同体 [venture tripartite]？我们不该所有物质共有吗？谁能享有优先

权?”(1.1.134-36)在此,古典城邦共同体静悄悄地转变成了以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商业共同体,炼金术也成了多尔言语中的商业行为(1.2.67)。萨托尔称屋子主人为“墨丘利”(Mercury),暗示炼金屋是由商业神墨丘利掌管商业王国,一个主要通过商品和货币联结起来的商业共同体。这从喜剧中琳琅满目的异国商品和货币可见一斑,其中既有“来自霍尔木兹海峡的船,会带来烟草之类的商品”(1.1.59-60),成为市民们竞相追捧的消费品,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货币,如荷兰货币(dutch dollars; 3.2.145)、西班牙金币(pistolets; 3.3.15)、葡萄牙金币(portague; 1.2.85-87)等,更有各种各样的英国货币。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货币聚集在洛夫威特的炼金屋,使之成为一个跨越时空的商业货币共同体。

不管是古典城邦共同体还是资本主义商业共同体,“三人集团”建构的基础离不开炼金术,更离不开基督教。临时共同体对其他成员(伦敦市民)的吸引也是基于炼金术和基督教牧领治理术的结合。正如鲁斯特(Jennifer R. Rust)所说,《炼金术士》揭示出炼金术本身构成了一种治理形式——基于修道院和炼金术基础的基督教牧领治理形式(99)。喜剧的主要人物炼金术士在脱离官方管辖的自由区(Liberties of London)虚构了一个临时的基督教牧领共同体,试图借助炼金术话语实现对伦敦市民的精神净化和道德教育。

首先,《炼金术士》的演出背景有浓厚的基督教因素。该剧由国王供奉剧团(The King's Men)在黑衣修士区(Blackfriars)的私人剧院演出。历史上的黑衣修士区从1270年到1538年一直是多米尼克修道院的所在地。修道院关闭之后,此处成了伦敦自由区。自由区虽然位于伦敦市内,却不属于伦敦的官方管辖范围。《炼金术士》在黑衣修士区上演并非偶然,昔日的修道院成了今日的自由区,不仅为因瘟疫而关闭的剧院提供了许可证,也为炼金术士萨托尔对伦敦市民进行行为和精神指引提供了便利。瘟疫、自由区、修道院、剧院的多重背景为喜剧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阈限空间。剧院原本就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塑造了人们对空间的感知,包括观众空间、剧院空间、虚拟表演空间和城市空间”(Stage 18)。这使得戏剧带上了明显的实验性质:它能够使用或暂停城市的规则,从而在舞台上重新建构了一个伦敦、一个想象的城市共同体。

萨托尔一面用炼金术话语指挥费斯等人进行物质提纯,以实现贱金属向贵金属(黄金)的转化;另一面,又用基督教话语对“羊羔们”进行精神“关怀”和规训。正如萨托尔对费斯所说:“你这害虫,我把你从粪堆里拯救,你如此卑贱可怜[……]我把你从尘土和污水中唤醒,让你得以升华,在这个典雅的第三空间,用心经营你的精神/精髓吧,让我得以两次完成哲学家的。”(Alch. 1.1.64-71)此时的炼金术士更像一个牧师或哲学家,他强调的“精神”(quintessence)既指炼金术的精髓,也指人的精神/灵魂。萨托尔的拟人化炼金术语犹如基督教牧领话语,表面上指导的是金属提纯,实际上表达了拯救市民灵魂的愿望。牧领炼金术士按照基督教神的计划运作,指导自然从不完美过渡到完美状态,也指导人类灵魂从低贱升华至高贵。在“三人集团”建构的临时共同体中,萨托尔通过牧领治理原则

既将费斯“团结”起来，也把八位伦敦市民吸引到共同体之中。萨托尔和费斯一方面引诱客人们投入贱金属（钱币）以获得贵金属（黄金），另一方面从精神上将其驯化。如费斯引导市民达珀时说：“你要发誓，——你追随仙后。”（1.2.125-27）吩咐他“必须斋戒，滴醋三滴在鼻子上”（1.2.165-68）。其余市民也大多为炼金术而来，每个人都按要求遵循基督教的虔诚信仰，因为“炼金术士必须是一个虔诚、神圣和信教的人”（2.2.97-99）。和费斯一样，他们在炼金的同时，也遵从牧师的精神指引和道德教育。此时的共同体是一个以基督教虔诚美德为基础的思想共同体，无论是创建者还是参与者，都主动或被动地遵循着基督教的牧领治理术。就连主人洛夫威特归来后也自愿服从术士们的规则，对仆人说：“我愿意接受你对我任何事情的指导，杰里米。”（5.5.143）洛夫威特最终之所以能获得财物和年轻的妻子，成为炼金术最大的赢家，恰恰也因为他服从了炼金术士/牧师的指挥。

可见，炼金屋内的临时共同体既有古典城邦共同体的痕迹，也有对早期资本主义商业共同体的想象，更是一个基督教牧领治理下的思想共同体，旨在挽救城市的道德危机。然而这又是一个难以作为的共同体，或者说是基督教牧领共同体的滑稽模仿。随着炼金炉的烟消云散，“三人集团”解散，共同体坍塌了。不作为的共同体实现了对17世纪初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现实的讽刺性观照：多尔对“内战”的隐忧巧喻了即将到来的英国内战；共同体的坍塌既影射了彼时英国现实共同体分崩离析的状态，也微妙地影射了早期现代英国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中，基督教在拯救市民道德和城市危机方面的无力。17世纪初期的伦敦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商业中心，物质享乐主义和资本逐利主义的盛行深刻影响了市民的道德与文化观念，进一步引发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社会的道德焦虑，而瘟疫的暴发更加剧了城市的弊病和道德危机。这些危机助推了即将到来的英国内战。

《炼金术士》中的基督教道德教育意义不言自明，体现了本·琼生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家国情怀。然而，借用炼金术的话语模式进行基督教牧领式的道德教育似乎又表达了他对该模式的不自信。炼金术士不曾为市民带来财富，隐藏在术士身份背后的牧师身份也没能真正实现对市民精神的指引和灵魂的拯救。我们不难理解本·琼生在第四幕第五场借多尔之口道出的创作初衷：“我们喊来拉比和异教的希腊人[……]从耶路撒冷和雅典喊来教育大不列颠的民众。”（*Alch.* 4.5.10-14）本·琼生试图借助古希腊异教传统弥补希伯来基督教传统在教育英国民众方面的不足，这一诗学理想在其随后的乡村庄园诗中得到延续。而他对基督教牧领共同体的不自信最终让位于乡村庄园诗中的古典共同体展望。

二、乡村庄园共同体建构：古典农神时代的诗意回归

英国拥有悠久的庄园文学传统，庄园常被当成文学想象和身份认同的文化场域，并逐渐演变成英国人实现共同体认同的符号象征。十六、十七世纪的乡村庄园诗是一种赞美

诗，主要赞美贵族庄园的美好与庄园主的美德。代表诗人除本·琼生外还有卡鲁（Thomas Carew）、马维尔（Andrew Marvell）、赫立克（Robert Herrick）等。庄园诗中的乡村庄园超越了物质的存在，传递着富有深意的文化信息，成为美德、和谐与秩序的象征。本·琼生的《致潘舍斯特》和《致罗伯特·罗斯爵士》以歌颂庄园主美德和乡邻友谊为基础，书写了17世纪初的英国乡村共同体。

英国文艺复兴文学中的共同体想象深受古典共同体思想的影响，尤其强调共同体的友谊基础，而这正是亚里士多德共同体思想的核心要素。亚里士多德认为，“友谊构建社会的凝聚力更广泛”，“友谊的基础是共同体”，“友谊把共同体联结起来”（201, 215）。受此影响，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也强调共同体与友谊的联系，无论是以书信和手稿交换为基础的共同体，还是以情感为基础的文艺复兴女性共同体，都离不开友谊的因素。本·琼生的乡村庄园诗通过强调庄园主和乡邻们之间的友谊，尤其是庄园主对乡邻的慷慨与热情虚构了一个和谐的乡村友谊共同体。

庄园主们如同宫廷假面剧中的国王，是古典式的“集中式自我”（centered self），代表着“秩序、稳定和供人依靠的源泉”（Greene 327），也是美德与理性的典范。庄园主慷慨热情的品德影响着乡邻，大家和睦大方，携礼而来，“毫无惧怕之感”，和庄园主一起“吃肉喝酒”，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好似“主人和宾客共同拥有庄园里的一切”（“To Penshurst” 60-64）^[2]。富庶宁静、邻里和睦的乡村庄园变成了一个建立在主人热情美德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庄园里物资源源不断自动产出，不见劳动者的辛勤劳作，也没有等级秩序，没有剥削。“共同拥有”显然不是对英国当时乡村的现实主义描写，也不是对英国未来乡村的理想构思，而是对“自然秩序”的回望，是对古典黄金时代的怀旧，更是对当时英国资本主义高速发展而形成的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现象的不满，以及对因此滋生的城市道德危机和思想危机的忧虑。

乡村庄园共同体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其一是自然产出的丰富物资，其二是主人的慷慨美德。《致潘舍斯特》和《致罗伯特·罗斯爵士》两首诗都描述了乡村庄园中丰富的物产，它们并不是劳动的成果，而是自然的产物。如“河岸盛产兔子”，“地里盛产斑点野鸡”，“田里到处都是斑斓的山鹑”，它们“自愿被宰杀供你食用”，“装点你丰盛的餐桌”（25-30）。庄园里的物产除了有飞禽走兽和鱼类，也有各种水果和花草，“早熟的樱桃和晚熟的李子”，“红红的杏和毛茸茸的桃，挂在你的围墙上，每个孩子都能够得到”（41-45）。“每个孩子都能够得到”再一次让人回归到“一切共有”的“黄金时代”，庄园里的物产不是“劳动者”的辛勤劳动，而成为“自然秩序”的结果，是自然神或者农神的馈赠。本·琼生对阶级对立和资本因素的回避，或许是因为他试图规避或者美化17世纪英国的阶级矛盾，同时也离不开他对古典农业共同体的怀念与寄托。

本·琼生同样美化了庄园围墙。他没有交代围墙是何时由何人所建造，对围墙的防御与隔离功能视而不见，而是强调围墙并不妨碍主人与乡邻们的友谊与和谐，围墙内外因为

主人的慷慨与热情而亲密无间。“没人希望围墙倒塌”，因为“它从不造成任何人的毁灭和痛苦”（45-48）。乡邻们成群而来，个个手捧美食，为庄园主的餐桌添色，但乡邻们带来的食物远远比不上庄园主免费提供的盛宴，也“难以表达他们的爱慕之情”（57）。他们都深知主人的慷慨，“所来皆客人，都可以无所拘束地享受主人的美食和美酒”（60-65）。正如山珍是自愿被宰成为餐桌上的佳肴，鱼儿会主动跳上渔夫之手，果子会自动挂满枝头，庄园本身也仿佛是自然存在，而非工业文明的产物，不带来隔阂和不平等。物产和庄园本身均来自众神的馈赠，尤其是农神萨杜恩（Saturn）、自然/畜牧神潘（Pan）、树神德律阿德斯（Dryads）等。乡村庄园化身成农神统治下的黄金时代。

通过对物产和庄园的神话式产出和建构，本·琼生笔下的潘舍斯特庄园成功地脱离了庄园作为农业资本主义象征的刻板印象，成为一个理想化的乡村共同体。它是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对立面，是一种怀旧，一种看向农神时代的诗意回归。这不禁让人想起德兰蒂对早期现代英国农业共同体的阐释。他认为前现代时期的农业共同体是“自然意志”所造，是一种往后的回归式共同体；强调乡村道德观的重要性，体现了也对现代性的抵制与批评，是一种试图脱离国家和批评国家的乌托邦共同体（10-11）。本·琼生在庄园诗的结尾延续了其城市喜剧对城市陋习和道德危机的批评，且他在诗歌开头便通过古代与现代的对比，凸显了古典共同体的美好，反衬了现代（城市化）的腐败。

《致潘舍斯特》开篇便指出了庄园与其他大厦的区别：“你的宅院不为炫耀，也不为彰显闪耀光滑的大理石柱，又或者金光闪闪的黄金屋顶，这里的故事无关旋梯、庭院、灯塔。你的庭院自远古以来便巍峨耸立，受人景仰，而不似其他大厦引人嫉恨。泥土、空气、树木和流水将你装扮得更加美好。”（“To Penshurst” 1-8）诗歌开头的对比非常明显，在诗人笔下，潘舍斯特庄园是古典建筑的典范，与现代建筑截然不同。前者代表的是自然秩序，而后者则带有明显的人为痕迹，不难让人联想到“理性选择意志”所造的现代建筑。在古典与现代的张力之中，本·琼生显然选择了前者，并委婉表达了对现代建筑的批评与讽刺，因为它们大体是为“卖弄”和“炫耀”而建，势必会引发矛盾和“嫉恨”。在诗人看来，潘舍斯特庄园是古典农神统治下的乡村文明共同体，与之相对的则是承载着早期现代英国政治和经济思想的城市与宫廷。

这种对比在姐妹诗篇《致罗伯特·罗斯爵士》的开头得到进一步证实：“尽管城市和宫廷近在咫尺，庄园却不受两者恶习和享乐主义的玷污。”（“To Sir Robert Wroth” 1-4）显然，以庄园为代表的乡村文明成了城市文明的对立面，相较于城市的堕落和腐败而言，乡村是宁静、纯真和美德的化身，这里没有贫穷、痛苦、剥削，没有你我之分，是自然意志治理下的前现代农业共同体。其他大厦由“傲慢”与“野心”堆砌而成，是在理性意志支配下建造而成的现代建筑，而“老爷您是栖居在[这座]庄园”（“To Penshurst” 101-102）。本·琼生通过“建造”（have built）和“栖居”（dwells）区分了城市大厦和潘舍斯特庄园的不同，

前者清楚表达了其他大厦并非主人亲自所建，而是雇人建造。“傲慢”和“野心”或多或少暴露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资本主义背景下的阶级傲慢和剥削本质。相比之下，潘舍斯特庄园则如园中物产一样，是自然秩序的产物，主人一直诗意地栖居于此，“它不造成任何人的毁灭和痛苦”（45-48），也不引起任何人的抱怨。

在《致潘舍斯特》结尾，城市与宫廷的登场把读者拉回到17世纪的现实英国，也拉回到城市喜剧中对城市“恶习”的披露。本·琼生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刻画了17世纪的伦敦市民形象，对城市的弊端和市民的陋习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如前文所述，《炼金术士》虚构了一个反讽的城市共同体，展现了深陷道德危机和瘟疫困扰的现实城市——伦敦，并通过借用炼金术话语对市民进行了基督教牧领式的道德劝诫和精神指引。遗憾的是，喜剧结尾炼金炉的坍塌隐喻了临时城市共同体的无效，也影射了基督教道德共同体在文艺复兴晚期英国的乏力，进一步暗示了彼时英国政治局势和文化观念的复杂与矛盾。

17世纪初期的英国是一个矛盾重重、危机频繁的多重体，有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矛盾，有英格兰和爱尔兰、苏格兰等地之间的胶着，还有城市商业资本主义同封建农业经济之间的拉锯。詹姆斯一世一心想统一不列颠，采取了各种措施激发英国人的共同体热情，如扩大议会中的爱尔兰、苏格兰裔贵族比例，将英语普及到苏格兰，鼓励外居乡绅返回乡村宴请乡邻以缓和乡村与城市的关系等。乡村庄园诗一方面描写了庄园主宴请乡邻的盛况，另一方面理想化地虚构了一个看似和谐的古典乡村共同体，激发了民众的共同体热情与认同意识。这无论是对处于分裂和矛盾状态中的早期现代英国来说，还是对深陷道德危机和迷茫思想意识之中的英国人来说都意义重大。

共同体书写的形式多种多样，即使是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其共同体想象也各不相同。如果说宫廷假面剧和庄园诗为本·琼生提供了浪漫式共同体书写的载体，那么他开创的城市喜剧则是进行现实主义共同体书写的最佳场域。城市喜剧既是本·琼生创作时间最长、成果最显著的戏剧实践，也是他对英国喜剧做出的杰出贡献，代表了英国喜剧从浪漫走向现实的趋势，很大程度上开启了英国现实主义喜剧的传统，与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代表的浪漫喜剧并驾齐驱，成为英国文艺复兴喜剧的两大潮流，并直接影响了17世纪的王朝复辟喜剧。本·琼生在城市喜剧中以一种更加现实的风格虚构了“流动性”的城市共同体，代表了英国民族想象从农业走向资本、从固定走向流动的趋势。

然而，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文学逐步发展成一个更具包容性和现实性的文学传统，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共同体不断被想象和建构，尤其是在社会观念流变明显的转型时期，如狄更斯的城市小说和艾略特的城市诗歌；文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围绕伦敦展开共同体想象，与各自时代的社会现实形成或批评或歌颂的互文，也与各自时代的乡村共同体形成对话。但是，以乡村庄园为场域的乡村文学始终在英国文学传统的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乡村

与城市的共存和对话也始终是英国文学传统的重要特征。文艺复兴之后，英国文学一方面朝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向展开了外向型和扩张型的帝国共同体想象；另一方面，也存在不断向内看、向后看的回溯式乡村共同体想象，乡村庄园始终是英国人实现身份认同和民族想象的重要载体和文化记忆。

注释 [Notes]

- [1] 本文中所引用的本·琼生散文《发现》(*Discoveries*)、喜剧《人人高兴》(*Every Man in His Humour*) 和城市喜剧《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 均选自 *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Ben Jonson*。引文由本文作者翻译，数字代表行数，为简洁起见，*The Alchemist* 缩写成 *Alch.*。
- [2] 本文中的两首乡村庄园诗《致潘舍斯特》和《致罗伯特·罗斯爵士》选自 *Ben Jonson and the Cavalier Poets*，数字代表行数。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Revised editio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ugh Tredennick, Penguin, 2004.
- Delanty, Gerard. *Community*. Routledge, 2003.
- Greene, Thomas M. "Ben Jonson and the Centered Self."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vol. 10, no. 2, 1970, pp. 325-48.
- Jonson, Ben. *Ben Jonson and the Cavalier Poets*. Edited by Maclean Hugh, Norton, 1974.
- . *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Ben Jonson*. Edited by David Bevington, et al., Cambridge UP, 2012.
- Miller, J. Hillis. *Communities in Fiction*. Fordham UP, 2015.
- Muhleisen, Susanne, editor. *Contested Communities: Communication, Narration, Imagination*. Brill Rodopi, 2017.
- Ramsay, William Everett. "Against Stanley Fish on Ben Jonson and the Community of the Same." *Ben Jonson Journal*, vol. 24, no. 1, 2017, pp. 117-40.
- Rust, Jennifer R. "Forms of Governmentality in *The Alchemist*."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vol. 58, iss. 1, 2018, pp. 95-121.
- Stage, Kelley J. *Producing Early Modern London: A Comedy of Urban Space, 1598-1616*. U of Nebraska P, 2018.
- Tönnies, Ferdinand. *Community and Societ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Charles Price Loomis, Dover Publications, 2002.
- Zhou, Hui. "All and Each: Foucault's Genealogical Study of Governmentality and Bio-power." *Foreign Literature*, no. 2, 2016, pp. 90-100. [周慧：“整体和单个”：福柯的治理术和生命权力的系谱研究，载《外国文学》2016年第2期，第90-100页。]

◇责任编辑：马妮娅

FLC

比较文学研究

对位比较

◎ 大卫·达姆罗什 文逸闻/译^[1]

内容提要: 比较文学的欧洲中心主义意味着人们往往通过笼统的普遍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异域想象来研究非欧洲的文学文本。纠正或补充这种东方主义知识的方法是借鉴地方知识,开展对位阅读,将文化差异视为需要分析的事实,而非反常现象。在文学研究和人类学领域,学者一直在努力破除学科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根基。本文以前人的理论探索为出发点,并结合9世纪学者欢增的《韵光》及其继承者新护的《韵光注》对伦纳德·内森1976年的迦梨陀婆《云使》迦梨陀婆英译本进行对位分析。通过比较,笔者试图说明如何基于地方知识进行对位比较,以弥补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在阐释非西方文学传统上的不足。

关键词: 对位阅读 东方主义 迦梨陀婆 《云使》 欢增 新护 欧洲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 I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3-0096-15

作者单位: 哈佛大学,美国 马萨诸塞州 剑桥 02138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3.010

Title: Contrapuntal Comparison

Abstract: The Eurocentrism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s meant that non-European literary texts have been studied through either vague universalism or imperialist exoticism. What can correct, or complement, such orientalist knowledge is contrapuntal reading with local knowledge, to tackle cultural difference not as an anomaly but a fact to be analytically accommodated. Engaging previous theoretical work in literary studies and anthropology that have struggled with the Eurocentric foundations of scholarly disciplines, this paper presents a sample of contrapuntal reading by examining the 1976 English translation of Kālidāsa's *Meghadūta*, rendered by Leonard Nathan, in the light of the 9th-century scholar Anandavardhana's *Dhvanyaloka* and the extended commentary written by his follower Abhinavagupta. This comparative sample clarifies how contrapuntal reading with local knowledge can balance Eurocentric and orientalist readings of non-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s.

Keywords: contrapuntal reading, orientalism, Kālidāsa, *Meghadūta*, Anandavardhana, Abhinavagupta, Eurocentrism

Author: David Damrosch, Professor,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merica.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比较文学基本上是一门研究西欧地区的学科。学者主要分析同一传统中的作家，却很少将比较作为真正的问题来谈。通常而言，比较的对象之间存在明显的“事实联系”（*rappports de fait*），而对那些不存在直接关联的作家，人们也可根据共同的文化或理论概念，如“浪漫主义”（*Romanticism*）、彼特拉克主义和“小说”（*novel*）这类欧洲的术语来进行对比或比较研究。不过随着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研究的发展，比较的问题成为一个新议题。从那时起，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便逐渐拓展到世界各国的文学研究领域，人们愈发渴望建立一个可行的理论框架。

世界的文学文化从古发展至今，其多样性对任何一种文学史或理论框架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当理论家以文学为参照提出自己的观点时，他们通常都建立在相当具体的文学档案之上。如迈纳（*Earl Miner*）在20世纪70年代利用前现代英语诗歌和日本诗歌进行比较诗学研究；而在迈纳之前，弗莱（*Northrop Frye*）和布鲁姆（*Harold Bloom*）等人则精研英国浪漫主义作家。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运用这些具有时代和文化特色的理论来研究现代英国文学或日本文学？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比如美洲、非洲或大洋洲，我们是否可以正确地运用这些理论？比较文学研究者在文学理论方面长期的交流互鉴使外国文学研究变得更加复杂而非简单。如果中国或美国学者用巴黎或法兰克福的理论来研究巴西小说或梵语诗歌，那么有多少东西会在这种“三角贸易”中遭到扭曲或遮蔽呢？

有时理论家们自己也认为，将理论运用于其诞生的语境之外是错误的。卡勒（*Jonathan Culler*）曾指出，意义的互文性“使得文学研究本质上是比较性质的，但这也导致了另一种情况，即可比性取决于同一种文化体系这样一个能够进行比较的共同场域”。他提醒道：“人们对话语的理解越深入，就越难在西方和非西方文本之间进行比较。”（268）当然，理论可以被错误或机械地套用在新的文本上，但如果缺乏分析和联系来充当理论的基石，那么被比较的传统之间也可能因国家、时期、体裁、性别和阶级不同互不关联，甚至相互抵牾。

一旦研究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和思维框架，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如何阅读一个完全陌生的文本，而不将我们业已熟知的文学常识和理论模型带入这一文本中来？地方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有效规避笼统的普遍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异域想象，但作为比较研究者，我们经常需要跨越国家和语言的界限。不论我们如何努力地向大师巨擘学习，研究仍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就连那些鼎鼎大名的专业学者也都是经过中介才得以掌握丰富的地方知识。不论这些学者是来自圣保罗、内罗毕、北京还是卡拉奇，他们在研究肯尼亚小说或乌尔都诗歌时也常常是基于自己的批评或理论框架，而这些框架大多发端于欧洲或北美，其文学档案也和他们的研究对象相去甚远。

在涉及前现代文学时，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过去是一个陌生的国度；那里人的处事方式和我们不同”。与文化流变的主题相呼应，专业读者很可

能在拉什迪 (Salman Rushdie) 的论文《想象的家园》(“Imaginary Homelands”) 开头, 而不是在哈特利 (Leslie Poles Hartley) 小说《送信人》(《The Go-Between》) 的首句读到这句话, 尽管后者才是它的原始出处。哈特利小说的背景是 1900 年的英国。如果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能让一个人的祖国变成一个陌生的国度, 那么当我们回望几个世纪以前, 这一落差会有多大? 尽管我们尽力重现作品中的前现代价值, 但很难抹去自己在成长教育过程中所学的现代知识, 而且如今的主流理论话语基本上源自过去两百年的文学, 是现当代的产物。我们如何能正确地运用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在巴黎提出的理论或查特吉 (Partha Chatterjee) 在加尔各答提出的理论 (基于他在纽约州北部取得的博士研究成果) 来分析一千多年前的中国或印度诗歌? 当理论的传播范围不再局限于巴黎和美国, 而是涉及多个迥然不同的文化领域时, 翻译、传播和接受的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

与此同时, 各种新素材和物质条件为我们修正和完善理论, 亦即为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克服其局限性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受东/西方比较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的启发, 人们数十年来都在将理论引入西方以外的世界, 但这一工作并未完成, 其中一大原因是“理论”基本上仍然是欧洲和北美的话语。欧洲或北美一系列经典或超经典的理论著述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甚至连那些拒绝给文学作品冠以“伟大著作”之名的批评家也都在阅读这些理论。正如克里希纳斯瓦米 (Revathi Krishnaswamy) 所言, 关心政治的比较文学研究者通常高度怀疑那些“将整个 (第三) 世界文学作品理论化的宏大元叙事”, 比如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和莫莱蒂 (Franco Moretti) 在美国提出的那些理论。“但即使是在这些怀疑论者中也很少有人提出要重新审视理论以破除比较文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 结果导致如今只有世界文学, 没有世界文学批评” (400)。克里希纳斯瓦米认为, 只有当比较文学学者开始深入研究其他地区的理论话语时, 欧美理论的霸权才会被打破。她以泰米尔语为例指出, 这种语言虽具有悠久的诗学传统, 但在印度本土和海外却深受忽视。

在将比较研究拓展至现代欧美世界之外的文本时, 学界需要注意这些素材之间的关键差异。很多时候, 大都市批评家会在非西方文本中遇到他们十分熟悉的观点——无论是早期比较研究中常见的东方主义修辞 (认为东方是无时间的), 抑或是詹明信近来基于第三世界研究所提出的民族寓言, 还是当今西方批评家从全球小说中挖掘到的新自由主义批评。即使在克里希纳斯瓦米的文章中也能看到这种倾向。她有力地证明了研究帕克蒂 (bhakti)^[2] 诗歌和诗学的重要性, 认为它们是精英梵语传统的替代品: “由鞋匠、织工、牛倌、羊倌、贱民和妇女等人创作的帕克蒂诗歌借鉴了民歌和警句的口头传统, 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反传统、寻求精神解放的愿景。” (410) 然而, 当她聚焦于 12 世纪女诗人玛哈德薇 (Mahadeviakka) 时, 她所提出的论点和现代世俗女权主义并无二致。她认为玛哈德薇 “一再抱怨女性受到的限制, 无论是父母、丈夫和姻亲提出的无理要求, 还是智者和祭司施加的巨大阻力”。梵语传统中的“爱情主题, 即信徒和神祇间的悲欢离合 [……] 实际上不过是社会越轨和精神升

华等颠覆性思想的拙劣障眼法”(411)。帕克蒂诗歌和梵语传统的关键差异几乎再明显不过了,但它与当代西方关注的问题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克里希纳斯瓦米认为,欧美世界向其他理论传统学习的能力受到了殖民者原有好恶的长期影响。她举例说明英国东方学家对印度古典梵语传统推崇备至,却忽视了泰米尔诗学等源远流长的传统。这一做法正符合他们的观念,即前现代亚洲是永恒智慧的宝库,因此其现代文化可任由殖民者统治。克里希纳斯瓦米指出,独立后,许多印度民族主义者采取了类似的立场,通过将梵语和印地语置于印度其他二十种文学语言及地方传统和达利特传统之上,以加强印度的统一。她的观点与法农(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不谋而合,后者揭示了非洲精英如何在独立后仍然长期延续旧殖民模式,两者的契合恰好说明非欧美的理论之间或许能够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

一、比较不可比较的事物

自2000年以来,比较研究者更加注重保持跨文化比较的公正性。比利时古典学家德蒂安(Marcel Detienne)的方法论著作《比较不可比较的事物》(*Comparer l'incomparable/Comparing the Incomparable*)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极具启发性的探讨。德蒂安在书中介绍了他于20世纪90年代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的一个研究小组,该小组成员由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组成,致力于全方位探索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在该书第二章“构建可比性”中,德蒂安指出,比较文学研究者不能只聚焦于保持密切往来的邻近社会,而应该把目光放得更远。他主张采用“对比的方法”,而不是寻求“对等”或“相似”(compare和Vergleich等词的词根含义,斜体为原文所有),因为通过这一方法,“人们可以发现认知的失调,或者简单来说,可以发现其他阐释者和研究者忽略的细节或特征”(Comparing 23)。

为了将这一对比方法付诸实践,德蒂安的团队开始探索几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发源地和起源神话,研究人们如何通过有关开国元勋和国家诞生地的故事建立领土意识。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件。为了实现研究目标,德蒂安召集了一批研究非洲、日本、美洲和地中海地区早期文化的古典学家和人类学家。项目开始时十分顺利,但随后日本学者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的研究对象很容易从“清晰可辨”的建国及国家缔造者的故事变成一系列与领土化相关的旅行、活动和仪式,但领土化不同于、甚至先于实际的建国。然而,当我们遇到如下不可比较的案例时,我们所经历的冲击可谓发人深省。有一天,两位在研究过程中长期保持沉默的日本专家突然发言,他们无奈地表示,根据现有最古老的文献,日本根本没有建国和国家缔造者的记载。(25-26)

德蒂安对日本学者的遗憾感到惊讶，但并没有请他们离开小组。“我对他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并且告诉他们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思考‘立国安邦’的真正含义了。受到这个不可比较的事例的启发，诸如‘建立’这类熟悉的词语开始变得模糊、飘忽不定”（26）。德蒂安说在这次事件后，他的团队开始奉行“多元比较主义”（plural comparativism），以“消除‘建立’一词营造的清晰假象”，从而使他们能够对“‘建立领土’在不同社会中的含义进行概念分析”（27）。

德蒂安认为多元比较主义既是道德理想，也是知识理想，是避免让历史文化的多样性淹没在普遍主义（以我们自身向外投射的价值观为基础）大浪中的最佳方式。德蒂安团队的研究体现了他根除顽固偏见的策略。他没有试图创建一个年鉴学派式的“团体”，而是汇聚了具有不同背景和观点的成员，他们彼此密切合作，逐渐形成一个集体的“我们/我”（nous-je）。德蒂安的译者将这个新词翻译成“a we/I”（*Comparing* 27），虽然保留了该词的代词形式，但却遮蔽了它和希腊语 *voûc*（意为心灵）形成的潜在对话。正如历史学家不能只挖掘中世纪农民的群体心态，他自己的心态也需要重新调整。每个比较文学学者“必须同时是单数和复数”，但学者们无法独自达到这一状态。“要使‘一个’比较文学学者变成复数，就必须让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组成一个小团体，他们一起研究，甚至一起犯错，而且还愿意一起讨论交流”（24）。

德蒂安在该书增订版（2009年第二版，尚无英译本）中重新抨击了民族主义学术。他增加了三章来剖析法国古典学家和人类学家所构造的“不可比较”的法国民族神话，这一神话源自一个同样不可比较的古希腊。他以“超越梵蒂冈和它的香榭丽舍大街：回归可比较性构建的艺术”为题作结（*Comparer* 169-73），并在结尾讽刺了2008年9月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与萨科齐（Nicholas Sarkozy）之间的会谈，但他没有直呼萨科齐之名，而是称他为法国的“最高祭司”。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堪称来访教皇的世俗乐土）举行的会晤中，两位领导人就法国与天主教之间的密切联系达成了共识，即认为这种联系是古希腊思想与希腊—罗马基督教相结合的产物。德蒂安在全书结尾呼吁学者们采取一种“不协调”的比较研究以消除种种起源神话，并“摆正自己的位置”。尽管他承认“任何一种比较人类学都不是万能的”，但他也表示，“一种实验性和建设性的对比研究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和自己保持距离”（173）。

德蒂安的想法很有吸引力，但我们到底能与自己保持多大的距离呢？或者说，一个流亡海外的学者能够真正做到去国离乡吗？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执教多年后，德蒂安本人也没有完全摆脱他和美国及美国思想界的亲缘关系。德蒂安对自身学术理想的定位和他在20世纪60年代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有着莫大的关系。那时，他受到了巴黎古典学家和结构主义人类学家的双重熏陶，这些人包括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洛罗（Nicole Loraux）、维达尔-纳凯（Pierre Vidal-Naquet）和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在推进世俗世界主义的过程中，德蒂安提出全球游牧主义（global nomadism），在世界各地寻找具有启发性的差异模式：“一个试图确定自身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学者必须能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到处走动。”他说，“而且还总是带着一堆的问题，就像是对一个广阔无垠的领域进行地毯式调查”（*Comparing* 24, 27）。尽管德蒂安与他之前的同行有很大的不同，但这种表述与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在《千高原》（*Mille plateaux*）中提出的“游牧科学”（nomadic science）存在明显的契合，也呼应了列维-斯特劳斯对其学术研究的自嘲：“我的智慧是新石器时代式的。就像原始的草原野火，它有时会照亮一些未被探索的区域；有时会给那些区域带来养料，从中带走一些收成，然后继续向前推进，留下一片焦土。”（53）你或许可以带游牧者走出巴黎，但未必能将让他忘却巴黎。

二、没有霸权的比较

在过去的十年里，不断有人撰写专著和论文研究“没有霸权的比较”这一问题。菲尔斯基（Rita Felski）与弗里德曼（Susan Stanford Friedman）合编的论文集《比较：理论、方法与应用》（*Comparison: Theories, Approaches, Uses*）在这方面极有启发意义。论文集的首篇文章是拉达克里希南（Rajagopalan Radhakrishnan）的《为什么比较？》（“Why Compare?”）。拉达克里希南在其专著《失衡世界中的理论》（*Theory in an Uneven World*）的基础上指出，比较研究难免存在高下之分。他认为比较的两个对象中总是有一个主导另一个，“只要轴线上的一端得到了认可，那么另一端则会一直被人误解”（19）。这篇文章随后在弗里德曼的《为什么不比较？》中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弗里德曼在列举了拉达克里希南等人反对比较的理由后指出：“我们之所以比较，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会出现比政治错误和脱离语境还要严重的问题。不比较的伦理是什么？拒绝比较也是一种政治行为，由于没有挑战等级制，它可能会使等级制卷土重来。”（36）苏源熙（Haun Saussy）也重新思考了比较研究的霸权问题：“和很多人类学家一样，我们都对虚伪的普遍主义心存警惕。我们对它的厌恶使我们对整个比较事业都产生了怀疑。”针对拉达克里希南的论断，即比较使一方“一直被人误解”，苏源熙指出：“与之相比，更恰当的做法难道不是承认比较研究的实质问题在于，它过于简化研究对象，严重忽视作品意义生成的原初语境？”（67-68）

这些年来一直存在争议的是，比较研究应该扩展到多大的范围。拉达克里希南倾向于以单一国家或帝国历史为基础的地方比较，而研究中国和欧洲文学的苏源熙则认为，后殖民学者不能只通过单一的帝国语境来规避“比较的恶魔”。^[3]他进一步说道，当如此多的问题和可能性远远超出了国家的框架时，跨文化比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而坚持把国家作为我们的思维单位无助于这项研究”（73）。苏源熙反对“世界文学”这一称呼。他

认为,“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长期以来是探索这个问题^[4]的一条途径,或者换个直白的说法,是造成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的一个原因”(69)。然而,在论文集的另一篇文章中,张隆溪捍卫了世界文学研究,他的观点和苏源熙对拉达克里希南的回应相似。正如他在《从比较到世界文学》(*From Comparison to World Literature*)一书中所言,张隆溪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不论是针对某一地区内部的文化,还是针对不同国家的文化,当比较研究误入歧途时,地方性知识会被包装成普遍知识的欧洲价值观取代(“Crossroads” 46-63)。事实上,张隆溪并不反对普遍性的观点,他同样借鉴了中国和西方传统以突出“东方”与“西方”的共同点,打破二者的截然对立。而早在二十年前他就在《强力的对峙:从两分法到差异性的中国比较研究》(*Mighty Opposites: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一书中对这一点进行了批判。

在名为《没有霸权的比较》(“Comparison without Hegemony”)的探究性论文中,梵文学家波洛克(Sheldon Pollock)提出要“在有限的案例中发现同与异,以便更好地理解研究的问题,并从偶然因素中筛选出‘关键’因素,甚至有可能的话还包括‘因果’关系”(191)。他十分关注拉达克里希南等后殖民学者所指出的问题,即比较文学学者讨论的案例很少处于同一层面。波洛克注意到,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不仅仅是因为文化权力或帝国历史各不相同,还因为我们的研究往往是从熟悉到陌生的。正如他所言:

在自我意识的理想状态下,这一过程可以被简单地视为阐释学循环的变体: B 只有在 ABCD 的整体语境中才具有特定的意义,但是这个语境又只有在我们已经知道 A、B、C、D 各自含义的情况下才具有意义。我将证明,比较循环和阐释学循环一样也可以是良性循环。通过概括 A 以确定 B 是一个帝国(或“帝国”)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探究 B 和 A 之间的差异来纠正我们的概括。(198)

然而在很多时候,“理想状态并未出现,当一个特定的对象被提升为‘标准’时,良性循环也就变成了恶性循环”(198)。波洛克以黑格尔为例指出,后者之所以对梵文史诗存在误读,是因为他拿《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作为衡量的标准,认为它们才真正体现了“史诗的本质特征”(200)。波洛克主张要时刻认识到“没有任何一种思维模式可以被视为是普遍的。意识到这一局限性[……]对解决比较研究自身的问题至关重要”(190)。他的结论是“尽管比较是必要的,但内在于比较方法中的等级意识却需要摒弃”(202)。

在后来的《比较的难题》(“Conundrums of Comparison”)一文中,波洛克不仅提倡自我意识,还提出要通过所谓的“方法论世界主义”(methodological cosmopolitanism)来实现无霸权的比较研究,这种多元的视角可以帮助人们在比较印度的“史”(itihāsa)和中国的“诗”等形式时完全摒弃欧洲的术语(282)。这种“差异比较”完全不同于相似性研究,它涉及:

分组讨论的新方式，要通过偏离中心的比较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对象相互映照，尽管各不相同（而且往往是截然不同），但彼此之间并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在摆脱了对事物本质（如史诗、历史或国家的真正含义）的妄想后再来比较，你就能更好地把握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独特性。更准确地说，它的特殊性只有在和其他事物比较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显现出来。（286）

谢明在《比较的条件：关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思考》（*Conditions of Comparison: 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Intercultural Inquiry*）一书中对跨文化比较的认识论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谢明认为比较研究者应该在二阶反思中进行比较：“传统意义上的比较通常关注实际研究结果，即相似性或差异性本身，而比较主义研究和比较或思考如何（不）比较的行为更关注意义是如何构成的。”（38-39）他没有像通常那样把“比较主义者”（comparativists）用作“比较研究者”（comparatists）的同义词，而是用它来指代那些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学者，他们的研究能够揭示出自身知识型中“未被思考之处”及外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认知盲点。

在谢明看来，“未被思考之处就像是不可翻译之处，因为不可翻译不仅意味着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失败’。相反，不可翻译还指涉了翻译和知识的本体论条件”（44）。谢明引用伯克（Kenneth Burke）的“非协调视角”（perspective by incongruity）指出：“作为一种认识论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批判性研究模式，比较具有深远的政治和伦理意义。批判性比较不仅仅是比较现有的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在比较中对它们进行分析。”（49）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意识到自身所推崇的相对主义的相对性，从而达到“所谓的相对的普遍主义——一种能意识到自身局限和问题的普遍主义”（127）。

这种相对主义的自我意识并不需要我们放弃现有的概念词汇，因为即便能够放弃也无济于事。改变术语并不一定会给文学研究带来富有意义的变化，就像卡特（Jimmy Carter）总统斥责治理通胀的专家卡恩（Alfred Kahn）那样。卡特警告卡恩高通胀可能导致新的“萧条”，于是卡恩便拿“香蕉”来指代“萧条”这个禁用语，暂时解决了这一问题。但香蕉生产商很快提出了反对意见，卡恩又只好拿“金橘”代替“香蕉”。不管如何称呼，概念的本质都不会改变。

三、对位阅读迦梨陀婆

当我们以两种不同的文化或理论为观照来阅读一部作品时就能实现跨文化比较。即使我们从现有的参照系出发，也是有可能通过对位阅读（在萨义德的概念意义上[xxv]）来建立一种无霸权的比较模式。这既不是一味吹嘘我们所熟悉的参照系，也不是完全放弃我们自己的见解。真正的对位阅读应该摒弃如下观点，如说《红楼梦》的拉康式解读才能真正

揭示小说长期隐含的意义，或者反过来，认为外国的理论视角只会扭曲《红楼梦》的真正内涵，它只能在清代诗学的语境中加以理解。

笔者将以迦梨陀娑（Kālidāsa）创作于公元5世纪前后的《云使》（*Meghadūta*）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迦梨陀娑是亚洲最早受到欧洲称誉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奠定了南亚文学在早期比较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东方学先驱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于1789年翻译了他的戏剧《沙恭达罗》（*Shakuntala*）。公认的迦梨陀娑作品还包括若干首经典叙事诗，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云使》（英文直译为“Cloud Messenger”）。该诗以千里传书为题，讲述了小神仙药叉和爱妻分别的故事：主人公药叉被他的主人财神俱毗罗逐出喜马拉雅山上的宫廷，流放到南方。由于十分希望能给爱妻传信，药叉便委托一朵雨云向北寻找他的妻子，向她传达他忠贞不渝的爱意。全诗共111节，在诗中药叉主要描述了游云的必经之路和沿途秀丽旖旎的风光，最后想象了雨云和他妻子相会的情景。

《云使》表现了恋人相思的普遍主题，但自从1814年琼斯在加尔各答的弟子威尔逊（Horace Hayman Wilson）首次将其翻译成英文以来，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地方知识的重要性，因为迦梨陀娑在作品中大量引用了当地的地名、神话、山川草木、花鸟虫鱼和史诗传统。同样重要的还有印度本土的诗歌理论。如笔者在拙作第四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从两千年前婆罗多（Bharata）的《舞论》（*Nāṭyaśāstra*）开始，一批梵语诗人和学者都在讨论诗学和诗歌语言的问题。但是在1814年，由于西方学者刚刚开始接触梵语诗学，威尔逊在翻译时不得不依靠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诗歌概念。而如今我们能通过对比古典梵语理论和现代西方理论来解读《云使》，从而加深对迦梨陀娑诗歌的理解，这比单一视角的研究要丰富。

1976年，美国诗人兼翻译家内森（Leonard Nathan）以双关标题《情使》（*The Transport of Love*）出版了《云使》的详注译本。内森一直努力让译文忠于原文，他甚至在译文旁的对页上附上了梵语原文。在其翔实的引言和尾注中，内森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尽力弥合亚洲与美国、古代与现代之间的鸿沟。他在译著中还保留了一些不可翻译的内容和外来术语，并在文末附上了一份词汇索引表。即便如此（萨义德或许会对此表示赞同），内森的翻译仍然带有简单化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尽管他引用了大量的文化信息，但他常常透过美国新批评的视角来解读迦梨陀娑，同时还在哲学上将迦梨陀娑与其同时代的地中海作家相提并论，这种做法比威尔逊有过之而无不及，后者曾对迦梨陀娑与奥维德和贺拉斯（威尔逊曾称贺拉斯是“优雅的弗拉库斯”[145]）进行了比较。内森的新柏拉图主义倾向在其引言中已初现端倪，比如他认为迦梨陀娑很不符合西方人的认知：“关于印度人对诗歌的期待及其实际创作，我们并不认同其中两大要点。首先，人不是通过自身对不断变化的经验世界的感知来理解现实的，而是超越它，进入一个永恒和理想的世界[……]因此，诗歌是一种体验表象之外的现实的方式。”（3）印度不像西方，“后者在很大

程度上将现象世界视为现实世界，不管它之外还有什么”（4）。

在内森看来，迦梨陀娑的诗表现的并不是物质现实，而是一个不变的社会和宗教世界，究其实质是伯顿爵士（Sir Richard Burton）眼中的无时间的东方。在这个无时间的秩序中，内森邀请我们领略“理想世界的和谐，它的美，存在于大与小，高与低，玄妙神秘与稀松平常之间深刻的关系中，看似对立却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9）。在他的评论中，内森以新批评的方式解读《云使》，将其视为一个平衡的讽刺结构，其中每个意象相互交融，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既不失优雅也不失趣味，同时还具有严整的社会秩序。尽管诗歌开头几节描写了药叉的孤寂、无助、深情和伤感，但我们不应该把他内心的悲痛太当回事，因为从西方意义上说，他并不是真正的人物。在内森的解读中，药叉只是诗人借以意淫的幌子而非受难者形象。相反，诗中最抽象的实体雨云才是真正的主人公：“如果《云使》中有任何真实的角色，那就是雨云。通过药叉的情色想象，它成了一个复杂的磁力中心，连接着世界上的一切事物。”（7-8）从诗的第99节开始，爱情和语言的力量汇集在药叉对雨云的托附之词中，内森称之为“全诗的音调高潮”。在这里，药叉的言语表现了古典梵文中情侣别离的母题，即爱情不因分别而告终，反而因此变得更加浓烈。药叉说道：请告诉她，

他为厄运阻隔在远方，怀着心心相印的愿望，
他只有任凭清癯消瘦，凄怆悲痛，频频叹息，
热泪纵横和焦灼不安，来配你的瘦弱可怜，
凄凉伤感，长吁短叹，珠泪盈腮和满怀焦急。（81）^[5]

内森的阐释框架有助于我们解读以上诗节，但却难以合理解释其余内容，作者在这些部分里着力突出了隐喻无法恰当表现本体和喻体的对应关系。比如下文云的比喻就暗示了视觉的失真：

我用红垩在岩石上画出你由爱生嗔，
又想把我自己画在你脚下匍匐求情，
顿时汹涌的泪水模糊（clouded）了我的眼睛，
在画图中残忍的命运也不让你我亲近。（83）

在整首诗中，有序、和谐的场景不断被极度混乱和偶然的意象打破。虽然该诗洋溢着幸福和满足之情，但它也不乏对痛苦、暴力和空虚的描写。在诗的开头，药叉的云使并没有被塑造为意义和交流的“磁力中心”，而是一个瞬息万变、神秘莫测的形象：

什么是烟光水风结成的一片云彩？
什么是只有口舌才能够传达的音讯？
药叉激于热情就不顾这些向云恳请，
因为苦恋者天然不能分别有生与无生。(19)

在这一节里，与其说雨云是柏拉图式的“理式”(form)，还不如说它是一个飘浮的能指。

熟悉德里达的读者也许会觉得诗中许多段落是为阐明解构主义中意义的延宕和自我消解而量身定制的。雨云非但没有直接传达药叉给爱妻的“信”，它反倒踏上了一个没有尽头、不断延宕的旅程：

朋友啊！我知道你为我的爱人虽然想快走，
却仍会在每一座有山花香气的山上淹留，
但愿你努力加快脚步，假如见到有孔雀
以声声鸣叫向你表示欢迎而珠泪盈眸。(Nathan 31)

在此，药叉设想了一个充满诱惑的双重延宕：雨云反复驻足于花香弥漫的山峰上，只是为了推脱孔雀的盛情邀请，它才移到下一个山峰，并在那里停留片刻，推迟传递一直延宕的口信。在德里达将《明信片》(*La Carte Postale*)交给出版商的1500年前，便有雨云这个“延异”的信使了。

诗中写到，雨云掠过了一片充满暴力的土地。药叉告诉云朵“取来晚霞的鲜玫瑰色的红光化作圆形，使大神不再想去拿那新剥下的象皮”(39)。在内森中庸、和谐的解读中，这类场景往往遭到忽视。又如在第48节中，雨云经过俱卢古战场，在那里“阿周那曾把千百支利箭洒向帝王头，正像你^[6]把无数雨点洒在莲花脸上”(47)。在注释中，内森介绍了这个史诗中的暴力场景，但却否认它带有暴力意味：

迦梨陀娑能将一切事物纳入诗歌所编织的复杂关系网之中，但他在诗的第48节中却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在那一节里，雨云来到了俱卢古战场。在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中，大批士兵在此厮杀搏斗，只有少数英雄生还。这一典故背后的传说是如此的宏大，几乎家喻户晓，如果诗人对它大加渲染，他反而会打破全诗既定的非英雄主义基调。事实上，诗人将史诗英雄阿周那的不朽战功置于背景，仅仅用它来比照倾盆大雨对娇弱莲花的冲击。(100)

这个启示录式的暴力场景也许只是用来表现一个微妙的比喻，但可以看出，内森重在维持

其和谐化的解读，而非证明迦梨陀娑的才华“在此遭遇了严峻的挑战”。

在诗的结尾，社会和个人因素交织在一起。雨云受托安慰药叉的妻子，向她转告药叉平安无恙的消息及其思念之情。为了向妻子证明云使所言非虚，药叉便向她说起了他们夫妻过去的一件隐事。这一想法很好，但是药叉选择了一个奇怪的逸事作为证据：

告诉她我说过：“有一次你和我交颈同眠，
入睡后你忽然无缘无故大声哭醒；
我再三问时，你才心中暗笑着告诉我：
坏人啊！我梦中见你和别的女人调情。”（87）

向远方的妻子提及不忠的话题，这真的合适吗？用德曼（Paul de Man）的话来说，这则隐事或许会抵消自我，恰恰制造出它本应缓解的焦虑。在这里，内森的和諧化解读再次受到严峻的考验，但他给出了解决之道：“通过向妻子讲述只有他俩才知道的隐事，药叉使这则口信显得更加可信。凭借高超的智慧，他以一则幽默的逸事来博取爱妻一笑。”（110）这真是智慧高超的吗？

在一面自称忠诚，一面又自损形象后，药叉开始担心雨云难以传达他那模棱两可的口信：

好友啊！你是否已决定为朋友办理此事？
我决不认为你的沉默就是表达拒绝；
你不声不响时还应饮雨鸟的请求给他雨水；
善人对求告者的答复就是做他所求的一切。（89）

内森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但他看似无理论的解读并非没有理论支撑，而是实际上把自己所熟知的新批评理论应用到了梵语文学。总而言之，我们并不认为内森真的揭示了《云使》的神奇魅力，而引入解构的视角可以让我们注意到那些被内森忽视的重要元素。然而，我们也不能轻易断言，朴素的新批评已经被严谨的解构所取代，后者揭示了迦梨陀娑偏好暴力而非秩序、不忠而非忠诚、延宕而非圆满的秘密倾向（就藏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说德里达敢于挑战维姆萨特（William Wimsatt）^[7]都不敢涉足的领域，这似乎又犯了时代错置的错误。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云使》，我们可以借鉴印度9世纪学者欢增（Anandavardhana）的经典梵语诗学论著《韵光》（*Dhvanyaloka*）。作品后来在新护（Abhinavagupta）所作的《韵光注》（*Locana*）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欢增和新护都曾多次引用迦梨陀娑，他们的研究为人们了解梵语诗歌一千年前的阅读方式提供了不少洞见。从两部作品中可以看出，《云使》

具有强烈的社会气息。欢增和新护并不认为该诗表现的是丈夫独自一人时说给远方妻子的心里话，或是他的自言自语。两位学者透过诗歌看到了一幅繁华热闹的社会画卷，他们也十分关注叙述者和周围社会环境的伦理互动。这一点和《罗摩衍那》(Ramayana)中那个讲述自身诗律起源的故事^[8]有异曲同工之处(Damrosch 122-64)。

欢增和新护独特的社会诗学源于千年的梵文传统。在它的观照下，我们能够以一种与西方诗歌研究截然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云使》。尽管药叉和妻子天各一方，但他们的感情却因雨云途中所遇之人和所见之物得到了维系。作为读者，我们和这些中间形象产生了共鸣，就像和这对身处戒指链两端的情侣产生共鸣一样。当雨云启程时，

旅客家中的妻子掠起发梢向你凝望，
望见你升向天空，便满怀信念而安心。(Nathan 21)

在这里，记忆是一个关键的词语，呼应了欢增和新护的诗学理论。两人极具影响力的“味韵说”(rasadhvani)解释了一系列问题，如观众如何在观看他人受难的场景时避免无法自拔。当诗歌叙述者因不幸或离别而悲伤时，其痛楚会激起我们对过去类似事件的记忆。比照这些创伤记忆和诗中场景，作为听众的我们会对叙述者产生怜悯之心，自身的记忆也会得到净化，最后走出自我痴迷。如新护所言，通过这个过程，自我的悲伤“变成了悲悯(flavor of compassion)”^[9]，“与普通的悲伤不同，它熔铸了个人的思想”(Ingalls et al. 115)。梵语诗歌强烈的社会关怀造就了怜悯的伦理学和诗学。

根据这种解读，我们不妨转向《云使》的最后一节，这里可以看到内森恰当地译出了“怜悯”这一关键词：

你应我的不情之请，肯对我施此恩惠，
不论是出于友情还是对我独居感到怜悯；
云啊！雨季为你增加光彩，此后请任意遨游，
但愿你一刹那也不和你的闪电夫人离分。(89)

我们不能将迦梨陀婆浮动的能指视为德曼式绝境的象征，好像雨云在途中永远无法实现隐喻意义的转述，只能经历转喻的消解。然而，要说解构式解读被印度本土的权威诗学所推翻，也不正确。欢增和新护的时代距迦梨陀婆有500年之远，他们为多元且近乎碎片化的印度诗歌传统建立了体系。他们既是神学家也是修辞学家：他们有自己的考虑，就像儒家注经者将《诗经》中的艳情诗寓言化，或者像圣经阐释者弱化《传道书》的激进思想那样。^[10]欢增和新护淡化了激情跨越同情边界的倾向，不像迦梨陀婆那样使他身处的伦理框架复杂

化。德里达和维姆萨特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云使》中那些无法由“味韵说”解释的维度。同样，在梵语诗学的观照下，我们也能避免直接套用当代理论解读那个充满怜悯之心的雨云的延宕式旅程。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那几个长期受比较研究界关注的国家之外时，一幅全新的比较景观将呈现在眼前。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当代之前的文学传统，采用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在 75 年前提出的历史透视主义，并将自己所处的时空与研究对象的时空背景相结合，眼前的景致或许会更加开阔。无论是个人还是合作团队，我们都可以实践多元比较主义，开展多元研究，检验和修正我们在研究中所建构的美学、政治和历史框架。这是当下操演对位比较的最佳方式。

（本文来自“Contrapunt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vol. 6, no. 1, 2022, pp. 52-65.）

注释 [Notes]

- [1] 关于本文所探讨问题的深入分析，参见 David Damrosch, *Comparing the Literatures*, 尤其是第七章“理论”和第八章“比较”，本文改编自以上两章。另外，本文译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师。
- [2] “帕克蒂”又译为“虔诚”，指的是人对神的“敬仰和崇拜之情”。帕克蒂运动是印度中世纪重要的宗教改革运动，与之相应的印度中世纪文学可以说就是帕克蒂文学。参见邓兵：《印度帕克蒂运动与黑天文学》，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111-16页。——译者注
- [3] “比较的恶魔”指的是比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隐含的偏见和歧视等负面现象。比较之所以会成为“恶魔”，是因为它可能强化或重申不平等和不公正的观念（如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译者注。
- [4] 即比较研究中的霸权主义。——译者注。
- [5] 本文《云使》中译文均出自金克木：《梵竺庐集乙：天竺诗文》。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译文根据翻译需要稍有改动。——译者注。
- [6] 即雨云。——译者注。
- [7] 威廉·维姆萨特（1907—1975）是美国新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译者注。
- [8] 在《罗摩衍那》第一篇第二章中，作者蚁垤讲述了自己创造诗律输洛迦的由来。——译者注。
- [9] “味”是梵语诗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国学者黄宝生根据古印度文艺理论婆罗多的《舞论》将“味”解释为“戏剧艺术的感情效应，即观众在观剧时体验到的审美快感”。婆罗多将味分为八种，其中就包括悲悯味。参见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41页。——译者注。
- [10] 关于中国和圣经阐释传统的比较研究，参见 Zhang Longxi, *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Cornell UP, 2005.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Culler, Jonathan. “Comparability.”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 69, no. 2, 1995, pp. 268-70.
- Damrosch, David. *Comparing the Literatures: Literary Studies in a Global Age*. Princeton UP, 2020.
- Detienne, Marcel. *Comparer l'incomparable*. Rev. ed. Points, 2009.

- . *Comparing the Incomparable*.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Stanford UP, 2008.
- Friedman, Susan Stanford. "Why Not Compare?" *Comparison: Theories, Approaches, Uses*, edited by Rita Felski and Susan Stanford Friedman, Johns Hopkins UP, 2013, pp. 34-45.
- Ingalls, Daniel H. H., et al., editors and translators. *The Dhvanyaloka of Anandavardhana with the Locana of Abhinavagupta*.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49. Harvard UP, 1990.
- Krishnaswamy, Revathi. "Toward World Literary Knowledges: Theor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62, no. 4, 2010, pp. 399-419.
- Levi-Strauss, Claude. *Tristes Tropiques*. Translated by John Weightman and Doreen Weightman, Penguin, 1981.
- Nathan, Leonard. *The Transport of Love: The Mēghadūta of Kālidāsa*. U of California P, 1976.
- Pollock, Sheldon. "Conundrums of Comparison." *Know: A Journal on the Formation of Knowledge*, vol. 1, no. 2, 2017, pp. 273-94.
- . "Comparison without Hegemony." *The Benefit of Broad Horizons: Intellectual and Institutional Preconditions for a Global Social Science*, Festschrift for Björn Wittrock, edited by Hans Jonas and Barbro Klein, Brill, 2010, pp. 185-204.
- Radhakrishnan, Rajagopalan. "Why Compare?" *Comparison: Theories, Approaches, Uses*, edited by Rita Felski and Susan Stanford Friedman, Johns Hopkins UP, 2013, pp. 15-33.
- 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Knopf, 1993.
- Saussy, Haun. "Axes of Comparison." *Comparison: Theories, Approaches, Uses*, edited by Rita Felski and Susan Stanford Friedman, Johns Hopkins UP, 2013, pp. 64-76.
- Wilson, Horace Hayman. *The Mégha Dūta; or Cloud Messenger; A Poem, in the Sanscrit Language: by Cālidāsa*. Calcutta and London: Black, Parry and Co., 1814.
- Xie, Ming. *Conditions of Comparison: 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Intercultural Inquiry*. Continuum, 2011.
- Zhang, Longxi. *From Comparison to World Literature*. State U of New York P, 2014.
- . "Crossroads, Distant Killing, and Translation: On 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Comparison." *Comparison: Theories, Approaches, Uses*, edited by Rita Felski and Susan Stanford Friedman, Johns Hopkins UP, 2013, pp. 46-63.

◇责任编辑：易佳

比较“西方”和“其他地区”：超越欧洲中心主义？

◎ 西奥·德汉 肖美玲/译^[1]

内容提要：史书美、周蕾和克里希纳斯瓦米从不同角度批判了比较文学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因为对非欧洲/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仍然沿着欧洲/西方范式。本文将简要概述他们各自的立场，并论证在过去几十年至少已出现一些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尝试。

关键词：比较文学 欧洲中心主义 东西方关系 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 I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3-0111-11

作者单位：比利时鲁汶大学英语文学系，比利时 鲁汶 3000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3.011

Title: Comparing “West” and “Rest”: Beyond Eurocentrism?

Abstrac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hu-mei Shih, Rey Chow, and Revathi Krishnaswamy have accus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f being inherently Eurocentric in tha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non-European/Western literatures continues being steered by European/Western paradigms. In what follows I briefly outline their respective positions, and argue tha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at least some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move beyond Eurocentrism.

Key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urocentrism, East-West relations, world literature

Author: Theo D’haen, Professor Emeritus, English Literature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Leuven, Leuven, Belgium.

在卡波·阿塞奎诺拉扎（Fernando Cabo Aseguinolaza）看来，“比较文学——无论是最初作为文学共和国，还是后来作为用来界定各民族文学之间关系的地理文化空间——其存在都是建立在欧洲文学的概念之上”（420）。事实上，他指出，“文学是一个欧洲概念——无论是从发展谱系，还是其与字母文字和书籍（the book）的根本联系来看，文学都体现了最彻底的欧洲中心主义”，因此，“某种程度上，谈论欧洲文学也是多余的”（419）。从这个角度看，欧洲文学成为所有文学的“衡量标杆”，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讨论“世界文学”也是多余的，因为人们认为两者是等同的。然而，“欧洲文学的概念已落后于全球力量达到的新平衡，也滞后于我们对19世纪文学概念中悖论和不足的认识”。如今，欧洲文学“不可避免地带有过分正统和自我陶醉的意味，而其世界性维度也面临挑战”（419）。史书美（Shu-mei Shih）、周蕾（Rey Chow）和克里希纳斯瓦米（Revathi Krishnaswamy）的论述从不同角度与上述观点不谋而合。

在讨论21世纪之交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指导范式再度兴起这一现象时，史书美认为：“虽然许多学者在重申世界文学的概念时，都会象征性地为其欧洲中心起源而感到抱歉，却鲜有人分析欧洲中心主义本质上的等级结构和不平等。”（16）由于“西方”是认可的主体，而“‘其他地区’是表征过程中受到认可的客体”（17），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学忽视、无视、避而不谈，或者至少误认了与自身差异甚大的文学对象。周蕾呼吁建立“新”的东西比较研究方法，让亚洲文学摆脱她所说的“后欧洲与某某”情结（“post-European and [...] complex”），即，“欧洲”（和美国）作为比较研究的参考坐标，其阴影一直笼罩着“与”字之后的比较对象。新的比较研究将为“其他差异替补 [supplementarity] 的可能性、以不同的时间动态为中介的其他符号联结 [……] 等尚未实现的比较视角和仅仅处于初步设想阶段的潜在比较范畴和内容”提供平台（307）。克里希纳斯瓦米批评了“普遍存在的预设，即认为理论是西方哲学传统特有的产物”，而“非西方是异域文化的来源”，但“不能成为理论的场所”（400）。她提道，唯一的例外——就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也被认为仅仅是对西方的回应”；“尽管比较诗学和东西方研究领域的学者试图通过关注殖民时期前的文学传统（中国文学、日本文学、梵语文学和阿拉伯语文学）来挑战这一预设，但此类研究对比较文学或文学的理论实践影响甚微”（400）。

问题在于：如何“超越欧洲中心主义”？让我们依次讨论上述三个关注点。

实质上，史书美的批判可归结为西方比较学家、批评家、文史家和文选家在论述非西方文学时，如何深受所谓“全能定义”（omnipotent definitions）影响的问题。例如，学界常用“系统性”（the systematic）、“寓言的时差”（the time lag of allegory）、“全球多元文化主义”（global multiculturalism）、“例外的特殊性”（the exceptional particular）和“后差异伦理”（post-difference ethics）等术语来选择比较研究的时期、流派、作品、作者，以及研究方法（16-30）。诚如我们所知，西方的世界文学选集编者和理论家在选编非西方文学

作品时，常常拘泥于宗教和神话体裁，或者充其量仅选择其“古典”时期的文学，而将其其他任何与当代沾边的作品排除在外。莫尔顿（Richard Moulton）于1911年出版的第一部英文撰写的世界文学专著就是典型的例子。该书只涉及对“英语世界人民”（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文学产生影响的非欧洲文学（9），因此他断然将中国和日本文学排除在外，也很少提及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学。在探讨现代性以来的较近时期时，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欧洲/西方视为世界范围内文学创新的源头和推动力，抑或是世界文学的最终裁决者。在此，我们会立即想到莫莱蒂（Franco Moretti）和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的类似论述。弗里德曼（Susan Stanford Friedman）则指出，“文学和艺术现代主义的标准历史预设了西方在创作主体上的主导地位，这不仅致使历史中的性别和种族‘他者’被边缘化，而且几乎抹杀了西方以外——尤其是欧美帝国主义殖民下的‘他者’——的现代主义文化生产”（“World Modernisms” 499）。我们还能想到，以欧洲为标榜的文学体系中，史诗作为衡量文学是否全面发展的标准，长期以来让许多非西方文学遭受冷遇，恰恰只是因为人们认为后者缺少史诗体裁。我们还可以说，只有那些符合欧洲/西方价值评判，迎合西方观点、偏见或符合非西方社会刻板印象的作品才能得到关注。对此，史书美例举了20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新电影。尽管史书美的这番话写于中国作家莫言获诺奖之前，但我们也可以认为，莫言常被视为一名魔幻现实主义作家（hallucinatory realist），因此也被西方“误认”了（misrecognized）。

毋庸讳言，就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长久以来的学科实践而言，史书美的论述大多是正确的。尽管如此，非西方文学的代表性不足和学科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等问题并非完全没有引起重视。早在1940年，热拉尔（Albert Guérard）就对“东方的代表性严重不足”深感惋惜，认为“世界文学一词显然是言过其实”，称该领域为“‘西方世界文学’：西方人的文学——无论他们身处何方，或者已然西化的东方人的文学”更为准确（34）。弗里德里希（Werner Friederich）颇为风趣地指出，美国大学所教授的世界文学只涵盖了（当时）北约组织（NATO）成员国语言的四分之一，即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大概还有彼时还不属于北约成员国语言的西班牙语（9-22）。艾田蒲（René Etiemble）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曾呼吁将中国文学和阿拉伯文学纳入世界文学（“Faut-il réviser” 15-36）。20世纪80年代中期，奥尔德里奇（Alfred Owen Aldridge）在《世界文学的重新崛起：亚洲与西方研究》（*The Re-emergence of World Literature: A Study of Asia and the West*）一书中聚焦亚洲比较文学。一年后，艾田蒲在一篇有关比较文学在中国再度兴起的文章中反问道：“当一个人无视所有阿拉伯文学、所有印度文学、所有中国文学、所有日本文学、所有印度文学、所有非洲文学等时，他还有资格自称为比较文学家吗？”（“Sur le renouveau” 9）。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史书美和周蕾等学者陆续发表文章，拉瓦尔（Sarah Lawall）主编并出版具有开创意义的文学选集《阅读世界文学：理论、历史、实践》（*Reading World*

Literature: Theory, History, Practice), 人们对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中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认识不断提高。如今, 任何关于该学科的讨论几乎都必须承认这一传统的存在。与此同时, 在文学选集编选方面, 拉瓦尔为 90 年代出版的一些诺顿文学选集担任联合编辑, 最近也与人合编了朗文文学选集(达姆罗什 [David Damrosch] 主编)和诺顿文学选集(普赫纳 [Martin Puchner] 主编)。在她的影响下, 文学选集的囊括范围已远远超出欧洲语言文学。或许, 以上提到的文学选集也仍带有史书美所批判的“认可的机制”(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的烙印, 助长了阿拉克 (Jonathan Arac) 所说的“盎格鲁-全球主义”(anglo-globalism; 35-45), 让美国大学生认为世界文学基本上是美国文学的延续, 是美国文学的后花园——如果我们同意斯皮瓦克 (Gayatri Spivak) 21 世纪初在《一门学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中对世界文学的批判的话。但不可否认的是, 与早期文学选集编纂实践相比, 这至少代表了某种进步。近来, 批评和理论领域同样有所发展——谢平 (Pheng Cheah) 所著的《什么是世界? 论作为世界文学的后殖民文学》(*What Is a World? O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和马夫蒂 (Aamir R. Mufti) 的《忘记英语: 东方主义与世界文学》(*Forget English: Orientalisms and World Literatures*), 以及收录了前文提及的弗里德曼所写文章的《牛津全球现代主义手册》(*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Modernisms*), 都是佐证。

弗里德曼于 2015 年出版的《地球上的现代主义: 以历时挑衅现代性》(*Planetary Modernisms: Provocations on Modernity across Time*) 直接回应了周蕾对新东西方比较方法的诉求, 不再将西方作为比较研究的参照坐标。事实上, 弗里德曼明确指出, 此书旨在从“地球的维度重新考量现代性, ‘不再思考’[unthink]西方将自身视为‘源现代性’[Ur-modernity]的观念”(3)。弗里德曼在使用“地球的”(planetary)的概念时, 援引了斯皮瓦克和更早期的艾田蒲的倡议, 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疆域扩展到整个地球, 规避了世界文学中隐含的欧洲中心主义, 也剔除了“全球”(global)一词中的技术经济意涵。此书拓宽了现代主义的界限, 囊括了中国唐代诗人杜甫的诗歌, 洛伊 (Arundhati Roy) 笔下后殖民时期的印度, 美籍韩裔作家车学庆 (Theresa Hak Kyung Cha) 的《听写》(*Dictee*) 等世界各地的美学创新实例。同时, 此处“modernisms”的复数形式也让弗里德曼的分析立足于当今“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学术探讨中。该议题的提出大致可追溯至艾森斯塔德 (Shmuel N. Eisenstadt) 的《比较文明与多元现代性》(*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and Multiple Modernities*) 和《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在文学研究领域, 有关多元现代性的研究成果包括芬奇 (Norbert Finzsch) 的哈莱姆文艺复兴研究 (193-212); 马斯托罗维奇 (Gorica Majstorovic) 的《全球南方现代性: 现代主义文学与先锋艺术》(*Global South Modernities: Modernist Literature and the Avant-Garde in Latin America*) 有关拉丁美洲文学与 20 世纪上半叶印度及其他地区文学活动的研究; 罗伯逊 (Bruce Robertson) 与张健

的《中国与美国的现代主义：作为生活的艺术/作为思想的艺术》(*Modernism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t as Life/Art as Idea*)关于中国和美国现代主义的比较研究等。此外，相关论文集还包括卡迪尔(Djelal Kadir)与勒伯曼(Dorothea Löbbermann)合编的《全球化时代的其他现代主义》(*Other Modernism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吉利斯(Mary Ann Gillies)、索德(Helen Sword)和姚铮(Steven Yao)合编的《环太平洋现代主义》(*Pacific Rim Modernisms*)，以及魏朴(Paul Manfredi)和陆敬思(Christopher Lupke)合编的《中国诗歌现代主义》(*Chinese Poetic Modernisms*)。史书美于2001年出版的《现代的诱惑：书写1917—1937年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开启了在国际背景下研究中国文学——也属于最为重要的非西方文学之列——的关键时期。

在“南南”(South-South)文学联结研究领域，哈桑(Wail Hassan)尤为活跃，特别是他所专攻的阿拉伯与巴西文学交流。哈桑的研究散见于他主编的《牛津阿拉伯叙事传统手册》(*Oxford Handbook of Arab Narrative Traditions*)中的部分章节，及在《巴西的文学与移居/移民》(*Literatura e (i)migração no Brasil/Literature and (Im)migration in Brazil*；与利马[Rogério Lima]合编)、《中东与巴西：全球新南方的视角》(*The Middle East and Brazil: Perspectives on the New Global South*；阿马尔[Paul Amar]主编)和《全球南大西洋》(*The Global South Atlantic*；拜斯特罗姆[Kerry Bystrom]和斯洛特[Joseph R. Slaughter]主编)等论文集集中的文章。弗里德曼提倡的时间维度涵盖了整个地球，摒弃了传统意义上与欧洲/西方发展阶段挂钩的时期划分，这与宋惠慈(Wai Chee Dimock)的《穿越大洲》(*Through Other Continents*)不谋而合。宋惠慈聚焦于“穿越深度时间的美国文学[即美利坚合众国文学]”，通过其他大洲、国家或地区及其事件和历史的视角阐释美国文学作品。此书的导言是对“地球作为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延伸”(“Planet as Duration and Extension”)的思考，再次与艾田蒲和斯皮瓦克的诉求遥相呼应。

以上提到的例子足以证明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和规模在过去几十年得到了极大扩展，涵盖了迄今为止难以想象的时间和空间维度。此外，也有一些颇有抱负，但在时间和地理范围上更小的研究回应了周蕾对东西方比较新方法的倡议。例如阿克巴里(Suzanne Conklin Akbari)提出的“中世纪世界文学模型”(“modeling medieval world literature”；2-17)讨论了《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曼德维尔游记》(*The Book of John Mandeville*)、《众王荣耀》(*Kebrā Nagast*)和《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勾勒了世界文学探讨中世纪文学的新路径。也可参考比克罗夫特(Alexander Beecroft)的《世界文学生态学：从古至今》(*An Ec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Day*)一书，以及德内克(Wiebke Denecke)在《世界古典文学：中日与希罗比较》(*Classical World Literatures: Sino-Japanese and Greco-Roman Comparisons*)中分别比

较希腊与罗马，中国与日本的古典文化、文明和文学的研究方法。在这两部专著中，尽管欧洲和欧洲古典文学仍是比较研究对象，但也不再是旧有的、特权意义上的比较方式，而是严格意义上与非西方文学的平等比较。在这方面，比克罗夫特的做法还沿用了波斯奈特（Hutcheson Macauley Posnett）首次提出的观念，对“从古至今”的世界文学进行全面分类——也就是所谓的“生态学”（ecology）方法——不去考虑文学或文化因素，也不特别强调西方的状况或传统（33-40）。事实上，与比克罗夫特的研究方法最为类似的例子和灵感来源是波洛克（Sheldon Pollock）于2006年出版的《人类世界的众神语言：前现代印度的梵文、文化与权力》（*The Language of the Gods in the World of Men: Sanskrit, Culture, and Power in Premodern India*）。书中，波洛克设想了“梵文化寰宇邦”（Sanskrit cosmopolis）的存在，其历史从公元年初一直延续到第二个千禧年初，地域上覆盖了南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一直延伸到爪哇。波洛克指出，这与同时期拉丁语在欧洲的流布范围极为相似。不过，波洛克的重点在于亚洲，这从他将在欧洲拉丁语的流布范围重新命名为“反寰宇邦”（countercosmopolis）中可见一斑。

达姆罗什认为楔形文字是一种“寰宇邦文字”（cosmopolitan script），在他所谓的“文字世界”（scriptworld）中起着凝聚作用，他也就此扩展了由特定语言创造的“寰宇”（cosmos）的概念。正如达姆罗什所言：“一种全球语言的领先优势倚重的是其全球化的文字，因为文字的传播远超语言本身。”例如，中国“几个世纪以来 [……] 拥有的是全国性的文字而非全国性的语言”（206）。此外，唐丽园（Karen Thornber）援引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s; 33-40），提出了用“文学接触星云”（literature contact nebulae）的概念比较各类非西方文学。唐丽园详细描绘了19世纪晚期，由中国、日本和韩国组成的东亚星云。正如她所说，“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一些持续时间最长、最为活跃的东亚艺术联结，发展之地不在个别东亚社会内部，也不在东亚和西方文学之间，而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文学世界”（462）。无独有偶，朴素媛（音译，Sowon Park）从另一角度指出：“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虽然人们越来越关注西方正典之外的文学网络，但这些研究仅限于殖民世界及西方列强影响下的后殖民国家。”同时，她指出：“泛亚帝国 [Pan-Asian Empire]（1894—1945）的非西方殖民地区——如帝国主义时期的日本、殖民时期的朝鲜和半殖民地时期的中国——与其说被边缘化，不如说被一笔带过。”因此，朴素媛的目标是“通过在学术讨论中引入东亚视角，重新调整世界文学中‘西方与其他地区’和‘中心/边缘’模式的动态关系”（web）。马宗达尔（Auritro Majumder）对南亚和印度文学，尤其是对孟加拉文学的研究也有类似抱负。他将“印度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墨西哥和苏联相联系，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古巴和刚果相联系，以及与当今的中国和美国相联系”，探讨“文学文本如何跨越国界，凸显边缘化社群，本土化（provincialize）主流历史，从而厘清边缘文学独特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他强调，“这样做的重要意义在于，‘西方’之外未能得到充

分关注的作家社群，能在审美理解上不再依赖帝国中心，而是更多地相互借鉴”（ix）。马宗达尔探讨了泰戈尔 1907 年有关世界文学的演讲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有的情感——这就是在所谓“边缘国际主义”（peripheral internationalism）的语境下进行“南南比较”（South-South comparison）的实例。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新近成果似乎部分解决了，甚至是补救了史书美和周蕾提出的问题。然而克里希纳斯瓦米所关注问题的现况却有所不同。虽然与史书美一样，克里希纳斯瓦米也注意到西方文学范式通过“勿认和误认”（non- and misrecognition）的机制吸纳非西方文学作品，但她还提到了更为根本的议题，即西方理论是所有“比较研究”的基础。换言之，只有使用西方理论才能进行比较研究，因为人们认为西方理论具有普适性，而非西方理论则局限于本土。罗伯特·杨（Robert Young）从后殖民视角出发，认为“在比较文学中，[……] 理论发挥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杆作用，比较文学研究本身也因此可以占据普适的地位”，而“欧洲理论则是比较研究的支点”。他认为“这一模式 [……] 在德语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概念中重现，即世界诸类文学无法直接进行比较，而是需以更大的世界文学为中介，在此框架中并置排列”（“The Postcolonial” 685）。不过，西方和东亚比较文学学者至少已做出一些尝试，以更公平的方式处理理论议题，同等对待非西方与西方理论。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专著包括迈纳（Earl Miner）的《比较诗学：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还有张隆溪探讨不同思想体系的《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Tao and the Logos: Literary Hermeneutics, East and West*）和《从比较到世界文学》（*From Comparison to World Literature*）——两者分别展现了西方和中国学界进行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方式。虽然上述张隆溪的论著都是用英文撰写，但在《作为比较主义者的钱锺书》（“Qian Zhongshu as Comparatist”）和《从比较到世界文学》中，他却以用中文发表文章的钱锺书为榜样，努力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跨文化理解。无独有偶，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解放理论，尤其是中国理论，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赖。毫无疑问，这一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崛起并行不悖。王宁发问，随着“‘中国热’在全世界的兴起，[中国] 文学学者 [……] 该如何重塑世界文学？”（“Global English(es)” 170）。在另一篇文章中，王宁认为，随着“世界文学 [……] 成为审美现实，文学理论的‘后理论时代’已然到来”，这让“之前被边缘化的理论话语挣脱出趋同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正统观念，成为领军力量”，“少数族裔学者或非西方学者也得以与西方和国际同行以平等的姿势进行对话”。因此，王宁得出结论，“就世界诗学而言，现在是发展中国理论话语的时机”（“On the Construction” 187）。

长久以来，学界一直主张存在或应当存在独立的中国比较文学学派，该倡议也在王宁的同行曹顺庆所著的《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得到了响应。王宁强调，曹顺庆在比较文学研究初期受到刘若愚和迈纳的影响，后期目

标则转向“发展中国本土的比较文学”(“Variation Theory” web)。他认为,曹顺庆为此所作的努力在《中外文论史》(*A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Theory*)中达到了顶峰:

该书的优势在于首次将中国文学理论置于世界文学理论的广阔语境中,凸显了中国文学理论与与众不同的特点和独特立场。同时也说明,要撰写一部全面详尽的世界文学理论史,就不能忽视非西方国家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以《文心雕龙》(刘勰著)为标志,有着独立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的中国尤其不能被忽略。(web)

除此之外,不应忘记的是,史书美、周蕾和克里希纳斯瓦米对非西方文学/文化研究的批判同样适用于西方/欧洲所谓少数或小众文学(minor or smaller literatures)研究。我们通常所说的欧洲文学,或者由此引申而来的西方文学,仅仅包括极少数欧洲语言的主流文学:从历史角度看,只包括(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学,其次是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德语和英语文学——“其他文学”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仅停留在不受关注的“其他”。换言之,“欧洲”或“西方”文学内部,并非如“东/西方文学”二元对立话语中假定或暗示的那样趋同。尽管如此,针对非西方文学研究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同样也可以适用于欧洲文学研究。例如,唐丽园的“文学接触星云”概念可以与杜里申(Dionýsz Ďurišin)在《什么是世界文学?》(*Čojesvetová literatúra?*)中提出的“文学间共同体”(interliterary communities)概念相提并论。这样一来,不仅欧洲内部的文学社群可以进行比较,还可以如杜里申和尼希(Armando Gnisci)在《地中海:文学互动网络》(*Il Mediterraneo: una rete interletteraria*)中所展示的那样,将“非欧洲”文学纳入地中海文学间网络。即使不使用杜里申的术语,这种方法也能为比较欧洲各地的各种跨文学社群打开思路。正如达依诺托(Roberto Dainotto)在《(理论上的)欧洲》(*Europe (In Theory)*)和《阿拉伯理论中隐秘的魅力》(“The Discreet Charm of the Arabist Theory”)中所说,一些欧洲文学社群与非欧洲文学社群同样有着密切联系。达依诺托将南欧(主要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文学社群和北欧(主要包括法国、英国和德国)文学社群分辨开来,认为区分二者对于阐述世界文学概念和疆域至关重要(7-29)。在他看来,在19世纪之交,相较于南欧,北欧不仅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更在文化上占据绝对优势。结果,源于南欧的文学概念、方法和见解被系统性忽略或绕过,而北欧的文学贡献却受到偏袒。例如,虽然歌德是在阅读一部翻译版本的中国小说时,才首次向他的助手埃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提到“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这一词却被普遍认为是“世界文学”相关讨论的起源,但这实际上是将世界文学的范围锁定在了欧洲文学。达依诺托从西班牙耶稣会士安德烈斯(Juan Andrés)用意大利语撰写的多卷本著作(1782—1799)中,追溯了世界文学的另一起源。与19世纪法国和德国追随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的大多数学者不同,安德烈斯没有把欧洲文学当作“自成一格”

(*sui generis*) 来讨论, 而是勾勒了欧洲文学与非欧洲文学, 特别是与阿拉伯文学的密切联系。哈桑在 2021 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议 (ACLA) 的主席致辞中进一步阐述了安德烈斯对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255-69)。

本文旨在呼吁学界不要将“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变相理解为与欧洲文学完全割裂的“新比较文学”, 这只会让欧洲文学和其他文学一样遭受排斥。恰恰相反, 无论是从世界、全球还是地球的视角出发, 我们都应该平等对待欧洲文学和所有其他文学。以往有关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如何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讨论, 现如今已转变为如何在平等基础上用特定的理论方式将欧洲/西方文学和非西方文学一起纳入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范围的问题。华威研究团队 (Warwick Research Collective [WReC]) 所提议的“融合与不均衡发展” (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 或许是一种解决方案。该团队建议“将‘世界文学’定义为世界体系的文学, 即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文学” (8)。根据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对世界体系的构想, 团队将该体系起始时间定为公元 1500 年左右。他们认为这一体系影响着整个世界, 因此用连字符联结了“世界”和“体系” (world-system), 以表明该体系不仅是“世界上”存在的“某一”体系, 而且是影响着世界方方面面的体系。重点是, 世界不同地区受世界体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均衡的。因此, “世界-文学” (world-literature) 是团队给所有记录了这种不均衡性的文学作品贴上的标签——无论这些文学作品来自享有特权的西方国家, 还是处于弱势或劣势, 甚至是受到完全压制的非西方国家。可以说, 世界文学体系影响着所有“现代”文学作品——即使是乍看上去似乎只与当地或当下主题相关的作品也不例外 (D’haen 35-50)。事实上, “融合和不均衡发展”模式也适用于“西方”/“欧洲”文学内部。例如, 在世界文学的讨论中, 工人阶级几乎常常被忽视。

穆斯格努格 (Florian Mussnug) 探讨了洪水和海平面上升造成的生态危机如何逾越东西方二元对立, 在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地球”维度影响着整个世界。然而, 这只是世界共同面临的危机逐渐进入文学视野的案例之一, 尽管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灾难对部分地区的影响比其他地区更大: 海平面上升和洪水等生态灾难; 干旱、森林砍伐和荒漠化; 疫情等医疗灾难; 人为污染; 饥荒; 起义和叛乱; 极权主义; 大规模移民、难民危机和普遍的背井离乡; 等等。这正是华威研究团队的“融合与不均衡发展”模式与新近文学研究实践的契合之处——如海瑟 (Ursula Heise) 和唐丽园等学者的环境人文研究, 及唐丽园所著《全球化疗愈: 文学、宣传与关怀》 (*Global Healing: Literature, Advocacy, Care*) 中体现的医学人文研究等。此外, 对世界共同面临的危机的关注也可以成为后殖民主义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融会贯通之处——尽管不是以既往相互质疑和对立的态度 (Young, “World Literature” 213-22; Boehmer 299-308)。后殖民研究可以通过从“身份和混杂性的准则” (Menozzi 6), 过渡到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物质主义研究, 为考

察世界上的不平等现象提供更多视角。当然，所有这些学科话语都可以在同一个富有成效的平台进行比较和分析，例如高绪（Amitav Ghosh）的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一个平台——不过这是后话了。

（本文来自“Comparing ‘West’ and ‘Rest’: Beyond Eurocentrism?”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vol. 6, no. 1, 2022, pp. 79-87.）

注释 [Note]

[1] 本文译者系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化研究系博士生。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kbari, Suzanne Conklin. “Modeling Medieval World Literature.” *Middle Eastern Literatures*, vol. 20, no. 1, 2017, pp. 2-17.
- Arac, Jonathan. “Anglo-Globalism?” *New Left Review*, no. 16, July-August 2002, pp. 35-45.
- Beecroft, Alexander. *An Ec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Day*. Verso, 2015.
- Boehmer, Elleke. “The World and the Postcolonial.” *European Review*, vol. 22, no. 2, 2014, pp. 299-308.
- Cabo Aseguinolaza, Fernando. “Dead, or a Picture of Good Health? Comparatism, Europe, and World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58, no. 4, 2006, pp. 418-35.
- Chow, Rey. “The Old/New Question of Comparison in Literary Studies: A Post-European Perspective.” *ELH*, vol. 71, no. 2, 2004, pp. 289-311.
- Dainotto, Roberto M. “The Discreet Charm of the Arabist Theory: Juan Andrés, Historicism, and the De-Centering of Montesquieu’s Europe.”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vol. 36, no. 1, 2006, pp. 7-29.
- Damrosch, David. “Scriptworlds: Writing Systems and the Forma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 68, no. 2, 2007, pp. 195-219.
- D’haen, Theo. “For ‘Global Literature,’ Anglo-Phone.” *Anglia*, vol. 135, no. 1, 2017, pp. 35-50.
- Dimock, Wai Chee. *Through Other Continents: American Literature Across Deep Time*. Princeton UP, 2006.
- Etiemble, René. “Faut-il réviser la notion de Weltliteratur?” *Essais de littérature (vraiment) générale*, Gallimard, 1975 (1964), pp. 15-36.
- . “Sur le renouveau du comparatisme en Chine Populai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 24, no. 1, 1987, pp. 1-16.
- Finsch, Norbert. “The Harlem Renaissance, 1919-1935: American Modernism, Multiple Modernities or Postcolonial Diaspora?” *Fractured Modernity: America Confronts Modern Times, 1890s to 1940s*, edited by Thomas Welskopp, et al., Oldenbourg Verlag, 2012, pp. 193-212.
- Friederich, Werner P. “On the Integrity of Our Planning.” *The Teaching of World Literature*, edited by Haskell M. Block, U of North Carolina P, 1960, pp. 9-22.
- Friedman, Susan Stanford. “World Modernisms,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ity.”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Modernisms*, edited by Mark Wolleager and Matt Eatough, Oxford UP, 2012, pp. 499-525.

- . *Planetary Modernisms: Provocations on Modernity Across Time*. Columbia UP, 2015.
- Guérard, Albert. *Preface to World Literature*.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40.
- Hassan, Wail S. “Geopolitics of Comparison: World Literature Avant la Lett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73, no. 3, 2021, pp. 255-69.
- Krishnaswamy, Revathi. “Toward World Literary Knowledges: Theor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o. 62, no. 4, 2010, pp. 399-419.
- Majumder, Auritro. *Insurgent Imaginations: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Periphery*. Cambridge UP, 2021.
- Menozi, Filippo. *World Literature, Non-Synchro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Time*.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 Moulton, Richard. *World Literature and Its Place in General Culture*. Macmillan, 1921(1911).
- Mussnug, Florian. “Passage and Flow: Oceanic Dystopia in the Self-Conscious Anthropocene.” *Passages: Moving Beyond Liminality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dited by Jens Kugele, et al., UCL Press. In press.
- Park, Sowon S. “The Pan-Asian Empire and World Literatures.”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15, no. 5, 2013, article 15, docs.lib.purdue.edu/cleweb/vol15/iss5/15/.
- Posnett, Hutcheson Macaula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Kegan Paul, Trench, 1886.
- Pratt, Mary Louise. “Arts of the Contact Zone.” *Profession*, 1991, pp. 33-40.
- Shih, Shu-Mei. “Global Literature and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PMLA*, vol. 119, no. 1, 2004, pp. 16-30.
- Thornber, Karen Laura. “Rethinking the World in World Literature: East Asia and Literary Contact Nebulae.” *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 edited by David Damrosch, Wiley Blackwell, 2014, pp. 460-79.
- Wang, Ning. “Global English(es) and Global Chinese(s): Toward Rewriting a New Literary History in 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9, no. 63, 2010, pp. 159-74.
- . “Variation The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Book Review Article about Cao’s Work.”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15, no. 6, 2013, CLCWeb: Article 18, doi.org/10.7771/1481-4374.2371.
- . “On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et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 36, no. 3, 2015, pp. 186-96.
- WReC (Warwick Research Collective). *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 Towards a New Theory of World Literature*. Liverpool UP, 2015.
- Young, Robert J. C. “The Postcolonial Comparative.” *PMLA*, vol. 128, no. 3, 2013, pp. 683-89.
- . “World Literature and Postcolonialism.”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edited by Theo D’haen, et al., Routledge, 2012, pp. 213-22.

FLC

翻 译 研 究

巴恩斯通毛泽东诗词英译原则探微

◎ 侯奇焜

内容提要: 毛泽东诗词的英译传播不仅让世界更加理解毛泽东及其诗人身份, 也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积极作用, 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考察美国诗人巴恩斯通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 其英译缘起及其翻译策略与方法, 认为巴恩斯通的翻译原则可归结为三点, 即逐词对译的翻译方法、对等直译的译诗风格和区分读者、有的放矢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 威利斯·巴恩斯通 毛泽东诗词 英译原则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3-0122-09

基金项目: 湖南省“十四五”时期社科重大学术和文化研究专项项目“湖湘经典英译与传播研究”(21ZDAZ21); 湖南省社科基金外语科研联合项目“域外毛泽东诗词英译影响力研究”(19WLH20)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3.012

Title: A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ao Zedong's Poems by Willis Barnstone

Abstrac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Mao Zedong's poems has allowed the world to better understand Mao Zedong and his identity as a poet, which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rategy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ou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ao Zedong's poems translated by Willis Barnston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ranslator's thoughts th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poetry translation, and tries to analyze his three translation principles which can be concluded as follows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literal translation with equivalence and the specific and divers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readers of different foreign language levels and experiences.

Keywords: Willis Barnstone, Mao Zedong's poems, translation principles

Author: Qikun Hou, Lecturer,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也是一位诗人。1972年,巴恩斯通与同校的华裔教授郭清波(Ko Ching-po)合作翻译的《毛泽东诗词》(*The Poems of Mao Tse-tung*)英译本由纽约哈珀与罗(Harper and Row)联合出版公司出版。该译本是中西译者合作翻译模式下的代表译本,也是英语世界影响较大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之一。华裔合作译者提供了必需的汉语历史文化知识,帮助西方译者更好地理解与把握诗词含义及意境,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东西方的历史文化差异。由于巴恩斯通译本的影响力较大,传播范围较广,学界已有一些关于该译本翻译策略及方法的研究。顾森和李崇月聚焦毛泽东诗词的词牌名翻译,将巴恩斯通的省译策略归类为“零译法”(87);郑静立足意识形态、赞助人及诗学三要素对比阐释毛泽东诗词三种英译本的英译策略(221);魏薇和刘明东从创译视角观照毛泽东诗词五种典型译本的创译特点,丰富了毛泽东诗词的世界文学性(30);曾清重点关注海外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副文本研究,并提出更好促进毛泽东诗词对外传播的重要启示(53);李正栓和张丹以英、美、中三国的三种不同英译本为例对《沁园春·雪》三组译者进行译者行为研究,以期探讨不同译文中的诗人形象(82)。本文将从巴恩斯通英译毛泽东诗词的缘起出发,以其英译实践为基础,管窥巴氏诗词翻译观的核心要素,为毛泽东诗词的域外传播与影响力研究提供借鉴。

一、巴恩斯通英译毛泽东诗词的缘起

巴恩斯通英译本的第一部分是译本导言,从中西比较文学视角论述了中国帝王与西方文人作诗传统的区别:“相比西方,写诗在东方或许是一件更自然和平常的举动。[……]在某种程度上,写诗已经成了一种传统诗歌模式的‘填空’,一种认字的证明。”(Barnstone and Ko 17)辩证看待毛泽东及其诗人身份是客观分析和理解毛泽东诗词的前提。巴恩斯通作为西方诗人能主动译介毛泽东诗词,并拥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透彻的文学洞察力,无疑为我们研究毛泽东诗词英译活动提供了中西文学比较的视野与维度。

巴恩斯通之所以能够英译毛泽东诗词自有充足的条件与动因,具体归结如下:首先是文学素养与专业训练。巴恩斯通接受过系统而良好的文学训练,既有西方诗歌传统的熏染,又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中国古典诗词。这些教育背景在他的知识体系中形成了中国诗歌意象与西方诗歌传统的相互交融,为他成为英语诗人以及翻译毛泽东诗词打下了基础。其次是外界的诱因。英国诗人白英(Robert Payne)曾英译毛泽东诗词,他在巴黎时曾与巴恩斯通谈及毛泽东诗词,激发了后者对毛泽东诗人身份的好奇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巴恩斯通译本的诞生。最后是诗人兼译者的身份。巴恩斯通是一位深谙多国语言、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大学教授和诗人,也是东亚和中国政治历史方面的专家。他从东西方诗歌比较的视角

出发,采取偏归化的自由体译诗方法,结合当时东亚的政治文化背景等因素,从一位西方诗人的角度传译了毛泽东诗词的意蕴。

英语世界的毛泽东诗词英译大多是希望通过译介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只有深入认识和了解毛泽东诗词,才能真正推动毛泽东诗人形象的世界传播。因此,马新强和杨阳认为英美等国“所发行的译本更多将焦点置于回顾及评述中国革命运动历史以及毛泽东在这段历史中的角色定位问题”(98),作为诗人心路历程与中国革命进程诗性表达的毛泽东诗词成为重要的佐证。翻译环境、翻译目的和目标读者的区别能对文学翻译的译本属性产生一定的影响,也能决定相关译本各不相同的翻译走向和归属,迄今为止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能为此话题提供不错的翻译研究语料。

二、巴恩斯通英译毛泽东诗词的原则

巴恩斯通是一位深谙英语诗歌传统的诗人,受过良好的诗歌训练与文学教育,他曾多次接触并研究中国传统诗词,也曾在中国居住和任教。从其英语诗歌创作、汉英诗词翻译成就及与中国的渊源来看,巴恩斯通的诗学理念与翻译思想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 逐词对译的翻译方法

巴恩斯通沿袭了英语译诗中自韦利(Arthur Waley)以降的逐字对译翻译法,重视译诗中异质文化意象的凸显与传递。毛泽东诗词巴译本的翻译说明开宗明义地谈到汉诗英译中的意象:“因为中国诗歌非常依赖于意象,而意象翻译相对于其他诗歌翻译显得更容易且损失部分较少,我们已有一个始于韦利的优秀英译汉诗传统。庞德的《诗章》,雷克思罗斯、佩恩、凯泽等的翻译,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译诗。它们读起来像诗。”(Barnstone and Ko 141)针对西方诗歌创作和翻译的意象传统,王宏印曾评价说:“对于中国诗歌中的意象问题的极端重视,以及翻译的可能性的自信,是亚瑟·威利和艾兹拉·庞德意象翻译的传统,源远流长,而且后继有人。”(31)巴恩斯通在阐述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翻译策略及方法时说:“此译本与其他译本的区别还在于专有名词,特别是地名,往往是意译而不是音译,有时也会给出汉语名称及其英语意思。九嶷山成了‘九个问题山’。”(Barnstone and Ko 141)因为是英语诗人与华裔同事之间的合作翻译,译本容易走向翻译极端,如何协调归化与异化的矛盾是巴译本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时译者若采取折中的翻译方式和双重翻译策略或许能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试看《七律·答友人》的巴译本翻译:

表1 《七律·答友人》巴译文

原文	巴译文
答友人 九嶷山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To a Friend White clouds hang over the Mountain of Nine Questions. The daughters of the emperor rode the wind down to a jade meadow where a thousand tears fell and dappled the bamboo. Now their dresses are a hundred folds of silk, a million sunclouds of red blossoms. In Tungting Lake snow waves rise to heaven and people of the Orange Island sing and make the earth vibrate. I want to dream of the immense land of the hibiscus shiny with young morning sun.

从表1可知，巴译本的附录部分在介绍中国诗律时详细区分了中国古典诗与词的形式和体例：“律诗包括八行，每行必须是五音节或七音节，全诗使用相同的韵脚。五律在第二、四、六、八行押尾韵；七律可在第一行押尾韵，然后在二、四、六和第八行押同样的韵。”（Barnstone and Ko 143）巴恩斯通作为英语诗人，深谙英语诗歌传统，又比较了解中国古典诗词体例，因此译文翻译效果总体可算上乘。

在翻译中国地名、文化词或数词时，巴恩斯通多采取直译方式，例如上文的“九嶷山”被译为“the Mountain of Nine Questions”，并以译文注释具体解释，再如将“乘风”译为“rode the wind”，以及将数字“万”和“百”直译为“a million”和“a hundred”。对于英语译者，我们无法苛求他们能够完全转译汉语文化的内涵，逐字对译的处理方式不仅能保留汉语诗词中的某些特定意象，甚至可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上例译文以“a jade meadow”译“翠微”一词便显出灵动贴合的效果，具有英语诗歌的典型韵味。但是，巴译文在保持汉诗形式一致性方面还不够到位，上下阙均存在某些诗句译文过长的情况，译者只得强行划分诗行，勉强维持译诗与原诗的形式对应，有译散的可能性。汉英语言的结构与表达差异造成译文在保持诗形与意义对等方面的困难，容易产生形式或意思的出入，但译者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尽可能缩小这种差异。

巴恩斯通“逐词对译”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忠实地将重要信息传译出去。他非常重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认为译者既是作家的读者，又是读者的作家。对于不懂译出语的读者来说，译者就是他们的“原文”作者，而对熟悉译出语的读者而言，译者则变为原文的第一位读者。刘重德先生曾提到巴恩斯通有关翻译过程的观点对他有所启发：

按照巴氏的程式，就是译者首先是原作者的读者，第一步必须读通读懂原作

所包括的一切，从思想感情、形象直到风格，然后把融会于心的原作的的内容直到形式动笔用译入语来重新写作（我们平时所说的翻译），于是就生产出翻译文本，其结果也就有了重新阅读者（译者译文的读者）（81）

按照英国评论家萨瓦利（Theodore Savory）所说，译者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必须承认自己只是沟通作者和读者思想的桥梁和渠道。因此，巴恩斯通称译者为“第二作者”或是“第一作者的合作者”。关于翻译的性质，巴恩斯通认为翻译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如果翻译是科学，那么一切形式的写作都是科学，把翻译称为科学“到头来他会起一种降低作用。绘画、音乐作品，小说和诗都不是科学，文学翻译也不是科学。把文学翻译局限于科学，同时也就取消它的艺术——直觉、美学和模糊性”（刘重德 78）。翻译诗学与这门艺术的许多方面息息相关，尤其是译诗的艺术。巴恩斯认为，译诗必须像诗，而且必须能歌唱，如果诗歌译文不能歌唱，翻译就归于失败。诗歌的语音成分十分重要，失去它，译诗就没有吸引力，“这样的翻译只在读外文文本中起一种词典的作用。从这些诗译过来的信息只是词汇的信息；它永远不能歌唱，而且也往往文理不通”（76）。这样的论点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巴恩斯通关于诗歌翻译的理论观点，值得我们探讨。

（二）对等直译的译诗风格

如前所述，巴恩斯通沿袭自韦利和庞德以降的自由诗体译诗传统，通过逐词对译的方法最大限度地传递汉诗的诗意。他在《翻译诗学：历史、理论、实践》（*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 History, Theory, Practice*）中提道：“本世纪[20世纪]的第一部分中，庞德是‘伟大的推动者’和‘伟大的译者’，[……]庞德的原创文库基本上源于或脱胎于他的翻译及翻译的文本记忆。”（9）巴恩斯通赞成好的翻译就是好的文学，主张将译诗也看成译者的原创诗，并且要断绝译诗与原诗之间的彼此联系和渊源，由此才能提高译者及其译诗在目标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一般读者因为原诗的异域属性即语言的天然屏障阻碍了读者直接阅读与理解原诗的含义及意境，故译者须使译诗服从于原诗，保持译诗的意义忠实及其与原诗的互文关系。这种文学互文关联实际上源于译诗读者心中某种无法割舍的文学假设与想象。巴恩斯通认为，译作因其自主独立性而与原作区别开来，译作是译者与原作者的某种和谐共存，读者阅读译作实际上是在阅读由一位“读者”（译者）翻译另一位作者（原作者）作品而重新写作的一部新作品（13）。因此，在他看来，深入完整地看和听完译者眼前的诗歌才能对得起译作，才能串通今昔，才能通过现在的译作与原诗的作者，使所有读者为自己的阅读经历感觉到荣耀。

除对中国诗歌意象及其传统有较深了解外，巴恩斯通还精通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及希腊语等语言，这让他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接触和了解世界各国的优秀诗歌及其传统。在读

大学时，他便通过西班牙语和希腊语，在安达卢西亚流行歌和英美意象派诗人那里见识过中国诗歌意象的清明（clarity），这为他在之后的翻译活动中把握中国诗词意象打下坚实基础。在谈到中国诗歌的清晰意象时他说：“因为中国诗歌意象的极端清晰度，甚至在诗歌的语音和韵律节奏等丰富传统被忽略时，英译汉诗仍然能读，而且在富有技巧的翻译者手中，一种贴近、适度的逐字直译译文也能取得良好效果。”（49）。

受到中国诗歌意象运用的影响，以庞德为代表的英美诗人将汉诗重视营造意象的诗歌手法引入英诗创作，以简洁明快的诗行节奏突出诗歌的画面感，开创了英语意象派新诗风，巴恩斯通的译诗便可视为其继承者之一。巴氏的毛泽东诗词英译同样重点突出意象派诗歌风格，抓住代表性意象传译出汉诗的整体意境之美，例如《忆秦娥·娄山关》的巴译文：

表2 《忆秦娥·娄山关》巴译文

原文	巴译文
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Loushan Pass A hard west wind, in the vast frozen air wild geese shriek to the morning moon, frozen morning moon. Horse hoofs shatter the air and the bugle sobs. The grim pass is like iron yet today we will cross the summit in one step, cross the summit. Before us greenblue mountains are like the sea, the dying sun like blood.

汉语诗词的创作历来重视营造自然空灵的意象景致，以庞德为代表的英语诗人从汉字结构和汉诗英译的经验中总结出汉语诗歌的意象特征，将之引入英语诗歌，创新了当时的英诗写作手法。英美意象派诗歌创作的关键是通过简洁有力的构词和轻快跳动的节奏来构筑诗歌意境。以表2中的译文为例，上阕开头一句中的“西风烈”译为“a hard west wind”，“west wind”在英语中表示和煦暖风之意，而“hard”却能让人心生寒意，构成强烈的心理反差。此外，译者还以“the vast frozen air”译“长空”，以“frozen morning moon”译“霜晨月”，用重复“frozen”的方式突出寒意，似乎读者也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诗词的逼人寒气。诗词下阕中作者连用了三个比喻词“如”，以此形象地勾描出自然景观及作者内心的复杂情感。译者翻译时也以三个“like”与之对应，简单明了地指出喻体“iron”“the sea”和“blood”。译文很好地保持了原诗的诗眼，节奏和步调与原诗一致，情绪调动充分，有助于英语读者领会原诗诗义感受其修辞手法，产生诗词感悟的共鸣。

(三) 区分读者、有的放矢的翻译策略

中西文化具有共通性，中西诗歌反映了人类共同的思想情感。作为有诗人身份的西方译者，巴恩斯通在把握汉诗意象、韵律和诗性等方面更具优势，同时他也熟知西方诗歌传统与表达形式，这使得他的译诗更加适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期待视野。试以《念奴娇·昆仑》的巴译文为例进行分析。

表3 《念奴娇·昆仑》巴译文

原文	巴译文
昆仑 横空出世， 莽昆仑， 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 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 江河横溢， 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 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Kunlun Moutain Over the earth the greenblue monster Kunlun who has seen all spring color and passion of men. Three million dragons of white jade soar and freeze the whole sky with snow. When a summer sun heats the globe river flood and men turn into fish and turtles. Who can judge a thousand years of accomplishments or failures? Kunlun, you don't need all that height or snow. If I could lean on heaven, grab my sword, and cut you in three parts, I would send one to Europe, one to America, and keep one part here in China that the world have peace and the globe share the same heat and ice.

从表3可知，巴译文采取散体译诗策略，试图通过诗行编排和分层描述凸显原诗色彩层次与诗词韵味，但英译文中不规则的缩进、大小写把中国诗歌的分行形式断裂成许多长短诗行，以及词牌名的省译等，都可能使不懂汉语的英语读者丢失对中国古典诗词诗形式特征的认知与理解，故而英译文对原词的诗歌音律特征保留不足，在准确把握并合理传递原诗诗形和诗意方面有所欠缺。考虑到英语译者身份及汉诗英译的传译难度，即便有中国同事从旁协助，巴恩斯通在理解诗词含义时仍不免有误，在保留汉诗形式特征方面也有一些不到位的痕迹，例如表3中的“人或为鱼鳖”，有学者将此句意义解释为“江河横溢，洪水成灾，人也许为鱼鳖所食”（公木 113），巴译文译成“men turn into fish and turtles”似有不妥，未能准确表达诗词原意。巴译文的目标读者多为不懂汉语的西方读者，故准确把握及传译原始意义显得尤为重要，也是西方世界正确认识和理解毛泽东诗词的基础。巴译文

采取的逐词对译方法虽令诗意简单明了，但也容易使读者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巴恩斯通认为，译诗必须区分读者对象的外语水平和期待视野等因素，采取具体分析、有的放矢的翻译策略。一般的诗歌读者分为两种：一是精通双语者，对于他们，译诗或许无法完全复制原诗的意境和韵律，只能作为欣赏品评的对象或文学谈论的话题；二是不识外语者，他们因为没有原诗的意义作为参照，故将译诗当作“原诗”来读，不太明白译者在译诗中的辛苦付出与“锱铢必较”。如果译诗属于上乘之作，则会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甚至使其产生学习外语而读原诗的冲动之念，令人想到钱锺书先生所说的翻译能起到的“媒”的作用；如果译诗水平良莠不齐，则又可能将读者的阅读热情浇灭，甚至会起到“讹”的效果，如此则真可谓译犹不译矣。因此，译者译诗犹如园丁移植树木，方法和策略正确与否可能产生橘枳之分。中外诗歌的交流实践是人类思维共通性的突出表现，东西方思想感情中孕育出的普遍精神内核保证全人类都能共同分享杰出的文化成果，达到跨国界的文化交流。译诗体现译者的诗歌创作水平和想象力，它可以仿制品的身份脱离原诗独自发展，可视为原诗生命的延续。随着时间的推移，译诗甚至可能替代最初的原诗，此观点恰似本雅明所说的译作是原作的来世，也颇有文物界赝品替代真品的意味。对于译诗，王佐良先生曾说：“首先显而易见的一点：只有诗人才能把诗译好。其次，译诗对原作者和译者都有益处。原作者有了新读者，译者接触了新的影响力量，尽管受限于新的格律。”（205）王佐良先生赞同诗人译诗，认为翻译能为诗人的创作提供充分的养分，两者彼此促进，相辅相成。此外，语言活跃程度于文学翻译，特别是译诗而言，也是极为关键的要素，唯此方能让译者发挥自己的语言天赋和诗歌创作才能，创译出既符合语言规律又能押韵的经典好诗。巴恩斯通与王佐良先生的译诗观点近似，体现了中外诗人译家在译诗思想上的互通与契合，也是人类思维模式与情感体验彼此融通的表现之一。在将外国诗歌或诗词译成本国文字时，巴恩斯通主张以本国通行的诗体翻译外国诗歌或诗词，无须套用外来诗歌成分，如韵脚、诗行、节奏和音步等的规律，使译诗既失去了原诗的艺术魅力，又不符合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兴趣，反之亦然。

因为特殊的领袖身份与政治地位，毛泽东的诗词外译与国际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巴恩斯通的英译本则是其典型译本之一。由于西方译者身份背景的不同及文化差异，巴恩斯通在英译毛泽东诗词时的误译在所难免。他在诗意理解与译文表达方面的确存在一些偏差，但也并非有意为之。总的来说，巴恩斯通的翻译为毛泽东诗词的国际传播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我们研究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与传播，重点是考察其典型译本生产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语境，分析译者的独特翻译策略及方法，探寻译本的传播路径与效果，总结翻译与传播中的经验。毛泽东诗词的对外翻译与传播将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增强我国文化自信、不断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认知度与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世界各民族平等和谐地沟通交流做出贡献。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rnstone, Willis. *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Yale UP, 1993.
- Barnstone, Willis, and Ching-po Ko. *The Poems of Mao Tse-tung*.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1972.
- Gong, Mu. *A Study of Mao Zedong's Poems*. Changchun Publishing, 1994. [公木:《毛泽东诗词鉴赏》。长春: 长春出版社, 1994。]
- Gu, Sen, and Chongyue Li. "A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Tune Nam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Tune Names of Mao Ze-dong's Ci Poems." *Journal of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isty (Social Science)*, vol. 20, no. 4, 2008, pp. 86-88. [顾森、李崇月:《浅谈词牌名的翻译——以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为例》, 载《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第86-88页。]
- Li, Zhengshuan, and Dan Zhang. "A Study of Translator's Behavior on Mao Zedong's Poem *Qingyuanchun Snow*." *Foreign Lanugage Education*, vol. 42, no. 3, 2021, pp. 82-87. [李正栓、张丹:《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译者行为研究》, 载《外语教学》2021年第3期, 第82-87页。]
- Liu, Zhongde. *A Study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China Translation Corporation, 2003. [刘重德:《西方译论研究》。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
- Ma, Xinqiang, and Yang Yang. "The Diachronic Study of English Versions of Mao Zedong's Poems." *Publishing Research*, no. 12, 2015, pp. 96-98. [马新强、杨阳:《毛泽东诗词英译版本历时性研究》, 载《出版发行研究》2015年第12期, 第96-98页。]
- Wang, Hongyin. Prefa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Versions of Mao Zedong's Poem*, by Zhizhong Zha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8, pp. 1-63. [王宏印:《序》, 载张智中《毛泽东诗词英译比较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第1-63页。]
- Wang, Zuoliang. *Degrees of Affinit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王佐良:《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 Wei, Wei, and Mingdong Liu. "On Creative Translation of Mao Zedong's Poetry: Taking Five English Versions of 'Qingyuanchun·Changsha'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vol. 17, no. 3, 2017, pp. 30-35. [魏薇、刘明东:《毛泽东诗词创译探析——以〈沁园春·长沙〉英译为例》, 载《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第30-35页。]
- Zeng, Qing. "Paratext in the Overseas Translation of Mao Zedong's Poems." *Journal of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vol. 18, no. 4, 2018, pp. 53-57. [曾清:《海外毛泽东诗词英译副文本研究》, 载《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第53-57页。]
- Zheng, Jing. "An Analysi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Mao Zedong's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ysystem Theory—With Reference to the Three Versions of Mao Zedong's Poem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no. 5, 2011, pp. 221, 223. [郑静:《多元视角下毛泽东诗词的英译策略阐释——以毛泽东诗词三个英译本为例》, 载《科技资讯》2011年第5期, 第221, 223页。]

◇责任编辑: 马纳克

FLC

语 言 学 研 究

英语新闻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等级及其认知阐释

◎ 齐新刚 邓云华

内容提要: 英语新闻语篇中, 模糊限制语具有特殊的语用价值, 但已有研究未能揭示模糊限制语语用动因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从主观性角度出发, 根据视角、认识和情感三个维度构建了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连续统,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等级: 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 > 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 > 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这三种类型模糊限制语的语用动因反映了言者不同程度的主观性, 凸显了概念化主体对命题内容的客观性、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识解。本研究为模糊限制语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对模糊限制语的理论构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同时对新闻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教学也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 模糊限制语 客观性 主观性 交互主观性 识解

中图分类号: H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3-0131-13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教改项目“互动式元话语框架下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研究”(HNJC-2021-0405); 湖南省社科基金外语联合项目“英汉新闻语篇中语用含糊的批评性比较研究”(16WHLH26)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3.013

Title: A Cognitive Study on the Subjectivity Hierarchy of Hedging in English News Discourse

Abstract: Hedging serves special pragmatic functions in English news discourse. However, current research has failed to reveal the interrelationships of the pragmatic motivations of hedging.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ubjectivi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ntinuum of hedging with respect to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ubjectivity, namely perspective, epistemic modality and affect, and hence establishes a subjectivity hierarchy of hedging: reader-oriented hedges > writer-oriented hedges > accuracy-oriented hedges. The pragmatic motivations underlying the three types of hedging are suggestive of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speakers' subjectivity, highlighting an objective, subjective and intersubjective construal of propositional content on the part of conceptualizers respectively. Our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hedging, shedding light on i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in English news discourse.

Keywords: hedging, objectivity, subjectivity, intersubjectivity, construal

Authors: Xingang Qi, Lecturer,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Yunhua Deng, Professor,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模糊限制语因其特殊的语义特征和语用功能而备受国内外学界的关注,成为语言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特定语篇类型特别是学术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主要涉及科研论文中模糊限制语的语用功能(Salager-Meyer 149-70; Hyland, "Writing Without Conviction?" 433-54; 蒋婷 47-51)、跨语言和跨文化差异性(Hu and Cao 2795-2809; Yang 23-36; Chen and Zhang 1-34; Dontcheva-Navratilova 163-84; 徐江等 46-55; 陈成辉等 36-43; 刘应亮、陈洋 81-89)及元话语功能(Weatherall 317-37; Chen and Hu 1-12; Liu and Tseng 1-16; 高芸 78-83; 鲜丽霞 150-56)。这些研究虽然有利于加深我们对模糊限制语的认识,但主要局限于探讨模糊限制语在学术语篇中的语用价值。

由于新闻语篇有着鲜明的特点,新闻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受学术语篇研究取向的影响,新闻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其独特的语篇语用功能(Jensen 347-69; Fraser 201-13; Teng 1688-94; Rabab'ah and Rumman 157-85; Peterlin and Moe 1-12)、元语用策略(Ponterotto 175-207; Shafqat et al. 126-37)以及模糊限制语的批评话语分析(Zhang 54-67)。总体而言,目前关于英语新闻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研究视角单一,仅仅是孤立地探讨模糊限制语在新闻语篇中的语用价值,未能揭示其语用动因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对不同类型模糊限制语语用动因深层的认知分析。实际上,模糊限制语是说话人主观性的具体表现。从主观性的角度探讨英语新闻语篇中的模糊限制语,能够更好地概括不同类型模糊限制语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其认知动因,加深对其本质的认识。因此,本研究拟考察新闻语篇中使用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问题,并从识解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认知阐释。

一、模糊限制语的类型

模糊限制语范畴具有异质性,缺乏明确的、一致的语义特征与句法形式特征,无法从语义和句法的角度进行合理分类,但具有特殊的语用价值,比较适合从语用功能的角度出发划分其类型。本质上,模糊限制语具有多重语用价值(Hyland, *Hedging in Scientific* 157),既表达言者对命题内容的态度,又表达言者对听者的态度,因此海兰德主张把模糊限制语置于一定的社会语用语境下进行考察,这样才能更好地解释其多功能性(Hyland, "Writing Without Conviction?" 433-54)。参照海兰德的分析框架,我们也将英语新闻语篇中的模糊限制语分为以下三种类型: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accuracy-oriented hedges)、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writer-oriented hedges)和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reader-oriented hedges)。

(一) 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

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旨在提升命题内容的准确性,是作者准确、可靠地陈述可变结果或表达不确定观点的重要手段。具体来说,它体现了作者对命题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关注,其主要功能在于确保命题信息的准确性(Hyland, *Hedging in Scientific* 162-63)。就新闻语篇

而言,它有利于作者准确表明信息的状态,增强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使读者能够区分事实与潜在的或推理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并不意味着作者对所陈述的信息有十足的把握,但此时作者对命题的承诺要么未被涉及,要么仅仅居于次要地位。简而言之,它的主要功能在于准确地表明信息的状态,而不是强调作者对命题真值的个人承诺。

英语新闻语篇中,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常见表现形式有强化语、减弱语和语体附加语。这三种模糊限制语也被称为属性模糊限制语,它们帮助作者准确表达客观现实与语言描述之间的偏差(Hyland, *Hedging in Scientific* 163)。例如:

(1) So after the tax hikes wages and salaries are now *barely* growing after inflation. (*Forbes*, Apr. 17, 2013)

(2) Deutsche Post has been *partially* privatised but retains a lucrative monopoly of the letters market. (*The Economist*, Jan. 31, 2002)

例(1)使用了减弱语“barely”,几乎否定了它所修饰行为动作的发生,描述了高通胀背景下美国普通民众真实的薪资状况。例(2)使用了语体附加语“partially”,表明德国邮政实际的私有化程度。这两个用例中的模糊限制语均有助于提升命题内容表达的精确度。

除此之外,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还可以表现为内容附加语、情态助词、认识情态名词、认识情态形容词和副词等。这类模糊限制语也被称为可靠性模糊限制语,用来表明作者对命题信息的理解在何种程度上为真(166)。例如:

(3) Balotelli was not a Brescia fan as a child; he admitted in 2009 that he supported A.C. Milan, his honesty *apparently* unencumbered by the fact that at the time he was playing for Milan's fierce city rival, Internazionale. (*New York Times*, Jan. 2, 2020)

(4) The ships *may* be at a standstill but the 15,000 longshoremen, along with some of the 18,000 registered truckers at LA port alone, continue to work day and night while adding on extra time for cleaning and social distancing as part of new health and safety restrictions. (*The Telegraph*, Dec. 9, 2020)

(5) Subsequent experiments by the scientists showed that the protein *probably* does not breach the blood-brain barrier and act directly on the brain, Dr. Villeda says. (*New York Times*, July 15, 2020)

例(3)使用了内容附加语“apparently”,强调作者对命题内容所作的陈述是准确、可靠的。例(4)和例(5)分别使用了情态助词“may”和认识情态副词“probably”,如实地表明了作者对命题信息的认识状态。例(3)和(5)中模糊限制语的主要功能在于如实地描述作者所掌握的信息状态,而非减轻作者对命题真值的承诺,因而仍然属于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范畴。

（二）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

虽然新闻语篇以公正、客观著称，但作者往往巧妙地将其个人或代表机构的意识形态附着在新闻报道之中（吕伊哲 24-35），一个重要的实现手段就是借助于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与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不同，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涉及更高层次的主张。前者是以命题为焦点，通过明确交代命题信息的实际状态或命题信息的理解方式，来提升命题信息的精确度；后者是以作者为焦点，作者通过限制其对命题信息的个人承诺，避免因命题信息被否定而可能承担的不利后果（Hyland, *Hedging in Scientific* 170-71）。新闻语篇中，影响力与价值高度相关。在追求最大影响力的同时，作者必然会减轻命题信息的确定程度，拉开个人承诺与命题信息之间的距离，以免出现失误而遭受严重的后果，从而实现自我保护。

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最显著的特点是作者作为施事在命题内容中的缺失（172）。在英语新闻语篇中，它主要表现为非人称结构和非施事名词短语作主语的插入语等句法形式。例如：

(6) The vast majority *are assumed* to be pets traveling with their owners, *the report said*; the USDA issued only about 2,900 permits for dogs destined to be resold to consumers. (*The Washington Post*, Jun. 24, 2020)

(7)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China-averse special interests have even paid US journalists to publish stories biased against China's policies, to include encouraging a US-China confrontation. (*Global Times*, May 27, 2021)

例（6）同时使用了转述型被动式和非施事名词性成分作主语的插入语，例（7）除了被动式，还使用了虚主语。两个例子均隐去了被动式的施事短语，降低了作者对命题信息的介入程度，从而大大减轻了作者所要承担的责任。

（三）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

模糊限制语不仅有助于提升命题信息的准确性，减轻作者对命题真值的个人承诺，还具有人际功能。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体现了作者邀请读者进入语篇对话的意图，以期待读者对命题信息产生同样的反应。因此，此类模糊限制语并非直接将作者的主张强行施加在读者身上，而是让读者站在其立场上参与到命题信息的协商之中，避免威胁读者的消极面子（177-84）。

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在英语新闻语篇中常见的表现形式有人称代词、认识情态动词等。例如：

(8) We observe the disconnect between their public face and private pain and grieve that anyone could keep up such an excruciating charade. (*The Washington Post*, Jun. 9, 2018)

(9) Apart from Mr. Pompeo's declaration in Februar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and will not ever recognize" Russia's claim to the region, though, Mr. Trump's proposal *suggests* the United

States is moving on. (*New York Times*, Jun. 1, 2020)

例(8)使用了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这一自我提及语表明命题信息仅仅是作者的个人看法,有效地降低了命题信息的普遍性。作者通过移情于读者,邀请读者与其站在同样的主观立场,对命题信息做出一致的推理判断。例(9)中的认识情态动词起着缓和语气的作用,暗示命题信息只是多个可能的选择之一,需要读者参与到命题信息的对话协商中,给读者留出了充足的探讨余地,有效地照顾了读者的面子需求。

除了词汇手段,新闻语篇中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还经常采用条件句、疑问句等句法手段。例如:

(10) The 7% forecast is for a scenario where the strictest coronavirus lockdown rules remain in place all year across much of the globe; *if they are lifted sooner*, the reduction would be closer to 4%. (*Los Angeles Times*, May 19, 2020)

(11) So, now that it is open to the public, *could the prison become a new holy site for Christian pilgrims or even change the path of the Via Dolorosa?* (*The Washington Post*, Jan. 4, 2015)

例(10)使用了条件句,表明作者对命题真值的成立条件所持的试探性态度,以期读者认同其应尽快解除防疫措施的主张。例(11)使用了疑问句,体现了作者期待读者站在相同的主观立场上对命题信息做出回应的愿望。通过这类间接言语行为,作者间接地实施了邀请读者参与命题信息建构的言语行为。

概而言之,这三种类型的模糊限制语各自有着独特的语用动因。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旨在客观准确地表达命题内容的信息状态,凸显作者对命题内容与现实世界之间关系的关注。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倾向于表达作者对命题信息的介入程度,以实现作者的自我保护意图,凸显作者对自身的关注。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具有重要的人际功能,凸显作者对读者面子需求的关注。

二、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等级

主观性(subjectivity)也被称为言者的印记,指的是说话人在话语中的自我表达及其视角或态度的呈现(Finegan 1-15)。语言必然带有言者自我表达的印记(沈家焯 268-275),主观性普遍存在于语言交际之中(邓云华、齐新刚 699-711)。同时,语言交际还带有明显的交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色彩。所谓的交互主观性,是指言者通过语言结构及其他手段表达自己对听者的态度、信念,尤其是对听者的面子或个人形象的关注(Traugott 124-39)。

语言的主观性主要表现在说话人的视角、情感和认识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说话人的视角指说话人观察客观事件或状态的角度,或对其进行叙述的出发点;说话人的认识则与说话人对话语命题信息的认识情态有关;说话人的情感关涉说话人对话语命题信息的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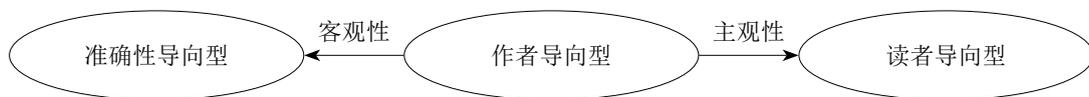
表达 (Finegan 1-15)。事实上,语言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是一个程度问题。当说话人说话时,其视角、认识和情感,或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说话人的话语,这些与说话人有关的因素必然会不同程度地体现在说话人的话语中(刘瑾 9-12)。正因为如此,语言运用往往会表现出一个主观性等级。

根据语言主观性的三个方面,结合第一节对模糊限制语类型的讨论,我们可以分别描述三类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程度,如表 1 所示。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是从客观的视角陈述命题信息的实际状态,几乎不涉及说话人的认识情态和情感表达。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是以作者为焦点,旨在降低作者对命题真值的个人承诺,减轻对命题信息认识地位的确程度,从而实现作者的自我保护。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从作者和读者互动的视角,通过移情手段使作者和读者站在同一认识立场,增加了命题信息的可商讨性。

表 1 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程度

	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	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	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
视角	+	+	+
认识	-	+	+
情感	-	-	+

由于范畴的边界具有模糊性,三者之间的界限并非总是泾渭分明,而是构成一个连续统。基于三者不同的主观性表现程度,我们可以构建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连续统,如图 1 所示:



▲图 1 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连续统

在英语新闻语篇中,三类模糊限制语表现出了一个主观性等级。如图 1 所示,越靠近左端的客观性越强,而越靠近右端的主观性越强。左端的准确导向型模糊限制语倾向于表现命题信息的客观性,其主要语用价值在于提升命题信息的准确性。右端的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倾向于表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互主观性,有助于增加作者与读者理解命题信息的可商讨性。这两种类型的模糊限制语分别体现了作者对命题和读者的关注。而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则处于二者之间,倾向于表现作者的主观性,体现了作者对自身的关注。因此,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等级可以概括为: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 > 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 > 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例如:

(12) Dock workers in this West African coastal city raised the alarm, port staff said, after news of the massive blast in Beirut, which killed *around* 200 people and injured *at least* 6,500. (*New*

York Times, Aug. 31,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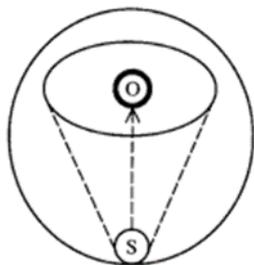
(13) Harry and Meghan also hope talks can be concluded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according to a source.* (*The Guardian*, Jan. 12, 2020)

(14) Were either Sullivan or another judge eventually to decide that it would be contrary to the public interest to dismiss the prosecution or that to do so would undermine the integrity of the judicial process, that judgment could be appealed.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5, 2020)

例(12)中,作者从客观视角出发,先后使用了around和at least两个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以便尽可能如实准确地描述贝鲁特港口爆炸事故造成的伤亡情况。例(13)使用了转述型传信标记according to a source,作者从另一概念化主体的视角出发,表明其对命题信息的认识来自第三方,有效地拉开了作者与命题信息之间的距离,减轻了作者对命题真值的个人承诺,属于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例(14)中的非真实条件句为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表明作者是从虚拟视角出发陈述命题信息,暗示作者对命题信息的试探性态度,同时间接邀请读者参与句子的命题信息建构。

三、模糊限制语主观性等级的认知阐释

主观性与主观化理论强调言者对言语事件的认知识解,认为主观性是一个重要的识解维度(Langacker, “On Subjectification” 71-89)。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对立,体现为认知情境中处于台下的观察者与台上的被观察者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Langacker, *Cognitive Grammar* 260)。如图2所示,最外面的大椭圆代表完整意识辖域,“S”和“O”分别代表概念化主体和概念化客体,小椭圆代表台上区域,最里面的粗线小圆代表注意焦点,虚线箭头表示注意力的指向。概念化主体虽然参与了概念化活动,但并未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只是充当概念化场所,其本身未获得表征,主体活动仅涉及注意力的指向。在完整意识辖域内,概念化主体的注意力指向台上区域,进而挑选某一台上成分作为注意焦点,也即是概念化客体。当整个情景呈现极性对立时,主体与客体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此时概念化主体被主观识解,具有最大主观性,而概念化客体则被客观识解,具有最大客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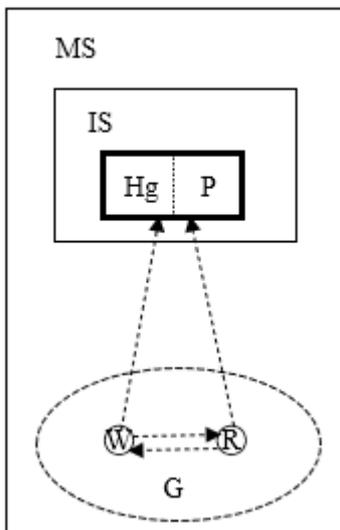
▲图2 主观识解与客观识解的非对称性

如前所述,英语新闻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表现出一个主观性等级。作者为了表现不同程度的主观性,往往选择使用不同类型模糊限制语。下面我们将从识解的角度分别对英语新闻语篇中三类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等级进行认知阐释。

(一) 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客观识解

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首要功能是提升命题信息的准确性,使作者描述的命题内容尽可能地与客观实际相符,从而降低命题信息被客观依据否定的可能性。它在新闻语篇中的使用有利于增强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作者通过该主观化策略表明信息的实际状态,使读者能够区分事实与非事实信息。

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客观识解可以借助图3中的模型来表示。“MS”代表最大辖域(maximal scope),“IS”代表直接辖域(immediate scope),分别相当于图2中的完整意识辖域和台上区域。“W”代表作者,“R”代表读者,由于意义即概念化,作者和读者作为概念化主体在每个表达式的意义中至少均有微弱的体现。虚线箭头代表概念化主体注意力的指向,作者和读者的注意力均潜在地指向直接辖域中用粗线方框表示的显面。“Hg”代表模糊限制语,“P”代表命题信息,前者对后者进行调控。反向箭头表示作者与读者在场景“G”中进行互动,但这种互动仅仅发生在用虚线椭圆表示的台下区域。



▲图3 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客观识解

从图3可见,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对命题内容的准确性进行调控,二者协同作用构建命题信息的实际状态。在使用它的语篇语境中,命题信息作为概念化客体位于台上区域,被作者和读者的注意力聚焦,概念化主体位于台下区域,可及性较弱。此时,命题信息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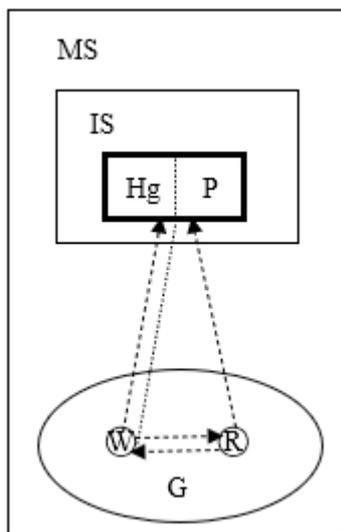
识解为具有最大客观性。例如：

(15) Generic versions of pills are *generally* between 30% and 80% cheaper than the brand names. (*Forbes*, Jun. 23, 2006)

例(15)使用了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中的语体附加语“generally”，使得语言描述更加符合现实情况，从而提升了命题信息的准确性。概念化主体仅隐现于场景中，对命题信息进行客观识解，两者呈极性对立，命题信息表现出最大客观性。

(二) 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主观识解

为实现自我保护，作者往往要减轻自己对命题真值的承诺程度，于是采用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英语新闻语篇中，作者有意拉开自己与报道内容之间的距离，以避免新闻消息被否定后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因此，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表现出了作者较大的主观性。



▲图4 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主观识解

如图4所示，此类模糊限制语反映了作者对命题信息个人承诺的调控。作者作为概念主体存在于场景中，但试图拉开自己与命题信息之间的距离，图中不带箭头的虚线即表示作者对命题信息的介入程度。正因为如此，场景的可及性明显增强，在图中用实线椭圆表示。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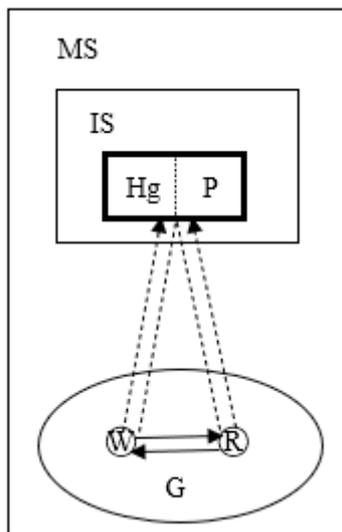
(16) Polar bear populations *are believed* to have declined in recent decades due in large part to global warming, though populations are difficult to track due to the bears' remote habitats. (*The Telegraph*, Jun. 8, 2020)

在新闻语篇中，命题信息源自作者的新闻报道，作者对命题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负

有直接责任。例(16)中的被动结构隐去了作者作为施事参与命题信息的构建,使得作者对命题真值的介入程度大为减弱。由于被动结构中施事通常被置于背景地位(齐新刚 136-40),倘若命题信息后来被客观依据所否定,施事隐现能够避免作者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有效地实现了作者自我保护的意图。

(三) 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交互主观性

在新闻语篇中,作者通常会预想其主张与读者的信念或价值观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于是积极采取应对策略。作者往往会诉诸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表明其主张只是众多可能的选项之一,并主动邀请读者参与到命题信息的对话协商中。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体现了作者对读者的态度、看法和对读者的面子或自我形象的关注。如图5所示,作者与读者在场景中互动,其在场景中的可及性明显增强,这在图中用反向实线箭头表示。通过此类模糊限制语,作者主动邀请读者参与命题协商。图中的两条不带箭头的虚线表示作者和读者一同构建命题信息。



▲图5 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交互主观性

(17) The tributes from both of these celebritie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will deepen the portrait held by casual fans; Bourdain *seems* to have had a particularly special ability to connect with those he crossed paths with. (*The Washington Post*, Jun. 09, 2018)

例(17)使用了认识情态动词 *seems*, 表明作者对命题信息持不确定态度。鉴于上文所述明星的生活有着两面性,作者对于 Bourdain 是否具有亲和力持不确定态度。为了避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读者,威胁读者的消极面子,作者通过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向读者表明自

己的描述仅仅是一种可能的信息状态,邀请读者对命题信息进行协商,以便他们根据自己掌握的相关信息对命题内容进行推理判断。该用法体现了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的交互主观性。

根据模糊限制语在英语新闻语篇中的主观性程度,本文构建了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连续统。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首要功能在于提升命题信息的准确性,位于连续统的左端,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体现了作者与读者通过互动协商来构建命题信息,位于连续统的右端,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旨在减轻作者对命题信息的个人承诺,位于连续统的中间。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英语新闻语篇中的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等级: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 > 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 > 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表明了作者对读者的态度、信念,特别是对读者的面子或个人形象的关注,带有明显的交互主观性。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体现了作者对命题真值个人承诺的调控,表现了作者的主观性。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倾向于表达命题信息的客观性,此时作者的主观性较弱。本文从识解的角度对英语新闻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等级进行了认知阐释。本研究突破以往模糊限制语研究的藩篱,从主观性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模糊限制语语用动因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模糊限制语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加深了对模糊限制语本质的认识,同时对英语新闻语篇教学特别是模糊限制语语用能力的培养也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Chen, Chenghui, and Lawrence Jun Zhang. "An Inter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Use of Hedging by Chinese and Anglophone Academic English Writers." *Applied Linguistics Review*, vol. 8, no.1, 2016, pp. 1-34.
- Chen, Chenghui, et al. "A Study of Hedges in Academic Discourse from an Intercultural Rhetoric Perspectiv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no. 4, 2016, pp. 36-43. [陈成辉等:《跨文化修辞视角下学术语篇模糊限制语探析》,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4期,第36-43页。]
- Chen, Lang, and Guangwei Hu. "Surprise Marker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Articles: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Lingua*, vol. 248, 2020, pp. 1-12.
- Deng, Yunhua, and Xingang Qi. "The Subjectification Process and Cognitive Mechanism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ause-Effect Compound and Complex Sentence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5, 2019, pp. 699-711. [邓云华、齐新刚:《英汉因果复句主观化的历程和机制》,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5期,第699-711页。]
- Dontcheva-Navratilova, Olga. "Cross-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Use of Hedges and Boosters in Academic Discourse." *Prague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vol. 5, no. 1, 2016, pp. 163-84.
- Finegan, Edward.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An Introduction."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edited by Dieter Stein and Susan Wright, Cambridge UP, 1995, pp. 1-15.
- Fraser, Bruce. "Hedging in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Bush 2007 Press Conferences." *Perspectives in Politics and Discourse*, edited by Urszula Okulska and Piotr Cap, John Benjamins, 2010, pp. 201-13.

- Gao, Yu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Discourse Interaction in Western and Chinese Medical Research Articles: A Corpus-Based Analysis of SCI Research Articles." *Technology Enhance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no. 180, 2018, pp. 78-83. [高芸:《中西医英语科研论文语篇互动性对比研究——基于SCI期刊论文的语料库分析》,载《外语电化教学》2018年第4期,第78-83页。]
- Hu, Guangwei, and Feng Cao. "Hedging and Boosting in Abstracts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rticl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Medium Journals."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 43, no. 11, 2011, pp. 2795-2809.
- Hyland, Ken. "Writing Without Conviction? Hedging in Science Research Articles." *Applied Linguistics*, vol. 17, no. 4, 1996, pp. 433-54.
- . *Hedging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rticles*. John Benjamins, 1998.
- Jensen, Jakob D. "Scientific Uncertainty in News Coverage of Cancer Research: Effects of Hedging on Scientists' and Journalists' Credibility."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34, 2008, pp. 347-69.
- Jiang, Ting. "On Modal Hedges in EAP: A Study Based on Corpus." *Technology Enhance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no. 4, 2006, pp. 47-51. [蒋婷:《论学术英语中的情态模糊限制语——一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载《外语电化教学》2006年第4期,第47-51页。]
- Langacker, Ronald W. "On Subjectification."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Bridging the Gap*, edited by Jean-Pierre Koenig, CSLI, 1998, pp. 71-89.
- .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Oxford UP, 2008.
- Liu, Chunhong, and Ming-Yu Tseng. "Paradigmatic Variation in Hedging and Boost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scussions in Narrative Inquiry and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vol. 61, 2021, pp. 1-16.
- Liu, Jin. "The Philosophical Study of Linguistic Subjectivity."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no. 3, 2009, pp. 9-12. [刘瑾:《语言主观性的哲学考察》,载《外语学刊》2009年第3期,第9-12页。]
- Liu, Yingliang, and Yang Chen. "Contrastive Study on Stance Markers in MA Thes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by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no. 2, 2020, pp. 81-89. [刘应亮、陈洋:《中美学生硕士论文写作中立场标记语对比研究》,载《中国外语》2020年第2期,第81-89页。]
- Lü, Yizhe. "An Analysis of Reported Speech in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lish News on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no. 4, 2019, pp. 24-35. [吕伊哲:《中美主流媒体关于亚投行英文报道中的转述言语分析》,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24-35页。]
- Peterlin, Agnes, and Marija Zlatnar Moe. "Translating Hedging Devices in News Discour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 102, 2016, pp. 1-12.
- Ponterotto, Diane. "Hedging in Political Interviewing: When Obama Meets the Press." *Pragmatics and Society*, vol. 9, no. 2, 2018, pp. 175-207.
- Qi, Xingang. "A Cognitive Study of Evidentials in English News Discourse." *Journal of Qiqihar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12, 2021, pp. 136-40. [齐新刚:《英语新闻语篇中传信标记的认知研究》,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2期,第136-40页。]
- Rabab'ah, Ghaleb, and Ronza Abu Rumman. "Hedging in Political Discourse: Evidence from the Speeches of King Abdullah II of Jordan." *Prague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vol. 4, no. 1, 2015, pp. 157-85.
- Salager-Meyer, Françoise. "Hedges and Textual Communicative Function in Medical English Written Discourse."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vol. 13, no. 2, 1994, pp. 149-70.
- Shafqat, Asmara, et al.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Use of Hedges in European and Pakistani English Newspaper: A Corpus-Based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vol. 9, no. 5, 2019, pp. 126-37.
- Shen, Jiaxuan. "A Survey of Studies on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4, 2001, pp. 268-75. [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第268-75页。]

Teng, Yongqing. “An Analysis of Pragmatic Functions of Hedging in American Presidential Inaugural Addresse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vol. 5, no. 8, 2015, pp. 1688-94.

Traugott, Elizabeth C. “From Subjectification to Intersubjectification.” *Motives for Language Change*, edited by Raymond Hickey, Cambridge UP, 2003, pp. 124-39.

Weatherall, Ann. “I Don’t Know as a Prepositioned Epistemic Hedge.”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vol. 44, no. 4, 2011, pp. 317-37.

Xian, Lixia. “The Interactional Function of the Hedge ‘Youdianer’.”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no. 4, 2020, pp. 150-56. [鲜丽霞:《汉语模糊限制语“有点儿”的互动研究》,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150-56页。]

Xu, Jiang, et al. “A Corpus-Based Contrastive Study of Hedges in Mainland Chinese and Native Scholars’ English Scientific Research Articles: A Case Study of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Nanotechnology.”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no. 2, 2014, pp. 46-55. [徐江等:《基于语料库的中国大陆与本族语学者英语科研论文模糊限制语比较研究——以国际期刊〈纳米技术〉论文为例》,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4年第2期,第46-55页。]

Yang, Yingli. “Exploring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Variations in the Use of Hedg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Scientific Discour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 50, no. 1, 2013, pp. 23-36.

Zhang, Danqi. “The Pragmatics of Hedge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Debates.”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Journal*, vol. 5, no. 1, 2021, pp. 54-67.

◇责任编辑:陈忠平

《外国语言与文化》征稿启事

由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语言与文化》是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新广出审(2016)5011号]的外语类学术期刊。本刊热切期盼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热忱欢迎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踊跃来稿。现就投稿事宜说明如下:

1. 本刊欢迎以下领域具有独到见解的理论性、实证性和综述性论文:语言与语言学研究、文学理论与批评、区域与国别文化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与测评等,也欢迎介绍相关学科最新动态的新书评介、名家访谈等。
2. 研究性论文篇幅一般在8,000~12,000字,特别优秀的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限制。
3. 为便于匿名审稿,请另页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出生年份、最后学位、职称、工作单位、通信地址、电话号码、E-mail地址等。投稿后3个月内若未接到稿件修改意见或录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4.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优稿优酬。
5. 投稿网址:中国知网“腾云”期刊协同采编系统<http://wywh.cbpt.cnki.net>
6. 联系方式:电话0731-88873041,邮箱jflc@hunnu.edu.cn,微信公众号“外国语言与文化杂志”

文化话语研究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传播 ——基于《中国日报》网站和“网络新闻语料库”的对比分析

◎ 王彦 任欢

内容提要: 在国际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对中国文化在本土的传承及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外传播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但中外媒体对非遗的新闻报道各有侧重,呈现出不同的话语特点。本文对《中国日报》网站和“网络新闻语料库”中的非遗报道话语进行了基于语料库的对比研究,从文化话语研究视角分析中外媒体的非遗国际传播话语在词汇特征、主题内容、言说主体和传播策略等方面的异同,揭示话语背后的社会文化含义,为促进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借鉴。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话语 国际传播 新闻报道 语料库

中图分类号: H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3) 03-0144-13

基金项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融媒体传播话语研究”(19YB08)

作者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北京 100029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3.014

Title: A Corpus-based Comparative Cultural Discourse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etween *China Daily* and News on the Web Corpus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elling China's stories to the world, English news report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ssemination and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is study conducts a corpus-based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news reports on this topic collected from *China Daily* and News on the Web Corpus, and compares the lexical features, news themes, communicative agents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f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media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 The socio-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the study may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ews reports, corpus

Authors: Yan Wang,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China; Huan Re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China.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交流的加强,各国文化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我国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失传和被同化的危机。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受到了相当严重的冲击,部分项目甚至处于濒危状态。非遗的有效传播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而媒体的积极报道可以起到促进作用。有关非遗的问题近年来在学界和业界、官方和民间都有讨论,但大多是从实践的角度探讨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而鲜见非遗传播话语的相关研究。本文从文化话语研究视角切入,对中外媒体非遗报道的话语特征进行对比分析,考察非遗国际传播的内容和影响,探讨如何改进传播策略、增强传播效果,提高对非遗文化内涵的认识,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参考。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播研究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个人视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包括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Stefano and Davis 1)。国外近年来关于非遗的研究大多从文化管理、社会实践和政治经济的视角探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比如对政府非遗保护政策的论证及对各种文化遗产传承途径的探讨(Alkymakchy et al. 355-60),从文化遗产与旅游、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出发探讨国际化进程对非遗的冲击(Vasavada and Kour 22-34),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对文化外交、软实力战略和全球秩序的影响(Winter 319-39)等。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政府的宏观观非遗保护政策和措施研究(刘洋 144-48)、各种非遗形式(民间文学、戏剧曲艺、传统手工艺、武术杂技和古村落等)的传承实践(胡亮 184-86)、地域性或民族性的非遗传承(陈玉茜 102-106)等。此外,近年来非遗项目的商业化与市场开发(如旅游体验、文创市集等)也逐渐引起学界重视(曹星 53-56)。

伴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整个社会信息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非遗网站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Severo and Venturini 1616-35)。2015年7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的颁布为非遗的保护和创新指明了方向。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非遗传播的数字化平台,推动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的有机融合成为一种新的潮流(王龙 193-97)。非遗不仅通过展览、博物馆、大众传媒、商业活动和学术研究等传统方式传播(杨红 235-66),通过新媒体平台如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的非遗传播实践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仝召娟等 16-22)。在全媒体和融媒体时代,非遗传播如何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创新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刘筠梅 29-34;冉红艳、陈实 55-57;何志武、马晓亮 42-47)。

总的来说,目前从宏观管理和具体实践的角度分析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成果不少,对非遗传播策略的讨论也逐年增多,但对非遗传播话语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语言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非遗传播就是相关话语从产生、发布到被受众接受的过程,但目前尚未见到关于非遗传播话语语料库建设的相关研究。虽有少数研究已开始关注非遗传播中

的话语功能,如批判现实主义视角下的话语分析(Skrede and Hølleland 77-96)、基于报纸和网络文本的非遗传播研究(赵路平等 37-45)、非遗译介话语的建构问题(周彩玉 91-93)等,但这些零星的研究尚未形成体系,文化、传播、话语相关领域的理论方法尚需进一步整合。倡导多元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文化话语研究理论近年来在各类话语研究中影响力不断扩大,但对历史与文化汇聚的非遗传播领域影响不足。田德新和葛丹丹对大运河文化带扬州雕版印刷的相关媒体报道所做的文化话语研究(149-53),是将这个多元文化体系运用到非遗对外传播的少数实证研究之一,为揭示话语对非遗传播的作用提供了生动的案例。文化话语研究理论可以在非遗传播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更多非遗话语进行更加系统的分析,有利于揭示此类话语的语言特征、文化内涵及社会意义。同时,大量非遗传播话语也为文化话语理论的应用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一) 文化话语研究理论

当代话语研究理论主要从欧美的语言学、修辞学和传播学等社会科学发展而来。把语言作为社会实践来研究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认为,要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维度进行话语分析,才能全面地描述并解释话语的语言特点、社会活动实质和意识形态意义(Fairclough 18)。国外主流话语分析方法基本都以西方价值观为出发点,缺乏多元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而中国话语分析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也往往以西方的标准和方法为依据,套用西方理论时也未对其做出有效的适应性修订,结果是巩固了西方的话语权、淡化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声音(施旭,《当代中国话语的中国理论》51-58)。在此背景下,施旭提出了文化话语研究这种话语分析新模式,致力于在话语和传播的学术研究中识别、削弱并中立化各种形式的种族中心主义,发展具有文化意识的批评性理论框架,并应用于多样化的人类话语研究(《文化话语研究》11-20)。

根据文化话语研究理论,话语指的是“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下人们运用语言以及其他符号(如表情、道具)所进行的具体社会事件或反复出现的社会实践活动”(施旭,《当代中国话语的中国理论》53)。这是一个超越结构主义的概念,不只是文本及其背后的观念和规则,而且是一个“整体、多元、复杂、动态的现象”(53)。人们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中使用语言进行的交流都可以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

文化话语研究理论包含三个维度:历史与辩证分析的一般原则、多角度的本土立场和全球视野、文化和谐与繁荣的基本准则(施旭,《文化话语研究》52)。该理论将有关范畴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用来描述、分析、解释、阐述和评价话语传播事件,这些范畴包括(1)言说主体;(2)内容/形式/社会关系;(3)媒介使用;(4)目的/效果;(5)文化关系;(6)历史关系(施旭,《文化话语研究与中国实践》10-15)。

文化话语研究的理念强调了建立中国话语范式的必要性,并呼吁话语研究者要关注与当代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本研究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背景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新闻报道进行话语分析,从话语的视角探讨文化传播。因此,以文化话语研究理论所包含的六个范畴作为分析框架,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非遗国际传播话语的语言特征及传播策略,对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研究体系具有促进作用。

(二) 研究问题

本研究运用文化话语研究理论对非遗传播话语进行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从中国的国家英文报纸《中国日报》(*China Daily*)的网站和国外“网络新闻语料库”(News on the Web Corpus)中收集非遗新闻报道,探讨非遗国际传播的话语策略,具体回答如下研究问题:(1)《中国日报》与国外媒体非遗报道的主题内容有何异同?体现了什么文化内涵?(2)《中国日报》与国外媒体非遗报道的言说主体和传播目的有何异同?体现了什么传播策略?(3)《中国日报》与国外媒体非遗传播话语的异同反映了什么社会文化和历史关系?

(三) 语料与研究方法

非遗传播话语在非遗传承实践中产生,媒体报道可提供大量的语料来源。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近10年的国内外英文非遗报道,语料来自代表中国外宣媒体的《中国日报》网站和代表其他国家主要媒体的网络新闻语料库。《中国日报》网站于1994年成立,是中国最大的英文资讯门户,面向国内外英文读者,为国家级重点新闻网站之一。网络新闻语料库由美国杨百翰大学开发,可以提供2010年至今来自20个英语国家的网络报纸杂志的语料数据,每年新增约20亿词汇。

本研究通过搜索并下载2013年1月至2022年12月间《中国日报》网站和网络新闻语料库中含有关键词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闻报道,得到原始语料。通过检索新闻报道的来源,在《中国日报》的相关新闻中删除转载外刊的报道,共获得4635篇新闻报道;网络新闻语料库中的新闻来源显示非遗报道来自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坦桑尼亚在内的五大洲17个国家,共有2149篇新闻报道。然后人工筛选删除内容不相关的报道,去除图像、符号、广告、链接等内容,只保留新闻报道的文本。由于中外媒体关于非遗报道的语篇数量差别较大,为确保对比分析中两个语料库的对等性,本研究在所收集的语料中随机抽取《中国日报》非遗报道和网络新闻非遗报道各2000篇,英文单词数分别为964116和756248。本研究以布朗家族语料库的新成员Crown Corpus(可代表当代美国英语使用现状)为参考语料库(Xu and Liang 175-83),用语料库分析软件AntConc对两个语料库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对比中外媒体非遗报道的异同。

本研究以文化话语研究理论提出的言说主体、内容/形式/社会关系、媒介使用、目的/效果、文化关系和历史关系这六个方面为分析框架,用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方法,探讨网

络报刊这种媒体话语的内容主题、言说主体、传播目的，并对其所体现的社会文化历史关系进行讨论。首先分析文本的词汇特征，通过语料库工具进行词频和关键词的统计，从而发现中外媒体非遗报道主题内容的异同。然后通过对主要引述动词的检索和搭配关系的分析，对中外非遗报道的言说主体和传播目的进行对比。最后从历史与辩证、本土立场与全球视野、文化和谐与繁荣这三个维度解析中外非遗报道不同话语特征背后的社会文化含义。

三、结果与讨论

(一) 中外非遗报道的突出主题及文化内涵分析

根据 AntConc 语料库软件的统计分析,按照高频词的关键值由高到低排序,得到表 1《中国日报》和网络新闻语料库近 10 年非遗报道中排名前 50 的关键词对照的情况。

将表 1 左栏中的 50 个关键词进行分类,可归纳出《中国日报》非遗报道的突出主题,包括如下五类:遗产类别 (opera, dance, art, embroidery, tea, paper, dragon, Kunqu)、活动形式 (festival, exhibition, museum, expo, ceremony, performance, perform)、地域分布和传播范围 (international, national, local, rural, China, province, autonomous region, city, county, village, Beijing, Shanghai, Shandong, Sichuan)、行为主体及其行为 (people, ethnic, miao, folk, UNESCO, visitor, government, protection, list, safeguard, hold)、文化传承及经济生活 (culture, heritage, intangible, tradition, ancient, dynasty, development, tourism, yuan)。

以上主题词分类反映出我国当前文化遗产传承的主要内容、方式和传播现状,也可看出《中国日报》在非遗传播内容及主题选取方面的侧重。比如遗产类别比较关注各种地方戏剧、剪纸、民族舞蹈及特色艺术形式;活动形式主要以节庆、仪式、展览和演出为主;非遗传播的地域范围涉及全国各种行政区划,其中北京(政治和文化中心)、四川(地方传统)等重要地点在非遗传承中的作用比较突出;非遗传播涉及的行为主体非常广泛,上自联合国、各级政府机构,下至民间、各族人民(如苗族),通过制定各种政策和措施、组织各种活动,来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与历史发展相关的主题突出了中国的悠久传统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有 ancient, tradition, dynasty 等具有年代感的高频词,另一方面以非遗为依托的旅游经济也有较多报道,比如代表经济效益的 yuan 关键值较高。

表 1 右栏中的 50 个关键词中也有遗产类别 (cuisine, dance, art, hawker, music, food, yoga, tea, reggae, dish)、活动形式 (festival, museum, exhibition)、地域分布和传播范围 (world, international, national, local, community, country, city, China, Singapore, India, Hong Kong, Japan, Pakistan, Malaysia, Jamaica, Nigeria, Estonia, Korea)、行为主体及其行为 (UNESCO, ministry, people, indigenous, government, folk, list, promote)、文化传承及经济生活 (culture, heritage, intangible, tradition, ancient, humanity, convention, tourism, tourist site) 等五大类。此外,还有 unique, diversity 两个高频词,反映了国外媒体选取非遗报道对象的两个重要标准。

表 1 中外媒体近 10 年非遗报道的关键词对比

《中国日报》			网络新闻语料库		
关键值排序	词频	关键词	关键值排序	词频	关键词
1	13057	China/-'s/Chinese	1	6298	culture/-s/cultural
2	11389	culture/-s/cultural	2	3932	heritage/-s
3	5863	heritage/-s	3	2154	UNESCO
4	4288	intangible	4	2085	intangible
5	4350	province/-s/provincial	5	1753	China/-'s/Chinese
6	4180	tradition/-s/-al	6	1218	cuisine/-s
7	1890	Beijing	7	2062	tradition/-s/-al
8	2315	festival/-s/festive	8	1208	festival/-s/festive
9	2052	opera/-s	9	1189	list/-s/-ed/-ing
10	3749	art/-s	10	1098	tourism/tourist/-s
11	3868	people	11	851	Singapore/-'s/-an
12	1697	ethnic	12	1013	India/-'s/-n
13	1433	yuan	13	788	dance/-s/-ing
14	1523	folk	14	545	Hong Kong/-'s
15	1429	exhibition/-s	15	859	Japan/-'s/-ese
16	2304	national	16	1897	world
17	1291	ancient	17	1017	minister/ministry
18	1068	UNESCO	18	992	art/-s
19	1876	local	19	773	international
20	2035	city/cities	20	432	humanity/humanities
21	1521	perform/-ed/-ers	21	676	hawker/-s
22	1087	dynasty/dynasties	22	1023	national
23	1853	development/-s	23	797	music
24	758	Shanghai	24	682	food
25	1412	tourism/tourist/-s	25	892	local
26	1108	museum/-s	26	288	yoga
27	1384	county/counties	27	1553	people
28	1096	protection	28	365	tea
29	736	autonomous	29	255	reggae
30	709	Shandong	30	618	promote/-s/-d/-ing
31	1434	village/-s	31	982	community/communities
32	1143	international	32	1296	country/countries
33	1266	region/-s	33	269	Pakistan/-'s/-i
34	1013	dance/-s/-ing	34	230	indigenous
35	613	embroidery	35	337	Malaysia/-'s/-n
36	570	miao	36	910	city/cities
37	719	tea	37	315	Jamaica/-'s/-n
38	1289	list/-s/-ed/-ing	38	389	site/-s
39	604	safeguard/-s/-ed/-ing	39	309	Nigeria/-'s/-n
40	563	dragon/-s	40	398	museum/-s
41	764	visitor/-s	41	315	exhibition/-s
42	527	expo/-s	42	393	dish/-es
43	958	paper	43	988	government/-s
44	654	ceremony/ceremonies	44	289	Estonia/-'s/-n
45	1807	government/-s	45	332	unique
46	659	rural	46	354	ancient
47	450	Sichuan	47	348	folk
48	1415	hold/-s/-ing/held	48	214	Korea
49	1223	performance/-s	49	286	convention/-s/-al
50	411	Kunqu	50	243	diversity/diversities

根据这些主题词,可以看出国外非遗报道关注的遗产类别包括世界各民族的特色非遗形式,如新加坡的小贩文化(hawker)、印度的瑜伽和牙买加的雷鬼音乐。在非遗传播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新加坡、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出现频率高,尤其是中国已成为国际非遗报道中的主角。非遗国际传播的行为主体主要是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可见其在非遗名录整理和促进非遗保护方面的作用。

表1左右两栏中相同的关键词反映了中外非遗报道共同关注的主题。表2列出了两个语料库中重复的高频词,总数为22个。这些重复的词大多反映了非遗传播的基本特征。除了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还突出了历史和传统的重要性(tradition)、联合国(UNESCO)和政府(government)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性,以及人(people)在非遗的民间(folk)传承中的作用。中外媒体都围绕艺术(art)、舞蹈(dance)等具体非遗形式,以及节日(festival)、展览(exhibition)、博物馆(museum)等活动形式进行报道,同时强调非遗的本土特色(local)和国际视野(international)。在经济生活方面重点报道了借助非遗传播发展旅游业(tourism)。与中国(China/Chinese)有关的非遗报道在国内外媒体中排名均靠前,这表明近年来中国的非遗传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仅国内媒体有大量报道,也获得了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表2 中外媒体非遗语料库中重复的高频词

序号	主题词	关键值排序		序号	主题词	关键值排序	
		《中国日报》	网络新闻			《中国日报》	网络新闻
1	China/-' s/Chinese	1	5	12	ancient	17	46
2	culture/-s/cultural	2	1	13	UNESCO	18	3
3	heritage/-s	3	2	14	local	19	25
4	intangible	4	4	15	city/cities	20	36
5	tradition/-s /-al	6	7	16	tourism/tourist/-s	25	10
6	festival/-s/festive	8	8	17	museum/-s	26	40
7	art/-s	9	18	18	international	32	19
8	people	11	27	19	dance/-s/-ing	34	13
9	folk	14	47	20	tea	37	28
10	exhibition/-s	15	41	21	list/-s/-ed/-ing	38	9
11	national	16	22	22	government/-s	45	43

在《中国日报》中词频较高却未进入网络新闻语料库前50的关键词中的词汇反映了中国非遗的特色,如中国的地域及行政区划特点、多民族文化特性(ethnic)、悠久的历史(dynasty)、独特的艺术形式(opera, paper, embroidery, Kunqu)。而网络新闻语料库中词频较高却未出现在《中国日报》高频关键词表的词汇反映的是中外媒体对非遗类别、行为主体等方面的不同认识和文化差异。比如关于饮食文化的系列词汇(cuisine, food, dish)出现频率较高,尤其是cuisine一词在关键词中高居第六位,外媒报道均对各国菜系津津乐道。但对中国这样一个饮食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司空见惯的各地美食已不再被当作非遗报道的重点了,与其他更具文化内涵的非遗类别相比所占比例相对较低。

中国非遗报道中突出强调非遗的文化内涵,对传承难度较高的艺术形式尤为重视。比如对词频较高的opera一词进行检索,可以看到除了关键词中的昆曲,还有京剧、黄梅戏、粤剧、山东梆子、评剧、豫剧等各地剧种,以及costume, makeup, mask, troupe, performance等一系列与各种戏曲形式及表演相关的搭配词汇出现。可见中国对戏曲这种艺术瑰宝的保护、传承、发扬、传播关注度较高,而外媒对这种艺术形式缺少详细报道。剪纸和刺绣也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还有中国书法艺术中不可或缺的“宣纸”也提高了paper一词出现的频率。而其他国家对非遗的多样形式及其文化内涵缺乏深入了解,仅有少数报道提到了中国的剪纸和书法,刺绣则只字未提。

两个语料库的词汇使用情况对比反映了中外媒体非遗报道主题内容的异同。相同之处体现了不同文化对非遗共性的相似理解,而不同之处说明我国非遗独特的民族性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尚未被其他民族和文化所了解,还需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让世界真正认识中国。

(二) 中外非遗报道的言说主体、传播目的和传播策略分析

新闻报道是通过记者对发生的客观事实进行主观反映之后形成的观念性信息,是记者把自己对客观事实的主观理解传达出来而产生的话语,因此记者作为传播者在选择报道内容、转述或引述消息来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主观意愿表现。中外非遗报道内容的差异也可以通过分析消息来源或事件的言说主体及传播目的得到进一步解释,从而加深对不同媒体报道背后社会文化差异的理解。

《中国日报》非遗报道的言说主体示例

while, some of the volunteers say that they also have benefited fr
s. In addition, conservationists say the illegal wildlife trade continu
; tradition alive? Local officials say they are waiting for the Shaanxi
The crew of the documentary say they hope to show the everlasti
ehavior of consumers, experts say Consumers widely support the
ell as the wind. Archaeologists say underground dwellings are a reid
embroidery. The authorities say the Chinese way of promoting a
der master Chen, the brothers say that their training was anything
age award. Historical archives say the city's famous eggs were alre
oreign visitors, the organizers say. According to Nguyen Tien Da, d
f the artist's body heat. Artists say that it takes a total of 10 proces
population, some expatriates say. In general though, most say the
" is a big deal. But sociologists say the lack of effective communica
Shuangjun and Chen Zhenglei say that they'll continue to lead the
in the world today. Historians say the discovery of this patch of wil
have been enhanced, officials say. Among China's poorest provinc
rdling and timing. The experts say it is vital to get the proportion
ur painter and photographer, says he does not regret doing jobs r
cher at the National Museum, says the play Qiang Qin is accompar
e the beauty of our country," says Xia Hua, founder and chairwor
atfsmanship in its curriculum, says Jia Ronglin, deputy dean of the
os provided to China Daily Lin, says his painting is based on traditic
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aid Sun Guilin, dean of the Jilin Aca
se cultural counselor in Egypt, said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
ng Opera costumes. Al-Sayed, said she was eager to learn about Cl
ween the Beijing and Athens," said Cao Pengcheng, deputy directo
elop mutual tourism culture," said Qian Zhen, CEO of destination r
e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said Tan Shu, director of the China C
any different types of paper," said Tang, who leads a team of expe
l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aid officials with the Hainan Cultur

网络新闻语料库非遗报道的言说主体示例

to wildlife groups. Critics say the ban will just move the trade
ones instead. Researchers say reducing demand is the only effe
khuus. At first, observers say, the mother either ignores the ca
African elephants. Experts say about 10 million of the ancient c
nal conservationists, who say between 30-40,000 elephants ea
tamped out, campaigners say, if mammoth ivory continues to l
j, mammoth ivory traders say demand for their products has ir
ng it to Unesco. Panelists say no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
op. But butchers in France say militant vegans are on the rise, u
v, poor treatment Activists say that the lakes located in this belt
scale ones, KSPCB officials say, are the biggest violators of norr
r legs. Farmers in the area say that the water and soil are so
imchi, both Kang and Park say their mothers frowned upon it.
nwhile, Deputy Pat Breen says he has been lobbying intensely
em urgently. As UNESCO says, we must actively safeguard our
ie, but much has changed, says ballet master Proeung Chhieng
aking is well under way," says Malkhaz Kharbedia, president o
h America. Chef Gonzalez says there are excellent restaurants i
ents. Sociologist Lhuissier says that there has been a shift towa
Caps coach Mike Hesson says a series win is more important t
tastes." The ambassador says Mexico and South Africa are wo
ep it alive. Money is tight. Said Chhieng, the master dancer: "W
lister Heather Humphreys said keen interest has been expresse
l director Rudolph Alama said. The festival continues to give lc
red by the outside world," said Georgian wine enthusiast Levar
mbassador Grant Griffiths said the governments of Jamaica an
han mothers, Murata also said he wants to promote Japanese l
ide Jamaica," the minister said. The junior minister, speaking
at security. Industry experts sai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
uide, 72% of respondents said provenance was the most impo

▲图1 中外媒体非遗报道的言说主体对比: say/says/said 检索行(部分)

新闻报道中事件的言说主体可以通过查找引述动词的主语来确定。图 1 展示的是两个语料库中引述动词 say 及其变化形式 says 和 said 的部分检索行。

从图 1 的言说主体示例中可以看出,《中国日报》比较注重引用专家学者 (experts, sociologists, historians, archeologists)、权威人士 (authorities)、官方人士 (officials) 的观点;涉及具体的非遗形式,也让非遗传承人和实践者 (artists, photographer, painter, calligrapher, trainer, volunteers, organizers) 发声。国外媒体除了较多引述专家学者的说法与《中国日报》相似之外,更加注重联合国机构 (UNESCO) 和政府官员 (officials, panelists, ministers, ambassadors) 的观点。此外,还引用了一些批评家 (critics)、观察员 (observers)、活动家 (activists, campaigners, animal conservationists) 的说法,因为这一类言说主体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力比较大,而在中国媒体上比较少见对活动家话语的引述。国外媒体对于非遗实践者的话语引用也较多,但实践者类型与中国不同。中国多侧重艺术类的专业非遗传承者,如画家、书法家、戏剧表演艺术家等;而国外的非遗实践者除了舞蹈家 (master dancer, ballet master),还有面包师、厨师 (chef) 等,这与外媒关于饮食文化的报道较多有关。此外,国外媒体中引述动词的主语中普通人较多,而且一般都指出本人姓名,通过普通人的讲述来报道非遗实践活动。而中国媒体报道对普通人的实践活动描述较多,但对其话语引述较少,更多的引述动词主语是代表一定权威的人士。这与中国读者尊崇权威性的传统观念有关,而西方媒体更注重突出个人,以增强报道的亲合力。

非遗报道的传播目的是通过记者的报道意图及报道中言说主体的行为意图共同实现的,

《中国日报》非遗报道的目的句示例

were historical manuscripts. **in order to** recreate the art work, Qian and of the 2003 Convention, **in order to** begin the work of inventory livelihood project since 2011 **in order to** provide a healthy environment. Craftsmen still train apprentices **in order to** pass on traditional carving techniques well a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maintain and develop disappearing edible raw material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raditional crafts. A held in over 10 other cities **in order to** build appreciation for Dongbei and enhance inheritance skills **in order to** foster the role of culture. Dragon Head-Raising Festival, **in order to** showcase the folk culture of going into Gaomi clay sculpture **in order to** interweave the three folk arts. The Chinese Dream was raised **in order to** attain the greatest rejuvenation. Role work must be repainted. **in order to** create more vivid paintings, exchanges and exchange experience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use of bilateral facilities to facilitate business operations **in order to** support regional trade and in primary schools since 2014 **in order to** instill the practice in younger generations to develop about 100 new styles **in order to** meet market demands and reform formed by local Miao people, **in order to** protect and inherit unique sorted the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order to** keep this art form booming. Perform luoguzaxi in Beijing **in order to** celebrate the apple promotion. In the Kallaway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continued transmission and cultural law enforcement **so as to** keep up with cultural reform modified by electronic music, **so as to** present the rich culture of deeply rooted in the town **so as to** truly contribute to our industrial African nations to do more **so as to** attain the goal of a and project-oriented model **so a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most suitable and other sub-regional plans **so as to** promote comprehensive connect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o as to** improve mutual understandings on judicial proceedings, **so as to** ensure the public's right by environment is conserved, **so as to** constantly promote harmony by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fair play, **so as to** maximize the potential and vitality

网络新闻语料库非遗报道的目的句示例

phonics singing in Central Africa **in order to** seek addition to the list, safeguarding our shared memory. **in order to** support this effort, increasing in part of our cultural heritage **in order to** achieve greater knowledge of the to cook food more meticulously **in order to** promote good health and digest we must adapt to modern times **in order to** remain relevant. Ingredients like promote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 **in order to** build the climate of peace e central halls of the tenements **in order to** hook the attention of the Scheme has been introduced **in order to** invigorate and revitalise the various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reforms **in order to** increase universal respect for justice. Matose for some years is revived **in order to** promote our country as a Jaffrelot in the Indian Express. **in order to** restore public confidence, India to the telecom service provider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only authorised ancient artists were to be "graded" **in order to** equally distribute central funds activity is primarily performed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strongest of the rich artistes were to be "graded" **in order to** equally distribute central funds activity is primarily performed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strongest of the renaissance of the village cows **in order to** procreate. Nationhood, in terms White Revolution in India. **in order to** sustain a multiplied production this power to make legislations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international laws new capital of the state of Osun, **in order to** compete with the rich past government to ban the ivory trade **in order to** protect African elephants. Celestin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universal respect for justice programs is considered desirabl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when the ferry is able to run, **in order to** help support their families during tea masters annually since 2013. **so as to** inherit the HK-style milk making process more transparent **so as to** guarantee culture rights, including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o as to** bolster the country's soft e and people sectors are needed **so as to** address the teething issues and culture, specifically framed **so as to** register the politically-engineered arts and crafts by local artists **so as to** develop the sector. The secretary

▲图 2 中外媒体非遗报道的传播目的对比: in order to/so as to 检索行 (部分)

因此记者对报道的主题内容以及对言说主体话语的转述有不同的选择。非遗报道中的目的句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媒体及事件行为主体的传播目的。图2是两个语料库中目的句(含有in order to和so as to句子)的部分检索行。

通过对比发现,《中国日报》的非遗传播目的可以概括为:保护支持、宣传促进、传承培育和发展创新。这反映出中国政府近年来的非遗保护政策比较明确,各级政府和民间传承实践也相对连续地贯彻了国家的发展战略,在传播文化遗产的同时也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在国际上树立积极的国家形象。而国外媒体报道中体现的非遗传播目的缺少明确的指向性,具体事件报道和不同言说主体的目的各不相同,比如增长知识、促进健康、加强尊重、重建信心、遵守法规、保护动物、保障权益、发展行业、增进和平等。这些传播目的比较多样化,大多比较微观,与中国的宏观目标相比有很大差异。这与各国的非遗保护政策和实践各有侧重有关,也反映了不同媒体对不同国家非遗传播目的的解读有一定的差异。同时还可以看出明显的全球视角,比如与国际政治、立法、和平、环保等主题相关的非遗传播目的。与中国媒体主要立足于本土文化对外传播的基本目的相比,国外媒体更注重推广普世价值。

两个语料库中非遗报道言说主体和传播目的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外媒体传播策略的差异,说明了媒体代表的利益方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中国日报》作为中国政府的官方英文媒体,面向国际读者传播非遗,旨在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其传播策略是立足本土文化,强调文化遗产的内涵和价值,注重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而网络新闻语料库中收录的外国媒体情况比较复杂,代表不同国家的官方和非官方的观点。总体而言,国外媒体关注的是非遗形式的多样性及相关个人的做法和看法,旨在把各国文化遗产作为独特的事物介绍给国内外读者,让个人发声,以小见大,注重报道的亲合力。

(三) 中外非遗传播话语的社会文化含义分析

本研究的语料来源《中国日报》网站和网络新闻语料库,分别代表了中国主流媒体和其他国家主要媒体的观点。对比同一时间段中外非遗报道两个语料库的样本,可以看到报道的篇数和篇幅有很大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媒体对非遗的报道力度相对较大。“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传统文化”的理念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而其他国家媒体的新闻报道对文化主题的关注度远不及对政治经济领域新闻的兴趣。中外媒体非遗报道在主题内容和传播策略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差异性更加显著。其中的社会文化含义可以从人类非遗的共同性和中国非遗的独特性这两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背景下,作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各国的非遗保护受到普遍重视。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于2004年8月加入。《公约》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和拥护,目前已有181个缔约国。这有力地证明了全世界保护非遗的目标是一致的,其保护和传承也符合各国的

共同利益。《中国日报》和网络新闻语料库中非遗报道的共同高频词大多数都与非遗的国际概念相吻合，充分体现了中国与其他国家非遗传播话语的一致性。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加强非遗的国际传播，努力使中国非遗融入世界文明，促进世界文化的和谐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自己的文化独特性。非遗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具有不可复制性，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很难被西方充分理解。而从非遗的社会历史意义来说，表现形式独特的文化遗产更具艺术价值。《中国日报》的报道突出了中国非遗的历史文化特征，旨在宣扬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非遗传播话语只有突出中国文化身份，彰显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历史内涵和艺术气质，才能在世界文明中凸显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

在文化话语理论视角下，只有充分考虑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未来发展，同时兼顾全球视野和国际传播策略，才能使中国媒体的非遗报道在国际上产生更大的影响。《中国日报》的很多非遗报道在强调非遗民族性的同时也强调文化的世界性，既有本土立场也有全球视野。比如，在一篇标题为“Charting New Cultural Horizons”的新闻报道中，来自中国的近80位艺术家、工匠和非遗传承人参加了在多伦多举办的“当代中国”艺术节，与加拿大的艺术家一起展示中国的民俗文化，表明文化是没有边界的，是连接中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桥梁。根据文化话语理论，这篇报道不仅仅是一条新闻，也是一种体现文化和谐与繁荣基本准则的传播话语，为中国文化艺术走向世界进行了有效宣传。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中国日报》报道了很多关于技艺传承的内容。比如“Art Lessons”这篇报道介绍了京剧在中国年轻人中的传承实践。京剧经典剧目《击鼓骂曹》在课堂上由年轻人来演绎，让学生切实体会到京剧的韵味，培养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这种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体现在《中国日报》的许多非遗报道中，无论是对非遗项目还是对非遗传承人的介绍，报道的重点都是围绕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对非遗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描述，对未来前景进行展望。依托非遗项目的旅游业虽是经济生活的一部分，但相关报道在强调非遗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重在传播传统文化。地方政府突出宣传当地与非遗项目相关的活动，如展览或比赛，通过文化形式促进旅游业发展。非遗形式与内涵的创造性转化、非遗传承人的开拓创新也是《中国日报》非遗报道的关注点。

总的来看，中外媒体非遗报道的话语特征和传播策略存在明显差异。《中国日报》的非遗报道内容丰富、主题多样且紧跟国家形势，旨在促进自身发展和国际交流；而国外媒体更关注具体非遗形式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报道各种非遗实践活动，而对其文化内涵的挖掘不够深入。中国非遗报道的主题内容体现了我国非遗独特的文化内涵，反映了民族文化特性和悠久的历史传统，传达了文化认同感和文化传承的迫切感；而国外媒体在报道中国的非遗时具有不同的侧重点，这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中国社会发展存在偏差，未能与时俱进地报道中国非遗传承的现状。

中国媒体的非遗报道旨在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弘扬传统文化，树立中国的积极形象，因此在言说主体的选择上倾向于权威和专业人士。而国外媒体的传播目的比较多样化，在报道非遗的同时还涉及其他全球性问题，言说主体有很多普通人。在这一点上，中国媒体也需开阔国际视野，把中国文化与世界体系联系起来，结合全球共同关注的事务和贴近生活的问题来讨论文化现象，弱化带有官方色彩的对外宣传，使国际社会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本文的语料虽来自网络，但研究对象仍是传统媒体上的新闻报道，而未讨论新媒体的传播形式。随着社交媒体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日益加深，我们的文化传播实践有效地利用了多种媒体平台，运用数字技术生成多模态话语，增强传播效果，由此新产生的话语形态值得更加深入广泛的研究。因此，中国非遗的国际传播应不断改进传播策略、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进一步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了解。唯有充分认识到话语在传播中的作用，才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lkymakchy, Nahedh T., et al. "A Comparison between Synthetic Space Analysis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Investigation in Urban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in the Digital Era*, vol. 1, no. 1, 2012, pp. 355-60.
- Cao, Xing.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the New-media-based Transmission Linkage to the Inform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n Leisure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miss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through New Media in Yunnan." *Journal of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 32, no. 4, 2015, pp. 53-56. [曹星:《非遗借助新媒体与旅游实现联动传播可行性分析——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为例》,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53-56页。]
- Chen, Yuqian. "Exploring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f the Contemporary Liao Songs of the Zhuang Ethnic Gro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versification." *Sichuan Drama*, no. 12, 2016, pp. 102-106. [陈玉茜:《多元化视野中的当代壮族嘹歌传播策略新探》,载《四川戏剧》2016年第12期,第102-106页。]
- Fairclough, Norma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Longman, 1995.
- He, Zhiwu, and Xiaoliang Ma. "Communication of Micro Documentari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Era of Media Convergence." *Chinese Editors Journal*, no. 9, 2022, pp. 42-47. [何志武、马晓亮:《融媒体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微纪录片传播》,载《中国编辑》2022年第9期,第42-47页。]
- Hu, Liang. "Digitalization, Communic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Exemplified by the Folk Skills and Opera Varieties of Boat Village in Hangji Town." *Art Evaluation*, no. 5, 2016, pp. 184-86, 179. [胡亮:《传统古村落非遗项目数字化展示、传播应用示范——以杭集“船村”古村落中民间传统技艺与戏曲音乐品种为例》,载《艺术评鉴》2016年第5期,第184-86,179页。]
- Liu, Yang. "On the Precise Management and Polic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xi*, no. 7, 2019, pp. 144-48. [刘洋:《论我国“非遗”保护的精准管理与施策》,载《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第144-48页。]
- Liu, Yunmei.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mission Mod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Performing Arts in the All-media Era." *Journal of Chinese Culture*, no. 6, 2017, pp. 29-34. [刘筠梅:《全媒体时代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模式分析》,载《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6期,第29-34页。]
- Ran, Hongyan, and Shi Chen.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Short Video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Context of All Media." *China Publishing Journal*, no. 19, 2021, pp. 55-57. [冉红艳、陈实:《全媒体语境下非物

- 质文化遗产短视频的生产与传播》，载《中国出版》2021年第19期，第55-57页。]
- Severo, Marta, and Tommaso Venturini.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ebs: Comparing National Networks with Digital Methods." *New Media & Society*, vol. 18, no. 8, 2015, pp. 1616-35.
- Shi, Xu. *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 Researching Chinese Theory, Methods and Topics*. Peking UP, 2010. [施旭:《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 "Exploring a Chinese The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iscourses." *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5, 2013, pp. 51-58. [施旭:《当代中国话语的中国理论》,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51-58页。]
- . "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 and Its Chinese Practice."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vol. 15, no. 6, 2018, pp. 1, 10-15. [施旭:《文化话语研究与中国实践》,载《中国外语》2018年第6期,第1,10-15页。]
- Skrede, Joar, and Herdis Hølleland. "Uses of Heritage and Beyond: Heritage Studies Viewed through the Lens of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ritical Realism." *Journal of Social Archaeology*, vol. 18, no. 1, 2018, pp. 77-96.
- Stefano, Michelle L., and Peter Davis, editor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Routledge, 2017.
- Tian, Dexin, and Dandan Ge. "A Discourse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emplified by Yangzhou Woodblock Printing." *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 to Cultural Relics*, no. 8, 2022, pp. 149-53. [田德新、葛丹丹:《话语研究视域下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外传播研究——以扬州雕版印刷为例》,载《文物鉴定与鉴赏》2022年第8期,第149-53页。]
- Tong, Zhaojuan, et al. "Status an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 of China's Offi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in the Use of Sina Weibo and WeCha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vol. 61, no. 2, 2017, pp. 16-22. [全召娟等:《我国非遗保护政府机构官微利用现状及优化策略》,载《图书情报工作》2017年第2期,第16-22页。]
- Vasavada, Falguni, and Gurpreet Kour. "Heritage Tourism: How Advertising is Branding the Intangibles?" *Journal of Heritage Management*, vol. 1, no. 1, 2016, pp. 22-34.
- Wang, Long. "Digit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Era of 'Internet+'." *Seeker*, no. 8, 2017, pp. 193-97. [王龙:《“互联网+”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载《求索》2017年第8期,第193-97页。]
- Winter, Tim. "Heritage Conservation Futures in an Age of Shifting Global Power." *Journal of Social Archaeology*, vol. 14, no. 3, 2014, pp. 319-39.
- Xu, Jiajin, and Maocheng Liang. "A Tale of Two C's: Comparing English Varieties with Crown and CLOB (The 2009 Brown Family Corpora)." *ICAME Journal*, no. 37, 2013, pp. 175-83.
- Yang, Hong. *Frontier Researches on 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singhua UP, 2017. [杨红:《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与传播前沿》。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 Zhao, Luping, et al. "A Study o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mmunication Based on Newspaper and Web News Report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vol. 59, no. 14, 2015, pp. 37-45. [赵路平等:《基于报纸和网络文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研究》,载《图书情报工作》2015年第14期,第37-45页。]
- Zhou, Caiyu.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ranslation Discours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ichuan Drama*, no. 11, 2016, pp. 91-93. [周彩玉:《非物质文化遗产译介话语建构与文化传播研究》,载《四川戏剧》2016年第11期,第91-93页。]

◇责任编辑:胡桑